



从1921年起，到2002年
的81年间，全世界共有
1648人从38条路线上登
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共有472人遇难死亡，但
攀登珠峰的勇敢者们仍
在一年比一年增多，这
就是珠峰的魅力，就像
马洛里说的，*Because it
is there.* “因为它在那
里！”

N817.6

1

ISBN 7-80671-427-8

9 787806 714270 >

ISBN 7-80671-427-8/K · 39

定价：42.00 元



《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探险珠峰

周正著

漓江出版社

出版总策划：杨迅文
组 稿：张 维
项目主持：江金辉
装帧设计：西里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险珠峰 / 周正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11

(《中国西藏》视点·丛书)

ISBN 7-80671-427-8/K · 39

I . 探... II . 周... III . 珠穆朗玛峰—探险 IV . N8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8815 号

责任编辑：黄新英

特约编辑：黄 源

探 险 珠 峰

周 正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中国地质科学院 562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 960 1/16 印张：20.625

字数：270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71-427-8/K · 39

定价：42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中国西藏》视点·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朱维群

编委会主任：刘延东

编委会副主任：朱维群

编委会委员：常荣军 斯 塔

张晓明 姚茂臣

《中国西藏》视点·丛书编委会

前 言

结缘珠峰

1955年6月，我国派4位青年前往苏联的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登山运动的战术和技术。组织上安排我担任翻译兼学员。这一极为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新中国最早接受这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学习结束后，我们又和苏联登山队员一起，登上了吉尔吉斯境内、帕米尔高原上的“十月峰”和“团结峰”，创造了新中国第一个登山高度记录。我发现，原来大山有那么多的奥秘，攀登高山还有那么多的学问。从那时起，我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

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高山探险和高山科学考察，直接参与国内和国际合作的一些重大登山活动。出于兴趣和工作的需要，我学习关于山的知识，研究山体的结构、山间各种危险的形成、攀登高山的战术和技术；研究国内外登山的历史和现状，分析高山探险的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一切，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大山的无穷奥秘和魅力，吸引我笔耕不止，乐在其中。

珠穆朗玛峰是全世界万山中的王者，是五大洲高山中的明珠和瑰宝，也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千百年来，它沐浴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传说，屹立在地球的最高点，吸引着众多的高山探险家前来挑战。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人类就开始挑战珠峰，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53年5月29日才由参加英国珠峰探险队的新西兰人E·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两人登上珠峰，第一次揭开了珠穆



朗玛峰的神秘面纱。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前仆后继，为征战珠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谱写了许多悲壮、可歌可泣的篇章，也获得了令人惊异和欣喜的重大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向珠穆朗玛峰的挑战过程，也是一部高山探险事业的发展历史。它记录了高山探险各个不同阶段的历程、战术技术的发展和演变、成功的奥秘和失败的原因，以及人们在挑战珠峰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一些自然现象和变化的规律。这些，对后来者无疑有所裨益，对今后的科学考察、经济开发和国防建设也都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珠穆朗玛峰仍然是世界各国探险家和登山爱好者向往的地方。随着经济和科学的日益发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必将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青少年投入这项极有意义的活动中去。本书如能对他们从事此项活动有所启迪和帮助，将是作者的最大欣慰。



目 录

前 言 结缘珠峰 / 1

第一章 自然珠峰 / 1

地球最高极 / 1

成长中的最年轻地质单元 / 6

珠峰自然保护区 / 7

珠峰地区的动植物 / 18

第二章 冠名珠峰 / 24

三姐珠穆朗玛 / 24

大清钦天监官员胜往等人藏测绘 / 27

珠峰如何变成埃佛勒斯峰 / 29

中国人为珠峰正名 / 31

第三章 探险珠峰(上) / 35

藏人对神山的禁忌 / 35

英国人的特权：七次冲顶 / 38

二战后各国探险家的努力 / 56

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

希拉里和丹增的成功 / 60

瑞士队一箭双雕 / 67

第四章 探险珠峰(中) / 69

中苏联合队的组建 / 69

公鸡母鸡和鸡蛋妈妈 / 72

关于中国女队员登顶问题的争执 / 74

目 录 ◎

- 阿巴拉科夫对我的指责 / 77
- 莫斯科—北京峰的命名争执 / 80
- 结组长斯科勒巴卡托夫给我的启发 / 83
- 伊万诺夫和苏共党的小组会 / 86
- 中苏联合侦察 / 88
- 中苏联合队的离奇解体 / 91
- 周总理的问题与支持 / 93
- 意外的情报 / 95
- 珠峰脚下的新村 / 98
- 周总理的新指示 / 102
- 刘连满的奉献 / 104
- 把国旗和毛主席像留在珠峰顶 / 107
- 刘连满的“遗书” / 109
- 中国队创造的奇迹 / 113
- 中苏希夏邦马峰合作之议 / 114

第五章 探险珠峰(下) / 121

- 美国队登顶并会师珠峰 / 121
- 从珠峰滑雪下山的日本人 / 130
- 多国联合登山队鲜能成功 / 141
- 希拉里解析意大利队 / 143
- 日本队秋季登顶成功 / 144
- 首位登顶女英雄田部井淳子 / 146
- 中国觇标与梯子 / 148
- 首支英国队从西南壁登顶 / 165
- “无氧”与“全天候”攀登珠峰的新时代 / 172

第六章 喜马拉雅的“铁器时代” / 177
日本队捷足先登 / 177
莫须有的贡嘎山特务 / 183
突破“季节禁区” / 186
美国队开创东壁路线 / 188
4支日本队各出奇招 / 190
《植村直己的故事》拍摄奇迹 / 193
关于高山向导的思考 / 195
或成功或失败的各国珠峰队 / 196
中日尼三国队员成功“双跨” / 199
22小时登顶与乘滑翔器下山 / 208
登顶人数最多的中美苏珠峰联合队 / 211
切森单人“无氧”登顶 / 213
世纪末创造奇迹 / 215
102人登顶的1992年 / 219
攀登珠峰的各种第一 / 221

第七章 长眠珠峰 / 232
英国人的质疑 / 233
英国人对解开“马·欧之谜”的执迷 / 235
揭开谜底的一线希望 / 237
多年的努力 / 240
美国探险调查队找到马洛里 / 243
美国队成功的原因 / 248

第八章 珠峰气象知识与天气预报 / 251
珠峰南北气候不同 / 251
珠峰南北攀登气象条件不同 / 252
正确选择登山季节 / 254
扬起哈达暗示风云 / 255
“狭管效应”带来大风 / 258
背风波涛暗藏玄机 / 261
热岛效应改变急流 / 264
地面风速朝夕巨变 / 265
风冷效应牢记在心 / 266
河水径流日差很大 / 267
做好登山天气预报 / 268
第九章 有关珠峰的一些技术问题 / 272
“人类死亡地带”与“生物禁区” / 272
攀登珠峰的“三脊路线” / 275
珠峰三壁 / 280
南北两侧登顶孰难孰易 / 285
珠峰顶上的风力和气温 / 289
珠峰登顶中的向导与高山协作——夏尔巴、藏人、牦牛 / 291
中国西藏登山队 / 292
全球 14 个 8000 米以上峰群与 29 座 8000 米高峰 / 302
注 释 / 310
附 录 中国和世界的高山 / 312
后 记 / 326



第一章 自然珠峰

地球的南极、北极早已为大众所熟知，2000 多年前就有人对极地进行过探险。自 13 世纪起更倍受重视，开始了有意识地具有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然而，地球还有一个极在相当长时间内鲜为人知，这就是它的高极——青藏高原。一个多世纪前，人们才注意到这块神秘的地域，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块土地在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因而愈来愈加重视，并成为科技竞争的热点之一。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地球第三极之极点。

地球最高极

珠穆朗玛峰之所以被称为地球最高极，自然科学家归纳为两个原因。

一是它的高度。首先确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是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印度测量队。1848~1852 年，在乔治·埃佛勒斯和安德鲁·华夫的领导下，从 100 多英里之外的印度平原，安置传统光学机械测量仪器，进行远距离观测，以当时印度洋为基准面，从喜马拉雅山摩天群峰中首次推算出珠穆朗玛峰(当时他们称之为埃佛勒斯峰)的海拔为 8840 米(29002 英尺)，珠峰第一次被确认为地球上的最高峰。其后，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成为各国学者所关注而热烈讨论的问题，曾先后经过近 10 次有记录的测量，按照各国至今公布和曾被采用过的珠峰海拔高程，分别有：8888, 8882, 8840, 8842, 8847.6, 8846, 8848.13, 8872, 8846.10 和 8848.84 米等，其中，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约 42 米。由于这些测量是从不同坡向、使用不同的现代测量仪器和参数测定的，所采用的不同高程系，如黄海高程系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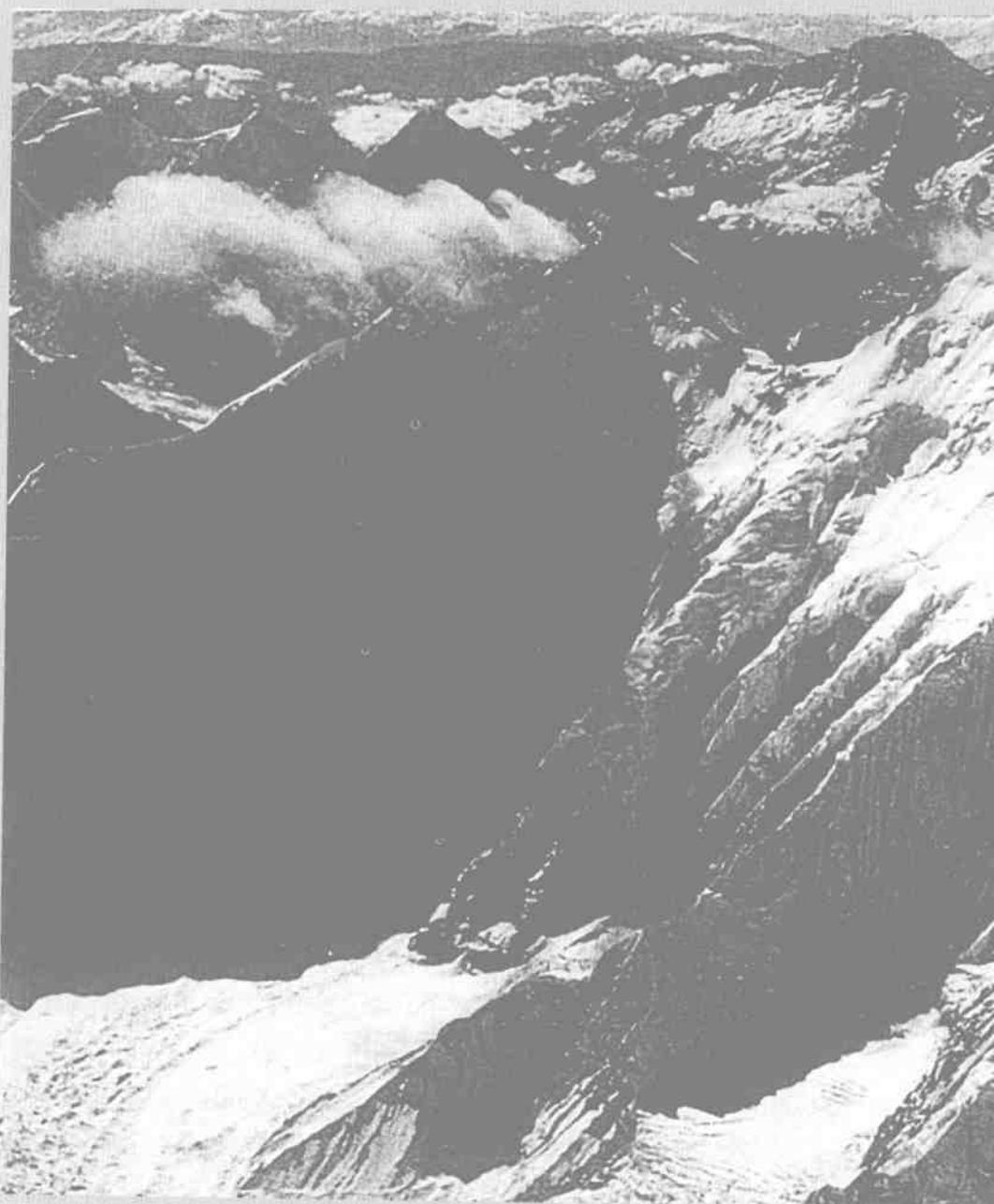
地球还有一个极在相当长时间内
鲜为人知，这就是它的高极——青藏
高原。



Makalu
马卡鲁峰 8481 米

Lhotse
洛子峰 8511 米

South col
南坳 8000 米



珠 峰 鸟 瞰 图

East face
珠峰东壁

Qomolangma
珠穆朗玛峰

North Face
北壁

West Ridge
西山脊

North col
北坳 7007 米

Khumbu Glacier(Icefall)
孔布冰川

Changste
章子峰(北峰)7543米

Rongbuk Glacier
绒布冰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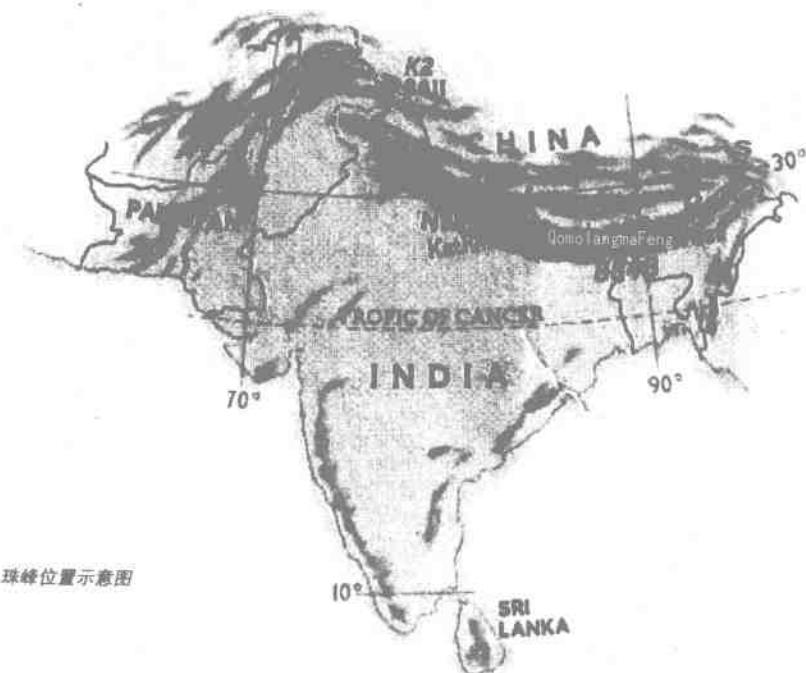
North east Ridge
东北山脊

章子峰与东北山脊
之间是东北支山
脊。东北支山脊与
东北山脊之间还有
东北壁。

(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
B. Wash. Burn 博士赠 1996.8.24

印度洋高程系，基准面本身之间就存在一个差值，如果按统计规则来看待上述不同的测量高程，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当今珠穆朗玛峰高程可能的变化范围应在8845~8850米之间。目前我国政府公布的珠穆朗玛峰高度为8848.13米，这一数值是通过1975年登山科学考察，以中国青岛黄海海面为高程基准面，以青岛为起点，经过5000多公里的测量，用三角高程交会法反复测量获得的。在大地测量的同时，还运用了天文、重力、定位、高程和气象等测量；1992年经过再次重复测量，还利用GPS进行综合测量。因此，这一高程被认为是比较精确的，尽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提出珠穆朗玛峰不是最高峰，而乔戈里峰可能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是，很快新技术测量数据证实这种异议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我国政府公布的8848.13米这一高程已为国际上大多数人认可、采纳。

二是它的低温气候。珠穆朗玛峰和它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雪峰



珠峰位置示意图

林立，冰雪连绵，一派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青藏高原上也绵延横亘着许多挺拔的高山，这些山脉冰川发育、雪峰林立，成为举世无双的高原；发育有冰帽和小冰盖，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高原上冰雪和寒冻风化作用普遍，现代冰川和冻土发育，多年冻土连续分布，是中低纬度地区最大的冻土岛和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起，影响到全球大气环流的改变。这样寒冷的气候及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只有地球的两极地区可以相比。因此，青藏高原无愧于地球“第三极”的称号，整个高原是第三极的极区，而珠穆朗玛峰是这个极区的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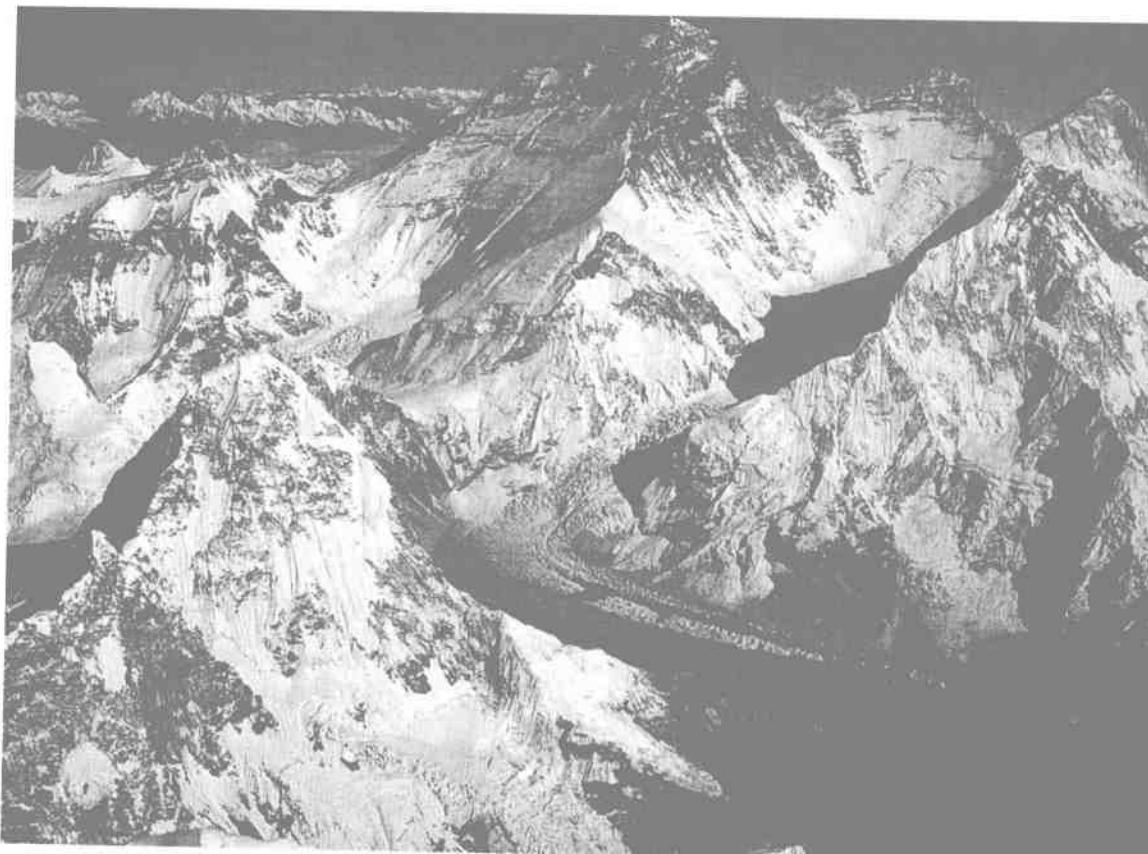
关于“第三极”的正式命名，其始作俑者为瑞士高山探险家、高山探险史学家、地理学家、专门从事地形学与地图绘制的专家麦谢尔·库尔兹(Maichel Kurz 1887~1967)。库尔兹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地理系，后来多次在亚洲的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从事地形和地图的绘制。他走遍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各个高山区，1925年出版《阿尔卑斯登山史》一书，讲述阿尔卑斯山脉上各座高峰的登顶路线，是一本攀登阿尔卑斯山峰的指导性读物。1934年，他远征喀喇昆仑山；1936年，远征喜马拉雅山，主要为绘制这两座大山的地图；1935年发表《喀喇昆仑的高峰》，1936年发表《喜马拉雅山的高峰》。1933年，在日内瓦大学做学术报告时，他提出关于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问题，提出“这座世界最高峰除了它的传统名称之外，它应该是地球上的南、北两极之外的第三个极地，应该叫它‘垂直极’(Perpedicular Pole)，或者叫‘第三极’(The Third Pole)。”他说：“这座高峰形似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1950年12月，英国高山俱乐部(The Alpine Club)在筹备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年会上，英国队队长、著名高山探险家希普顿(E·E·Shipton 1907~1977)提出用“第三极”这个名称很恰当。1946年，希普顿在其所著《Mountaineering Maps of the World》一书中多处引用库尔兹的“第三极”来指称珠穆朗玛峰。

“这座高峰形似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不过，它的升起很年轻这是公认的，因为四千万年前，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质学家称之为特提斯古海。



雄伟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全景图。
自左至右分别为：章子峰（海拔7543米）、珠峰（8848.13米）、洛子峰（8511米）、马卡鲁峰（8481米）。

成长中的最年轻地质单元

珠穆朗玛峰何时、如何升起成为地球之巅？这一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不过，它的升起很年轻这是公认的，因为四千万年前，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质学家称之为特提斯古海。那时根本不存在山脉，全部被浅海海水所淹没，广泛沉积了含海洋生物化石的石灰岩和砂岩。由于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碰撞，大约从三千八百万年前开始，喜马拉雅山逐渐升起，海水退出。但是那时它还并不高，印度次大陆的不断北移，推压青藏高原，而喜马拉雅山地区地处推挤前缘，首当其冲地遭受了巨大的南北向力量的挤压，地壳大规模变动，褶皱冲断和抬升。两千多

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地区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山脉快速抬升，很快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开始影响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青藏高原及其以北地区逐步向干旱化发展。到了七八百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地区又经历了一次快速抬升，山地已上升到3000米以上。不过，喜马拉雅山达到现在的高度还是从最近四百万年以来快速上升的结果，直至现今它还在继续上升之中。现代各种精密测量资料，如大地测量、精密水准测量、三角测量、GPS测量等，证实喜马拉雅山仍在快速上升中，每年平均上升达10毫米左右。珠穆朗玛峰就是在这些上升过程中跑得更快，从而超越群峰，挺拔于山原之上，成为地球之巅的。

藏族史籍中对西藏高原由深海变高峰有着生动的描写：“远古时期，世界一片黑暗、空荡荡的，从虚幻之中，吹来静谧的风，风越吹越大，云越积越厚，顿时大雨倾盆，巨大的雨点像车轮一样，大雨不停地下了许多年，雨停了，出现原始的海……原始的海上又吹来一股风，海面泛起层层微波，就像搅动牛奶一样，形成许多泡沫覆盖海面，泡沫变得凝重而发黄，就像从乳脂中提炼黄油一样，大地从海中产生了……”

自然科学家对喜马拉雅山脉多年的考察发现，构成其山体的片岩和片麻岩，是由海洋里沉淀的泥沙经过巨大的压力和高温变质而形成的。这种海洋积淀在珠峰地区的厚度有三万多米，属五亿多年前奥陶纪到四千万年前的早第三纪地层。这种地层中包含了许多化石，已找到的有20多门类的500多属约1000余种，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现的珊瑚、海百合、鹦鹉螺等化石，这些证明特提斯古海存在的地貌和遗迹的发现，使珠峰地区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成为沧海变桑田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珠峰自然保护区

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所划定的区域包括珠峰所在的定日县，

珠穆朗玛峰就是在这些上升过程中跑得更快，从而超越群峰，挺拔于山原之上，成为地球之巅的。



及其西侧毗邻的聂拉木、吉隆县和东侧相邻的定结县西部地区,大致位于北纬 $27^{\circ} 48'$ - $29^{\circ} 19'$,东经 $84^{\circ} 27'$ - 88° ,全区面积约33819平方公里,人口67000余人,4县均属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所辖。

关于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缘起,据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渤生介绍,1986年11月,美国西弗吉尼亚高山研究所所长丹尼尔·泰勒·艾德博士率团到珠峰地区进行了考察。1988年1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工作委员会。1989年3月18日,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共同努力和美国高山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正式宣布成立。同年10月26日,珠峰自然保护区工作委员会又与美国的高山研究所签定了为期12年的合作协议书。这一创新性的合作项目将保护珠峰地区举世罕见的极高山生态系统及其相邻高原的自然景观。保护这里独特生物区系的多样性以及区内有重大价值的地史遗迹和人类文化遗产;同时该项目还特别强调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最有效、最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途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造福当地人民。

受珠峰自然保护区工作委员会和美国高山研究所的委托,1990~1991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组织队伍对整个保护区做了全面的综合科学考察,并与西藏自治区各有关部门、日喀则地区和保护区管理机构以及保护区所在4县共同制定了珠峰自然保护区总体发展战略及1990~2000年发展规划。该规划已经西藏自治区政府原则批准,付诸实施。

珠峰自然保护区属综合性自然保护区,它以全面保护区内完整的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保护区由核心区(科学保护区,绝对保护区)、科学实验区(缓冲区)和经济发展区(外围区)三大部分组成。

核心区是保护区的灵魂,它是具有典型自然地带意义、保存完

好并且有一定面积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区。它作为判定珠峰及其毗邻地域生态质量的“本底”，是对上述区域进行开发的自然参照物；同时它又是该地区物种资源的储源地，是拯救和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探索生物资源永续利用方法的研究基地。珠峰自然保护区有7个核心保护区。其中脱隆沟、绒辖、雪布岗、江村、贡当5个核心保护区为喜马拉雅南翼湿润、半湿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代表。这5个核心保护区间存有一定的差异，体现了喜马拉雅南翼山地生态系统由东向西的渐变过程。珠穆朗玛和希夏邦马核心区，是喜马拉雅北翼半干旱高原灌丛、草原生态系统的代表。由于该生态是整个珠峰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这两个核心区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科学实验区分布于核心区的外缘，它是为确保核心区免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建立的缓冲地带。在珠峰自然保护区设有陈塘、帕卓—卡达、聂拉木、吉隆和贡当5个科学实验区。

经济发展区是珠峰自然保护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保护区中人口最密集、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地区，它分布于保护区的东北部，总面积占保护区的48%，但集中了保护区70%以上的人口。珠峰保护区最大的城镇——协噶尔位于该区腹地，它是保护区管理服务中心的所在地，亦是整个保护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山体异常高大、险峻，亦称高喜马拉雅。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群就有5座分布在这里。珠峰南侧是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海拔8501米；东侧为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海拔8470米；向西为卓奥友峰，海拔8153米，名列世界第七；再西是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在世界上8000米以上高峰中排名最后。

珠穆朗玛峰高高耸立在中喜马拉雅群峰之上，金字塔形峰顶，直插入云，气势雄伟壮观，远在一百公里之外，就可望见它那斜挂旗云的峰顶。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健儿在没有氧气和30余



珠峰及其附近
高峰素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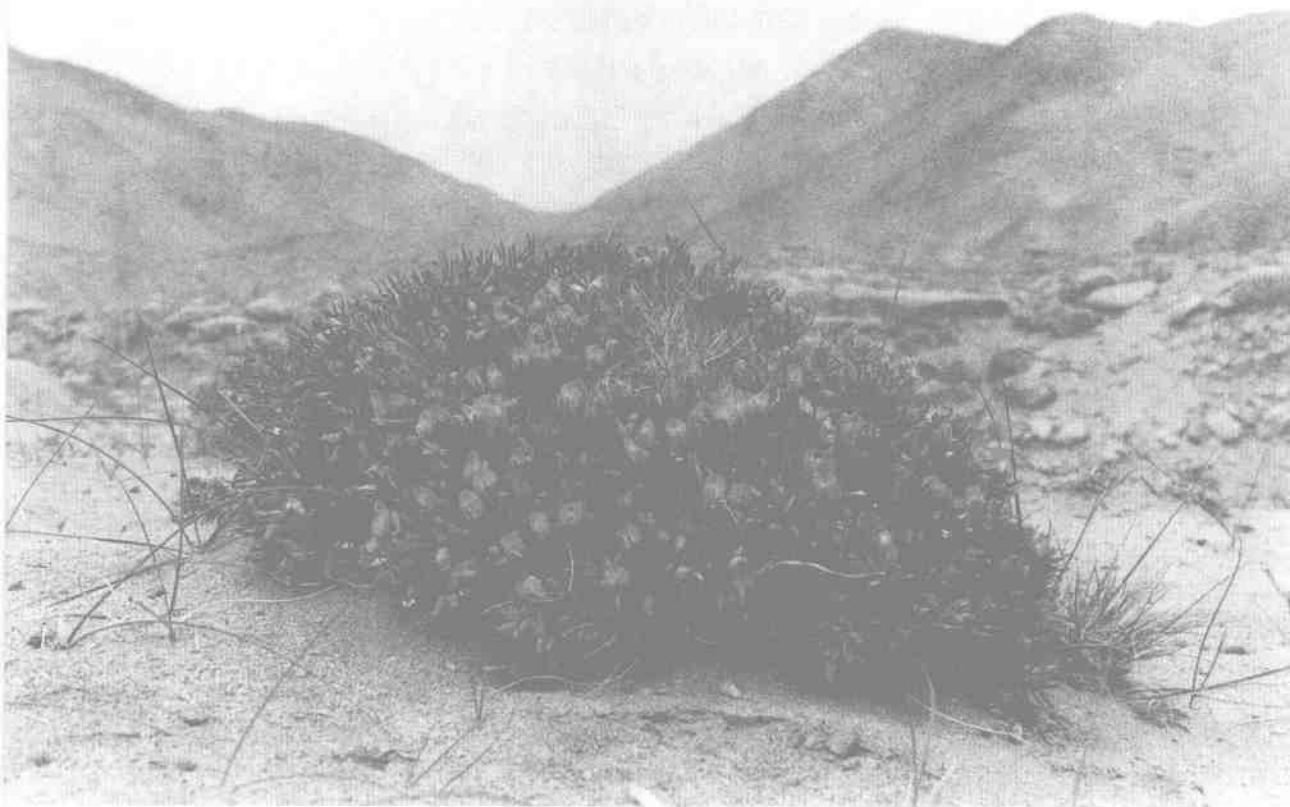
小时没有进食的极端情况下，凌晨4点30分，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留下了中国人的纪录。1975年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包括藏族女队员潘多，再次登上珠峰，并在峰顶竖立了测量觇标，从设立在珠峰周围海拔5600~7790米之内的十个测绘控制点，同时对珠峰峰顶的觇标进行了交会观测，首次精确测出了珠峰的高度——8848.13米。

通过对珠峰多年的考察，自然科学家发现，珠峰峰顶是由四亿三千万年以前的奥陶纪结晶灰岩组成，中腰为同纪的棕黄色大理岩，基底由前寒武纪沉积变质组成，其顶部地层与南侧洛子峰和北侧的章子峰相同，也是奥陶纪的大理岩和石灰岩。但它与南北侧峰均以一东西向断裂相隔，即南坳和北坳。这些说明珠穆朗玛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高峰，是上新世以来，该地区在喜马拉雅运动下，断块上升的结果。

珠峰地区高入天际的群峰使之成为冰雪之域。据统计，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冰川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而珠峰地区就有1976平

方公里，约占 6.6%，是喜马拉雅山脉冰川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共有大小冰川 548 条，主要为中型山谷冰川。其中最大者为北坡的绒布冰川，全长 22.2 公里，宽 9.4 公里。由于该冰川发育于干旱的珠峰北坡地区，冰川末端形成了世界低纬度地区最美丽、最奇特的冰塔林自然景观。无数因差异消融而形成的冰塔郁密成林，它们分布在 5100~5400 米之内的末段冰川表面，在大自然的雕塑下，形成各种奇形怪态。有的形似雄伟壮观的金字塔，高逾 50 米；有的则似精巧的冰笋，高不足 1 米，宛如雨后春笋；有的如同利剑，直插蓝天；有的却似长城，数里蜿蜒。冰塔融水，结成冰帘；绢绢细流，汇成冰河，冰河在冰塔间融蚀成幽深的涧谷，融水在冰

珠峰 4500 米的
谷地里到处都
有这样美丽的
野花。



由于该冰川发育于干旱的珠峰北坡地区，冰川末端形成了世界低纬度地区最美丽、最奇特的冰塔林自然景观。



下流淌，有如撞击钟磬，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声，形成了一个水晶宫般的世界。

在珠峰地区众多雪山之间，是河流侵蚀形成的谷地，自东向西依次为陈塘、绒辖、樟木、吉隆和贡当谷地。这些切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河谷为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高原提供了通道，受流经谷地的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这里发育着喜马拉雅南翼湿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整个河谷地区山高谷深，森林郁密，奇花异卉，五彩缤纷，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其中陈塘与吉隆谷地尤为美丽。

陈塘谷地位于朋曲下游。由卡达至陈塘的朋曲干流谷地——陈塘峡谷以及甘玛藏布、脱隆曲和拿当曲等支流谷地组成。这里山高谷深，人迹罕至，谷地深处发育着珠峰地区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自海拔2261米的谷地最低处至海拔4300米的林线，青冈、云南铁杉、喜马拉雅冷杉、垂枝柏组成各种类型的森林，依序排布在谷坡，形成参天蔽日的茫茫林海。当你漫步于林间，羽毛艳丽的红胸角雉、棕尾虹雉会突然从你脚下飞起；机警的赤鹿、斑羚不时从林隙闪过；林冠深处晃动的黑影很可能是在白日酣睡中被惊醒的金猫、豹猫或是小熊猫；而远处摇曳的树枝和杂乱的鸣叫声无疑是长尾猴或熊猴在枝头嬉戏。这寂静的密林充满了生机，向人们展示了喜马拉雅南翼湿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无穷的魅力。

在甘玛藏布谷地林线以上地区，却呈现出与之全然不同，五彩缤纷、热情奔放的自然景色。当春风吹绽了满山杜鹃，淡紫、鹅黄、靛兰、桃红、雪白……各种浓艳、清雅的色彩从山脚到山顶依次泼洒在高山灌丛织就的翠绿毡毯上，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幅既具有现代风格又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大写意特色的神奇画卷，使人进入一种由朦胧轮廓和色彩组成的意境。而卷头烟波浩渺的云海以及其间时隐时现的雪山，卷尾茫茫林海涌起的碧波绿浪进一步烘托出这一神奇的意境。这就是甘玛上游著名的杜鹃谷地——珠峰地区最引人入胜的徒步旅游佳地。



1960年中国队在珠峰下发现的中国鸟类新记录——“杂色噪鹛”。

吉隆谷地位于珠峰保护区西部。吉隆藏布穿越上游深邃的峡谷到达托丹，此时河谷骤然开阔，远处雪山屏列，插天入云，山下森林如海，起伏如波。山间河水清冽，河滩宽展，偶见几座村舍，木柱、木梁、木瓦、木墙，院围亦由木柴桩子叠砌，呈现一派古朴、粗犷的风格。吉隆谷地气候明显变干，西喜马拉雅的色彩更为浓郁。这里生长一种特殊的松树——喜马拉雅长叶松，它树干挺拔，高逾20~30米，树冠郁密，生长十分迅速，是亚热带干热气候地区优良的造林树种，在我国它仅仅生长在这里。

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喜马拉雅山的北侧，地势骤然开阔，山地缓平如波。源于希夏邦马康加勒冰川的朋曲自西向东横亘在雪山脚





珠峰地区海拔 5200 米的谷地里的成群野牦牛。





奔驰在珠峰脚下谷地里的藏野驴群。

如果说珠穆朗玛群山深谷体现了雄伟、刚强、挺拔、向上的大山的风格，山脉北侧的藏南谷地则表现出宽广、雄厚、怡静、深沉，海洋般胸怀的高原气度。



下，这里是著名的藏甫谷地，宽坦的河谷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是当地藏族人民最肥美的牧场和农田之所在。由于高喜马拉雅的屏障作用，印度洋暖湿气候在翻越山地时受到重重阻挡，大量水汽被南翼山地截去，气流翻山后下沉绝热增温产生的焚风效应，更加剧了北部气候的干旱。致使这里呈现出大陆性高原气候特征，发育了与前述谷地截然不同的半干旱灌丛、草原生态系统。其广袤的草地放牧着成群的牛羊，良好的光照条件，使便于灌溉的朋曲河两岸，成了保护区的粮仓。

在朋曲源头以西，佩枯错静卧在群山之中，它是保护区最大的湖泊，面积约三百平方公里。每年春天成群的赤麻鸭、棕头鸥、斑头雁、黑颈鹤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这里繁儿育女，在河心滩地上筑起无数窝巢，或在湖边沼泽草丛中寻觅几处佳地产卵育雏。夏天伊始，湖中顿时热闹起来，无数水鸟带着它们的儿女在湖中嬉戏，惹得栖息于水中的佩枯错特有鱼种——佩枯错裸鲤东躲西藏。当你来到佩枯错畔，舒目远望，但见湛蓝的湖水倒映着蓝天，时而漂过几朵白云，一列水鸟荡来，剪出两道水波，水中蓝天白云，山影散复聚合。湖边肥茂的草原上，飘荡着雪白的羊群，雄健的高原之舟——牦牛，远望不及寸许，像巨笔甩出的墨点，散落在碧野中。如果你仔细搜寻一下，还可见几只藏野驴气宇轩昂地在草原中漫步，俨然牧场的主人。偶有一曲牧歌，间伴几响牛铃……这一切无不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如果说珠穆朗玛群山深谷体现了雄伟、刚强、挺拔、向上的大山的风格，山脉北侧的藏南谷地则表现出宽广、雄厚、怡静、深沉，海洋般胸怀的高原气度。

珠峰地区的动植物

对珠峰自然保护区所做的综合评价表明：珠峰自然保护区地处古北极生物地理区南部。位于该生物地理区最为特殊的两省——西藏省和喜马拉雅高地省的交界处。作为保护区主体的北部地区属藏



珠峰谷地里到处可见的高原鼠兔。



珠峰谷地里的狼狗。

南山原宽谷、湖盆区，具有典型的寒冷、半干旱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区内发育着高寒灌丛草原生态系统，植物区系以泛北极成分为主，动物区系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保护区南部的河谷地区具有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特征，气候深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温暖湿润，垂直分异明显；河谷发育着喜马拉雅南翼湿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植物区系以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为主，动物区系以东洋界成分为主。仅在珠峰自然保护区一区范围内就同时存在着世界上两个特殊生物地理名的代表，这在世界自然保护区中实属罕见。珠峰自然保护区以具有典型的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高地两个自然地理区域的特征而独具特色。

珠峰自然保护区的这些特征，使其珍稀、濒危生物物种种类十



珠峰谷地里的藏羚群。

分丰富。保护区内的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长尾叶猴、熊猴、喜马拉雅塔尔羊、金钱豹，红胸角雉、棕尾虹雉、黑鹇。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有小熊猫、黑熊、小爪水獭、丛林猫、金猫、喜马拉雅麝、赤麂、斑羚、鬣羚、血雉等。属于古北界的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雪豹、藏野驴、黑颈鹤、玉带海鵙；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藏原羚、盘羊、岩羊、猞猁、棕熊、马麝、藏雪鸡、喜山兀鹫、普通鹗、灰林鹗、短耳鹗。保护区内所含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长蕊木兰、西藏延龄草、天麻、锡金海棠、人参、三七、长叶云杉、喜马拉雅长叶松、胡黄连、桃儿七、喜马拉雅红豆杉和水青树等。除此之外，珠峰自然保护区还含有很多尚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但十分珍贵的植物，如喜马

珠峰下谷地
里的喜马拉
雅熊。



拉雅红杉、西伯利亚刺柏、西藏润楠、吉隆绿绒蒿、互叶铁线莲和雪兔子等。

珠峰自然保护区不仅所含珍稀、濒危物种种类丰富，而且有不少分布面积异常狭窄的珍稀种类，如长尾叶猴、熊猴的喜马拉雅亚种，喜马拉雅塔尔羊则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南翼山地。本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属中亚地区特有种的雪豹，它在珠峰自然保护区有较大的种群，被列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标志动物。

研究表明：组成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喜马拉雅南翼半湿润山地森林和喜马拉雅北翼半干旱灌丛、草原生态系统都属于异常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以保护区具有很重要的保护价值。

珠峰自然保护区由喜马拉雅山地和藏南高原宽谷湖盆两大地貌单元组成，区内地势差异大，地貌形态具很强的多样性，亦造成了区内气候的多样性。在此如此多样的生态环境下，保护区生物的多样性异常明显。喜马拉雅南翼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由一系列垂直生态系统组成：从谷底到山顶依次为山地亚热带常绿半常绿阔叶林、山地暖温带硬叶常绿阔叶林、亚高山寒温带常绿针叶林、高山亚寒带灌丛草甸、高山寒带冰缘和冰雪等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北翼藏南高原半干旱灌丛、草原生态系统则由高原亚寒带灌丛草原、高山亚寒带草甸和高山寒带冰缘和冰雪生态系统组成。在上述众多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极其丰富。根据初步调查，这里有被子植物2100种、裸子植物20种，蕨类植物222种、苔藓植物472种，地衣植物172种、真菌136种，哺乳动物53种，鸟类206种，鱼类10种，两栖动物8种，爬行动物6种。在西藏自治区它是仅次于墨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最强的自然保护区。

珠峰自然保护区不仅所含珍稀、濒危物种种类丰富，而且有不少分布面积异常狭窄的珍稀种类。

“珠穆朗玛”是世界最高峰最古老的传统名称，我国的拼法是Qomolangma，国外转写成Chomolungma，都是根据我国的藏语拼音而来的。



第二章 冠名珠峰

海拔8848.13米的珠穆朗玛峰，位于世界最高最长的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偏东，西藏首府拉萨西南450公里处。确切的地理位置是东经 $86^{\circ} 55' 44''$ ，北纬 $27^{\circ} 59' 16''$ ，正处于中国和尼泊尔的国界分水岭上。山峰两侧雪峰林立，仅7000米以上的雪峰就有数十座之多，其中4座在8000米以上。它们拔地而起，摩天接云，银装素裹，冰河悬注，构建出世界最雄奇壮观的极高山自然景观。

正因为其特殊性，围绕它的命名，竟上演了一场赤裸裸的殖民霸权剧。

三姐珠穆朗玛

“珠穆朗玛”是世界最高峰最古老的传统名称，我国的拼法是Qomolangma，国外转写成Chomolungma，都是根据我国的藏语拼音而来的。由于珠穆朗玛山峰很高，远在距它100公里外的地方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这方圆百公里之内的居民对它的名称有所不同，在山的南方、北方、东西方的远近居民，自古以来对它就有着古老而传统的称谓。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藏族内部的民族支系的语言问题，如夏尔巴、门巴和藏族中的最大多数族群，语言和发音又都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叫Qomo-Lun-Wuli(珠穆朗乌里)，有的地方叫Qomo-Lan-Ma(珠穆兰玛)，有的地方叫Qo-Mo-Lon(珠穆隆)，而其意思也不太相同，Qomo-Lun-Wuli是“洁白如玉的女神”，Qomo-Lan-Ma是“百鸟的母神”，而Qomo-Lun-Ma则是“大地的母亲之神”，也有的外国人(英)将它译为“圣母之水”。

据藏传佛教经典记载，在珠穆朗玛峰的四周共有五座女神之峰，她们都是高大雪峰。大姐珠穆泽仁玛，二姐珠穆丁吉沙玛，三

姐珠穆朗玛，四妹珠穆觉本朗桑玛，小妹珠穆德格日卓桑玛。这里的“珠穆”在藏语中就是女神或仙女的意思，而“朗玛”或“丁吉沙玛”等等中的“玛”则是藏族对女孩的爱称。按照藏族人民的民间信仰，所有高出地面的山峰，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山包包，那都是神之所在。换言之，那里都有神，或者说，那就是神。

关于这五位女神峰，在西藏各族人民中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



被染成金黄的珠穆朗玛峰。



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西藏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岸边峰峦起伏、森林密布，森林旁边长满了奇花异草，芬芳满溢；森林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它们无忧无虑，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有一天，海里突然来了一头巨大的五首毒龙，搅起万丈巨浪，顷刻之间摧毁花草，拔起树木，冲毁森林，淹没草地，飞禽走兽惊恐万状，四处逃难。就在这芸芸众生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天上飘来五朵祥云，顿时化作五位仙女，她们使用法术降伏毒龙，大海随即风平浪静，生活在里面的鹿、羚、猴、兔、鸟等众生灵重获安宁，再现从前的祥和美景。众多飞禽走兽感念五位仙女搭救之恩，便恳求她们留下来，共享太平。它们一齐对仙女顶礼膜拜，感谢众仙女的救命之恩。五位仙女深受感动，接受了它们的请求。于是仙女再施法术，喝令海水退去，使这里变成了陆地。从此，在这片土地上，东边长出茂密的森林，西边变成万顷良田，南边是百花盛开的园林，北面为一望无际的牧场。那五位仙女则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主峰，守卫着这片美丽的土地。著名的珠穆朗玛峰就是第三位仙女贞慧仙女变成的，其余几位仙女分别是掌管福寿的祥寿仙女、掌管农田的翠颜仙女、掌管财宝的冠咏仙女和掌管畜牧的施仁仙女。她们分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各处。

那么，为什么这五位女神中，惟独三姐珠穆朗玛是最高的呢？我曾经就此专门请教了珠峰北坡绒布寺的老喇嘛。他说：“人的两只手伸直，不是中指最长吗？中指排第三哪！”多么简单而古朴的智慧！中指当然是五指中的最长者，而且是第三位！

我又问他，其他如珠穆泽仁玛等又在什么地方呢？他却说不上来。后来，我在日本出版的《外国山名辞典》中找到了这位大姐，现名“高丽萨卡”(Gaurisankar)，海拔7134米，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附近的喜马拉雅山上，其确切地理坐标是东经 $86^{\circ} 20' 07''$ ，北纬 $27^{\circ} 57' 57''$ 。当地的传统名称为“珠穆

泽仁玛”(Chomo Tseringma)。原来这位大姐与三妹之间还很有一段距离，并不是紧邻而立的。早在1855年，德国高山探险家赫尔曼就发现了这座高峰，并从当地居民中了解到它的名称。赫尔曼从当地居民和寺庙喇嘛那里，了解到“珠穆”是女神，“泽仁”是长寿，“玛”是女孩的爱称，这就是说大姐是“长寿女神”；至于其他三位姐妹的历史，我还没有查找到。总之，都叫“珠穆”，最后又都是“玛”，那就都是女神。这些千百年来的传统名称都应当保持它的原貌，是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也是全世界的普遍做法。1987年我应邀首次访美时，接待我的是当时美国高山俱乐部主席尼克拉斯·克林奇先生，他家住旧金山西南的Palo Alto，中国传统的译法是把Sanfrancisco译成“三藩市”或旧金山，可你对美国人说旧金山他不懂，Sanfrancisco是古代印第安人的叫法，译成“三藩市”还比较相近。美国的许多地方如洛杉矶、丹佛等都还是印第安人的古老称谓。为什么没把它们任意改一个什么大人物的名字呢？传统的、本民族的名称，是不允许随意更改的。



大清钦天监官员胜住等入藏测绘

根据藏传佛教经典上的记载，喜马拉雅山的许多高峰，自古就有自己的名字，珠穆朗玛峰等这些特别的高峰则更是有其固有的名称。

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堆介绍，根据藏族的经典，在七八世纪的时候，珠穆朗玛峰一带曾被藏王划做养鸟之地，叫“札马郎”或“罗札马郎”，这种称谓在发音上与“珠穆朗玛”相似。一般认为，11或12世纪，以文学天赋著称的藏族高僧米拉日巴曾经在珠峰一带修行，并写下歌颂珠峰的诗篇。

对珠峰最早的文献记载始于元朝，其名称为“次仁玛”。

北京大学地理学教授林超(1909~1991)先生研究指出，“最先

这张标有珠穆朗玛峰当时名字——“朱母朗玛阿林”的地图，1719年被收入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但珠峰的名字已改用满文标注。

发现珠穆朗玛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但是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在地图上的，则是在1715至1717年到西藏测量的中国测量队员胜住、楚儿泌藏布和兰本占巴”。胜住等三人都曾在钦天监学过数学，受清朝康熙皇帝委派从北京到西藏进行勘测。胜住是理藩院的主事，其他二人是喇嘛。他们发现珠穆朗玛峰为我国最高峰，较为精确地记录了珠峰地区的地理情况并依据当地藏族人民对它的称呼，将其正式命名为“朱母朗玛阿林”，标在“朝隆内府舆图”上，图中对珠峰的位置和四周边界有详细的记载。在藏语里，“朱母”是女神的意思，“朗玛”是她的名字，“阿林”是满文，意为山峰，朱母朗玛阿林全文简译出来就是神女峰。他们的这些工作为后人了解珠穆朗玛峰奠定了基础。

这张标有珠穆朗玛峰当时名字——“朱母朗玛阿林”的地图，1719年被收入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但珠峰的名字已改用满



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根据1721年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复制的道光年间版中国地图上，清楚标出汉文“珠穆朗玛山”。

文标注。而在 1721 年版的《皇舆全览图》中珠穆朗玛峰的汉语名字首次出现。康熙的《皇舆全览图》成为有关这座地球最高峰的最早的官方文献。后来，参与这些地图修订工作的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把《皇舆全览图》送到法国，法国皇家制图官唐维尔于 1733 年根据该图编制了“中国新地图”。这一法国版的中国地图册共有 42 页，其中包括两幅西藏地图，上面都用法语明确标出珠穆朗玛峰的名字 (M. Tchoumour Lancma) 和位置。



康熙版的《皇舆全览图》，在道光和同治年间曾在中国复制并流传到更大范围。虽然当时的地图中珠穆朗玛峰的汉语名字与现代汉语书写不同，但发音完全一样，而且音译与藏语的音节、发音非常吻合。如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根据 1721 年康熙《皇舆全览图》复制的道光年间版中国地图上，就清楚地标着汉文“珠穆朗玛山”。1836 年，德国地理学家克拉普洛恩根据中国地图和文献发表了一份中亚地图，其中标出珠穆朗玛峰的德语名称(*Disomo langma*)和位置。这说明到 19 世纪上半叶，珠穆朗玛这一美妙的名称，是得到了世界性认同的。

珠峰如何变成埃佛勒斯峰

但是在国际上任何一种外国词典中都找不到珠穆朗玛这一词条，世界最高峰的名字为埃佛勒斯或厄菲尔士，它是从英文的 Everest 译音而来的。这一称谓起于 19 世纪中叶。

世界上最老资格的帝国主义者是大英帝国。公元 1773 年，英国通过它侵略亚洲的主要机构——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对印度的血腥征服，随即设置了直接统治英属印度全部领土的总督。那时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而后又开始了对我西藏及其周围属国的侵略，先后占领了布噜克巴、哲孟雄、廓尔喀和克什米尔等国。为了进一步以印度为基地向我西藏和新疆入侵，他们必须事先测量和侦查好通往西藏和新疆的道路，了解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

康熙版的《皇舆全览图》，在道光和同治年间曾在中国复制并流传到更大范围。虽然当时的地图中珠穆朗玛峰的汉语名字与现代汉语书写不同，但发音完全一样，而且音译与藏语的音节、发音非常吻合。

1909年，英帝国陆军少将布鲁斯在珠峰山下，从当地藏族、夏尔巴人那里了解到，珠峰自古以来的名称是“珠穆朗玛”。

情况，所以英帝国主义者从印度派出军事测绘队对印度与中国边界上的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两大山脉进行测绘。当时的印度测量局就是为其侵略扩张目的服务的工具。

清咸丰二年(1852年)，该局军事测绘工程师班克尔在东部喜马拉雅山区进行测绘时，发现一座从很远的地方就能清楚看到的金字塔形巨峰，比喜马拉雅山东部所有高峰都要高出一大截。他立即向其上级、时任英帝国印度测绘局长的安德列·渥报告，这位测绘局长也是位测绘专家，根据报告，他立刻计算出该峰高度为海拔29002英尺，合8839~8882米，并给它标名为P15，也即第15号高峰。他将这个结果发表后，从此就确认了珠峰为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1856年，英帝国印度测绘局的地图上不但有他们所谓的“P15”，还有一个注解：“P15，地方民族有‘珠穆朗玛’，意思是女神的名称。”至于这个P15怎么又变成了Everest，则是这位局长对其前任、也是他的老师兼提拔者——乔治·厄菲尔士(George Everest 1790~1866)的感戴之举。此后，英国出版的地图上，这座早在千百年前就已为当地人民所熟悉的排行第三的女神峰——珠穆朗玛就变成了“厄菲尔士”，并广传于全世界。这就是此后，以至今天在西方文献、传媒中仍频频出现的Everest——埃佛勒斯或厄菲尔士的来历。

1904年，英帝国陆军上校瓦特尔和萨拉托两人从印度的大吉岭到达珠穆朗玛山下，他们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到珠穆朗玛的名称，并在英国发表了“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有它自己的名字——珠穆朗玛”。这说明英国人是完全清楚，在他们强加给珠峰一位男性名字之前，世界最高峰已经有了自己的专门称谓。

1905年，英印测绘局局长布拉德(Burrard Sydney Geralia 1850~1943)宣布：“经过详确地测量，Everest的高度为29141英尺(合8882米)。”在那以后，国际上都用这一高度来标示珠峰。

1909年，英帝国陆军少将布鲁斯在珠峰山下，从当地藏族、夏

尔巴人那里了解到，珠峰自古以来的名称是“珠穆朗玛”。不过，夏尔巴人的发音是“珠木伦莫”，这也许是布鲁斯将它拼成英文 cho mo-lun mo 的原因，但它与“珠穆朗玛”是完全一样的。

1920 年，曾经在印度服役的布鲁士准将在英国珠峰探险队出征前曾说：“我希望即使这一准备中的探险队找到它的真正名称，看到它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山上，我们也不要理它。我知道你们一定同意没有一个名称比埃佛勒斯更美妙更合适。”就是这种殖民主义的霸权心态，使得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无视珠穆朗玛的命名史实，特别是无视我国世代生活在珠峰地区的各族人民的民族情感，将一位女神峰仍冠以一位殖民官员的名字。

在国力衰微的清代，大片国土都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取豪夺而去，中国文献所记载的地名在诸列强眼中更分文不值。可悲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上海出版的地图，居然也沿用了英帝国主义强加给珠峰的这一名称。这就是 1949 年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不但使用了布拉德的 8882 米的高度，还沿用了英帝国主义者强加给珠峰的 Everest。这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尽管国人最早发现了珠峰，给它命名，但“珠穆朗玛峰”这一名称只是在 232 年以后，新中国站立起来之时，才堂堂正正地步入世界。

中国人为珠峰正名

1951 年，我国地理学家王鞠侯，根据有关资料，在《开明少年》杂志 2 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用“额非尔士峰”来命名世界第一高山的做法与世界公认的命名方式不符，因此应恢复我国更早的命名，改为“珠穆朗玛峰”。1952 年 5 月 8 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表正式通报，把“额非尔士峰”改为“珠穆朗玛峰”。对此，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上的一篇《为珠穆朗玛

尽管国人最早发现了珠峰，给它命名，但“珠穆朗玛峰”这一名称只是在 232 年以后，新中国站立起来之时，才堂堂正正地步入世界。

正名》的文章指出：

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伟大的祖国》专栏上刊出一幅喜马拉雅山主峰的照片，所附说明文字为：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高峰——额非尔士峰。王鞠侯先生（时任开明书店自然编辑室主任）看后，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找叶至善（时任开明书店之《开明少年》主编）说：“额非尔士”是个英国人，上个世纪中叶，他偷偷地测绘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硬给这座高峰标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比这个英国人早一百三四十，康熙皇帝派人测绘全国地图，已经发现了这座山峰，在地图上按藏族人民的传统称呼，标上了“珠穆朗玛”这个名称。鞠侯先生并说他正想在《大小高低》这篇文章中给“珠穆朗玛峰”正名；但《人民日报》仍沿用“额非尔士峰”这一名称，让他左右为难。

鞠侯先生与叶至善先生商量后，一致认为，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题材，不能等闲弃置。《大小高低》一文仍照原来的构思写，至于《人民日报》的那则说明，在文中不提就是了。后来，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大小高低》一文，刊登在《开明少年》1951年2月号上。鞠侯先生设计的插图也没把位于我国境内的冈底斯山，像多数地志舆图沿用外国侵略者观点那样，误称为“外喜马拉雅山”。叶至善还在这期封里配发了珠穆朗玛峰的照片，并在照片下面写了近两百字的说明。

《大小高低》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胡仲持的注意。当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世界上最高峰》为标题，一字不改地转载了王鞠侯写的《大小高低》一文中的一大段，前面还加上《编者按》：

耸立在我国西南边疆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过去曾被称为“额非尔士峰”，这是错误的名称。它应该叫做“珠穆朗玛峰”。本报1月9日《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说明中错误地沿用了“额非尔士”的名称，应予更正。本年2月16日出版的《开明少年》杂志第66

期上，发表了鞠侯先生的《大小高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现摘录转载在这里，请大家注意。

1952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式的政府通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五月八日发出通报。通报说明：“额非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1717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会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族“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1852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后，西人便从1858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额非尔士（英国人）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字。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马拉雅山”，这种称呼也是十分荒谬的。

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者冈底斯山时，都不得再误称为“额非尔士峰”或者“外喜马拉雅山”。

四天之后，即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更正：“圣母之水”应为“圣母”。

当这一正式的政府通报发布时，王鞠侯先生已长眠于地下一年多了。

1958年，我国地理史学和地名学专家林超（1909~1991），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一文，指出“最先发现珠穆朗玛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但是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在地图

最先发现珠穆朗玛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

上的，则是在1715至1717年到西藏测量的中国测量队员胜住、楚儿泌藏布和兰本占巴。”

此后，珠穆朗玛峰的名字在我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使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当中国学者站在世界讲坛上宣讲有关世界第一高峰的论文时，当中国报刊杂志说及世界最高峰时，当中国导游向海内外旅游者介绍世界第三极时，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已不再是埃佛勒斯峰，而是珠穆朗玛峰了。

在我国的友好邻邦——尼泊尔王国，1951年，作为英国殖民者傀儡的拉纳家族被迫交出世袭统治105年之久的政权，尼泊尔王国获得独立。1952年以后，从世界各国前来尼泊尔登山和进行高山旅游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外国团队，更是成倍地增长。逐渐地，尼泊尔人也不喜欢P.Everest“埃佛勒斯”这一带有殖民主义印记的名字。1960年，尼泊尔政府正式将这座世界最高峰命名为“萨迦玛塔”(Sagamth)，意思是“群峰之中的最高者”或“群峰中的王者”。目前，这一名称也逐渐为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外国人所接受和采用。十几年前，尼泊尔王国在珠峰南侧建立了萨迦玛塔国家公园，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地。

如今，在世界最高峰南北两侧，中国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和尼泊尔王国的萨迦玛塔国家公园像两个守护神拱卫在女神身旁，使翠颜仙女避开现代社会的侵扰，在此与众生过着平和与安谧的生活。

第三章 探险珠峰(上)

探险不是冒险，它是以科学发现为目的，以科学方法为指南的探险活动。探险是科学研究的一种特殊途径，是人类认识自然、宇宙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人类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一种特殊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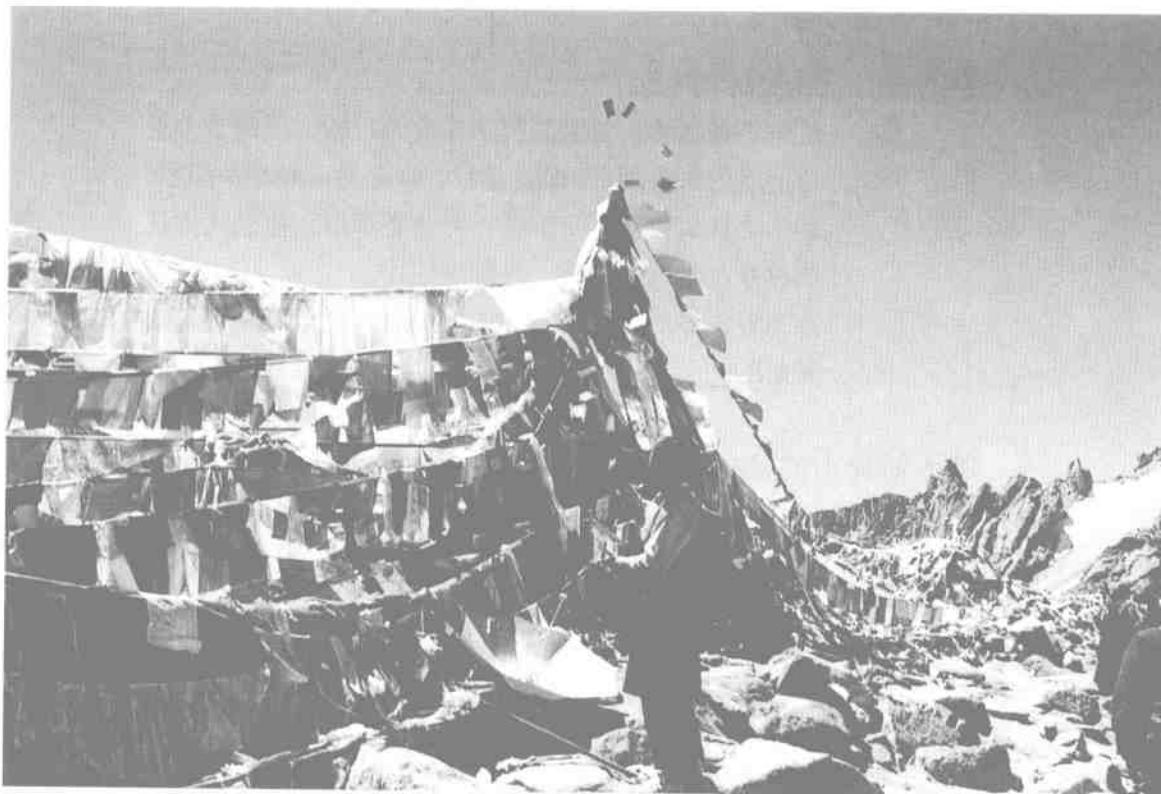
人类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探险，最早是从英国人开始的。

藏人对神山的禁忌

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人民认为，每一座山、每一个湖，都有神灵居住。这些神灵有时有形有时无形，它们时刻关注着生灵的一举一动，掌管着风云变幻、人间疾苦甚至灵魂超度。对它们最好的礼敬方式，就是朝拜，用双脚或全身(五体)投地的方式围绕这些神灵栖居的山或湖进行绕转。可以说，西藏男女老少大都有过朝山拜湖的经历。有些人还在襁褓中，就已经在母亲的背上转过神山圣湖了，而且往往朝拜的不止一山一湖。至于爬到神山山顶，将神山踩在脚下，那是想都不曾想过的。

西藏人的神灵意识，源自佛教传入西藏以前久远的苯教观念。西藏本土宗教苯教将世界分为天、地和地下三界，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神性，神鬼主宰世间一切。由于西藏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极富想象地将各路神灵具像化，在他们的生存意识里，无时无刻不晃动着它们雄伟凶悍的形象，从而产生敬畏。佛教进入西藏，遇到的最大阻力和挑战首先是苯教，二者纷争数百年，书写出充满腥风血雨的藏传佛教史。藏传佛教吸取了苯教的大量精髓，实际上已是西藏本土化宗教，正是这种本土属性使它能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对苯教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与此同时，苯教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的根深深扎在雪域大地，

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人民认为，每一座山、每一个湖，都有神灵居住。



原始万物有灵论直到今天，在藏区的各个地方，少量的苯教寺院仍然耸立并拥有信的遗留。使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至今仍崇山拜湖。在每个山口，都会建立起这样大大小小的经

幡柱。人们绕转神山时，总要添

上新的经幡，抛洒“风马”，并高呼“拉结罗！”。以示对山神的敬畏。图为冈仁布钦卓玛拉山口（海拔5760米）是西藏最早的寺庙桑耶寺和拉萨城内布达拉宫所在地红山的保护

的巨大经幡塔。四大山神中，雅拉香波山神居住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砻河谷

西藏的山神大致分为四个系统：雅拉香波山神、廓拉卡日山

神、罗杰康娃桑布山神、念青唐古拉山神。这四大山神分别位于西

藏的东南西北四方，各有自己的领地和众多的伴神和侍神，但它们

的职责和权限并不局限于各自的属地，像念青唐古拉山神，它不仅

拥有卫藏四茹的辽阔领地，它还护佑着锡金王国的生灵；同时，也

是西藏最早的寺庙桑耶寺和拉萨城内布达拉宫所在地红山的保护

周爱明 摄

的雅拉香波山上，是吐蕃王室的保护神，最著名的苯教大神之一，后被莲花生大师收服为佛教护法神，传说他躯体白如海螺，手持短矛和水晶剑，座骑是像一座山一样的白色牦牛，牦牛的口鼻里不断有雪瀑喷射，他统领着 10 亿战神，威力巨大无比；廓拉卡日山神居住在“南方之岩”的洛扎境内，被认为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的精魂。他也是一身洁白，一手握短矛，一手提狼头，座骑是一匹能飞翔的白马，10 万个手持盾牌和兵器的巨人围护在他那用宝石和水晶砌成的宫殿的周围。罗杰康娃桑布山神居住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他日夜镇守着河湖里的宝藏，他手持黑旗和宝剑，幻化成绿色的身形巡弋在辽阔的江河之上；念青唐古拉山神居住在藏北草原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 7117 米的主峰，山上终年积雪不化，云遮雾障。他是绵延千里的整个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统治神，他白衣白马，一手持藤杖，一手持水晶念珠，念青唐古拉山脉所有 360 座山峰的山神簇拥在他身旁。有关他的故事在藏区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的是他为阻挠来自印度的莲花生大师在藏地传扬佛法，一次次和莲花生大师较量，虽然最终落败并被收服，但他表现出的这种胆量和勇气无疑是人类自身精神的体现。

除了人们公认的这四大山神之外，还有许多的山神，有些在某一地域享有盛名，有些为某一教派特别推崇。如位于青海湖畔的阿尼玛卿山系，其山神名为玛卿伯姆，苯教认为他是苯教的保护神，是雍仲苯教教义的维护者，尤其受青海果洛藏区人们的崇拜。对这位山神的祭祀有一整套繁琐的仪轨，首先是在某一特定的吉祥日，要展示绘有这位山神各种不同化身的唐卡画，在画前要摆放各种山神喜爱的供品和他固定使用的兵器，然后通过占卜和诵经作法将山神从他的居住处请来，享受人间的供奉和尊崇，祈求山神护佑人畜免遭病疫，保一方平安。这种祭祀多少代表了人们对山神一类神灵通行的崇敬方式。

在西藏，山神和神山两个概念往往重叠在一起，统称为神山。

廓拉卡日山神居住在“南方之岩”的洛扎境内，被认为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的精魂。

1921年，第一支英国珠峰探险队，在队长赫瓦特·布瑞(Howard Bury C.K. 1883~1963)率领下，首次从中国西藏一侧对登顶路线进行了侦察。



但通过对山神和神山的了解，还是可以将它们剥离的：山神是山体本身的神化，在对山神化时，人类是拿自身作为参照的，山神们不仅有夸张的人形，还有人的七情六欲，他们几乎都有配偶，配偶有的同样是神山，也有的是圣湖。他们有喜怒哀乐，甚至有性格特点，他们是一个庞大且独立的神祇系统。而神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某位特定的个体的神，而是因为有神灵居住，也可以说是神的道场，不仅神灵众多，而且可能是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神灵汇聚一处，因此自然成了神山。在西藏，最有代表性的神山有两座，一座是冈底斯神山脉中的冈仁布钦，一座是杂日神山。西藏历来有“马年转冈底斯山，猴年转杂日山，羊年转纳木湖”之说。

英国人的特权：七次冲顶

1906~1907年，英国高山俱乐部(The Alpine Club成立于1857年)的C.G.布鲁斯(C.G.Bruce 1866~1939)和T.G.伦格斯塔弗(T.G.Longstaff 1875~1964)开始准备1907年远征珠穆朗玛峰，但遭到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未能实施。

1920年，英国驻拉萨的代办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正式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允许英国队攀登珠峰的请求，那时尼泊尔政府已拒绝了英国的请求，英国才转而想方设法从中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通过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特别是在西藏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西藏噶厦同意英国从其境内攀登珠峰。就在英国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申请书上，他们用的是“珠穆朗玛峰”，而且注明是“南方的百鸟之国”(意思)。这说明英帝国主义者非常清楚，倘若他们不用“珠穆朗玛”，尽管西藏噶厦在1888年、1904年就已被英国武力打败过，但却很难容忍Everest这一称谓，说明英帝国主义者对这座高峰的故有名称是心知肚明的，但当时英国出版的地图和英国将要攀登珠峰的所有报道上却都使用的是Everest。

1921年，第一支英国珠峰探险队，在队长赫瓦特·布瑞

(Howard Bury C.K. 1883 ~ 1963)率领下,首次从中国西藏一侧对登顶路线进行了侦察。这位赫瓦特·布瑞为英军上校,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中亚一带活动,1913年曾到过天山一带,著有《初探Everest 1921和1922年》。关于1920年英国向西藏噶厦请求攀登珠峰的申请书上使用“珠穆朗玛”这一西藏固有名称,就是他在这本书中首次披露的,只是他说“珠穆朗玛”是当地居民“洁白如玉般的女神”之意。他所带的这支探险队从东绒布冰川向上,先后用了3周时间,勉强登到北坳稍下方。负责运输的凯拉斯(Kallas Alexander Michell 1868 ~ 1921,此前他曾先后6次到过珠峰山下及其附近的高山区,是研究人在不同高度血液和心脏不同变化的生理学者,本人又特别爱好登山)医生在从加德满都押运英国队的全部食品和装备的骡马运输队途中,6月18日患急性肺水肿死亡。三位主力队员H.巴洛克、O.霍伊拉和G.马洛里在登上7007米的北坳后,感到身体不适下撤了。但英国人找到了从北坳登上东北山脊并登顶的道路。他们还侦察了珠峰南侧和西南坡面,认为都是很难攀登而危险的。

1922年,由英国陆军少将C.G.布鲁斯率领的13人英国队前来攀登珠峰。他们从尼泊尔进入我国西藏,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北麓山下建好基地营。

这次前来登山的队员都是英国在200多名志愿者中选出的强者,有马洛里(Geroge Mallory)、诺顿(Norton E.)、索马威尔(Somewell T.H.1890 ~ 1975)、芬奇(Finch G. L.1888 ~ 1970)、D.布鲁斯(Bruce D.)、诺耶尔(Noel J.L.1890 ~ 1959)、兰格斯塔弗(医生)和克拉乌弗尔德等。其中的索马威尔是英国优秀登山家、本人是医生,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参加过1922年和1924年英国珠峰登山队,发现了珠峰北壁上直通顶峰的一条大岩沟,他曾尝试从岩沟登顶,但因身体疲劳过度,中途下撤;芬奇,是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优秀登山家,善于攀岩,1895 ~ 1903年间多次登上欧洲阿尔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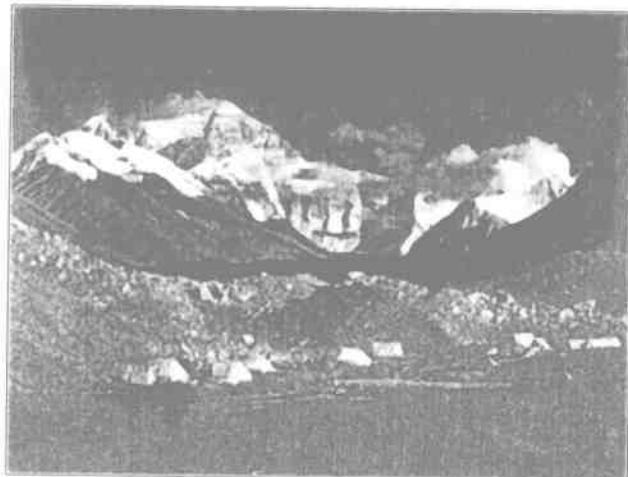
PHILHARMONIC HALL, LIVERPOOL.
A PUBLIC LECTU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iverpool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Climbing Mount Everest
1922

Will be given, on behalf of the Mount Everest Committee, by

Mr. G. H. LEIGH-MALLORY

ON

THURSDAY, OCTOBER 26th,
at 8 p.m.



Mount Everest (29,024 feet) from the Rongbuk Glacier base camp (18,500 feet)

CHAIRMAN

Charles Booth, Esq.
J.P.

THE Narrative will
be illustrated by
many beautiful
Lantern Slides from
photographs taken on
the Expedition.

The profits of the Lectur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unds of th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Committee.

Tickets: Reserved Seats, 5/-, 4/- and 3/-; Unreserved Seats, 2/-

Plan opens on Thursday, October 12th. Concert Direction RUSHWORTH & DREAPER, LTD.,
Box Offices, 21 Bassett Street and 13 Islington. (Phone: 3068 Royal)

Doors open 7.30. Lecture at 8. Carriages 9.45.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the Mount Everest Lecture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is in the hands of GERALD CHINCY,
The Lecture Agency, Ltd., The Outer Temple, London, W.C.*

F.2.0

1922年英国探险队攀登珠峰的报告书。



1922年英国探险队成员。从左至右：亨利·莫谢尔德、乔治·马洛里、塞多利·索马威尔和爱德华·诺顿。约翰·诺耶尔摄

斯山上的险峰，1922年参加珠峰队，到达过8321米的高度，是当时登上这个高度的世界第一人。1959~1961年间任英国高山俱乐部(The Alpine Club)主席。D.布鲁斯是队长布鲁斯将军的侄子，优秀攀岩能手；诺耶尔是英国陆军军官，1913年23岁时是英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军军官，曾带领5名夏尔巴人进入西藏，到达过绒布寺附近，对珠峰进行探查。5月27日，队员马洛里、索马威尔和诺顿三人沿东绒布冰川登上7007米的北坳，从北坳登上珠峰的东北山脊，到达了8225米的高度而返回。英国队首次突破8000米的高度。这次英国队的芬奇提出使用氧气，他在登山过程中自己试验使用氧气证明对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有好处。但因为在北坳下方，为英国人背负沉重登山装备和食品的7位夏尔巴人遭遇雪崩全部身亡，使



1924年英国珠峰探险队成员。后排左起：欧文、马洛里、诺顿、麦克斯唐纳；前排左起：谢波利、布鲁斯、索马威尔、贝特曼。

另有布鲁斯将军、约翰·诺耶尔等4人未出场。

得他们不得不撤退。但英国人懂得了必须人工供氧才能攀登8000米高峰的道理。

1924年，第三支英国队由9人组成，队长是诺顿。英国人民对这次攀登珠峰寄予厚望，给了很多赞助。本来这次的队长仍由布鲁斯将军担任，但他在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珠峰山下的基地营途中生病，被迫退出，英国队这才改由诺顿接任队长。诺顿是英国陆军少校，长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带尼泊尔的霍尔克雇佣兵。队员中有本国优秀登山家马洛里，37岁，这是他第三次参加珠峰队；还有剑桥大学在校生欧文(Irvine A.C. 1902~1924)、索马威尔、D.布鲁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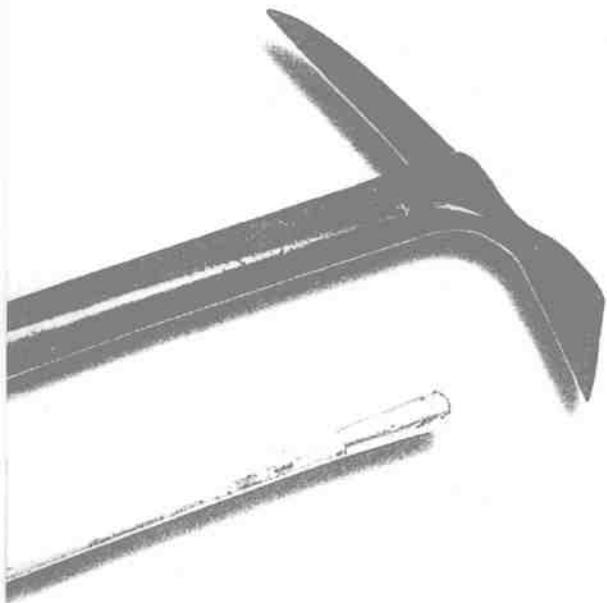
奥戴尔(Odell Noel E. 1889~1986)、彼得汉姆、卡扎尔特、金格斯顿(医生)等。他们这次携带了较多的氧气瓶。队长诺顿要求大家从7800米的高度开始不间断地用氧。6月4日，诺顿和索马威尔两人作为第一突击组，沿东北山脊上山，但刚到第一台阶附近(8100米)，索马威尔突然滑坠，所幸只受了点伤。诺顿只好一人继续前进，到达东北山脊8572米的高度，发现前边是一道陡峭的岩沟，因为别无选择，他试着进了岩沟，但氧气瓶中已没有氧，只好下山。诺顿虽然到达了离“第二台阶”不远的地方，却没有发现“第二台阶”(8690米)，因为他走的路线在“第二台阶”的右下方。

再说另一个突击组的马洛里和欧文两人，他们6月6日离开7007米的北坳，有8位夏尔巴人为他们两人背负装备、食品和氧气瓶。7日，到达8200米的东北山脊上的第6号营地，这时马洛里让夏尔巴人把所有的物资都放下，并让他们下山了。这位马洛里坚决反对使用氧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前来珠峰登山，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其次他的高山适应能力很好，比别人都能更快地适应高山缺氧的环境；第三他有着非常好的体质和体力。他和欧文两人于8日清晨离开8200米的第6号营地向顶峰冲击；与此同时诺顿队长派队员奥戴尔带两名夏尔巴人从5号营地向6号营地前进，以支援和接应他俩。奥戴尔一行到达6号营地的时间是8日中午12:50，当时他还能看到正在向顶峰前进的马洛里和欧文，而且彼此之间用望远镜还能看到对方并相互招手致



最后看见
马洛里、欧
文身影的
奥戴尔。

队长诺顿要求大家从7800米的高度开始不间断地用氧。



1933年英国队发现的欧文的冰镐。

意，说明他们之间还有联系。马洛里和欧文也知道，奥戴尔是在这个6号营地上等待他们的归来。但到下午两点钟以后，乌云挡住了他们之间的视线，这时马洛里和欧文已经到达“第二台阶”的下方。虽然乌云挡住了视线，最初还能听到一点彼此之间的呼叫声，接着，这点呼叫声也慢慢听不见了，此后云雾一直不散，又起了大风。奥戴尔和两名夏尔巴人一直在8200米的第6号营地上等待着支援马洛里和欧文。但是两天过去了，还不见他们的踪影。这时奥戴尔等三人的食品和氧气也都已用完，不得已，奥戴

尔第三天带着两位夏尔巴人下山了。从此，马洛里和欧文就“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奥戴尔等人下山回到基地营之后，队长诺顿等一直等了一周，仍不见马洛里两人下山，这时天气已然变坏，6月15日以后雨季已经到来，成天的大风雪一连几天不断，最后英国队只好撤营。37岁的马洛里和22岁的欧文到底发生了什么危险？他们是否已登上珠峰？或者登顶之后，在下山途中遇到了危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为人类攀登珠峰历史上的一个大谜——马·欧之谜。这个谜从1924年起，不仅在英国，而且它为世界登山界所关注，再加上这70多年间各国登山家多次登上珠峰，每次有人登上珠峰，就会在英国掀起一次“马·欧之谜”的议论高潮。许多英国人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在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之后，在下山途中，在暴风雪中遇难失踪的。英国人认为，如果有谁能够从中国的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上山，是能够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遗体或遗



1924年的珠峰和绒布寺。奥藏尔摄

英国人在1931年仍以“珠穆朗玛”的名称(当然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英国人还用的是Everest)向西藏噶厦提出申请,但这次的申请直到1932年8月末才获得批准。



物的。特别是他们当时所用的老式莱卡相机,那里边肯定能冲洗出他们登上顶峰的照片的。英国人甚至说,“如果能有证据说明马、欧二人早已在1924年就登上了珠峰,那么人类高山探险史必须重写……”这样,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以至90年代,“马·欧之谜”已经成为全世界登山者们关注的问题了。1986年6月,美国和英国的两个出版社共同出版了我写的《Footprints on the Peaks》一书,之后,我先后接到来自英国、德国、瑞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日本和塞尔维亚等国登山家的来信达60多封,他们一致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发现了马洛里和欧文的什么遗物或痕迹?可见人们对这个谜的关注。

1924年英国登山队第三次失败后,元气大伤,一时不能再组织第四次攀登,但英国人认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英国Everest委员会(英国高山俱乐部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改进了原先的技术装备,训练了一批年轻队员。因为1921、1922和1924年攀登珠峰有经验的队员,不是年龄大了,就是身体不行了。另外就是积极拉赞助,按英国人的说法是要换代了,这一换代,中间就隔了整整9年。另外西藏地方政府也不是那么好办的,英国人在1931年仍以“珠穆朗玛”的名称(当然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英国人还用的是Everest)向西藏噶厦提出申请,但这次的申请直到1932年8月末才获得批准。那时,英国人认为,从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登顶是最理想的路线,当然他们也探查过从珠峰的西山脊和北壁路线,认为太难和危险太大。而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沿孔布冰川先登上洛子峰的南坡面到达8000米的珠峰与洛子峰之间的鞍部——南坳也是可行的,但第一,路线太长;第二,尼泊尔地方居民和政府坚决反对英国人登他们的“神山”。当地居民曾对1922年从中国西藏越过西山脊下部进入尼泊尔境内侦查东南山脊和西南壁路线的英国人进行了殊死反抗,所以英国人不敢从尼泊尔那边登珠峰。

英国人这次登珠峰前，训练其对缺氧的适应能力和个人负重能力，因为这是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必备的条件。他们计划1933年两次登顶，如果春季登顶失败，将在雨季过后的9月下旬再进行一次。所以在装备、食品以及运输方面需要更细致地准备。这次队员的最后确定是在前述耐缺氧的适应能力和负重行军两项达标的水平上选出的。

英国人这次从160名候选队员中选出10位登顶队员和队长、负责装备和食品的管理员、医生以及电台技术人员。队长一职最后确定为48岁的很有高山登山经验的卢特列吉。他从1925年以来先后6次在喜马拉雅山区从事登山，而且懂得当地的藏语，对当地雇用的夏尔巴人搬运工也很熟悉，他认识30多位很强壮的夏尔巴人，其中有12人曾先后在1923、1924和1930年在加涅特峰为英国登山队当过搬运工和向导，而且他们都登上过8000米以上的高度。英国队员中32岁的史密斯，曾在1931年登上过喜马拉雅山上的加麦特峰；32岁的巴尼、31岁的格林、25岁的希普顿、37岁的J.H.巴斯提托；34岁的约翰逊、29岁的P.W.哈里斯、28岁的L.R.威嘉、27岁的隆吉兰德、24岁的布罗克列巴克，还有首席医生W.马可林等，他们虽然没有攀登过珠峰，但都在喜马拉雅登过高山，都有喜马拉雅山区的登山经验，平均年龄30岁，是一支年轻的高山探险队。在帐篷方面，英国队吸取了亚洲蒙古和新疆地区游牧民族抗风力和保暖性能都很强的蒙古包的优越性，制成蒙古包式的帐篷，而且用双层制作，也就是在里和面之间有一个空气层。在食品方面，注意了高热能食品，改进了氧气钢瓶，减轻了重量，增加了容量。在防寒衣物上也做了很大的改进，主要是用双层羽绒衣裤，特别制作了防止冻坏鼻子和面部的面罩。英国队吸取过去的教训，细致地对在东绒布冰川上设立的一、二、三号营地上用的不同形式的帐篷和其他营地的位置做了精心的设计。他们计划从海拔7000米，也就是从北坳向上就开始使用氧气，并尽可能多地考虑了更多的困难和应急措施。



在防寒衣物上也做了很大的改进。主要是用双层羽绒衣裤，特别制作了防止冻坏鼻子和面部的面罩。

由于从气象预报中得知雨季比往年提前到来，队员们必须抓紧时间，不停顿地向前冲击。

根据1921、1922和1924年三次攀登珠峰的经验，英国人认为春季5月上旬至6月中旬之间是登珠峰最好的时期，因此，第四支队伍于1933年4月17日全部到达位于绒布寺上方的基地营。5月6日，12名队员已在6100米以下建好两个中间营地。这次英国队对成功抱有极大希望，他们所雇用的夏尔巴搬运队也是很强的。

侦察中看清了通往北坳的道路与9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其难度和险度也比9年前大多了，尤其是天气特别坏。8位队员非常艰难地在前边开路，5月15日下午才越过北坳，登上7200米的东北山脊，在这里建了一个临时营地，但强烈的西风使人很难休息好。

由于从气象预报中得知雨季比往年提前到来，队员们必须抓紧时间，不停顿地向前冲击。史密斯、希普顿、哈利斯、隆古兰德、巴斯提托、巴尼和15名夏尔巴搬运工，提前于5月15日进入4号营地，并将物资运送到这里。之后，队员们于16日继续上攀，并于当晚建成第6号营地。他们打算在5月23日登上顶峰。但是强烈的暴风使他们无法在6号营地停留，只好下撤到4号营地暂避。3天之后，暴风才稍稍减弱，于是队员们紧急向前冲击，登顶日期推迟到25日。但是暴风稍弱却来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4号营地上的帐篷已多次被埋没，人们只能过一小时出来清除一次帐篷上的积雪，至于已建好的第5、6号营地，则早已深深地被埋入雪中。直到28日，天气稍有好转，哈利斯、维加和隆古兰德三人结组并带15名夏尔巴人向上修整第5号营地和第6号营地，这里已是海拔7600米了。他们在6号营地过夜。5月30日，史密斯和希普顿抵达6号营地，而哈里斯和维加两人已准备从6号营地向顶峰冲击了。他们沿东北山脊的脊背向上，在海拔8100米的第一台阶的东侧约140米、距山脊脊背20米的岩石斜坡上发现了一支冰镐，哈里斯拿起冰镐看到冰镐的木柄上刻有欧文的名字，说明欧文是从附近滑坠到珠峰北壁的下边去了。这一发现，后来引起了那些认为马洛里和欧文两人是在登上珠峰之后、下山途中遇难失踪的英国人更进一步强



调：“英国人早在1924年就已登上了珠峰。”

哈里斯和维加两人从大岩沟的左侧继续上攀，到达“第二台阶”下方，哈里斯先试着向这个陡峭的岩壁上攀，但没有可以抓握的支点，他只上攀了1米多，就滑下来，摔伤了腿。维加也来试着上攀，只比哈里斯稍微攀高了一些，但也摔下来了。他们又试着从旁边、左边和右边攀，结果都不行，只好暂时在“第二台阶”下宿营。但5月31日起，暴风雪又来了，虽然这时希普顿和史密斯等人也都到达了这里，但暴风雪使气温急剧下降，前进已无希望，而且所带氧气和食品也已快用完，他们只好一同下撤，先返回基地营，好好休息一下，再等候好天气的来临。但是当他们从北坳下撤时，大小雪崩不断，把原先已修好的路和保护绳索都砸得无影无踪，再想从这里上北坳，困难和危险难以预测，结果只好宣告失败。这时真正的雨季也已提前到来，如果再有4天的好天气，英国人很有成功的可能，但一直到6月15日，暴风雪也没有减退的迹象。第四支英国队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1933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这年的3月5日，英国的两位空军飞行员，D.F.麦金代尔上尉和S.B.哈利斯少校，驾驶空军侦查机从9500米的高空，围绕着珠峰飞行了40多分钟，从它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对珠峰的地形进行了拍摄；另一件事是4月24日，美国空军为试验他们最新制作的“贝卡撒斯五型”(Pegasus5—星座五型)发动机的性能，而用装有这种发动机的高空侦察机作横跨喜马拉雅高山的试验时，飞行员D.F.鲍里斯少校专门围绕珠峰转了几周，在18000~12000米和9200米的高空，从不同方向对珠峰的各个方向、不同角度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分别在1933年5月26日和28日，在《伦敦新闻》和《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珠峰的航拍照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表珠峰的航拍照片。《纽约时报》的标题是：“大自然最后的神秘，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在解说词中提到：“从西北方向鸟瞰它，大量的黑色断崖，黑森森的令人感到恐

如果再有4天的好天气，英国人很有成功的可能，但一直到6月15日，暴风雪也没有减退的迹象。

惧……这些非常清晰的地形图片，完全可用于作战使用……”这样，珠穆朗玛峰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33年第四支英国队虽然失败了，但英国人却总结出几条攀登珠峰的经验：



一、登顶的队员在进山之前，必须在10个月前就开始身体训练，而且要严格地按计划指标进行。

二、登顶队员必须经过严格而实际的耐缺氧和耐高寒训练，而且必须达到标准，因为1933年的队员通过选拔之后都进行了这两项训练，所以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冻伤之类事故，也没有发生肺水肿和肺气肿等严重的高山病，只有几个夏尔巴人受了冻伤。

三、登顶队员必须受过高山负重行军的严格训练，而不能完全依靠夏尔巴人搬运工和向导(夏尔巴人向导有时也要为英国队员背负很重的物资)，因为一旦夏尔巴人累坏或病倒，或罢工，队员就得自己背负装备或食品，所以这项训练是必须的。

四、登顶队员最迟必须从海拔7000米的高度开始用氧，而不是过去的从7500米或7800米才开始用氧。

五、攀登珠穆朗玛峰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4月底到6月初，具体地说是从4月25日到6月5日之间，这就是雨季前的最好登山季节；另外是在雨季过后的9月下旬到10月下旬，这一期间有4周的好天气周期，过了这个时期就是喜马拉雅山的严冬季节了。春季，雨季前珠穆朗玛地区有6周的好天气周期。

六、氧气瓶还需改进，要求钢瓶本身重量小，而容量要大。

七、食品和装备要多样化，包装和运输都应事先作好计划，不但要求热量高，体积也得小，适合各种运输，如轮船、卡车、牦牛驮工、夏尔巴人背运等。

八、汽油炉要小型化，要求工厂直接制造适合高山用的、体积小，火力大，又节省燃料的汽油炉(这种炉子当时只有向瑞典定购)。

照相器材和测量高度方法的改进。

1934年5月，英国人莫利斯·威尔逊(Maurice Wilson 1904~1934)单身一人前来攀登珠峰。他雇用了8名夏尔巴人，沿东绒布冰川向上，计划通过“北坳”，沿东北山脊登上珠峰。但不幸的是，他刚到6400米，就患了严重的肺水肿，很快死亡。8位夏尔巴人将他的遗体包在羽绒睡袋里放进帐篷后，都下山回家了。这就是1960年中国队在首次从珠峰东北山脊登山时，在6400米的地方所发现的那具欧洲人的遗骸，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哪国人，什么时候死亡的，所以就地在积雪和积冰中挖了个深坑，将它埋葬了。消息发表后，英国高山俱乐部和遇难者的家属都来过感谢信。

1934年6月末，英国的希普顿组织了一个六人队，前来珠峰地区进行全面侦察。这6人是狄尔曼、新西兰人L.V.布兰茵安德、查尔斯·渥林(医生)、E.G.H.肯普森、E.H.L.威格拉姆、麦考尔·斯奔达(优秀的摄影师)，并从尼泊尔雇了15位有经验的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还从珠峰山下雇了40位藏族搬运工和用耗牛驼运登山物资。但希普顿的目的，不是要登山，而是侦察珠峰的西山脊、西南壁、东南山脊和北壁的4条登顶路线，详细地观察并拍了大量的照片。

由于是在雨季之中，所以他们多次遇到雪崩，而且危险颇多。他们先后到达了北坳下方6400米、西山脊上7200米、西南壁上7400米和孔布冰川的源头(7800米)等高度，主要是查看地形，摄取照片，选择登顶路线，最后，6人登上尼泊尔境内海拔7816米的南达·迪威峰(Nanda Devi)，作为一次侦察性的训练，为1935年攀登珠峰做准备。

1935年春，西藏地方政府发给英国一个许可证，允许英国人在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的一年之内攀登珠峰。这样，英国的EVEREST委员会决定，1935年内全面细致地研究攀登珠峰的六大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措施，精心准备，以便1936年进行攀登。这六大问题是：

此时已是珠峰的雨季了，这时的北坳斜坡面是极危险的。雪崩不断。

探险珠峰 ◎ 西藏与珠峰的不解之缘



1.查清珠峰雨季期间和雨季过后期间高山上的积雪的质量,是松软的?还是含水分多?是较干燥的粒状还是成六角形的?积雪的深度和结构?是否可在雨季后攀登。

2.侦察尼泊尔一侧珠峰西山脊的登顶路线,有无可能从西山脊登上顶峰?如何应付从西藏一侧进入尼泊尔境内侦察西山脊时,不会引起尼泊尔人的坚决对抗。

3.根据北坳上方冰雪结构的情况,提出相应制作装备的报告。

4.选拔1936年登顶的主力队员的标准,提出必要的选拔条件和严格的检查制度,特别是高山缺氧的适应能力和负重能力两项必须达标。

5.提出登山途中和7500米以上高度的食品品种与热能的要求标准和高山服装的改进规格和要求。

6.提出摄影和测量高程的器材的改进与增加计划,专业摄影师和测绘人员的选择与要求。

委员会确定1936年英国队的队长由埃利克·希普顿(*shipton Eric Earl 1907~1977*)担任,并责成埃利克·希普顿和5名由委员会经过检测确定的队员:G.提尔曼、E.凯普森(测绘专家)、L.布莱茵(新西兰人)、E.维格拉姆和M.斯奔达尔(摄影师)于1935年春前往珠峰进行侦察路线和队员的适应性(高山缺氧)训练。

希普顿率领的这几位主力队员,大都在1934年攀登过南达·迪威峰(7816米)。他们于1935年7月4日经印度、尼泊尔,越过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界进入绒布寺上方、海拔5200米的基地营。此时已是珠峰的雨季了,这时的北坳斜坡面是极危险的,雪崩不断。但希普顿、沃林和凯普森3人在9位夏尔巴向导的支援下,从6400米的营地向北坳缓慢而慎重地前进,主要是了解积雪的雪质结构和他们自身的缺氧适应能力。他们共携带了15天的食品和燃料。由于从7月13日起,暴风雪不断,他们只好在6400米的营地上停留了4天。在这里细致地观察了通往东北山脊的可行性,并拍摄了大

量的各个地段的照片，然后下山。在下山过程中，他们在北坳下方多次遇到雪崩，每次都很大，5天前上山时道路还比较好走，下山时已面貌全非。与1922年相比，现在的雪崩比那时多多了。所以通过北坳时，雪崩是最大的危险，在准备工作上，这个问题是必须充分考虑和研究的。

从这次侦察的情况来看，雨季，也就是7月和8月间攀登珠峰危险太多，安全难保。

希普顿等人这次的侦察，特别是斯奔达所拍摄的珍贵的珠峰登顶路线地形图片，给下一步的准备工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希普顿认为，6位队员能够很顺利地登上北坳(7007米)，主要原因是队员都很精干，装备轻便，食品质量高而体积小，重量轻。所以次年的主力队员最多不要超过8人，能保证2~3人登上顶峰就很不错了。

1936年，第6支英国珠峰队由9人组成，队长是卢特列吉(Ruttledge Hugh 1884~1961，英国法学家，当过行政官，在印度当过县长，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从事高山探险，1933年和1936年英国珠峰登山队队长)，队员希普顿、E.G.H.肯普逊、P.哈里斯、F.史密斯、E.威格拉姆、P.奥利威尔、莫利斯和医生渥林。可以说，这是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英国人这次共雇用了56位尼泊尔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

英国队于1936年5月2日到达我国西藏境内的绒布寺上方，并在5200米处建立了基地营。他们一行，由于装备较轻，事先准备充分，人员精干，一开始就很顺利地于5月14日到达了第4号营地(北坳上方)，计划15日由希普顿和史密斯两人组成的第一突击组从北坳出发，在21名向导的支援下，向顶峰冲击。在这21名夏尔巴向导中，最小的是编号48的丹增，年仅19岁，表现得特别勇敢和能吃苦耐劳，学习英语也很快，英国人很欣赏他(他就是1953年参加英国队，并与希拉里两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

从这次侦察的情况来看，雨季，也就是7月和8月间攀登珠峰危险太多，安全难保。

英国队在撤离基地营前，曾准备派人前往北坳西侧的坡面上寻找马洛里和欧文的遗体，但因队员都已非常疲惫，队长只好取消了这个打算。

Norgay, 1914~1986)。5月18日，希普顿和史密斯两人曾建成了第七号营地(7400米)，但所在地正处大风口，强烈的西风夹着飞雪几次把帐篷吹起、吹坏、吹跑，而且，这一带山坡的积雪深而松软，危险太大，他们两人只得暂时下撤到四号营地等待风停。由于20多位夏尔巴向导和6位队员都在这里集中等候好天气的到来，所带的食品很快消耗完了。他们在这里一连停留了11天，天气还不见好，队长决定全部下撤返回基地营，另做打算。

5月19日，基地营的电台收到气象预报说雨季马上就要提前到来，孟加拉湾的海浪一个比一个大，预示着强暴的西风将会延长两周以上。这种气象是过去多年所没有的。只要孟加拉湾的大风浪一起，4天后必定为珠峰地区带来暴风雪，而且后来基地发现雪花都是湿雪，这就预示着这里将会不断地发生板状雪崩(雪崩中最危险的一种)。而正在从四号营地下撤的希普顿和哈利斯两人先后遭雪崩袭击，所幸仅处在雪崩的边缘，哈利斯的左手和头部被自己的冰镐尖扎伤。雪崩袭击时，哈利斯被冲倒，希普顿被崩雪埋了半个身子，他很快逃了出来，而夏尔巴人因为跑得快，没有伤亡，但大批的装备全都被埋在深深的积雪之中。1935年的英国队就这样被迫撤退。

英国队在撤离基地营前，曾准备派人前往北坳西侧的坡面上寻找马洛里和欧文的遗体，但因队员都已非常疲惫，队长只好取消了这个打算。

“现在看来，天气是决定成功与否的重要问题啊！”这是队长卢特列吉和希普顿在撤营前所说的。

1938年，第七支英国队的队长为迪尔曼(Tilman Harold William 1898~1977)。他是英国喜马拉雅探险家，曾随父母在非洲肯尼亚呆过6年，与其父登上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5895米)，后与奥迭尔等一同登上过喜马拉雅的南达·德威峰。队员有希普顿、史密斯、奥戴尔(1922、1924年英国珠峰队队员)、奥利渥、彼德、罗依



达、渥林等7人。英国队这次共雇用了31位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由夏尔巴人安·道尔吉担任工头。

1938年，正值欧洲战争风云密布、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半个中国的战争年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以其所积累的十多年经验，吸取了过去惨痛的教训，做好充分准备后，力争这次一举拿下珠峰。

4月6日，英国队进入5250米的基地营，26日以前，已建好一、二、三号营地，并将必需的食品和装备运上了这3个营地。不幸的是，队员们不是感冒就是咽炎，还有人发高烧，连北坳都没能上去。5月18日他们勉强上到第三号营地，只见珠峰顶部的旗云长长的，说明风很大，天气与1936年春天的情况差不多，预示着雨季提早来临。28日，队长迪尔曼、队员奥戴尔、奥利渥和渥林4人进到第四号营地，两天后其中三人使用氧气前往探察积雪深度和雪质，到达7400米的东北山脊上，但北坳上雪崩不断。

为了安全，奥戴尔等人又转到北坳的西侧察看地形，这里比较安全一些。6月5日，风雪减弱，史密斯、希普顿、罗依达和队长迪尔曼在夏尔巴向导道尔吉率领的7名向导的支援下，越过北坳到达7900米高度的第六号营地。7名夏尔巴向导将食品和物资运上六号营地之后就下山了。9日，迪尔曼和罗依达在六号营地过夜，准备10日向顶峰冲击，12日到达8400米的高度之后，由于风大雪深，难以前进，决定下撤。

这样，英国队从1921年起，到1938年止，先后对珠峰进行过7次挑战，但都失败了。

需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亚洲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从事高山探险活动的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美国的高山探险者们，他们也都攀登过海拔7000米、8000米以上的高峰，但地球上所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群中的最

这样，英国队从1921年起，到1938年止，先后对珠峰进行过7次挑战，但都失败了。

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国家暂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高山探险活动，英国人只能从尼泊尔一侧想办法。

高者，如珠穆朗玛、乔戈里(8611米，位于喀喇昆仑山上)、干城章嘉(8598米)、洛子(8511米)、马卡鲁(8481米)、卓奥友(8201米)、道拉吉里(8172米)、马纳斯鲁(8156米)、南格·帕尔巴特(8125米)、安娜普尔纳(8091米)、迦鲁布鲁姆Ⅰ(8068米)、布若阿特(8047米)、迦鲁布鲁姆Ⅱ(8036米)和希夏邦马(8012米)等大部分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有各国高山探险家攀登过，但从未有人登上过其中的任何一座。

1939年起，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各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也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并在伺机侵略东南亚各国。全世界各地的高山探险活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以及大洋洲)都处于停顿状态。

二战后各国探险家的努力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7年5月，有一位名叫阿尔·迪曼(E. Denman)的加拿大人，单身一人，雇了8名夏尔巴向导，前来从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上山，但他仅仅越过北坳就无法支持，不得不撤退了。

1950年5月，由英国H.W.迪尔曼(H.W. Tilman 1898~1977)和美国C.S.赫斯顿(O.Houston)率领的英美联合珠峰侦察队一行4人，首次从尼泊尔一侧，沿孔布冰川向上，对从珠峰东南侧和西南侧登顶路线进行了短期的侦察(一周)，仅到达6800米的孔布冰川上游。

1951年5月，由希普顿率领的第八支英国珠峰队，首次从尼泊尔一侧，沿孔布冰川对着洛子峰的南坡面向上，侦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的路线。这支侦察队一行共7人，他们是B.慕林、M.乌尔特、T.布尔吉隆、G.列吉弗尔特、A.提塞里斯和新西兰人E.希拉里。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国家暂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高山探险活动，英国人只能从尼泊尔一侧想办法。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支英国侦察队，它与1950年由迪尔曼率领的英美联合

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队的队员都很精干，经验也多。他们沿孔布冰川一直向上，察看了山东南山脊、西南壁和西山脊登顶的各条路线，最高登到孔布冰川中游偏上方的5800米，详细拍摄了地形图片。这是英国人首次进入孔布冰川山谷，由于其环境非常幽静，被命名为“幽静的山谷”。

1951年春，还有一个丹麦人克劳斯·贝加·拉尔森雇用了8名夏尔巴向导，偷偷地越过中国和尼泊尔边界进入西藏，从东绒布冰川向上，计划登上北坳后，沿东北山脊直取珠峰之顶。但当他和这几位向导到达6450米的营地时，8名夏尔巴人拒绝再往前走，集体罢工。这位想创造单身一人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丹麦人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1952年5月，历史上第一支瑞士队，由威斯·迪南特·埃德渥尔特(Wyss-Dunant Edoward 1897~1980，日内瓦外科医生，高山生理学家。曾先后攀登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和横穿格陵兰半岛，1950年获瑞士高山俱乐部的赞助后，曾在锡金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从事高山探险活动)领衔组成，有P.阿尔贝特、G.舍瓦尔、L.弗罗里、C.阿克比尔、A.罗克斯、霍夫施泰德等8人，另外还雇用了丹增·诺尔盖等42位夏尔巴人作向导。

瑞士队是一支很强的高山登山队，像A.罗克斯等人都是阿尔卑斯山险峰的优秀攀岩能手，虽然冻掉了3个手指和5个脚趾，但他仍然是位很有实力的攀登能手。在6位老队员中有两位是科学家。他们于1952年4月6日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然后雇用夏尔巴人做向导和搬运物资。从加德满都进入孔布冰川下游设立的基地营，物资全靠人背和牦牛驮运，瑞士队员也只能随运输队步行。

瑞士队4月25日到达基地营，26日将一号营地设在冰瀑区的下方，开始运输和适应性行军。罗克斯、弗罗里、朗贝尔和阿克比尔组成的突击组越过冰瀑区继续向上。但此时“南坳”的山坡上有很深、且呈粉状的积雪，雪崩的危险时刻都在威胁着瑞

但当他和这几位向导到达6450米的营地时，8名夏尔巴人拒绝再往前走，集体罢工。这位想创造单身一人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丹麦人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士队。他们绕道从右方积雪的边缘上攀还比较安全，再往上，在南坳稍下方有一道大的冰雪裂缝，宽达六七米，两名队员和5位夏尔巴向导下到裂缝底部，再攀上对岸的裂缝上方，在这个裂缝上架起了绳桥，使全队和夏尔巴向导都能省力而安全地通过。第五号营地就设在南坳稍下方海拔7800米处。这时，有的队员实在太疲劳了，队长根据当时队员的体力情况，决定由朗贝尔、弗罗里和阿克比尔3人组成第一突击组，由7位夏尔巴向导背负食品和装备、燃料，协助他们从南坳开始向顶峰冲击。

4月29日，瑞士队突击组在南坳上方设置第六号营地。为了减少食品和燃料的消耗，突击组决定只留下4位夏尔巴人，其余3人下山。30日晨，他们离开第六号营地沿东南山脊向顶峰冲击。遗憾的是，瑞士队在向顶峰冲击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考虑不周，没有计划在南坳与顶峰之间至少还应建立一个或两个中间营地，而是想从南坳一下子就冲上顶峰。另外，瑞士队虽然携带的氧气瓶比二战前英国人用的重量轻、容量大，但这种新式的氧气瓶仍处于试验阶段，使用过程中不断出现故障，队员们实际上并没有沾着它的多大好处。朗贝尔等3人中已有两人因冻伤走不动了，只有朗贝尔和夏尔巴向导丹增两人可以继续上攀，5月3日他们登上东南山脊8595米的高度，眼看就可以登上顶峰了！他俩在8595米的地方过了一夜，由于所带帐篷太小，防寒衣服过于单薄，朗贝尔在夜间脚被冻伤，天又下起了大雪，前进道路无法看清，队长通过对讲机让他们下撤，丹增扶着朗贝尔下山，返回了基地。就这样，瑞士队的冲顶计划功亏一篑。

队长的决策无疑是对的，大雪一连4天不断，若不下撤，后果不堪设想。

5月11日队长又组织了阿尔贝特、霍夫施泰德和罗克斯3人为第二突击组，并配备了洛克等2位夏尔巴向导协助他们，做第二次登顶冲击。他们于5月30日离开基地，第三天就登上了南

坳，但暴风雪一连几天不断，他们在南坳上方的营地上一连三天不敢行动。这时，从收音机里了解到，珠峰地区的雨季已经到来，瑞士队只好召回第二支突击组，并宣告停止1952年春季的登顶珠峰活动。

瑞士队在向尼泊尔政府申请1952年登珠峰时，申办了春季(雨季前)和秋季(雨季后)两次活动。因此，他们春季的活动失败后，又于当年秋天来到珠峰南坡。

9月24日，由舍瓦列率领的第二支瑞士队来到珠峰南坡山下，队员是朗贝尔、R.布希奥、G.格罗斯、A.施波海尔和N.吉连富尔特等6人。他们仍雇用了已很有经验的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为向导首领。

春天，瑞士队眼看胜利在望，只因天公不作美，失去了登顶的机会，他们很不甘心，秋天再来，轻车熟路，11月12日即登上南坳。但在这里又遇到大雪，直到19日才得以从南坳继续向上，到达8600米的高度。东南山脊上风很大，而且越往上走风力越大，几次把人吹倒，大风越刮越寒冷，令人感到恐怖。就在这时，一位夏尔巴人突然滑坠到下方摔死，这就更促成了瑞士人的撤退决心。失去了眼看到手的成功，又一次宣告失败。

瑞士人感到非常遗憾，他们千辛万苦，开创了一条从东南山脊直取顶峰的路线，却接连两次受挫，实在痛心。然而，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人却非常高兴，他们一直担心瑞士人一举拿下珠峰，瑞士人在几乎胜利的边缘失败，使英国人暗喜不已，他们更抓紧进行准备工作。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1952年，英国印度测绘局局长B.L.卡拉迪，在当年发行的《喜马拉雅》杂志上发表了印度对珠穆朗玛峰高度测量的最新数据为8840米，并提出今后各国应以这个数据为标准高程。

在此之前，英国印度测绘局曾先后发表过珠峰的不同高程为



因为丹增等人已先后3次从孔布冰川向上，到达南坳，并从南坳登上过8595米的高度。如果不是天气转坏，瑞士队早就登上了顶峰。

8888米、8882米、8847米、8834米、8852米，而从1955年到1957年，各国都普遍采用8848米。

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希拉里和丹增的成功

1953年由J.汉特(Hunt Henry Cecil John 1910~1989，英国著名高山探险家，曾登上过喀喇昆仑山上的撒尔托罗·堪利峰，海拔7742米；参加过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的侦察活动，多次在喜马拉雅山区从事高山探险)上校率领的英国9人珠峰队，做了三年准备工作，特别是吸取了瑞士队失败的教训后，选拔了英国当时最优秀的高山登山家：T.布尔迪隆(1924~1956，牛津大学毕业，1951年与汉特一起侦察过尼泊尔南侧的珠峰登顶路线)、R.埃文斯、A.葛里高利、W.诺依斯、G.劳·瓦伊利(印军霍尔克连队少校连队长)、M.威斯特马克特、G.宾特和特选队员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特·希拉里(Hillary Edmund Percival 1919-)。他们雇用了一年前为瑞士队服务过的、以丹增为首的全部40多位夏尔巴向导，为英国人的成功增加了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丹增等人已先后3次从孔布冰川向上，到达南坳，并从南坳登上过8595米的高度，如果不是天气转坏，瑞士队早就登上了顶峰。

这次英国队不但改进了氧气瓶和氧气面罩，还带了3种人工供氧的装置：有供7500米以下行军用的；有供8000米以上行军用的；有专为在高山上睡眠时用的。在羽绒服上，英国人吸取了法国的经验，采用制成双层的羽绒服；轻而保暖的高山靴，特别增强了靴底的坚硬度；由食品研究所改进的方便食品；帐篷面料不但作了防水处理，而且改为三层，这样就有了两个空气层，以最坚固的航空用的加厚但又较轻的面料做最外层，使其有很强的抗大风性能。可以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喜马拉雅委员会为这支队伍花了大量的经费，并动员了许多科研单位为他们研究当时最好的高山装备和高山食品。英国队共携带了180多个装满压缩氧的钢瓶，这就必须有上百名夏尔巴人为他们背运。

英国队携带了通过冰瀑区大冰裂缝时使用的铝合金轻型梯，为登上南坳提供了便利。在登山主绳和辅助绳方面，英国制作的尼龙绳比法国人发明的、1950年攀登安娜普尔纳峰(8091米)时使用的尼龙绳还要轻，而抗拉力要好得多，可达1750公斤。汉特队长为这次活动确实开动了脑筋。

英国队全体队员于这年3月6日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他们的装备和食品早在伦敦出发前一个多月就从海运和空运，经印度运抵加德满都。从加德满都雇了300名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运送大小500多包装备和食品前往珠峰南侧孔布冰川上的基地营。基地营设在丹勃齐喇嘛庙上方海拔5100米的孔布冰川侧碛上。时间是3月30日。

在基地营经过3周的适应性训练后，他们攀登了营地附近4000~5000米的几座山峰。4月13日，汉特计划在基地营上方再建一个前进营地²，以便使上方需要的食品和装备能够从这里越过危险较多的冰瀑区，运往上方的营地。在前进营地的上方，英国队使用了事先准备的轻金属梯，搭在冰裂缝上或立在冰裂缝底部，人们可以安全地横跨过冰裂缝或冰裂缝的上方。英国人制作的轻金属梯长3~5米，也可以把几个梯子连接起来，最长可达20米。这样，攀越直上直下的冰墙就方便多了。英国队的梯子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不但加快了前进速度，也使夏尔巴向导们背运物资减少了许多危险。

英国队计划在洛子峰的南坡面上设置两个营地，主要是使夏尔巴人运输物资能够有休息的地方，这是吸取了过去夏尔巴人事故伤亡较多的教训。英国人事先能够考虑到夏尔巴人搬运的安全问题，



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上珠峰顶峰的希拉里。

61
英国队的梯子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不但加快了前进速度，也使夏尔巴向导们背运物资减少了许多危险。

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

4月13日，汉特、希拉里、G.劳和威斯马克特4人出发，开辟越过孔布冰川大冰瀑区的道路。他们用了两天时间，开辟了越过大冰瀑区、通往南坳的道路。以后，夏尔巴人的运输队先后用了4周才把高山上的装备和食品通过这条道路运送到南坳上方8100米的营地。

5月18日，队员开始从8100米的营地向上方侦察。G.劳第一个上去，他发现这8100米的上方坡面比事先想象的要难爬得多，但他还是上到8400米的地方，5月24日，第八号营地就建在这里。



最初决定由布尔迪隆和埃文斯两人在两名夏尔巴人的协助(主要是背东西)下，作为第一突击组，从8400米的营地向顶峰冲击。他们两人于5月26日清晨7:30从8400米的营地出发，2200米路程用了一个半小时，应该说前进的速度是快的。他们的信心很足，但是越往上走山脊越陡险，特别是新下的雪很厚，危险也越来越大。上午10:00以后他们几乎走不动了，1小时只能前进100米，还相当吃力。12:00左右他们登上8710米的珠穆朗玛峰的南峰。这是当时人类登上的最高高度。眼看胜利在望。南峰与珠峰之间的鞍部，不是很长，只有不到500米，他们下决心一定坚持前进，但是氧气装备出了故障，布尔迪隆和埃文斯两人互相对看，在这紧急时刻，是继续前进还是赶快下山？因为当时还无人进行过无氧攀登，人们普遍认为氧气是决定生死的关键。就在这时，走在前边的布尔迪隆突然倒地，埃文斯很惊慌，他慢慢地扶起布尔迪隆，两人决定立即下撤。其实，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也就成功了，但他们在成功的门槛前没有能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

就在布尔迪隆和埃文斯两人向顶峰冲击之时，5月26日，队长汉特和夏尔巴人纳姆佳尔正背负着氧气瓶和食品从东南山脊8400米的地方向珠峰的南峰前进，他们是为第二突击组供应氧气和食品的。第二突击组由希拉里、G.劳和葛里高利3人组成，还有丹增等6位夏尔巴人。此时他们已越过南坳，正沿东南山脊向顶峰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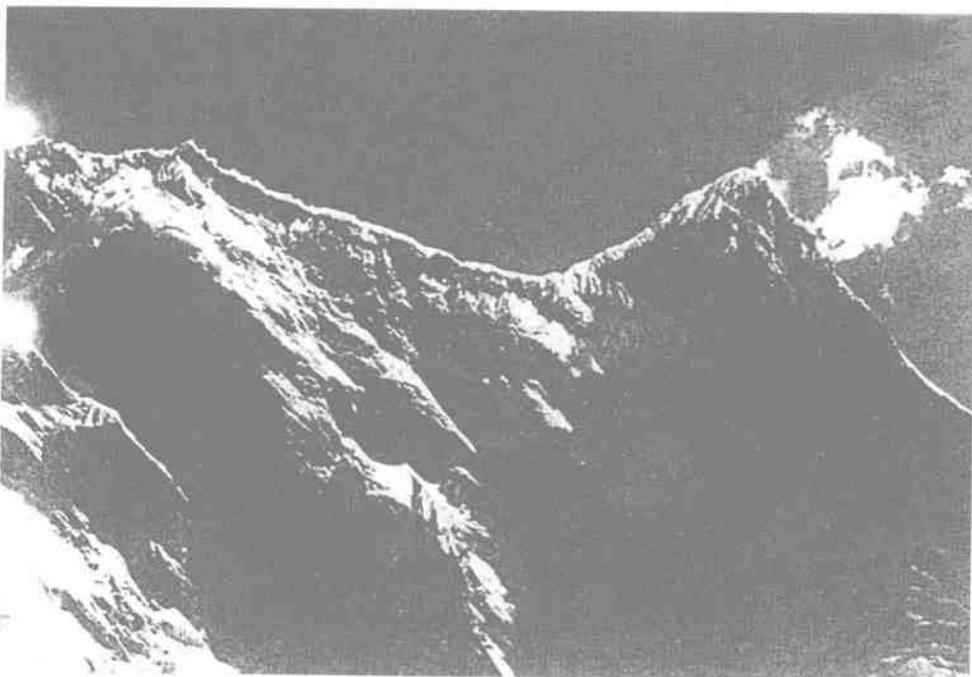
由于寒冷的大风刮个不停，气温已下降到零下25℃，这种天气在东南山脊行动是很危险的。所以，27日第二突击组在南坳上方的营地待命；28日，风力稍稍减弱，按计划G.劳和葛里高利两人向东南山脊上方前进，以便建立第九号营地。两人在3名夏尔巴人的支援下，清晨7:00离开营地，走了不到一小时，3名夏尔巴人中有2人病倒，仅剩一人背负达40磅的重物，使得小组行动非常缓慢，而在他们后面，由希拉里和丹增组成的支援组，很快追上并超过他们。这时，一同向上攀登的成了5个人：希拉里、丹增、埃文斯、葛里高利和另外一名夏尔巴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背负达50磅左右的东西，终于到达汉特所在的第九号营地。

稍事休息，大家继续从这个营地向顶峰冲击。从这里往顶峰，有一段陡峭的雪脊是最危险的，5人都有氧气，大家奋力前进。到达8700米的南峰附近时，每个人携带的氧气都不多了，食品也所剩无几，而埃文斯、葛里高利和另一位夏尔巴人的身体都难以坚持。汉特队长自己也不行了，于是他决定只留下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两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全部下撤。这确实是正确的决定。

希拉里和丹增目送他们下山后，立即重新支起帐篷，由于风力太大，他们把帐篷多次加固，用多条绳索将其上下左右都拉紧。入夜，气温降到零下27℃。他们两人把汉特特意留下的食品和燃料以及几个氧气不满的钢瓶都一一作了检查和清理。由于氧气已不多，他们尽量减少吸氧量，并将沙丁鱼、果酱、蜂蜜和杏仁等罐头食品集中起来，分为四份，为的是他们次日——29日一天突击顶峰，并于返途中使用。晚饭是在大风差点将帐篷吹跑的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吃完的。两人只吃了些沙丁鱼、果酱和面包干，咖啡也是用温水冲的，因为汽油炉的火焰太小，无法将水煮开。夜间，由于用氧太少，两人都在似睡非睡、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度过。

5月29日一早，他们两人只吃了些面包干、果酱，喝了些半开的温水（雪化水），就提早出发了。这天的天气还不错，太阳出来了。

从九号营地出发，他们整整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登上了地球的最高点。向四周望去，清楚地看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峰峰岭岭。



珠峰(右)与洛子峰(左)之间的“南坳”，1956年5月，瑞士队从这里兵分两路，18日登上洛子峰，24日登上珠峰。
9:00，他们登上南峰，也就是3天前埃文斯和布尔迪隆两人到达过的8710米的南峰，但前进的速度很慢。继续向南峰与珠峰间的小鞍部前进，希拉里感到氧气面罩漏气，但他忍受着缺氧的痛苦，慢慢向顶峰攀登。前方的积雪是冰雪混合体，踩上去很硬。他想这下总能登上顶峰吧！希拉里在前，后面是用主绳与他连在一起，保护他安全的丹增，他们默默无声地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整整走了4个小时，前边又出现了一个冰雪高台，他们十分艰难地登上这个雪台，其实这里就是珠穆朗玛的顶峰了！

从九号营地出发，他们整整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登上了地球的最高点，向四周望去，清楚地看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峰峰岭岭。英国人30多年的梦想今天实现了。他们看到绒布冰川、孔布冰川，看到北边的绒布寺，也看到南边的丹勃齐寺。丹增说：“我是最幸福的夏尔巴人，我站在这里向右看绒布寺就在下边，向左看又是丹勃齐寺，同时能向两个寺庙朝拜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1953年5月29日，
首次从东南山脊
登上珠峰的夏尔
巴人丹增，在顶峰
上手举英国、尼泊
尔国旗。

希拉里和丹增两人先后举起联合国旗、印度旗、英国旗和尼泊尔国旗，相互留影。丹增从怀中取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神仙的木刻像，在山顶挖了一个雪坑，将它埋到坑里，并用雪盖住；而希拉里则从脖子上摘下十字架的项链，一同埋在顶峰上。两人相互紧紧拥抱后，就下山了。人类总算登上了地球的最高点！

在基地营的队长汉特代表全队，通过营地的电台向英国政府发去电报，祝贺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并将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成功，作为对女王加冕的献礼。英国珠峰队的成功博得英国朝野极大欣慰和欢迎。当全队回到伦敦时，受到女王的接见和英国政府上下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女王授给希拉里以爵士，丹增则正式加入印度籍，并被接待游览了英国各地。

英国珠峰队登顶成功了，他们如愿以偿，在全世界抢先登上珠峰。从1921年起，英国人盼望了33年，努力了33年，奋斗了33年，先后9次挑战珠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这次的成功却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真正登顶的两名队员希拉里和丹增都不是英国本土人。对此，英国人并不甘心，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喜马拉雅委员会又积极准备再一次向珠峰进军。

英国人先后经过30多年漫长的岁月，前赴后继，总算在1953年5月29日拿下珠峰，虽然他们还有很大的遗憾，但总是取得了成功。应该说，汉特的组织和指挥是非常出色的，更何况他已带队登上了位于海拔8400米的第九号营地的上方，为了取得成功，在所有英国队员和夏尔巴搬运工都已不能继续上攀时，他选择了新西兰客串队员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继续冲顶，自己则带领所有已疲惫不堪、无法再坚持的英国队员和生病的夏尔巴人下撤，把氧气和食品留给能继续上山的人。这样不但保障了英国队员和生病的夏尔巴人的生命安全，而且增加了登顶成功的可能。因此，汉特功不可没。

英国人的成功还应该感谢瑞士人。正是瑞士人首先开创了从东

南山脊攀登珠峰的新线路，瑞士人为此花去大量财力，而且从这条路上攀到 8595 米的高度，几乎成功。老实说，英国拣了一个很大的便宜，我认为人类登上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成绩，是英国人、瑞士人、新西兰人和夏尔巴人共同作出的杰出贡献。

瑞士队一箭双雕

1956 年春，经过充分准备和严格训练的瑞士队，在阿尔贝特·埃格勒的率领下，再次来到珠峰南坡脚下。

阿尔贝特·埃格勒(Eggler Albert 1913~1990)，时年 43 岁，他是瑞士陆军准将，专门训练山地作战的专家，著有《云层上面的峰岭》(Gipfel Uben den Wolken)。瑞士派出以他为首的珠穆朗玛登山队，同样志在必得。

队员由 11 人组成，主力队员有 E. 史密斯、W. 马尔敏特、E. 瑞依斯(Reiss Ernet 1920~，航空机械师)、G. 贡钦和 F. 卢普辛格等，都是 1952 年参加过瑞士珠峰队的二线队员，全队平均年龄 35 岁，雇用了 230 多名夏尔巴向导。他们轻车熟路，不但有 1952 年两次攀登珠峰的教训，也吸取了 1953 年英国队的经验。

5 月 9 日，瑞士队沿孔布冰川，登上洛子峰的南坡到达南坳，在 1952 年为瑞士队服务过、1953 年又为英国队服务过、对珠峰南坡情况已经相当熟悉的夏尔巴向导的协助下，他们非常顺利地使用自己一再改进过的非常适合于攀登珠峰的各种装备和工具，于 23 日下午 2:00，第一突击组 2 人登顶成功；24 日第二组 3 人再次登顶成功。这样，他们一共有 5 人成功登上珠峰！

瑞士队这次登珠峰，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他们在攀登珠峰的同时，又派 2 人前去侦察位于珠峰南方直线距离 3000 米的世界第四高峰——海拔 8511 米的洛子峰。洛子峰虽然有人于 1955 年攀登过(瑞士与奥地利联队)，但没有成功。这次瑞士队派出的瑞依斯和卢普辛格从南坳出发，沿南山脊(主山脊)向上，在侦察



探险珠峰

同一支登山队，在一次登山活动中，先后登上两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而且两人是在同一次登山过程中，连续登上了两座高峰。

过程中，两人于5月18日登上洛子峰顶峰。然后他们返回南坳，瑞依斯再沿东南山脊，与瑞士队的第二突击组一起，于24日登上第一峰珠穆朗玛峰。

同一支登山队，在一次登山活动中，先后登上两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而且两人是在同一次登山过程中，连续登上了两座高峰，这在当时真是奇迹，也说明瑞士这支登山队实力很强。瑞士队的一箭双雕，曾在1956年传为佳话。它洗刷了该队两次未能登上珠峰的耻辱，且成绩突出，无人伤亡。



第四章 探险珠峰(中)

1950年6月3日，埃尔佐格(Herzog Maurice 1919~)和拉什耐尔(Lachenal Louis 1921~1955)两位法国登山家首次登上海拔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Annapurna)，从而打开了人类向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大门。接着，英国、瑞士队先后成功登上珠峰，给世界各国高山探险家以很大的鼓舞和刺激，激起了他们征服世界最高峰的雄心。到1964年5月2日，中国的索南多吉、云登、米玛扎西、多吉和王富洲、许竟、成天亮、陈三、张俊岩、邬宗岳等10位藏、汉族登山家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Xixabangma)，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群中的最高峰已被各国登山家征服。人们一般称这14年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在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特别是全球第一峰珠穆朗玛峰的形形色色的团队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联合攀登珠峰队的组建和离奇解体，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当我重新翻检记忆中的那一幕幕往事时，仍然疑惑不已，感慨万千。由于我于1955年曾前往苏联国立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并获得教练员资格，从1955至1961年间，一直担任中苏之间关于合作登山这个专业方面的谈判译员，是这次重大活动自始至终的见证人，也有幸亲身参加这次攀登活动的全过程。

中苏联合队的组建

苏联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境内仅有3座7000米以上高峰，最高峰共产主义峰(Peak Kommunizma)不过7495米，而

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群中的最高峰已被各国登山家征服。人们一般称这14年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1955年4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属的阿尔卑斯协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公函，邀请中国派出4名青年到他们的登山教练员学校去学习登山技术。

当时世界登山水平已达8848米。由于当时中苏“兄弟般的”关系“牢不可破”，要向8000米进军，最好的捷径就是到中国来。因此，1955年4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属的阿尔卑斯协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公函，邀请中国派出4名青年到他们的登山教练员学校去学习登山技术。这一动议得到我国政府同意。

1955年国家派出4人前往苏联学习。我当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做俄文和日文翻译，被抽派到这个队，作为这4人学习小组中的一员兼翻译，使我从此与我国的登山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格鲁吉亚的高加索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后，与苏联登山家们登上了吉尔吉斯境内帕米尔高原上的“十月峰”(Peak October,



1955年6—12月，中国派往苏联高加索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登山技术的运动员合影：周正（前左，本书作者，时年25岁，兼任翻译）、许竟（前右，27岁）、师秀（后左，27岁，1957年牺牲于贡嘎山）和褚德源（后右，时年21岁）。

6780米)和“团结峰”(Peak Yejunstro, 6773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登山高度记录。

1956年,苏联又提出合作攀登位于中国新疆境内、昆仑山西部的最高峰公格尔峰(Kongur, 7719米, 中亚地区最高峰)和慕士塔格峰(Muztagata, 7546米),后因公格尔峰难度太大,只登上了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Kongur Tiubie Tagh, 亦称小公格尔峰)和慕士塔格峰。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很不发达,真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沉睡了千百年、具有丰富资源的广大山区需要开发,因此很欢迎苏联“老大哥”帮助开展登山活动;而苏联与我们的合作,目标瞄准的是珠穆朗玛峰。上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8000米高峰做准备,打基础。



1958年7月,以苏联登山协会(阿尔卑斯协会)主席为首的100位登山运动功勋健将,联名分别上书给苏联和中国的党和国家元首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主席,要求组建一支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一要求获得中苏两国政府的支持。1958年7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决定1959~1960年两年内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两国代表分别为中国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与苏联政府体委主任罗曼诺夫。

协议规定,中国于1958年8月下旬派46名登山家前往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以全苏第二高峰列宁峰为目标进行集训;10月初,苏联派出3人前来中国,与中国队员一起前往西藏,对珠峰进行登山前的路线侦察。协议规定,中方承担修筑一条从日喀则经聂拉木、定日直到珠峰山脚登山营地、长达380公里的公路,以便运输车辆从拉萨直抵基地。根据苏联建议,中方从苏联购置两架AN-6型高空侦察机,并负担30名苏联队员和官员在中国期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而苏方仅负责供应30名中国队员的高山装备、氧气设备和攀登工具以及部分高山食品(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些物品)。

而苏联与我们的合作,目标瞄准的是珠穆朗玛峰。

在共同训练攀登列宁峰的基地营，由于中苏两国文化和经济情况的不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争执。



仅公路和向苏联购买飞机两项，就花费人民币上百万元，在我国当时的财政状况下，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但我国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可见对这个合作项目的诚意和决心。两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了协议书，这就是《中苏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书》。我作为会谈的翻译，见证了这个全过程。

遵照协议，1958年8月，我国派出46人的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联合攀登前的集训。我仍然作为随队翻译前往。

公鸡母鸡和鸡蛋妈妈

在共同训练攀登列宁峰的基地营，由于中苏两国文化和经济情况的不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争执。

在中国队前去苏联帕米尔高原参加集训前，我们准备了许多罐头食品，如花生米、核桃仁等，而罐头主要是红烧肉、牛肉和鸡肉等。那时，我们队里有专门管理后勤的队员，从国内带去的各种食品都由他来保管和分发，以补充队员不习惯吃俄罗斯食品而带来的营养缺损。其实俄罗斯的食品也不错，他们集训的伙食水平比一般俄罗斯人的高得多，品种也多得多，但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习惯。比如他们很喜欢吃的一种叫“奥布拉”的生咸鱼干，加工很简单，这些是从远东海参威到日本的北方四岛渔场捕获的一种三四十厘米长的有鳞海鱼，在海岸就地加工，除去内脏，抹上盐晒干后，就运往城市出售。吃这种奥布拉之前，要先用小刀刮去鱼身上的干鳞片，之后就一条一条地撕着吃，俄罗斯人还特别喜欢吃鱼肚子里的干鱼籽，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说：“夫古斯诺！（真好吃！）”可我们中国人就难以下咽，因为它实在太咸，还有臭味。因此，每到吃饭时，分给我的一份奥布拉，早在一天前我就预送给某位苏联队员了。有的人就还给我一块粗糙的巧克力，也有的人只说声谢谢！

我们带去的各种肉食罐头却成了俄罗斯人的稀罕物。特别是上

海梅林食品厂生产的鸡肉罐头，外包装上画着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苏联队员平时极少有鸡吃（当时苏联的食品工业还不如我们），每当我们吃鸡肉罐头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凑过来向我们要，而且越吃越想吃。有的苏联队员就先来找我，问我“这个，中国话怎么说？”我就耐心地教他们：这个，中国话怎么说；或者：这个，中国话叫什么。他们很用心地用俄语拼成汉语音，记在小本上。后来，又拿来一个我们的鸡肉罐头，找我们队员岳采文（他当时是管后勤的），用从我这里学去的那句：“这个，中国话怎么说？”他手指着罐头上的公鸡，岳采文告诉他说“公鸡！”又指着母鸡，岳采文告诉他：“母鸡！”那位叫施尔金的苏联队员，从此成了苏联队员们的中国话老师。不一会，全营的苏联队员都会说“公鸡！母鸡！”了。这下子可有趣了，只要一到开饭时间，苏联队员就去找中国队员，嘴里喊着“公鸡！母鸡！公鸡！母鸡！”中国队员只好把自己的鸡肉罐头分给他们。

还有一位伊万诺夫，画了一只母鸡，下了一个鸡蛋，指着鸡蛋问我：“中国话鸡蛋怎么说？”我告诉他：“鸡蛋。”他用俄文字母拼音将“鸡蛋”二字的发音记在小本上。过了一会，他去找岳采文，一边比划一边说：“鸡蛋妈妈！鸡蛋妈妈！”两只手的食指还指向自己的嘴巴，意思是向岳采文要我们的鸡肉罐头吃。岳采文就给了他一个没有打开的鸡肉罐头，他说了声“巴利诺耶斯巴司依巴！”（谢谢）还给岳采文鞠了一躬，握了手。那些苏联队员一看这个办法挺灵，可以从中国队的管理员那里直接要到整筒的鸡肉罐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许多苏联队员都跑到岳采文的帐篷里，对他说“鸡蛋妈妈！”“鸡蛋妈妈！”原来，他们都会说“鸡蛋妈妈”了，只要说“鸡蛋妈妈”就能得到鸡肉罐头，比原先的“公鸡！母鸡”有效多了。当时我们带的鸡肉罐头也有限，他们一下子来十几个人，岳采文只好把我找来，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并拿出5筒来，对他们说，“你们分着吃去吧！”后来他们的队长库兹

过了一会，他去找岳采文，一边比划一边说：“鸡蛋妈妈！鸡蛋妈妈！”

中国参加集训的队员一共46人，其中有5位女队员，她们是周玉英、周铨英、姜英、姚惠君和袁杨，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女登山运动员。

明知道了，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严肃地批评了一通。因为两国队员都在一个食堂帐篷中用餐，队员住的帐篷又都在食堂帐篷四周，什么话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知道这事后，立即与中国队的领导们研究，决定拿出20个鸡肉罐头通过苏联队长送给他们的总务长，因为我们自己的肉罐头也确实不多了。之后，他们就不再找我们要“公鸡”“母鸡”和“鸡蛋妈妈”了。

关于中国女队员登顶问题的争执

中国参加集训的队员一共46人，其中有5位女队员，她们是周玉英、周铨英、姜英、姚惠君和袁杨，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女登山运动员。

就在中苏两国队员以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为训练目标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经过前边两次适应性行军与运输之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确定哪些队员可以登顶，两国的队领导开会讨论时，苏方主教练、著名登山家维·米·阿巴拉科夫(1906~1984)和副主教练米·维·阿尔金(他俩都属于苏联斯巴达克登山俱乐部)首先提出，不同意中国女队员参加。阿巴拉科夫说：“你们中国姑娘连海拔6000米的山都没上过，经过这两次训练只到达了5600米的高度，还都表现得很费劲，为了安全，我不同意她们参加登顶……”接着，阿尔金说：“我完全同意维达里·米哈依洛维奇的意见，我们苏联的登山运动已有40年的历史，到今年7月也才有两位姑娘登上了列宁峰。你们的登山才刚刚开始，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们担心她们受不了，会出危险的……”

中国队长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经验，特别是女登山运动员。但难道不能让我们试试，锻炼一下还不行吗？！”

这时，苏方队长吉·康·库兹明(K.K.Kuzmen)说话了，他说：“我同意让中国的姑娘们锻炼一下，什么时候不行了，就赶快往下撤么！”

库兹明确实是个明白人。其实苏联教练们在开会前早就研究过不同意中国女队员们登顶。这里边有他们正确的一面，因为我们的5位女队员出国前仅仅进行过短期的身体训练，确实没有经过很严格和系统的训练，更别说攀登高山的经验；另一方面，苏联的一些登山权威们也很看不起我们，他们总认为我们中国不行，平时的言谈中常常以权威自居，对我们说话还常常带着讽刺。库兹明则与他们不同，第一他在此之前曾多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了解中国人吃苦耐劳、敢于向困难挑战，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另外此次的集体训练是为了第二年两国队员合作、共同攀登中国的珠穆朗玛峰，苏联人说中国人这不行那不行的，以后怎样到中国去与人家合作？所以在两国的队领导会上，争论让不让中国姑娘们参加登顶时，他一直默不做声。作为队长，他最后发言说：“中国的女队员们虽然缺乏登高山的经验，但她们有这种勇于奋斗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我们不妨也试试看么！所以我同意让中国的姑娘们参加登顶，但是我们必须作好急救和抢救的准备！”后来，会议通过了允许中国姑娘们参加登顶的决定。

散会后，库兹明对我说：“有些俄国人对中国有歧视思想，因为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你们不要介意，慢慢地他们会了解中国，也会懂得中国人的自强、自尊精神的！我是了解你们的。”库兹明的全名是吉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兹明，吉里尔是他的名字，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他的父名（俄国人的名字，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名字，第二个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叫康斯坦丁，在父名后加一个诺维奇，意思是康斯坦丁之子，而最后一个库兹明是他们的姓）。

我在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时，库兹明就曾给我们讲过理论课，是我的老师，现在他又是中苏共同训练的总队长，按俄罗斯的传统规矩，我称他为吉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这是对好朋友和比自己年长者的尊敬和友爱的称呼方式。库兹明并不是职业登山家，只是一位登山爱好者，职业是当时苏联政府水力电力部的总工程

库兹明则与他们不同，第一他在此之前曾多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了解中国人吃苦耐劳、敢于向困难挑战，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



不幸的是，当女队员姚惠君(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到达6700米高度时，因缺氧和过度疲劳而休克。

师，水电专家。苏联的许多水电站都是他设计和修建的。他还当过苏联援助埃及修建的阿斯旺(中东地区最大的水电站)水电站的总工程师，在国际上很有名。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在登山探险的战术和技术方面都非常杰出，受到全苏登山界尊敬。因此他最后的表态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场争执就这样结束了。

不幸的是，当女队员姚惠君(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到达6700米高度时，因缺氧和过度疲劳而休克。为了抢救她，她所在的那个结组和他们身后的一个结组的14位中苏队员，全都停止上攀，轮流抬着她下山。姚惠君当年21岁，身体健壮，但高山反应很强烈。这样，除了还有12位中国队员和与他们一起已越过6800米高度的苏联队员继续向顶峰冲击外，其余中苏男女队员都一律保护和轮流抬着担架，送她下山抢救。

我国队员缺少训练，难免意外，这在情理之中。但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苏联副队长别列斯基，这位苏联登山界的元老之一，也因患上高山探险最危险的肺水肿，突然从6920米的高度，由8位苏联队员和4位中国队员抬下山了。别列斯基虽然不是职业登山家，但他的技战术水平都是很高的，在苏联登山界很有名望。他是1955年我们在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时的专职教练，是当时苏联派给我们的最好教练。他本人是列宁格勒最大的机床制造厂——基洛夫机床制造厂精密车床车间的工长。我曾随他专门到过他的工作间，是大车间中专门隔出的一间隔音很好的小单间，里边有当时全苏两台最精密机床中的一台，是二战结束前从德国拆过来的。他当时是这里最出色的钳工工长。

别列斯基祖籍波兰，其父16岁随祖父移居俄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他是波兰犹太人后裔，在俄国乃至苏联都因种族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非常刻苦努力，什么事都力争优秀，像他的父亲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苏军步兵排长，他曾亲口告诉我，是他所在的营和他率领的排，最先攻下柏林市希特勒的

国会大厦的。为此，他曾获得当时苏军的最高奖章——红旗奖章和列宁勋章。他还享受另一种特别津贴，就是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他会到高加索的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当教练。因此，苏联的许多登山家都是他的学生。实际上，在苏联只有极少数的职业登山家，如阿巴拉科夫和阿尔金等，这些人在非登山季节，就到苏联国家体委下属的体育科学研究所从事登山战术和技术的研究或研制新工具、装备等。

不过，别列斯基当年已 58 岁，他在登山途中突患肺水肿，多半与年事已高有关。

阿巴拉科夫对我的指责

训练营中另外一件我不能忘记的事，是阿巴拉科夫指责我，为什么未征得他的同意就使用了苏联登山教材上的素描图？

1955 年，我从苏联学习登山技术战术回国后，应体育出版社的要求，写了一本登山技术书。登山技术如果用照片来做图解的话，是很难让人看清楚它的细微动作的，所以世界各国所出版的登山技术教学书或讲义都普遍采用素描。我写的中国第一本登山技术书，所有的技术动作素描图绝大部分取自苏联教科书，只不过出版社的美编把人的面孔和苏联人的帽子（那时都戴列宁帽）都改成了中国式的。1956 年，书出版后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的抢手物，因为这种登山或登高的技战术，不但为登山初学者需要，与此性质相关的消防、地质、地理、公路、铁路修建和建筑工程、测绘、科学考察和军事等野外工作者也很需要。这次参加中苏集训的中国队员几乎人手一本。

一天，阿巴拉科夫看到一位中国队员在基地营的帐篷旁读这本书，他顺手拿过来翻了一下，正巧我从旁边走过，他立刻叫住我，问：“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很不高兴地地质问我：“你写书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素描图？”我说：“难道不行吗？3 年前我

训练营中另外一件我不能忘记的事，是阿巴拉科夫指责我，为什么未征得他的同意就使用了苏联登山教材上的素描图？

多年与苏联人打交道，深知有那么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看不起的，时常表现出一种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样子，令我十分厌恶。

是在苏联学习的登山技术，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教材，苏联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作为学生，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写成中国文字的教材，使用了你们的、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时用的素描和文字有什么不对的？”他说：“这么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规定你应当事先得到我们的同意！”我说：“我们是个新国家，党中央提倡向苏联学习，学习你们一切先进的事物和知识，建设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兄弟国家，而我又是在苏联专门学习登山的，别的国家的登山资料我们没有，我们要开展这项活动，我只能参考苏联的教材和我在苏联学到的知识来编写。离开苏联时，你们登山教练员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送给我许多登山技术的教材书籍，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用苏联的资料必须得到您的同意，更何况我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和您在苏联的工作单位？！”阿巴拉科夫这才说了一句：“呶！拉得诺！（喏！那就算了吧！）”显得傲气十足。

多年与苏联人打交道，深知有那么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看不起的，时常表现出一种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样子，令我十分厌恶。联想起 1955 年我们刚到苏联学习时，参加中苏共同攀登苏联帕米尔高原上的“十月峰”时，与我们同一个结组的一位叫伊万诺夫的 50 多岁的人，他当时是莫斯科工业学校（中专）的教师，也是一位档次并不高的工程师。从与我们一接触，他就一副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的样子，很看不起我们，经常问我：“你们有飞机吗？你们自己能造汽车吗？许多东西都是我们苏联运去的吧？……”好像我们是靠苏联才能生存似的。我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的，常常和他吵。有一次他指着分在另一个结组的中国队员 XU 说：“那斯塔牙什依斯拉勃安！（真是个无能的！）”我听后很气愤，因为我们都是被国家从办公室拉出来，派到这里学习，从一名文职人员改行当一个运动员，在高加索接受一个多月的训练，就与你们这些久经锻炼的登山家们一起登山，当然没法与你们相比！你凭什么这样讽刺我们？他后来又对我说：“你们中国人不行啊！”我也来了火气，冲他说：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行！只不过经济不发达，我们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政权的压迫和统治下，我们党打败了800万美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比你们苏联的卫国战争更艰难。这样的民族正在一天天强起来，我们今天没有的东西，明天、后天都会有！你就等着瞧吧！”

后来，我还是觉得气愤不过，就把他讽刺中国人的话报告给队长别列斯基。吃晚饭的时候，别列斯基特别在大家动口前，用餐刀敲碗，让大家注意听他讲话。他很严厉地当着全体中苏队员说：“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为苏联和中国今后的更多合作登山打基础的，中国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胜利，派了许多青年人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我们应当像兄弟一样很好地接待他们。今天伊万诺夫竟然说出对我们中国同志们很不友好的话来，实在令人气愤！我现在再说一遍，今后再有谁对我们的中国同志表现不友好，说些不该说的话，我立即将他驱除出队！另外，我在这里也郑重地向中国同志们表示歉意，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不懂事的混蛋。但是我们决不允许破坏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行为！”这时，被批评的伊万诺夫低头一声不吭，过了两天后，他主动找我握手，并承认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请原谅！”

另外，还有些俄罗斯人对他们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并不尊重，甚至还有种族歧视现象。我去过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也与苏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接触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并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们总觉得俄罗斯人高人一等。1960年春我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去瑞士、法国、瑞典和奥地利以及当时的西德，仅从登山器材、装备和技术、战术的水平来看，要比当时的苏联高出许多，简直不能相比。苏联的那些东西是西方40年代初的水平，质量和工艺水平都很落后，可他们还在我们面前逞

这样的民族正在一天天强起来。
我们今天没有的东西，明天、后天都会有！你就等着瞧吧！

这种看不起中国人的思想，决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除的。总有一天我们中国超过你们，让一切歧视中国人的家伙们见鬼去吧！

强，完全是夜郎自大。

在苏联学习和后来为准备共同攀登珠峰的训练期间，我先后多次与那些自以为是的俄国人争论，甚至争吵。因为他骂我们中国人不行，说我们的XU同志是“无能之辈”或熊包，我才和他争吵，并向队长告了他的状，我这纯粹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和中国人的骨气。可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们回国做总结时，那位被人家骂的XU居然批评我“对苏联同志不尊重！”难道人家骂你、挖苦你，你就没有一点点自尊心么？！大概是有的人当惯了洋奴才，洋人说的什么都是对吧，真是可悲！当时说苏联是老大哥，可也不能说老大哥的什么都是好的、正确的呀？！他们有的比我们好，也有许多不如我们，我们学他们的先进的，决不是学他们的一切！沙俄还是最大的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一呢。这种看不起中国人的思想，决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除的。总有一天我们中国超过你们，让一切歧视中国人的家伙们见鬼去吧！

莫斯科－北京峰的命名争执

在共同训练中，总队长库兹明确实是很有经验的登山家，不论战术和技术，都相当出色，对中国人也很友好，有事总是商量，从不摆架子。我想，这与他的经历、地位，还有他的品格都是分不开的吧。修养越高的人，总是十分谦虚的。

1958年9月7日，在库兹明率领下，6位苏联队员和王富洲、陈荣昌和石竟等4位中国队员在成功地登上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后，继续前进，越过列宁峰与其峰前峰之间的山坳后（鞍部），又登上了海拔6820米的一座无名峰，并重新越过山坳，经列宁峰安全返回基地营后，库兹明请中国队队长等共同研究为这座无名山峰命名问题。

按照当时国际上和苏联的传统惯例，谁首先登上一座无名山峰，都有权为它命名，这在当时的苏联尤为盛行。除了著名的欧洲

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和乌什巴峰等的古老名称已有数百年历史、没有被重新命名之外，在苏联帕米尔高原上的许多山峰，尽管过去也曾有过当地民族传统的名称，但在苏维埃政权的40多年里，基本上都被重新命名，如海拔7495米的苏联最高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因为1933年苏联登山家们第4次登上它，确切地说是测量了其海拔高度，就正式以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为它冠名，而当地塔吉克人自古所称的“嘎尔莫”(Garmo)则弃如敝屣了；再如列宁峰，原名考夫曼峰(Kaufman)，是1871年俄罗斯地理学家A.费德钦科用当时沙俄帝国土尔基斯坦(Turkistan)总督考夫曼的名字命名的，1928年苏维埃国家登山队首次登上后，改为列宁峰。

这次中苏两国队员共同登上的列宁峰的峰前峰确实是个无名峰，库兹明等苏方领导研究后，认为这是中苏第一次大型合作登山的成果，而且明后年还要继续合作，就提议把这座山峰命名为“毛泽东峰”。这对我们来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而且更不像现在手中有新式的手机全球通，当时我们都不敢表态，因为事先没有请示过国家和党的领导，也无法与莫斯科的中国大使刘晓联系。可库兹明却理由充足地说：“这完全是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两国登山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在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上有斯大林峰、列宁峰，我们应当有一个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峰啊！”而在中国，我们党在这种问题上历来是非常严肃的。我们既无思想准备，也无法与国内或我国驻外的任何机构联系，何况，这座山峰才6820米——当然这在苏联并不多，因为全世界360多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苏联仅有3座，可是在我国，不仅有世界第一高峰，7500米以上的山峰更多。动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一座6820米的山峰命名，连我们自己也通不过，更不用说我们没有请示了，我想就是请示了也不可能同意。可苏联人却很高兴地认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友好表示。这样，我们当时没有同意，在苏方接二连三的游说下，我们表示：用毛泽东主席的名字为这座山峰命名，这是很严肃的事，

可苏联人却很高兴地认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友好表示。



大会上，苏联体委主任罗曼诺夫讲话时，代表苏联政府说，为了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了中苏两国登山家们的继续合作，我们正式为这次苏联和中国登山家们共同登上列宁峰的峰前峰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

探险珠峰 ◎ 首次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

没有请示我们的党中央，我们没有这个权力，请你们原谅！难道我们不能换一个别的名字吗？

在我们的坚持下，这事暂且搁下。后来回到莫斯科，我们立即去请示刘晓大使。刘大使说：“你们没有同意是对的，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没有请示中央，随便用毛主席的名字命名，这谁也不敢哪！”苏方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库兹明又想出一个名称：“莫斯科—北京峰”，经过请示大使，算是同意了。于是9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祝中苏共同登上列宁峰的大会，有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国和各国的留学生，苏联的一位副总理和体委主任、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和文化参赞戈宝权，还有一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等共1500多人参加。大会上，苏联体委主任罗曼诺夫讲话时，代表苏联政府说，为了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了中苏两国登山家们的继续合作，我们正式为这次苏联和中国登山家们共同登上列宁峰的峰前峰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大会。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这么隆重的大会，谁去做翻译呀？下面坐着上百的中国留学生，台上又有刘晓大使的高级翻译，更有中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俄语界的泰斗戈宝权，他们的俄语水平都比我高，翻译水平也比我强得多，所以我不敢上去，只在旁边等待着，希望刘晓大使的翻译能够上台或者由其他在苏联的留学生上台。可非常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刘大使的翻译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在场的还有一位苏联队的翻译加诺夫，他更不敢看我们，因为他的中国话连我都很难听懂，而刘大使的翻译推托他不懂登山专用词汇。时间容不得再迟疑，只听中国队长说“周正！上！”我只好捏着一把汗上了台，因为好几位大人物讲话，事先我都没看过他们的稿子，不知他们要讲什么。再有就是那位大诗人为这次活动的成功特意作了一首诗，要在大会上朗读，台下坐着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万一哪里译错了，或听不明白人家讲的话，翻不出来，多丢

人哪！但情况不允许我再后退，我只有硬着头皮，豁出去在千人面前出丑了。更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我一上台，苏联总队长库兹明立刻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向大家介绍我是中国第一位在苏联学习过的登山家和优秀的翻译！台下立刻掌声一片，这更给我增加了压力。

第一位上台讲话的是苏联体委主任罗曼诺夫，他讲的主要是政治性和友好性的内容，我没感到什么困难，安下心来，译得很清楚，用词也比较好。第二位是苏联的队长库兹明，他的话我早已很习惯，也没有什么困难。第三位是中国队长讲话，这时我要从中文翻成俄语了，但都是些口号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些中苏友谊万古长青之类，我也译得不错。阵阵掌声反倒使我很冷静地把他们的话都译得很恰当。最后是那位诗人，开始我担心这俄文的诗可怎么翻呀？但冷静地一听，他的诗就和普通俄国人说话一样，朗读起来慢慢地拿腔拿调的，我一听比说话还慢还清楚，其中有：“啊！上去啦！克服了许多困难！中国青年和苏联青年们都上去啦！两国登山家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啊！……”我越听越冷静，就也效仿着他，用中国话拿腔拿调地翻译出来。哗！又是一片掌声。朗诵结束，诗人还特别在台上与我拥抱，对我能把他的诗较好地翻译出来表示感谢！台上台下又是一片掌声。我没有出丑，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它使我在口译上又取得了进步。下来后，戈宝权参赞特意走过来和我握手，还说：“小伙子，不错么！”我默默地感谢他的鼓励。心想，不管怎样，我总算闯过了这一难关啦！

另一个结果，是我还在苏联翻译、学习登山技术的时候，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干，就是半个世纪。

结组长斯科勒巴卡托夫给我的启发

当我们与苏联队员一起攀登团结峰和十月峰，进行第三次行军

更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我一上台，苏联总队长库兹明立刻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向大家介绍我是中国第一位在苏联学习过的登山家和优秀的翻译！



时，我们这个结组的组长斯科勒巴卡托夫对中国人特别友好，常常帮我们做许多零碎而我们自己又不懂的事。自他担任我们中国学员的结组长之后，处处关心我们，比如上山背东西，他总是向队长提出，尽量让我们少背、背轻的，尽管那时他已42岁，而我们刚20多岁；我们不会用苏联产的那种小汽油炉，他就在每次宿营时亲自点火做饭，我们只需到小河边打点水就行了。

第二次行军，回到基地营的当天下午，他说：“萨莎（我的俄文名字，是在外语学院上学时，俄国老师为教学便利，给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取了个俄国名字），把你的手表给我看看行吗？”我当即摘下来，递给了他。这可是我1946年上大学时，家里给我买的瑞士手表，我已经用了十余年了。他接过我的表，放在耳朵边听了一下，说：“不太准吧！是不是慢？”我说：“对！”只见他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小木盒，从里边拿出一个只有修表匠才有的那种卡在眼睛上检查手表的放大镜，又拿出一个很小的螺丝刀、一个手表专用的扳手，没征求我的同意就三下五除二地把我的手表给打开了。然后，从小木盒中拿出一个汽油瓶，一个玻璃浅杯，用小镊子把我的表给拆卸了，把零件放到盛汽油的玻璃杯中浸泡起来。这可真叫我很担心！难道他真会修理？总不能不征得我的同意，就把表给拆了呀？他看出我的担心，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您这表油泥太多了，十年的表还不该擦洗呀？放心吧，明天早晨保证你戴上走得准准的手表！”说完，把装着零件的汽油杯放到帐篷的边角上，盖上一个玻璃盖，又对我说：“你去队里问问他们，是不是他们每年到帕米尔登山，都得求我给他们洗表、修表？”旁边的一位苏联队员沙拉耶夫立刻作证说：“他是最好的修表师，我们在莫斯科就经常找他修表，什么表他都会修，很多大人物的表坏了，不去表店，专门去他家找他修，他每年挣的修表钱可是不少哇！”我这才相信，我们的结组长主动为我修表，那可真是非常友好的表示呢。

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学会修表的？他说：“我3岁那年死了母

亲。母亲那年才 31 岁。我有 3 个哥哥，他们都比我大七八岁。父亲后来又娶了妻子，但继母对我很不好，后来我叔叔——他是我父亲惟一的弟弟，看不下去了，他虽然早就结了婚，但婶婶不会生孩子，叔叔就把我要去当儿子了。叔叔是个很好的修表匠（俄文叫“马斯吉尔”，中文一般译为师傅），我从 8 岁起就每天帮叔叔修表，当然我干的都是最简单的活，比如说洗洗玻璃杯，把它用干布擦得干干净净，好让叔叔往里倒汽油或酒精。对于大钟的零件，叔叔一般让我去清洗，叔叔累了，我就给他打点水让他擦擦脸、洗洗手什么的。我必须仔细地观察和学习叔叔是怎样拆表和装表、又怎样清洗怎样修复油丝和发条，什么地方不能乱碰，什么地方必须从后边拆、从后边装，等等。那些细致的工作，叔叔从不让我动。”

“12 岁那年，有位苏联驻法国的外交官夫人的高级手表坏了，找叔叔给修，叔叔过去从来没见过那种小巧的、报时字盘上镶的都是钻石数字的金表，他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怎么也不敢拆卸，后来他就放在工作台上，用一块白布盖住，就去市场上买配件去了。我知道他一去就得半天，要到下午六七点才能回来。我就上了他的工作台，揭开那块白布，仔细研究那块名贵的瑞士表。这是一种手工表，完全由高级制表师非常精细地用手工打磨出来的零件拼装成的，比机械生产出来的手表精确，价格当然极其昂贵，欧洲显贵都讲究戴这种手工表。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了它的特殊结构，也发现它只是由于小摆的油丝稍有折损，只要将它清洗一遍，把油丝拉直、摆正就行了。我大胆地将表打开，拆卸下油丝，放入纯净的酒精中清洗、晾干，又仔细地用小刷子刷净，然后一件件地将零件重新组装好，这只表竟很正常地走起来！那时我简直是太高兴了。不过，我并没有大喊乌拉！而是不声不响地将它仍然放回叔叔的工作台，用白布盖好，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晚上，叔叔回来，对我说：‘好不容易才买到瑞士的最小油丝，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晚饭后，叔叔打开那块白布，他说：‘谁动



过这表了？瓦夏（我的小名），你动过吗？”我笑着对叔叔说，“是的，我动过，而且已经修好了。您再好好看看，我修的行不行？！”叔叔拿起表，听听，走得很规律，声音正常，又拨了几下分针，看看，听听，哈哈！他大笑起来，连说：“孩子！我的好孩子！你行！比我强！我的宝贝呀！”他抱着我，热烈地吻我，摸我的头，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从那以后，凡是这种高级名贵女表都由我来修。叔叔当初不过是让我做些简单的小零粗活儿，而我对修表却是兴趣越来越浓，对表的结构上心，整天揣摩它，想着它。其实，手表的结构并不复杂，只有几个关键部位必须非常细致地拆装。”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古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果然是真理啊。

伊万诺夫和苏共党的小组会

我们4位中国学员被编为第二个结组，结组长是斯科勒巴卡托夫。第三结组的组长是科维尔科夫，4个组员中有一位来自莫斯科工业学院的讲师伊万诺夫，此人41岁，每年都参加苏联的帕米尔高山登山活动。

当我们已登上海拔6773米的团结峰、准备第二天早晨越过团结峰与十月峰（两峰都是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处女峰）之间的鞍部（山坳），再登上十月峰（6780米）时，当晚全队五个结组的队员都在鞍部宿营。我们的结组长斯科勒巴卡托夫正在为我们全组煮咖啡，就听得隔壁帐篷里的第三结组长科维尔科夫与他的队员伊万诺夫在争吵，争吵声越来越大，一个说：“这是我个人的东西，我有权不借！”另一个说：“给大家用一下，了解一下这里的高度有什么不行？又损坏不了你的高度计！”那个说：“按照苏联宪法，我有权不借，这是我个人的高度计，你用，以后他也用，给我弄坏了，连买都没地方买去！我就是不借！”后来，队长别列斯基过来（队长在第一结组），才平息了他们的争吵。



当天大家行军达10小时，登上团结峰后很累，下到这鞍部都想早点吃晚饭，早点休息，明天的任务还要重，要越过鞍部、登上十月峰，再下到这个鞍部，重新登上团结峰后下山到5700米处宿营。所以大家都不愿听他们吵架。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大吵大闹？

第四天，也就是我们回到基地营后的第二天上午，早餐后八点多钟，别列斯基主持苏联队中的6位党员小组会，别列斯基还特别邀请我列席这个党小组会，我才得知因由。

会议主要解决吵架问题。原来，当我们在鞍部宿营时，习惯写日记的科维尔科夫向伊万诺夫借用他的高度计，想了解一下鞍部的海拔高度，伊万诺夫拿出他自己的瑞士制高度计，告诉他是6560米。而科维尔科夫却说：“请你借我用一下，我再测一次……”伊万诺夫说：“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不相信，是吗？”科维尔科夫说：“不是不相信，这种高度计需要先后测量三次才能比较准确地知道高度。”伊万诺夫说“不借！”科维尔科夫说：“你太自私了！给我用一下又损坏不了！”伊万诺夫说：“不借！就是不借！按苏联宪法我有权不借……”这就是吵闹的原因和经过。

别列斯基在会上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何况借人家用一下，也损坏不了吧！你这人这么自私是不应该的，让大家更确切地了解我们所在位置的高度也是完全应该的呀！你为什么就不借呢？你应该检讨，承认自己是不对的！”其他4位党员都是这种看法，认为伊万诺夫不对，不应该。有的人讲话很气愤，甚至说：“这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相违背……应该认真地检讨！”伊万诺夫一直不开口，直到后来别列斯基让他发言，他说：“党章与苏维埃宪法是不矛盾的，应该是一致的，遵守宪法是每个人的权力，按照苏维埃宪法，我有权不把自己的私有财产借给别人，我并没有违反党章，你们这样批评我，我还想不通。那就允许我好好想想再说吧！……”

一个苏共的党小组会就这样结束了。解决了什么问题？我看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因为伊万诺夫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自私是不应该的。散会后，他还和没有参加党小组会的那些苏联非党队员嘟囔说他自己并没错。其实当时是在食堂帐篷中开的会，非党队员也都听到帐篷里会议的情况，那和我们中国50年代时的党小组会情况截然不同，我们那时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提了意见，批评的也好，表扬的也好，自己最后总得有个表态吧！可是这个党小组会是你批评你的，我还得想想再说，毫无结果就算完了。另外，会下也有的党员支持伊万诺夫，说他没有错的，而在会上他却一言没发。

中苏联合侦察

1958年8月下旬，继我们40余位中方人员完成在苏联列宁峰的集体训练返国后，以苏联队（中苏联合珠峰队）副队长E.A.别列斯基和队员A.E.科维尔科夫、L.E.菲利蒙诺夫组成的3人代表团于9月来到中国，与中国副队长许竟和队员王富洲、石竟、陈荣昌、刘连满、王家奎、赵国光、罗志升和医生翁庆章、翻译彭淑力等11人组成的珠穆朗玛峰联合侦察队，24日从北京乘空军运输机到达拉萨，再乘汽车抵日喀则，从日喀则改为骑马，到达定日和珠峰下的绒布寺，具体任务是往珠峰北侧的东绒布冰川和主绒布冰川，对从北坳沿东北山脊登顶的路线和环境进行侦查。

这次侦查活动是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们的支持，达赖集团已开始在西藏各地制造混乱，为此，当时西藏军区为侦察队特别派遣了一个加强连的警卫部队，以保障侦察队的安全。联合侦查队人员乘马从日喀则出发，在一个整连100多位解放军官兵的保护下，到珠峰脚下走了整整18天。18天里，这些解放军战士身背武器弹药、食品燃料，步行护卫。为了安全，3位苏联队员均改着中国队员的服装和解放军的军

用皮大衣，实际上，苏联生产的防寒服一点不保暖，比起我们带去的，差得太远。对于这些卫护侦察队的解放军，菲利蒙诺夫1994年在给我的来信中，还深情地回忆说：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中苏合作共同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活动，在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特为我们派了一个连队的保卫部队。我们骑着马，而战士们却步行，道路很不好走。他们背着枪和粮食，还背着替换的鞋，眼看着三五天就要换一双新鞋，马的铁掌也要几天一换。18天的行程，我们在马上。他们却非常艰苦地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上背负着很重的东西保护着我们，中国军人的吃苦耐劳、顽强奋进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我一生中能有幸参加这样一次活动，是幸福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的友谊也是非常珍贵的。

侦察组在珠峰山下，先后从主绒布冰川和东绒布冰川进行侦察，察看了从6400米到北坳的路线，观察了从7007米以上通向东北山脊的地形，共用了10天时间，然后原路安全返回定日、日喀则，12月2日回到北京。

12月4日，联合侦察组向中苏两国体委领导做了全面的汇报，中方由国家体委副主任、主管登山项目的黄中主持，苏方是苏联国家体委副主任K.安德里安诺夫。会上，两国侦察队长分别做了汇报，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如明年正式登山时基地营和第一、二、三号过渡营地的设置位置、通往北坳及登上东北山脊的计划路线等。我仍然是会议的翻译。会议进行了两个上午，两国领导高度评价了侦察组的工作，通过了他们所提出的计划方案。会上做了几项决定：1.1959年3月20日，由登山队员、教练员和官员组成的30人苏联队从莫斯科抵达北京，22日从北京飞往拉萨，然后乘汽车经日喀则进入珠峰脚下的基地营（海拔5120米）；2.中国方面负责修筑一条从日喀则经拉孜、定日到珠峰基地营的全长380公里的公路；3.同意别列斯基的建议，为了更确切地对北坳上方地形的侦察，中

我一生中能有幸参加这样一次活动，是幸福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的友谊也是非常珍贵的。

国向苏联购买两架AN-6型(安东诺夫6型)飞机(这种小型飞机可飞达12000米以上的高度)；4.中国气象科学人员提前进入珠峰山下，观测珠峰地区的气象变化规律，特别是4~6月份的气象变化规律。

其他如苏联队在中国境内的食宿交通费用、两国队员的登山服装及装备(高山帐篷、氧气瓶、供氧用的面罩、调节器、冰镐、铁爪、登山鞋、高山靴、岩石锥、冰锥、铁锁和主绳、辅助绳等)的提供，均已在同年7月两国务委员的会议中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中方在这次会议中明确承担的两条：修筑公路和向苏联购买两架侦察路线用的飞机，费用是相当高的，要比苏方承担的高出几十倍之多。仅修筑公路一项，就动用了西藏军区的一个工兵营，还有当地藏族民工800多人，耗时3个多月，耗资上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万)。而我们向苏联购买的飞机，是周总理亲自给赫鲁晓夫写的公函，经过当时的苏联对华贸易处，每架合人民币24万，共48万。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高级飞机，直到1959年1月间，由4位苏联民航飞行员驾驶，从伊尔库次克飞抵北京西郊机场，由我们的飞行员接收时，我才看清，原来与我们当时已能在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的安2型机基本上是一样的，双翼单螺旋桨飞机，可乘坐6~8人，只比安2多了一个空气压缩机。对此，我们的飞行员说：其实，我们只买一个空气压缩机就行了！当时我想，你们苏联人要登我们的珠峰，与我们合作，两家的经济负担最起码应当平均吧。我们要修公路，还要买你们的飞机，为什么你们就不能为这次活动提供两架飞机呢？后来这两架飞机根本就没用过，国家体委就把它拨给了下属的航空俱乐部。

不过，由于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是世界高山探险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我们国家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说明党和政府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和真心实意的支持。后来我才知道，为修筑那条公路，解放军工兵营共死伤6人之多，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历史上英国人从1921年到1938年先后7次向珠峰冲击，无论是从日喀则到珠峰，

或者从尼泊尔进入西藏，都是步行，除了雇用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夏尔巴人为他们背装备、食品、燃料外，队员自己也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一走就是20多天一个月才能到达山下；而撤退时也得一步一步走到加德满都，除了夏尔巴人外，就是牦牛和马匹。而我们却把公路一直修到基地营，全队人员和物资都可从拉萨乘汽车直达基地营，这可真是世界之最。这一方面说明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人的用心。

中苏联合队的离奇解体

1958年12月25日，苏联国家体委副主任安德里安诺夫和别列斯基等侦察队员回国。此后，我多次接到苏方队员的来信，称他们得知共同侦察的情况和两国务委领导做出的决定后，都感到欢欣鼓舞，表示他们将在高加索进行身体和技术的训练，摩拳擦掌，为1959年春季的联合攀登做各方面的准备。是啊，对苏联人来说，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能够以如此小的代价，获得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机会甚至成功，实在是件天大的喜事！

根据两国协议，1959年元月中旬，苏联方面已将氧气瓶、煤气罐以及其他装备和苏方人员的高山食品全部从铁路运抵北京。根据协议，苏方队员将于3月20日抵达北京，由中方准备专机将人员空运去拉萨。在此期间，中方不但已将苏方所有的物资运抵拉萨，而且修路任务也已于3月2日前全部完成。为了了解珠峰地区的气象变化，中方人员从1958年秋就派专家一直住在珠峰山下，观测记录了详细的气象变化资料。

按协议1959年是试探性登顶。因为中苏双方都没有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如果不行，还可以在1960年继续攀登。这些都是明文写进协议书的，双方主要领导也都在上面签了字。

在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下，一切准备工作顺利地进行着。1959年春，正当两国合作登山一切准备就绪，3月18日夜，在帝国主义的



而我们却把公路一直修到基地营，全队人员和物资都可从拉萨乘汽车直达基地营，这可真是世界之最。这一方面说明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人的用心。

支持下，西藏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尽管这场叛乱像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却推迟并最终搁浅了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计划。

叛乱发生后，很难说它何时可以平定。3月19日上午9:00，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和我前往苏联大使馆，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维年科及其文化参赞，并请紧急转告苏联体委，由于西藏境内出了点小问题，为了运动员人身安全起见，建议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希望得到苏方谅解。那天，我仍然是翻译。

平息达赖叛国者的这场闹剧后，我国在1959年11月致函苏联，请他们派人前来商讨1960年春天联合攀登珠峰的有关事项。苏联体委于12月3日派出一位叫安基宾诺克(Angibenok)的司长和原拟担任联合登山队苏方队长的库兹明两人的代表团前来北京。他们到达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查看10个月前苏联运来的高山食品和装备有否损坏。我们一起去兰州察看了因叛乱而从珠峰基地营——拉萨转运回来的这批物资，他们认为我们保管得很好。但在他们到华的这5天里，在双方的三次协商会议中，苏方闭口不谈方案的实施问题。第5天下午，当安基宾诺克去苏联大使馆时，库兹明悄悄对我说：“明年我们不能来了！”

为什么？我很奇怪，立刻追问。

“他！安基宾诺克是奉命前来破坏中苏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我们运动员反对破坏合作，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好机会啊！我们没有权力，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问题呢？难道我们合作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体育活动中还有什么政治因素吗？”

库兹明说：“西藏的叛乱，有印度人在后边指使，苏联与印度是友好国家，这里不就有政治问题了吗！”

我还是不解，又问他：“我们登山与印度毫无关系，印度为什

么干涉我们呢？”

他说：“苏联与印度关系友好，中国与印度关系紧张，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怎么与印度没有关系呢？我们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地区内活动，这不等于苏联支持中国对印度不友好么？！”

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完全懂得。今天看来，体育也好，其他事务也好，确实都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紧密相连，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以后，中苏双方的分歧日渐公开，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活动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而取消，也就势在必然了。

不过，我当时只是恍然觉得，原来他们一直说什么“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兄弟般的”等等，都是骗人的假话呀。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国家体委领导。果然，安基宾诺克从使馆回来后，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开口了：“你们的准备工作和去年从苏联运来的食品和装备都保存完好，我们没有什么意见。由于苏联队员至今还没有很好地集训，所以明年1960年苏联队员不能前来与中国联合攀登珠峰……至于什么时候能来我也很难说……”

由苏联倡议，两国队员付出无数心血实施，两国政府庄严达成的协议，凭他这几句谎言，就轻易撕毁了。明明是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一手策划的达赖集团的叛乱，现在又加上一个“兄弟般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暧昧支持！一个极其可耻的政治问题，就这样被扯进体育运动之中。

周总理的问题与支持

一切都明白了。苏联先想从设备方面挑毛病，在挑不出我们任何错的情况下，只好借口自己方面准备不足，单方面先撕毁了协议。

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歧视，现在又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令全国人民义愤填膺。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问我们：“他们不干了，我

以后，中苏双方的分歧日渐公开，
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活动由于这些分歧
的存在而取消，也就势在必然了。

在当时国家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拨款70万美元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前往西欧，考查他们攀登珠峰和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的战、技术并采购我们急需而国内又暂时不能制造的装备。

们自己能不能干好？”

这可问到了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都想为中国人争口气，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干得更好！更漂亮！我们一致表示：“我们自己一定能干好！”

周总理了解到中国登山队缺乏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装备和工具，国内暂时又无法生产这些装备的情况下，与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贺龙等商议后，决定支持我们，当即批准拨款70万美元，并指示我国驻西欧使馆，协助购买所需的各种高山装备。

在当时国家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拨款70万美元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前往西欧，考查他们攀登珠峰和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的战、技术并采购我们急需而国内又暂时不能制造的装备。那时西欧的许多国家还没有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每到一处，不管是看样品还是寻找和购买资料，后边都有特工人员盯梢。

我们于1960年元月3日离开北京，第一站是瑞士，之后又从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列支敦士敦等国购买攀登高山所需要的种种装备。

踏上苏黎世的土地，就被瑞士特工人员盯上。不管我们到哪里，工厂、商店、书店，还是登山博物馆，那些先生都在后面跟着。我们进商店，他们也进商店；我们乘车去哪，他们也跟到哪。我想，我们正在遭受来自外部的封锁和国内自然灾害双重困难，人家当然要注意我们这两位派往海外的人员、来自他们认为是神秘的共产党国家的不速之客了。他们不知我们干什么来了，难免跟踪；中国人做事正大光明，不怕你盯梢。见了面，我就和他们点点头，道个早安。有次我大胆去问这位跟踪我们多次的瑞士人：“您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们呢？”他说：“为了您的安全！”可见当时不少国家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注意。当然他们要了解我们到底是做什么来了？特别是当我们购置对讲机时，还一定要书面说明用于登山，而不是用于军事。其实那时我们国内也早能生产这种对讲机。



了，只是在隔着山脊或山峰时，有时还不太好用。为了保障我们登山的胜利，我们还是在瑞士购买了6台对讲机，这也许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和不安，其实我们确实是用于体育运动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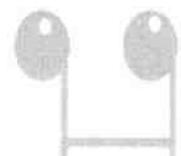
在使馆和一些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我们从法国买到了当时最好的氧气瓶、帐篷、登山鞋、铁锁、冰锥和登山绳，从意大利买到了冰镐，也买了些英国的帐篷和睡袋，买到了瑞典的汽油炉、瑞士的对讲机、列支敦士敦的太阳镜，还从德国买了一些氧气瓶。所有这些装备都远比苏联的先进，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技术和战术资料，对于法、英、瑞士、意大利等国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和教训也了解了许多。那时我才认识到，如果我们真的与苏联合作，用他们那些装备和技术，并不一定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登上珠峰。

这些装备总重达6吨，全部集中在布拉格，国内为此专门包租了我国民航局的一架专机，将这些难得的物资于3月20日全部运回北京。专机一到北京，西郊机场就早已为我们准备了3架军用飞机，立即运往西藏拉萨，再由拉萨转运珠峰脚下的登山基地。这时，我国登山运动队，早已在西藏等待整整一年，他们在那不但接受了高山训练，还在训练过程中登上了海拔7162米的念青唐古拉主峰。

意外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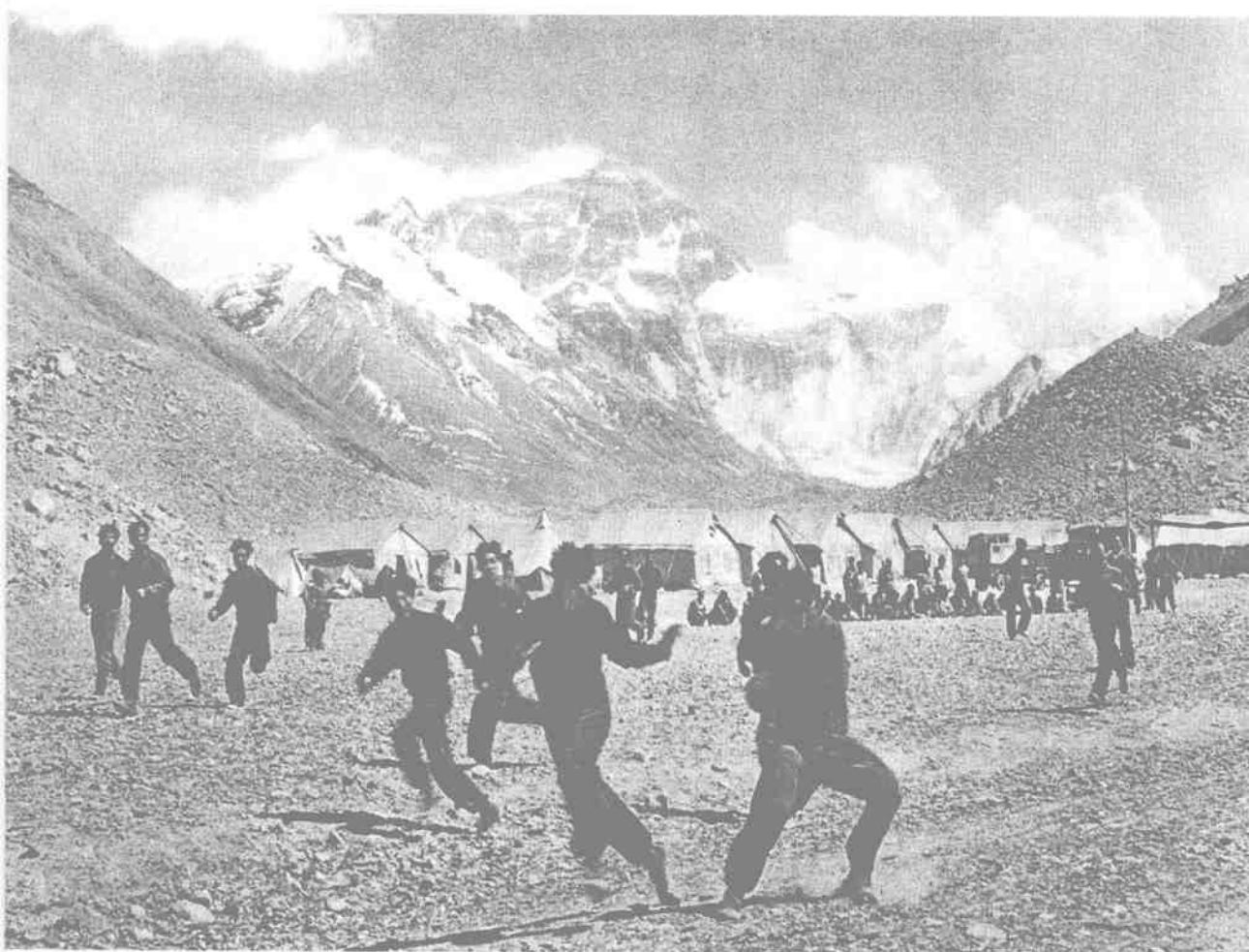
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苏黎世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里选择登山绳和冰镐，店老板霍夫施泰德(E. Hoffschdir，曾是1952、1956年瑞士珠峰登山队队员)突然指着距我们不到十米远的两个同样在他店里挑选羽绒睡袋的顾客，对我说，“您知道他们吗？”

我注意一看，是一个头上包着白布的印度人和另一个脸色油黑的人，这个人个子不高，好像面熟，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正在我琢磨之时，老板又说：“您不认识他？！他就是丹增啊！另一



这时，我国登山运动队，早已在西藏等待整整一年，他们在那不但接受了高山训练，还在训练过程中登上了海拔7162米的念青唐古拉主峰。

这位丹增的照片，我多次在英国资料上见过，一时对面，竟然没有对上号来。



1960年中国队在珠峰下的基地营进行手球训练。身后是成排的棉帐篷组成的珠峰新村。

位是印度队长甘·辛³。”原来他就是1953年作为英国队的向导头儿，与新西兰的希拉里一同首次从东南山脊登上珠峰的丹增·诺尔盖，当时已加入印度籍的夏尔巴向导。这位丹增的照片，我多次在英国资料上见过，一时对面，竟然没有对上号来。

我们这次到欧洲，并不对外宣扬要登珠峰，只是要购买一些攀登高峰的装备，所以不便对店主说什么。霍夫施泰德还对我讲：“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陆军已组成1960年春季的



1960年4月，中国队员在进行正式攀登前的冰雪地攀登训练。



厄菲尔士登山队，他们在这里采购各种高山登山装备。”这个意外的信息来得这么偶然，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立即将这个情报通过使馆报告给国家体委领导，一方面向中央领导汇报，另一方面这个信息对我国登山队员无疑是一个激励。我们将要与曾经妄想占有我们神圣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者展开一场竞赛，同时也是对赫鲁晓夫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将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比赛。它将向全世界显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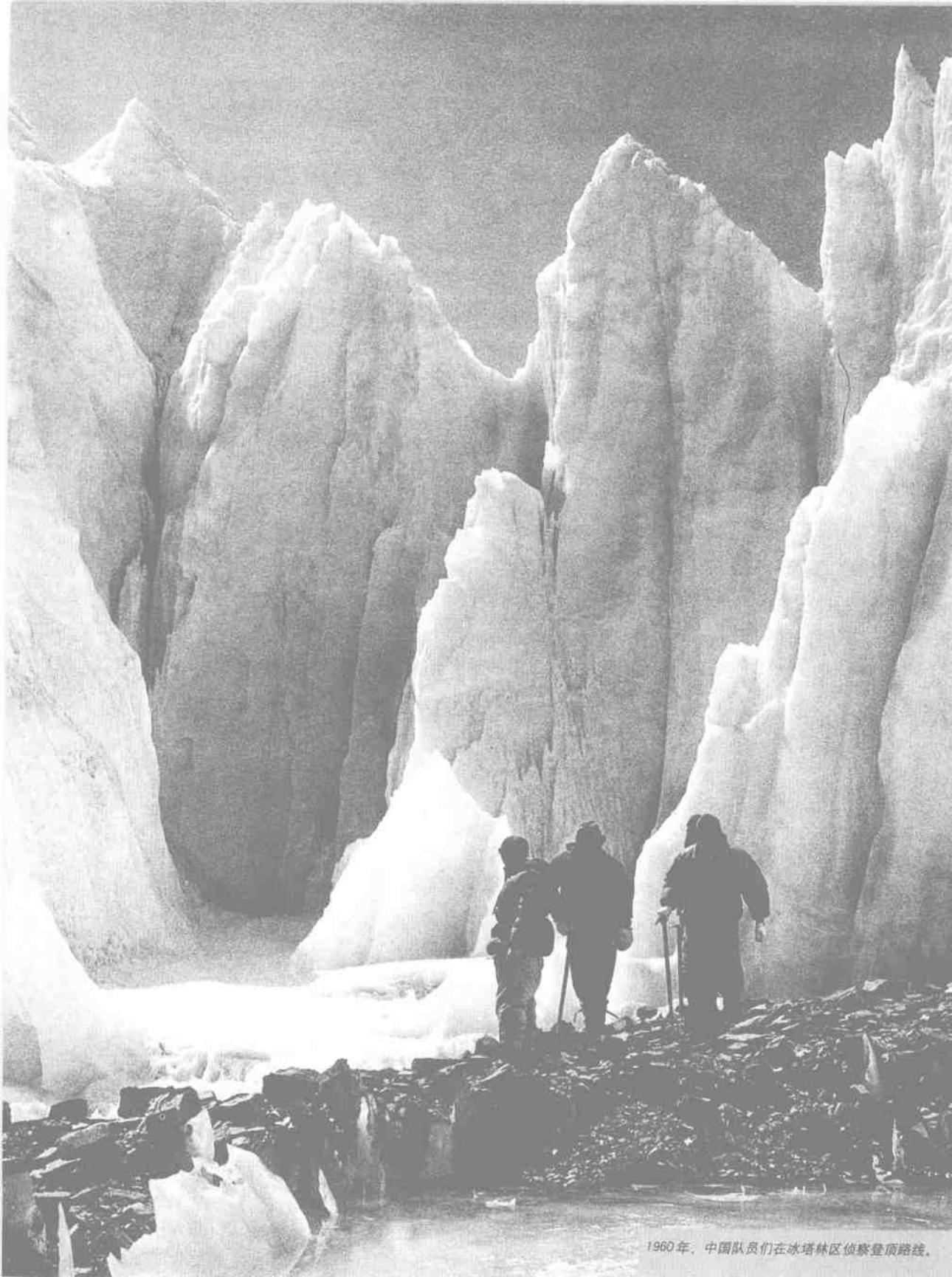
当我们把海拔8000米以下的各号营地建好之后，为了保守机密，各营地晚间用对讲机通话时都使用代号：基地营叫黄河，以上各高山营地分别是长江、珠江、湘江等。当我们的基地营与各号营地通话时，常常听到一种模仿我们的呼号、但又模仿得不那么像的声音的干扰。原来不是别人，这正是与我们几乎处于同一高度上的印军登山队在捣乱。他们在南坡，我们在北坡，他们进入营地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相同，只是在同一座山峰的不同坡面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两条不同的山脊上）。这就形成了中国和印度两国高山探险家之间的一场大家都知道、却相互看不见的激烈竞赛。

直到以后我们才知道，印军登山队也在向顶峰冲击之中。5月23日，他们越过南坳，24日到达8400米营地，离顶峰已经不远。但当中国队员向顶峰冲刺时，他们却停留在那里过夜，25日当中国队登上顶峰、下山到达8100米附近时，天气已变坏，暴风雪来了。因此，当中国队已安全返回基地营时，刚刚到达8600米的印度队员却不得不在大风雪中挣扎着下山，他们的登顶宣告失败。

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曾有名言：“两军相遇勇者胜。”他的这句话为这场互相看不见，又能实在感知到的、非常激烈的竞赛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裁判。

珠峰脚下的新村

其实早从1958年秋天开始，为了全面了解珠峰全年的气象变



1960年，中国队员们在冰塔林区侦察登顶路线。

化和地形情况，中国的气象、地质、地理、地貌等专家早已抵达珠峰山下进行各种科学考察和测试，所以最近中科院的科学家回忆说：“中国的高山探险事业促进了高山科学考察，而中国的高山科学考察也提高了中国高山探险水平。”应该说为了实现中苏联合攀登珠峰，中国在人力和物力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58到1960年，正是中国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封锁，经济十分困难，中国敢于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可见从领导到每一位队员敢于战胜任何困难的决心。

1958年10月，中国登山队先后在成都、拉萨和定日等地集训。苏联撕毁协议，我们决定自己干时，队员们更加积极训练。1959年4月初，由160多人组成的登山运动员、教练员和气象、地质、地理、地貌、动植物、水文、医学等各学科的专家们，进入珠峰山下，并展开了全面的营地建设和科学考察，为1960年的正式攀登珠峰，做全面的准备工作。

根据侦察的结果，确定了两条登顶路线，一条是从主绒布冰川（亦称中绒布冰川）到东绒布冰川，再从东绒布冰川的东侧砾顺冰川向上登上北坳，然后登上东北山脊登顶；另一条是从主绒布冰川的西侧直接登上北坳，再沿东北山脊登顶。其实这两条路线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先登上北坳，只不过是从基地出发，走哪条路线能够比较安全地登上北坳而已。

经过实地多次观察，最后决定按第一条路线登顶，并确定基地营设在海拔5120米的冰川融化的小河边。这里取水方便、背风，进出山也很方便，运输卡车可以直接开到这里。一号营地设在5400米，二号设在5900米，三号在6400米，四号在北坳上方7100米处。

1960年3月19日，270名登山运动员和运输队员全部进入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已然建好的基地；同时，上百吨从国内外采购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24顶大型越冬用棉帐篷组成的基本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给世界最高峰抹上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

里有库房、气象站、餐厅、食堂、电台、记者室、医务室、发电机房和队员们的宿舍、会议室，还有各种运输车辆等，这样一个设备齐全、可供200多人生活的登山基地，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少有的。

所有人员、物资进驻营地后，开始了适应性训练和向海拔5800米、6400米、7007米、7400米、7800米、8600米等各号营地运送突击顶峰的必要物资。

3月24日，第一次侦察，到达6400米，在这里建第3号营地，由于天气恶劣，未能按原计划越过危险的北坳。

4月6日，第二次侦察行军，同时向上方运送食品、装备。从基地出发，越过最危险的绒布冰川、冰裂缝地区，6天后登上7007米的北坳。全队有40人越过北坳并将大批物资运输上去。但侦察行军中有两名队员牺牲，一位是兰州大学地理系教师王玑，因高山病牺牲在6400米的营地附近；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气象系教师邵子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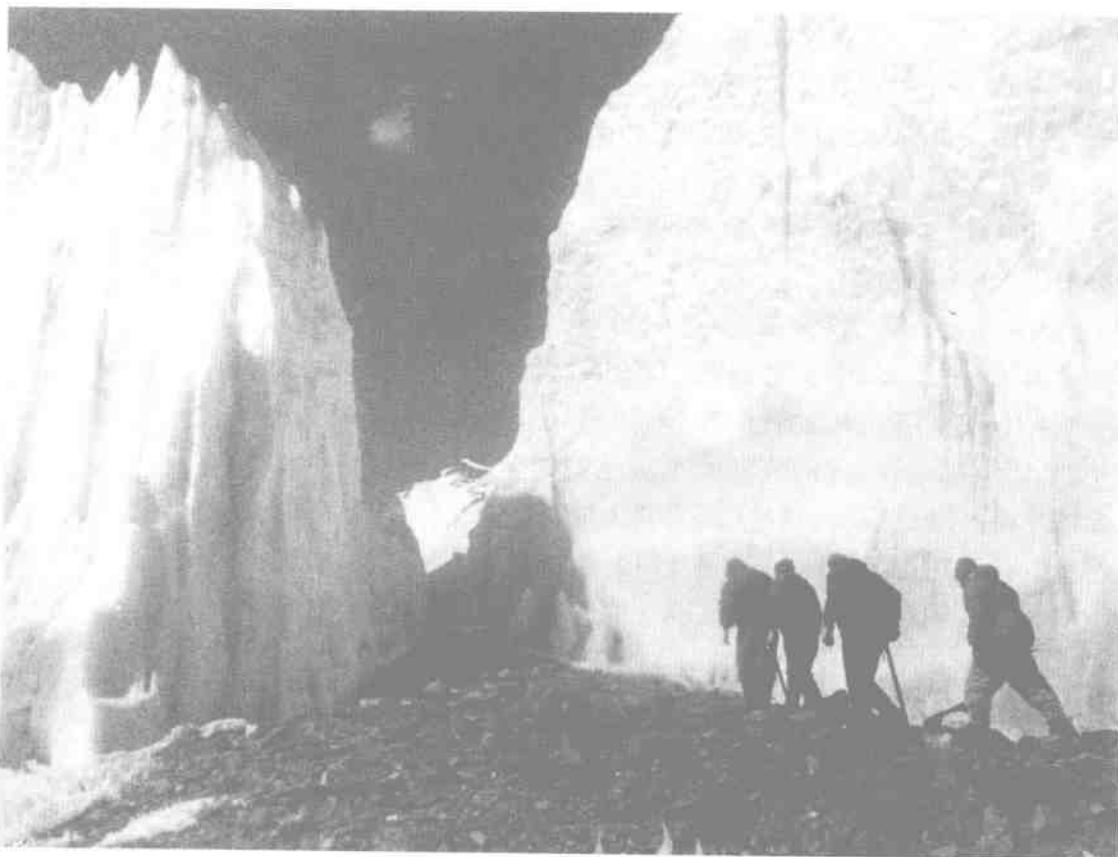
据气象预报，4月23日开始有一个好的天气周期。因此，4月25日又发起第三次冲击。突击队员29日越过北坳，5月2日，队员刘连满等人相继越过7600和7800米高度，这段路程是北坳之后的又一个难点，7400米处是一个大风口，人员很容易被风吹倒滑坠。当晚20时前后，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许竟等人已到达8100米处。

5月3日，队员在8200~8400米地带发现了黄褐色的岩石层，也就是英国资料上所说的“黄色地带”，在附近还发现了早年英国队的一个高山营地，里面有英国人用过的固定帐篷的木桩、早已风化腐烂的睡袋及亚麻登山绳等，证明当年英国人曾经到过这里。

这次冲击到达了8500米附近，但人员冻伤较多。按原计划应登顶，由于天气变坏，队员们只得撤回基地。当时的队长表示，1960年的登顶难以实现，自己又有严重的高山病，就离开基地前往日喀则治疗去了。

1960年的中国登山队眼看就要撤退。

正当人们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返回拉萨时，电波传来周恩来总理的新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



1960年5月，中
国队在6400米
上方的冰塔林
中前进。

周总理的新指示

正当人们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返回拉萨时，电波传来周恩来总理的新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

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解放军优秀指挥员，收到总理的指示后，他将全队人员召集起来，重新做了部署，清点、安置好藏汉族伤病人员后，能继续登顶的队员已不足20名。

韩复东选择副队长许竟，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工人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登顶队员，指定许竟为突击队长，王

富洲为副队长；邬宗岳、多加、索南多吉、米玛、云登、次仁、米玛扎西、却贝坚赞、却加等9位藏族队员为二线支援队员，一共16人组成第四次登顶突击队。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名言。在韩复东的指挥下，王富洲等人于5月17日上午9时左右从基地出发，18日晨从3号营地向上，到达7007米的北坳上方。

气象预报告知，5月25日后将有暴风雪，并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而珠峰地区的雨季又将于6月开始，第四次突击队的队员们奋



1960年5月，中国队通过北坳。

气象预报告知，5月25日后将有暴风雪，并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由于在地球的最高点附近，天色还很明亮。

力拼搏、全力推进：19日上到7400米的第5号营地，21日到达7600米，22日抵达8100米的6号营地，23日下午2点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许竟和贡布到达8500米，建立突击营地⁴。

24日晨，当突击小组5人准备向海拔8700米的“第二台阶”⁵前进，大家再次检查原先运输队运送到这里的法国制造的容积4升的一堆氧气瓶时，发现只有一瓶中还剩下一些压缩氧，而食品则一点也没有了。这时，率队到此的突击队长许竟突然倒地，提出自己下撤。担任副队长的王富洲毅然接过领导责任，他一面安慰突击队长，请他立即下山，一面率领其余3人继续前进。

谁知这位突击队长不但自己下撤，还把原计划留驻8100米营地的支援人员全部下撤，一直撤到7007米的北坳营地。

刘连满的奉献



中午，王富洲一行4人到达著名的“第二台阶”下方，没有发现任何曾有人到过的痕迹。这个六七米高的陡峭岩壁，可把他们难坏了。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刘连满试着攀登，没有成功，岩壁上根本没有可以抓握的支点；接着，贡布、屈银华也失败了。两个小时过去，他们除疲惫不堪外，仍在岩壁下。

这时，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想起了抢险中的人梯战术，毅然蹲下身子，让屈银华踩着他的肩膀，然后他扶着岩壁站立起来。这使屈银华一下上升到2米多，他就在刘连满的肩上，在这道高达7米的岩壁中间，把一根钢锥打入石缝中，从而打造了一个可攀抓的支点。借助这个钢锥支点和上面的一个岩石支点，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到“第二台阶”上！接着，刘连满又相继把贡布、王富洲顶了上去。最后，上边的3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这时，5个多小时过去了。为了越过这道位于8700米高度上的岩壁，他们用了多半天的时间，由此可见其艰难程度，也可以想见大家的体力消耗。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由于在地球的最高点附近，天色还很明



亮。根据基地营的消息，天气很快就要变坏。4人稍事休息，王富洲命令继续前进，争取时间，力争在坏天气到来之前拿下珠峰。多次在台阶下长时间协助大家上攀的刘连满，这时已疲乏至极，他虽坚持着往前行，但每走两三步就要摔一跤，一小时才能前进五六十米，行动十分缓慢费力。

要赶在暴风雪前拿下顶峰，就不能停留，必须争分夺秒地上攀。王富洲请大家停下，给大家讲抓紧时间前进的利害关系。最后决定刘连满留在8700米处，原地休息，其他3人继续前进，等他们3人下山时，再一同下山。

1960年5月，中国队员通过
7500—7600米
的大风口。

就这样，在一无食品、二无氧气的情况下，3个人出发冲向顶峰了。



1960年5月24～
25日夜间，珠峰
天晴，月光明
亮，王富洲等就
是借助月光夜
行军登上珠峰
顶峰的。

大家检查了氧气瓶，发现虽然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瓶，但只剩一瓶80立升氧气。可吃的东西，除贡布口袋里尚有一小块风干羊肉外，还剩18块水果糖。而他们4人已经24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王富洲决定：氧气和水果糖全部留给刘连满，其余3人轻装上阵！他还安慰刘连满，让他好好地在这里休息，等他们回来。就这样，在一无食品、二无氧气的情况下，3个人出发冲向顶峰了。

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有一种说法，8000米以上高度是“生物禁区”，也叫“人类死亡地带”，可他们顾不得这些。走着走着，他们发现月亮已经开始爬上来，前进道路上积雪很少，风也不大了，此时不夺取顶峰，更待何时？他们继续前进，道路本身不那么难走了，能见度也较好，但缺氧的反应、饥饿、干渴的折磨，使得他们步步艰难。借着月光他们走得慢，很慢，一小时才前进10米左右，但他们真像蜗牛虽慢却不断前行。

贡布一直走在前边开路。遇到一个高坡，贡布先攀上去，一看，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登山队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首次打通从珠峰东北山脊登顶的道路。图为当时在一无氧气、二无食品的情况下，登上地球最高点的三位英雄，自左至右：屈银华（25岁，时为四川林业工人），贡布（26岁，时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王富洲（25岁，登顶队队长）。

前边还有一个高坡。等攀上这个坡，他停下来，左看右看之后，回过头来用嘶哑的声音对王富洲喊道：

“不行啦！不能在走了！”

王富洲问他：“怎么不能再走啦？”

“再走就下山啦！就要到尼泊尔去了！”

原来，他们已经到达了顶峰：8848米！

从8700米的“第二台阶”上方到珠峰顶峰，垂直高度148米，3人突击组共费时7个多小时。这期间，既未使用人工供氧，也没有食物和水的补充，这是有着何等坚强意志的三位英雄啊！

把国旗和毛主席像留在珠峰顶

按照国际惯例，登上一座高峰顶峰的人，都要留下自己的登顶



纪念书和纪念物，王富洲在笔记本上用铅笔⁶写下：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于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写完后，由于手已被冻僵，又戴着手套，竟然无法从笔记本上撕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还是身体情况比较好的贡布帮他撕了下来。

贡布从背包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塑像，屈银华从背包中拿出一个空铁皮罐头盒，将王富洲写好的那一页登顶纪念书折好装进盒内，并把毛主席像和国旗一并埋在了顶峰西北角下方的碎石堆里（1975年中国队第二次登上珠峰时，藏族女队长潘多就是从这里取回这些纪念品的），因为这里最不容易被大风吹走。王富洲让贡布在世界最高峰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相互保护着，赶快下山了。

当勇士们从珠峰顶峰上下山时，由于高山缺氧，他们行动非常缓慢，但毕竟是下山。他们已经36小时未进任何食物了。渴了，顺手从旁边抓一把积雪往嘴里一塞，而这却是上高山时的大忌，因为雪吃多了，必然要伤到喉咙，结果3人的嗓子全都红肿嘶哑了。虚弱、疲惫、缺氧，使得下山途中，大家走不到三步就要跌倒，爬起来再走。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在攀登高山的活动中，相对来说下山要比上山容易一些：第一，下山比上山节省体力；第二，下山是往低处走，人越往低处走，空气越浓密，空气中的氧含量也越多，这对人和所有的动物来说，都会越来越感到舒服。

下山过程中，他们的步伐不知不觉比上山时稍快了一些。因为上山时，第一不了解前进路上到底还会遇到什么困难，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前途莫测的高度紧张中；第二尽管在月光下，但在毫无供氧装备的情况下，越往上走，空气中的氧含量越少，人越难受，行动越发吃力。下山时他们都感到不那么困难了。在珠峰顶上时，当王富洲用铅笔在笔记本上书写纪念书时，他握笔的右手是无力而颤抖着把字写完的，最后连从笔记本上撕下这张纪念书的力气都没

有了。他先后撕了三次，都没能撕下来，最后还是贡布上去撕下来的。可见他们当时体力的消耗程度！

人们也许会问，王富洲撕不动纸，为什么贡布却能很快撕下来？贡布不但撕下纸来，而且还埋好登顶纪念书、国旗和毛主席半身像（石膏像）以及采集岩石标本，这一系列工作，全部都是贡布完成的。原因是贡布当时体力最好。奥秘在哪？首先，贡布是从小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藏族，祖祖辈辈，已经适应了严寒缺氧的高原气候，在攀登高峰时不像非高原人那样有高山反应；其次，是贡布口袋中那小块风干肉。汉族队员从来没有吃生牛羊肉的习惯，而藏族同胞就不同了。他们从小就喜欢吃，刚刚杀好的牛羊，用身上携带的刀子，割下一块来，一不洗，二不沾盐，直接送到口中，吃得很香。把吃不完的生肉挂在帐篷外边，风干后就撕着干肉吃。这要换上汉人就不习惯了，他们一吃就恶心，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就是这块小小的干肉给贡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使他得以保存一定的体力。

刘连满的“遗书”

3人在下山途中，一心想的是上山时安置在8700米处的刘连满怎么样了？是活着，还是已经遇到什么危险？心里再急，再挂念，他们也只能一步一步地下山。

天色慢慢变亮，屈银华突然想起自己的背包中还有一个电影摄影机，拿出摄影机时，正好看到山下方有一个黑影在招手。“啊！那是连满！他没事！还活着！”屈银华说着，可当他迈开大步想往前跑去时，一下子就摔倒在地，忙去扶他的王富洲也摔倒了，还是贡布把他俩一个一个地拉起来。

大家忘掉一切疲劳，振作精神走向刘连满。终于会合了，四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八行泪水止不住地流，此时此刻大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大家忘掉一切疲劳，振作精神走向刘连满。终于会合了，四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八行泪水止不住地流，此时此刻大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刘连满立刻转身把大家头天晚上分手时留给他的那瓶氧气和18块水果糖拿出来，让大家吸氧吃糖。就在大家饥寒交迫地吃着那几块宝贵的水果糖时，王富洲忽然瞥见刘连满打开的背包旁，用一块小石块压着的纸条，拿起来一看，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也都跟着哭起来，原来那是刘连满的绝命书，上面写着：

“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给我留下的这18块糖和这些氧气，我一点也没有用，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辛苦了，快把这些糖吃了，吸些氧，赶快下山，把胜利的消息告诉祖国和人民！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战友刘连满 1960年5月24日夜 10:30”

原来，在与王富洲等分别后，当晚他从9:30分左右便昏沉沉地躺在8700米的高山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又被冷风吹醒，明月当空，他感到精神好了一些，但饥饿难忍，他本能地摸摸口袋，里面装着那18块水果糖，他伸手去拿糖，但手指刚一触到，他又把手缩了回来。他想，不行，这糖我不能吃，留着给他们回来时吃吧！他们比我更需要，吃了好赶快下山，把胜利的消息早些传给祖国人民。一会他又昏睡过去。第二次又因高山缺氧憋醒了。其实这是常有的事，不用说在海拔8700米的高度，就是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高山，或者在4000米的高原上，晚上睡觉因缺氧而憋醒都是常事。因缺氧被憋醒的刘连满，伸手去摸氧气瓶，但他马上又意识到，这也不能动，还是应该给他们三人留着。就这样，他睡着、又被憋醒，最后他实在太难受了，感到难以支持，可能等不及他们回来就会死去，于是写下了这份“遗书”。

每当我在国内外做报告，讲到这里，我都会感动得流泪。我想，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铮铮铁骨的男儿，还是温柔细腻的女性，读到这里，都会掩卷唏嘘的吧。世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甘于牺牲的人，才有美丽和高尚啊！



想不到休息一夜后，刘连满的身体和神智竟奇迹般地得到恢复。25日早晨快8点钟，当他看到上边的同伴已经下来时，强烈的震撼，使他站立起来，迎上前去。而这时王富洲等3人已极度疲劳，会合后他们没有在8700米处多停留，下了“第二台阶”，刘连满搀扶着3位战友，慢慢地向山下走去。在到达8100米的高度以前，4人不知摔了多少次跤，腿脚已不听使唤，走着走着就跌倒、跪倒了。

王富洲等4人从8600米上到8700米时，除随身携带一顶轻便帐篷和每人一条睡袋之外，什么通信工具都没有带上来。因此在他们向顶峰冲击的这三天里，他们无法与大本营或基地营联系。为了把登顶的消息尽快告知大本营，王富洲决定，让两位身体情况略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先下山，他和冻伤严重的屈银华随后。当贡布和刘连满下到8100米的营地时，发现那里空无一人，连帐篷都未留下。原来那位副队长先期下到这里时，对留守的人说别等了，他们大概回不来了！直到贡布、刘连满回到北坳上方时，才遇上韩复东派来的接应队员边巴和边安民，原来当他们从8100米下山时，韩复东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这才赶紧派人上来。

从5月23~25日的3天里，由于通讯联系的中断，基地营对于北坳以上营地的情况，一无所知。直到24日，从“第二台阶”单身下撤到北坳营地的副队长，才在这里用对讲机向基地报告，有4位队员从海拔8700米处向珠峰顶峰冲击去了。在这些天里，基地和北京的总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里顺便说一句，过去媒体对这一段曾描绘成：“一位副队长，在海拔7007米的营地上，指挥了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这种说法是十分滑稽、毫无根据的。山上连一个通讯对讲机都没有，怎么指挥？副队长当时明明知道海拔8700米处没有食品，氧气瓶空空如也，前边横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岩壁，坏天气又将来临。在这九死一生的关键时刻，这位副队长突然说自己体力不支而下了山，还撤走了8100米营地的所有接应人员。这

想不到休息一夜后，刘连满的身体和神智竟奇迹般地得到恢复。



探险珠峰

中国人民的三位优秀男儿，临危不惧，顽强拼搏，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于30日下午安全返回5100米的基地。



1960年5月30日，珠峰基地营举行盛大仪式，庆贺中国健儿登上世界最高峰。队员门在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脚下，将贡布（左）、王富洲抬在肩上游行。前排右中山装者为总指挥韩复东。

样，他与突击队员间就切断了所有联系，怎么可能指挥这几位勇敢者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民的三位优秀男儿，临危不惧，顽强拼搏，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于30日下午安全返回5100米的基地。

当四位英雄回到基地后，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时，发现屈银华和王富洲冻伤非常严重。屈银华的全部10个脚趾都被冻掉，王富

洲失去5个脚趾；同时，两人双手的第一节指头也被全部冻伤坏死。想一想他们艰难地从峰顶一步一步走下来，要忍受多大的痛苦！

当记者问王富洲有什么感想时，他说：“没有贡布的开路，没有刘连满的保护，我们是难以登上顶峰的，就是上了顶峰也很难回来！没有刘连满和屈银华的相互协作，‘第二台阶’也是过不去的！他们都为这个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都对我讲过，“当时如果我们没有当机立断把刘连满留在8700米处，使他在适当休息之后恢复了体力，以后主要是他保护了我们下山的安全。否则，我们很可能会掉进深谷，摔得粉身碎骨。”

中国队创造的奇迹

中国登山队的成功，为世界高山探险创下了3个新的世界

1960年的登顶队员王富洲（右二）、贡布（左一）、屈银华（左二）与刘连满（右一）2000年在北京相聚。



当时如果我们没有当机立断把刘连满留在8700米处，使他在适当休息之后恢复了体力，以后主要是他保护了我们下山的安全。否则，我们很可能会掉进深谷，摔得粉身碎骨。

纪录：

- 一、首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新路线)；
 - 二、夜行军登上珠峰；
 - 三、从8700米以上连续14小时未用人工氧气获得登顶成功⁷。
- 另外一个奇迹属于屈银华。

按国际高山探险传统的规定，登上一座从未有人登上过的高峰，或早先已有人登上过的高峰，登顶者应在顶峰书面写下纪念资料并留在顶峰上，让后来者找到它，再由后来者用自己的新的登顶文字记录来取代前人的记录，把这个记录寄还给原来的登顶者，并公布于报刊或电台。当然最有力的证明还是照片，如果能在顶峰上拍一张既有人，又有顶峰的照片，那就更好了。但是，中国队当时一无闪光灯，二缺乏较好的相机，只有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们在上山前将一台36毫米的小电影摄影机交给了屈银华。可在登顶的那一时刻，只有微弱的月光，难以拍摄。直到他们快下到8700米、天已大亮时，屈银华才忽然想起还有摄影的任务，那时要拍登顶已经迟了。他就拿出电影摄影机，对准顶峰连续拍了一阵，这就是后来攀登珠峰纪录片的最珍贵的一组镜头。虽然它们后来被英国的喜马拉雅专家们用来作为指责中国没有登上顶峰的证据，但屈银华却创造了一个新记录：在8700米高度上拍电影！因为直到这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登山家在这个高度上拍摄过电影片！因此，屈银华在无意之间，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电影摄影师。

中苏希夏邦马峰合作之议

1959年12月，苏联谈判代表安基宾诺克回国后，遵照上边的指示，对积极准备参加联合攀登珠峰的苏联队员说：“中国方面不同意1960年与苏联队员合作攀登珠峰。”绝大部分队员受他欺骗，纷纷指责中国背信弃义，撕毁协议，而知根知底的库兹明却保持沉



默，不敢向他们说明真相。队员列·菲利蒙诺夫所在的莫斯科化学工业研究院，有6位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实习，他的妻子伊利娅·菲利蒙诺娃是院里的工程师，对在她实验室实习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好，热情给予指导，自从知道中国“撕毁”协议，丈夫不能前往攀登珠峰后，态度180度大转变，时常谩骂中国人背信弃义。

直到1961年5月，库兹明提出邀请中国登山家们来给苏联登山家和群众做首次从东北山脊登珠峰的报告，菲利蒙诺夫才从库兹明处了解到真相。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他对我说：“去年我实在不知道安基宾诺克与你们谈判的真实情况，直到你们来这里两周前，吉利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对库兹明的尊称)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责任确实不在你们，而是苏联的领导人‘维诺瓦特’(错了)。我们错怪了你们，非常抱歉！我们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邀请呢？

情况是这样的。库兹明和我们的苏联好友们，如科维尔科夫、别列斯基、菲利蒙诺夫、斯科罗巴卡托夫和沙拉耶夫等人，在莫斯科机场欢迎我们到达时，就已在私下里对我讲了，原来他们与库兹明等得知中国队自己成功登上珠峰后，震动很大。一是没想到中国人在没有苏联登山家参加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壮举；二是惋惜自己没能参加！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可能自己登上珠峰，而在1960年登上世界最高峰是每一个登山者最美好的愿望，原本可能实现的理想，却因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原因而破灭。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苏联已落后于西方各国，现在又落后于中国！

当他们了解到实情后，就想方设法研究如何再与中国合作，到中国去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库兹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提出以“苏联登山协会”的名义，邀请中国的登山英雄来做报告，然后再和他们商讨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如获同意，虽然推迟攀登珠峰的机会，还可以选择这座完全在中国境内、不涉及苏印关系的高僧坚

赞峰(即希夏邦马)。库兹明的头脑确实很灵，这个办法也很有效，我们也确实应邀出访了。

但登山家毕竟不是政治家，库兹明等还是过于天真，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上打的牌是拉美国、日本，特别是印度，孤立和反对中国，想要绕过这种政治策略来谈合作攀登，是不可能的。1961年早已不是50年代初期那种“中苏关系是兄弟般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时代了，蜜月已经结束，我们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任人随意撕毁协议了。

早在接到苏联登山协会的邀请前一个月，库兹明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未能与中国队一起攀登珠峰，所有队员都非常遗憾，认为当局不该将体育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苏方队员希望能再次与中国合作……而从我们所订阅的“共青真理报”上，我在第三版上也读到苏联登山家、时任苏军“中央之家”登山俱乐部主席的拉塔达耶夫写的一篇《最后一座8000米的高峰在等待着》的文章，文中提到在各国登山家们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后面括号里以俄文标出EVEREST)在内的13座高峰征服的今天，这是一座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至今未被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高峰。很明显，这是在造舆论。

我们出国前，体委领导曾专门请示中央，中央指示：同意我们前往，但苏方若提出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如仅以其登山协会名义提出则不能同意，必须由苏联政府提出。因此我们在与苏联登山协会领导人——当时的主席是阿巴拉科夫，库兹明为副主席——谈判时，明确答复说：“仅以苏联登山协会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合作登希夏邦马峰，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答应你们的要求，珠穆朗玛峰的合作是你们政府向我们政府通过国家外交途径提出的，而且达成了协议，最后是你们政府撕毁的协议。现在同样也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具体说就是政府，只能由你们政府向我们政府提出，我们想合作攀登希夏邦马峰还是可以的！为增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可

以合作登山，但必须经过外交途径！”这一来，谈判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因为苏联登山协会的领导们很清楚，苏联政府是不会低头认错的，只好散会。

其实，我们中央早就明白，这是撕毁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苏联领导层耍的一个手腕，他们自知理亏，不好再向中国提出。由于事情真相已为苏联国内登山界了解，为了安抚苏方队员和国内广大登山者，想出这么一招，想不到我们早已识破。最后，我们说：“这件事必须由你们的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我们无权与你们达成协议。不过，我们会等待的，这最后的一座8000米高峰，给你们暂时留着，我们自己暂时不登，也不会让其他国家来登。等你们的政府提出时，我们会同意的……”这算是最后的答复。第二天在莫斯科活动了一整天。曾经来过我国的，又一起在两国登过山的，也有当过中国队教练的，还有苏联国家体委和工会中央理事会负责登山项目的各级官员，为我们举行欢迎会、宴会、座谈会等。

在这些活动中，苏联人又搞了一个小动作。《共青真理报》来了一位记者鲍斯尼科夫和一位会讲汉语的翻译尤拉（我已忘了他的姓），将我们团长请到一个角落里。我刚要上去为他们翻译，那位记者立即上来阻止我说：“您请休息吧！我们这里有翻译！”我只好回到座谈会上，继续与王富洲、贡布一起与友人们座谈。座谈会上多是苏联人提出各种问题，都是有关珠峰北坡和东北山脊的地形，中国使用的是什么装备？氧气从什么高度上开始使用？每分钟用多少？人感觉怎样？……会开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前团长才从外边回来，陪他回来的只有翻译尤拉，那位记者再没有露面。怎样谈的，谈了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团长也不愿意跟我们说。

第三天，我们前往基辅，然后到列宁格勒。第七天，刚从列宁格勒到达格鲁吉亚的梯比利斯时，突然接到我国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康冀民的电话，命令我们立即结束活动，返回莫斯科！我们回莫

斯科后立即去使馆，康参赞拿出5月4日的《共青真理报》记者专访中国登山代表团团长SHI的谈话全文，其中有：“中国登山代表团团长，中国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队长SHI说，中苏将共同攀登地球上最后一座尚未有过人迹的高峰希夏邦马……”康参贊问我们(主要是SHI)当时是怎么对人家说的？SHI不承认他说过这种话，康参贊就转问我是怎么翻译的？我说：“我不在场，苏方有他们的翻译，不让我参加他们的访问谈话。”康参贊说：“问题就在这里！让人家钻了空子，你们这样讲话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样吧，立即停止活动，明天回国吧！”其实只比我们原计划提前了一天，但这也是一种抗议的表示。我们就在第二天早晨向主人告别回国了。

这下子SHI捅下了个大漏子。回到北京刚下飞机就接到体委领导的指示：第二天汇报情况，听候处理。怎样汇报？其实这事很简单，SHI本人是非常想促成这起所谓合作攀登希峰的。因为座谈会上我们临分手前，我曾经嘱咐过他，千万注意希夏邦马的问题，出国前领导一再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我们决不主动提；他们提出则坚持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代表团不许承担任何义务！可当时SHI竟对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出个希夏邦马……”说明他主观意识里很想搞成这事儿。这位队长，竟是这样认识中央的指示，难怪让人家钻了空子！体委领导狠狠批评了他，让他写出检讨，记取教训。他却转身摊派到我和王富洲身上，不让我们回家。我们越想越气，这事与我们有何相干？思来想去，就把问题汇报到当时主管我们的司长韩复东那里。韩司长让我们回家，也不要写检查，我们才在半夜12:50回家去。第二天，韩司长找他谈话，他也没再让我们检查。但此后却给我们穿了无数的小鞋，我们无法忍受，只好向领导提出辞职或调离。王富洲是登山英雄，而我虽没有登珠峰，却是在苏联学习登山技战术的第一人，登山队的专业技术课全由我来讲授，又懂得外文，出版过两本这方面的书，当时体委不放我走。直

到shi因故撤职，我们才算解脱。

自那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着苏联从外交途径提出与我们合作攀登希峰，左等右等，一直等了3年，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在此期间，过去曾一起登山的3位苏联队友，多次给我来信，叙说他们也在等待其最高层像攀登珠峰那样，由政府向中国提出请求。3年过去，这最后一座8000米的希夏邦马峰，我们不能让它再等了。1963年，我国登山队对这个很少为世人，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了解的希夏邦马峰进行了侦察。1964年5月2日，王富洲、许竟、张俊岩、陈三、邬宗岳，还有藏族队员云登、索南多吉、米玛扎西等10人集体登上顶峰。

此后，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坏，苏联队员再积极斡旋，其决策层也不会批准了。从这件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甚至到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实力，这是最根本的，自己没有实力，借助他人是永远也做不成什么事情的。世上没有什么“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苏联人提出与我们合作攀登珠峰，首先是我们有这么一座世界最高峰，而他们答应供给我们所需要的装备，根本原因也在于我们自己不能生产，不得不仰仗他们，以及他们的登山经验。后来赫鲁晓夫修正政策，开始反华，使得合作破裂。但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怕任何困难，破釜沉舟，一咬牙，自己也就做成了。

现在回过头来细想，如果我们当年与苏联人合作，靠他们的装备，还不一定能够成功登顶。因为与西欧各国的高山设备相比，苏联的已经很落后并且笨重得很，势必加重每个队员的负担，而当时的苏联，也不可能花庞大的一笔外汇去购置国外生产、昂贵无比的高山装备。

至于他们1959年六七月间从莫斯科用火车运来为共同攀登所用的装备和食品、煤气罐、氧气瓶等物，1961年2月间，由库兹明和其外贸部的一位官员前来北京，与我们商谈处理，当时希望我们

自那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着苏联从外交途径提出与我们合作攀登希峰，左等右等，一直等了3年，也没有见他们的任何消息。

把它们全部买下来。经我们到西欧考察，并买回急需的各种高山装备后，当然再也看不上他们这些落后的笨东西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食品以极低的价格受理之外，其余装备全部退还给了苏方，由我方出了一部分运费。之后，库兹明与科维尔科夫等师友，每逢新年都会与我互通音讯，互致祝福，直到今天。而这，也成了“文革”中造反派强加我以“苏修特嫌”的因由。

登山运动最能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我几十年从事登山运动、高山探险、高山科学考察，去过不少国家，登过那里的山，但千山万水踏遍，还是我们自己的山山水水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山河，上天给中华民族送来的大好河山，越去攀登，越是热爱。



第五章 探险珠峰（下）

1960年中国队的成功，使“珠穆朗玛峰”这一世界最高峰的传统名称，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同时，中国队的成功，也给喜马拉雅黄金时代添上了重重的一笔，成为各国高山探险家比照的又一个目标。因为我国没有开放高山区，各国探险家就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频频向珠峰顶峰冲击。

美国队登顶并会师珠峰

1962年5月，第二支印军9人队，由陆军少校迪雅斯(J.D.Dias)率领，再次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他们共雇用了240多名夏尔巴搬运工。28日，在8450米处建立七号营地；30日，队员科利(M.Kohli)和夏尔巴向导安格扎尔凯到达8720米高度，但运输队的两名夏尔巴人在南坳附近被滚石砸死，又因暴风雪来临，印军队再次失败。

1962年5月，由美国人乌托罗·塞雅(W.W.Sayre)等4人(其中一位瑞士人)组成的珠峰队，在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偷偷越过中尼边界进入西藏的绒布寺附近，在海拔5120米的绒布寺上方建好基地营，并经6400米越过北坳下方的冰瀑区登上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计划沿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但他们只到达7550米的东北山脊大风口的下方，就被暴风雪给赶下来了。结果，偷攀未成。

1963年4月，以迪连弗斯(N.G.Dyhrenfuzth, 1919~1994)为首的20人美国珠峰队，集中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高山登山家。队长迪连弗斯，出生于瑞士，后移居美国，这位高山探险家多次在喜马拉雅山中活动，拍摄了许多高山探险的记录影片。美国队的装备和食品总重量达27吨之多。为此，他们除雇用了32名夏尔巴高山向

1960年中国队的成功，使“珠穆朗玛峰”这一世界最高峰的传统名称，为世界各国所关注。



导之外，还雇了909位夏尔巴搬运工。美国队的总费用为42万美元，是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美国阿尔卑斯俱乐部征集到的赞助。这支珠峰登山队可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人数最多的。

这支队伍经过两年的准备，队员都是经过多次集训后选拔出来的。他们是：

C.阿兰(Allen C. Auten, 36岁), C.巴瑞(Barry C. Bishop, 31岁), E.约翰(John E. Breitenbach, 27岁), B.詹姆斯(James B. Corbert, 26岁), L.戴维(David L. Dingman, 26岁), N.迪连弗斯(Norman G. Dyhrenfuxth, 44岁, 队长), E.丹尼尔(Daniel E. Doody, 29岁, 摄影师), M.理查德(Richard M. Emerson, 38岁, 摄影师), 托马斯·霍恩拜茵(Thomas T. Hombein, 32岁, 医生), G.卢泽(Luther G. Jerstad, 26岁), B.詹姆斯(James B. Lester, 35岁, 哲学博士), M.麦纳尔(Maynard M. Miller, 41岁, 哲学博士), P.理查德(Richard Pownall, 35岁), W.拜尔(Bear W. Parther, 23岁), R.基贝尔特(Gilbert Roberts, 28岁, 医生), O.詹姆斯(James Owen M. Roberts, 45岁, 英国陆军军官, 因曾在英印军队中工作过, 熟悉尼泊尔情况, 美国队特聘他负责组织夏尔巴向导和搬运队), E.威廉(William E. Siri, 44岁, 生理学家, 负责登山科学考察), R.詹姆斯(James Ramesy Ullman, 55岁, 作家, 负责登山全过程记事), F.威廉(William F. Umsoela, 36岁, 哲学博士), W.詹姆斯(James W. Whittaker, 33岁, 负责登山装备)。

美国队雄心勃勃，要创造一项从两条路线上山的记录：一路沿瑞士人和英国人曾使用过的沿孔布冰川经洛子峰南坡上到南坳，然后沿东南山脊直取顶峰；另一路从孔布冰川冰瀑区下方的罗拉山口登上西山脊，冲击顶峰，两路同在顶峰会师。

1963年2月3日，先遣队从旧金山飞往印度，13日从加尔各答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开始进山前的各项准备和招雇向导、搬运工；14日，全体队员和物资均已到达设在孔布冰川侧碛海拔5425

米的基地营；15日，队员开始适应性训练。3月25日，第1号营地设在冰川上方海拔6160米处，在孔布冰川西侧碛海拔6500米处设立了前进基地⁸，实际上这是第2号营地，因为它要兼顾东南山脊路线和西山脊路线，这里要存放更多的食品装备和燃料。东南山脊一路的第3号营地设立在洛子峰南坡上、海拔6980米处，第4号营地设在南坳稍下方、海拔7950米处。4月16日，建好了第5号营地，在南坳上方海拔8000米处，然后在东南山脊海拔8370米处设立了第6号营地，这里距顶峰的高距只有478米。

4月16~27日，西山脊一路的各号营地相继建成。第3号营地设在海拔7350米处，是一个山脊的肩部，地势比较平坦，但从这里再向上走，就是一道又宽又陡的雪坡了，雪崩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只好在这里建立一个物资仓库帐篷，人不住这里，以免危险；第4号营地只好再向上躲过这一段危险地区，在它的上方有岩石的地方设立，海拔高度是7650米。最后一个突击营地(第5号营地)设在西山脊上海拔8300米处，这里与珠峰顶上的高距是548米。

东南山脊一路进展比较顺利，4月27日，第一突击组从2号营地(前进基地营)开始向上，准备向顶峰冲击。他们从3号营地开始用氧，这个组由队长迪连弗斯、摄影师丹尼尔、W.詹姆斯和8名夏尔巴向导组成。他们刚刚离开3号营地不久，摄影师丹尼尔就因脑血栓由两名夏尔巴向导护送下山，剩下队长、W.詹姆斯和6名夏尔巴向导继续前进。队长迪连弗斯自己担负起摄影的任务，而W.詹姆斯是位身高1.95米的大个子，队长称他“大詹姆”。30日，8名夏尔巴向导背负物资从南坳向上方运送，由于雪坡危险太大，他们在途中用冰镐铲平了一块雪坡，支起两顶小帐篷存放食品和装备后，就下山了。5月1日，队长和大詹姆两人因夜间使用了氧气，睡得很好，清晨6:30就离开营地向上攀登了。当时风力很大，而且不断刮起浮雪，视野很小，但他们还是到达了8660米的高度；上午11:30登上珠峰的南峰(8760米)，这里的风太大了，他们稍作停留，

4月16~27日，西山脊一路的各号营地相继建成。

下午1:00，也就是从清晨离开突击营地，经过六个半小时之后，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峰顶，成为登山史上第四批登上珠峰的突击队和登上最高峰的第七和第八人。



就继续顶着大风前进，顶峰就在不远的前方。下午1:00，也就是从清晨离开突击营地，经过六个半小时之后，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峰顶，成为登山史上第四批登上珠峰的突击队和登上最高峰的第七和第八人。他们立即在顶峰上将挂有美国星条旗的铝合金旗杆插在顶峰的冰雪中，摄影留念，并在顶峰上寻找1960年中国队放置的毛泽东主席半身塑像和其他纪念物，但没有找到。

迪连弗斯和大詹姆原准备在顶峰上多呆一会，以与西山脊上来的伙伴们会合。他们试着摘下氧气面罩，不用氧气，马上感到非常难受，但他们还是在没有用氧的情况下，下山走了188米的路程。由于所带氧气已经很少，他们只好减少每分钟的用氧量，这样下山就慢多了，从下午3:30一直走到夜里10:30，才下撤到6号营地，也



1963年美国队的攀登路线示意图。

就是说全天走了十个半小时。在这个过程中，队长迪连弗斯拍了照片，也拍了电影片。由于所带氧气已经消耗了一大半，第二突击组只好减少每小时的用氧量，这个组两天都是在这个6号营地度过的，他们要负责对第一突击组的支援，在8000米以上的高山上，他们用一会、停一会的间断用氧，至少度过了40个小时。

全队回到基地营休整了几天。原计划在顶峰会师，然后从西山脊登顶的人，要从东南山脊下山，这种形式的登山叫做“高峰纵走”，是1954年以后国际上兴起的一项攀登高山的新项目。其形式为：先登上一座高峰，然后沿这座高峰的主山脊向前，如果前边还有一座高峰，那就越过两峰之间的鞍部，登上第二座高峰，从第二座高峰的一侧下山；或者登上一座高峰后，不从原先上山的路线返回，而是从已登上高峰的另一侧下山，即再开创一条新的下山路线。这种“高峰纵走”是50年代初在苏联兴起的，因为苏联国内没有7500米以上的高峰，他们就用连续登上两座或更多的山峰来增加攀登难度。1956年日本人把它运用到喜马拉雅山来了，从而为国际高山探险活动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开创了一个新的项目。

美国队在基地营休整期间，检查了氧气储存和食品，认为如果要按原计划，两路上山，在顶峰会师，然后交叉下山，现存的氧气是不够用的，必须采取间隔用氧，或减少每分钟用氧量（原计划是7800米以上行走时每分钟一立升氧，睡眠时每分钟0.8立升氧）。否则，就无法实现原计划；而且，夏尔巴向导也得重新调整，因为他们也有不少伤病者。

5月16~17日两天，西山脊一路阿兰、基尔贝特和4位夏尔巴向导的突击组，已经到达7650米的高度，并建好第4号营地，但这两天夜间和白天，强烈的大风，使他们无法活动。大风随时都有把他们连人带帐篷吹到西山脊右侧、中国西藏一侧万丈深渊的危险，他们只好将队员们和夏尔巴向导的帐篷紧紧地连在一起。就这连接的过程也非常危险，走出帐篷的人必须用登山绳先将自己的胸

125
大风随时都有把他们连人带帐篷吹到西山脊右侧、中国西藏一侧万丈深渊的危险，他们只好将队员们和夏尔巴向导的帐篷紧紧地连在一起。

经过两天的休整后，西山脊组再次离开基地营上山。他们原先设置的阿兰等人的4号营地已空无一物，就连绑在岩石上的汽油筒都被吹跑了，可见风力之大。



腰保护带连接，并用钢锥固定在岩石上，才能行动。在他们稍上方的另一组，霍恩拜茵和F.威廉组成的突击队越过4号营地继续向上攀登，也因风力太大不得不返回4号营地，他们原先建好的营地上帐篷和食品等，早已被强风吹得无影无踪了。霍恩拜茵和F.威廉只得也下到阿兰等人的4号营地，与他们一起，相互保护着下山。幸运的是，4位美国队员和4位夏尔巴人都安全返回基地营，与队里的其他队员一道，在这里进行休整、恢复体力，以便下一步顶峰会师。

东南山脊路线和西山脊路线，两路登顶队员在顶峰会师，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不但要靠队员们的拼搏，夏尔巴向导们的大力协助也非常重要，但难度还是很大。

经过两天的休整后，西山脊组再次离开基地营上山，他们原先设置的阿兰等人的4号营地已空无一物，就连绑在岩石上的汽油筒都被吹跑了，可见风力之大。没有办法，只好重新搭建。5月21日，他们在8300米处建好5号营地，本来计划是在7650~8300米间再建一个营地的，但由于地形太复杂，且风力强烈，他们只好上到这里建立营地。这里距顶峰只有548米的高距，距东南山脊组的6号营地只有100米高距。这时，霍恩拜茵发现在他们左侧有一个宽50米、长20米的岩石棚，可以容下他和F.威廉两人宿营，于是就在这里设立了6号营地。这时，东南山脊的6号营地里，C.巴瑞和G.卢泽正在等候霍恩拜茵两人从西山脊上来。

5月22日7:00，霍恩拜茵和F.威廉离开6号营地，沿西山脊向上攀登，但前边的山脊上出现了一条陡直的岩柱，其左右两侧又都是陡峭的岩壁，头脑冷静的霍恩拜茵发现6号营地左侧——这里已是中国国境了，有一条很大的岩石沟，从沟中向上看，不但有许多可以抓握的岩石支点，而且沟里的风很小，他们俩就离开西山脊，做好主绳的保护后，慢慢地移动到左侧，转向这条大岩沟。进到沟内，向上竟然能够看到珠峰的南峰！这更增添了他们上攀的勇气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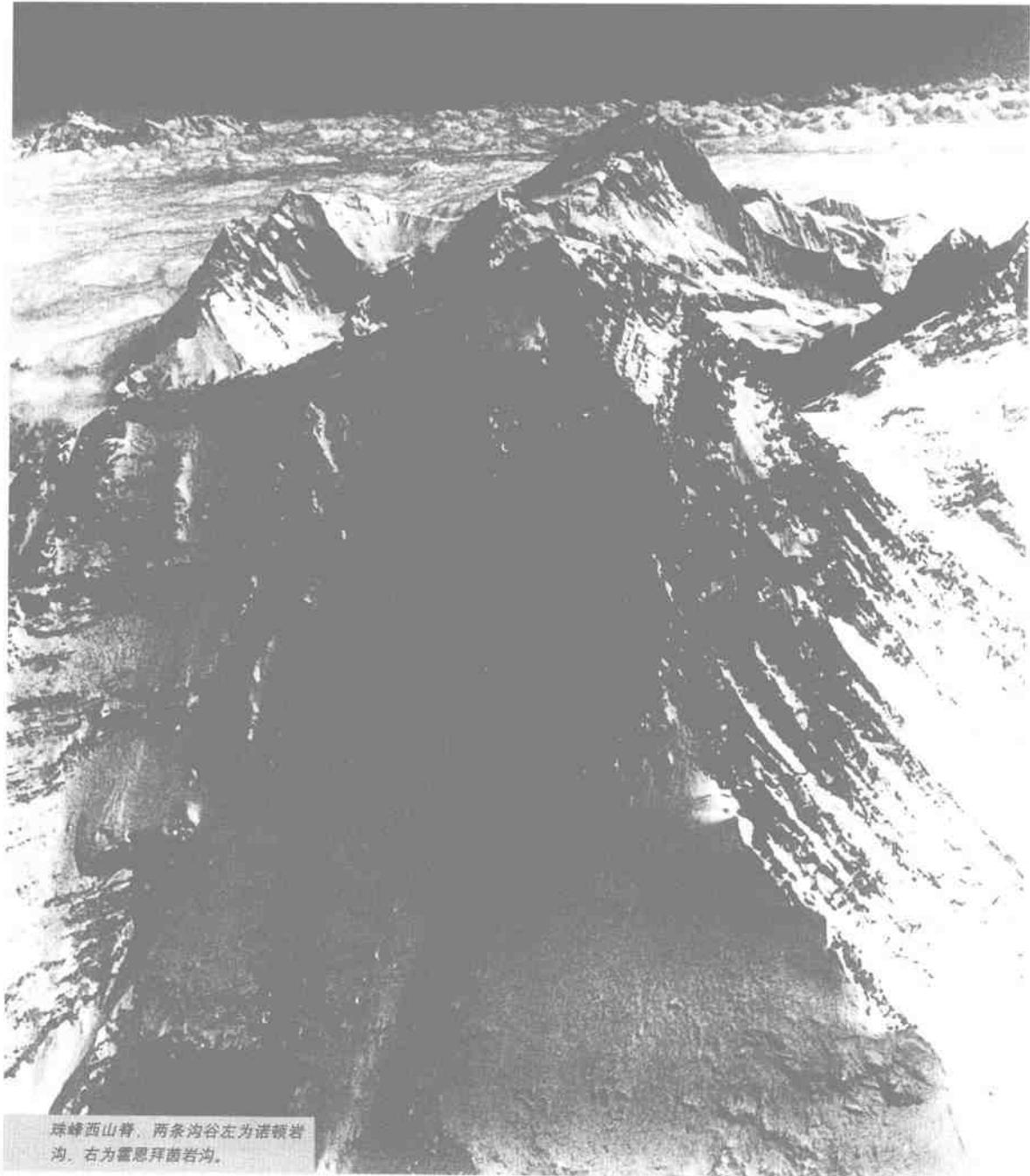
信心。他们不断地用岩石钢锥和主绳保护自己在岩沟内安全上攀，攀着攀着，突然看到了峰顶上冰雪地中插着的星条旗，在明媚的阳光中哗啦哗啦地飘扬着！下午6:50，他们俩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峰顶。从岩石棚下的6号营地出发算起，他们用了11小时15分钟，这就是美国人开创的攀登珠峰的新路线。无疑，霍恩拜茵与F.威廉是历史上第六批登上珠峰的勇士。

东南山脊一路的第二组C.巴瑞和G.卢泽，22日早8:00出发，下午3:30登上顶峰，比霍恩拜茵俩早近3小时，成为第五批登上珠峰的勇士。霍恩拜茵和F.威廉攀登途中所见的美国国旗，就是他俩插挂的。他们在顶峰上迟迟不见霍恩拜茵等上来，不得已下撤，于下午8:00回到8625米处，因天色已暗，他们掏出电筒不断向霍恩拜茵俩可能出现的地方照射，并呼喊，但两个多小时过去，仍不见任何回音。此时霍恩拜茵两人的手电筒中的电快用完，他们也在逐渐暗淡的电筒光中寻找着巴瑞等。所幸终于在黑暗



1963年5月22日，从珠峰西山脊登上珠峰顶峰的霍恩拜茵。他发现的这条攀登岩沟，后来被称为“霍恩拜茵岩沟”。

探险珠峰 ◎ 西藏珠峰大本營



珠峰西山脊，两条沟谷左为诺顿岩沟，右为雷恩拜岩沟。

中听到了彼此的呼唤，下到东南山脊的6号营地，与巴瑞会师了。虽然不是在顶峰，而是在顶峰南部下方海拔8625米的6号营地，但总算是会师了，实现了美国队的原定计划，这也是当时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的一件大事。



细心的霍恩拜茵
因为发现了“霍
恩拜茵岩沟”而
使美国队西山脊
路线成功。

虽然不是在顶峰，而是在顶峰南部下方海拔8625米的6号营地，但总算是会师了，实现了美国队的原定计划，这也是当时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的一件大事。

美国队这次只有E.约翰在南坳附近砍冰台阶时，不幸滑坠身亡。

5月24日夜间，西山脊登顶的全体队员和夏尔巴向导都安全地从东南山脊返回了基地营，除霍恩拜茵没有伤病之外，巴瑞等3人脚趾都冻伤，被立即送往南芭巴扎尔机场，从那里改乘飞机送到加德满都医院治疗，F.威廉的脚趾已全部冻伤坏死，不得不切除。

美国队最后结算全部费用，总计405263美元。

美国队实现了首次从两条不同路线登顶并会师的壮举。这是二次大战后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第七支登山队。美国队这次只有E.约翰在南坳附近砍冰台阶时，不幸滑坠身亡。

从珠峰滑雪下山的日本人

1965年3月，由科里(M.S.Kohli)率领的第三支印度军事珠峰登山队一行9人，在大批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的协助下，于5月22日、24和29日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⁹分三批共6人(其中3名夏尔巴向导)登顶成功。这是印度军事登山队首次获胜。此前1960年5月和1962年5月的两次都失败了。印度陆军在其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设有军事登山学校，专门培训在山地作战的印军军官。

此后，在1965~1968年，珠峰的登山探险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原因是当时逃亡国外的西藏叛乱分子频频抢劫前来尼泊尔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各国登山队，使得登山家们谈虎色变。尼泊尔政府下令封锁了珠峰山区，暂时禁止外国队前来登山。尼泊尔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幅减少。以后尼泊尔驱逐和肃清了境内的西藏叛乱分子，于1968年8月19日宣布重新开放，尼泊尔一侧的喜马拉雅山区才又热闹起来。

1966年5月，中国队对经北坳沿东北山脊登顶的传统路线进行了侦察，发现北坳下方的地形有了很大的变化，难度和险度都远比1960年时大得多，也复杂得多。这次侦察是为1967年正式攀登做准备，但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活动随即陷入停顿。



霍恩拜因
岩沟与绒
布冰川。

这年秋，日本又派来了以宫下秀树为队长的珠峰西南壁登顶路线侦察队，他们尝试着从珠峰的西南岩石陡壁(坡面)上，登上了海拔8050米的高度。

1969年春，由藤田佳宏率领的日本山岳会珠穆朗玛登山队的侦察队，前来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坳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和他们要开创的珠峰西南壁登顶路线，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侦察活动。这年秋，日本又派来了以宫下秀树为队长的珠峰西南壁登顶路线侦察队，他们尝试着从珠峰的西南岩石陡壁(坡面)上，登上了海拔8050米的高度。

1970年5月，由日本登山界元老松方三郎(Matsukata Sanro 1899~1973)率领的首支日本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39人(其中9人是电视、报纸和电台的记者)，集中了日本当时最优秀的高山登山家，其中有医学、生理、气象、地球物理和无线电通信等专家。从年龄结构上看，20~39岁的27位，40岁以上的只有3人，除队长71岁以外，带领突击队员登顶的突击队长大塚博美(Hiromi Ohtsuka 45岁)曾登上过海拔8256米的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Manaslu)，突击队员住吉仙也(43岁)本人是外科医生，但多次参加喜马拉雅高山登山活动，此外全是40岁以下的队员。应该说，这个年龄是攀登高峰最合适的角度。

日本队是由日本最大的登山组织、成立于1914年的日本山岳会派出的，这是日本首次向世界最高峰挑战，要开创一条从珠峰的西南壁上登顶的路线，难度和险度都是相当大的。这当然也是当年的奇迹，因为美国人于1963年开创了西山脊的登顶路线，并发现了西山脊新路线，从这条路线和东南山脊路线登顶，同时在顶峰会师完成“高山纵走”。日本队决心创造一项比美国队还难还险的记录，队员要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空中攀登非常陡峭的悬崖峭壁，为此必须事先做好侦察工作，研制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攀登岩壁的特殊装备，特别是供氧装备。这样，他们需要的资金也就比美国的要多。所以，日本山岳会和日本喜马拉雅协会，全国最大的三家报纸《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以及日本广播公司、日本广播电视台(NHK)等为此向日本全国中等以上的公司、企

业、银行、大报社、保险公司和大富豪们，共计1000多家单位和个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共募得1146.4万日元，合100多万美元。募捐活动从1968年开始，两年之内取得如此效果，是很不错的了。

高山探险的成功与否，人们都说三分在人七分在天，因为天气是成功与失败的最关键问题。所以日本队早在1969年春就派出了侦察队。侦察结束后，日本队又特别留下植村直己（28岁，曾单身一人登上过西欧、北美和非洲的最高峰，并单身一人直闯北极点探险）等两人，在1969年春到1970年春日本大队进入基地营的前一年，住在珠峰山下观察珠峰的气象变化，研究其变化规律，为正式登山把好气象关。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除了我国珠峰登山队1959～1960年曾派气象专家住在珠峰脚下观测珠峰全年的气象变化之外，日本人是第二支这样做的登山队，其效果确实也是很好的，对第二年的攀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气象变化规律。

日本队的食品、装备总重达30吨，从国内空运、海运到印度，用小飞机或汽车运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再运往登山基地营。雇用了516人的夏尔巴运输队，还包租了一架一次可以运送500公斤的小型运输机，从1970年2月7日起连续运送了10天，将所有物资运送到丹勃齐（Thyangboche）小机场，这在世界高山探险史上也是头一回。这些物资再由夏尔巴人从机场运

1969年，日本派驻珠峰南峰山脚观测，准备一年，次年随日本队成功登顶的著名登山探险家植村直己。他是当时登上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第一人。



高山探险的成功与否，人们都说三分在人七分在天，因为天气是成功与失败的最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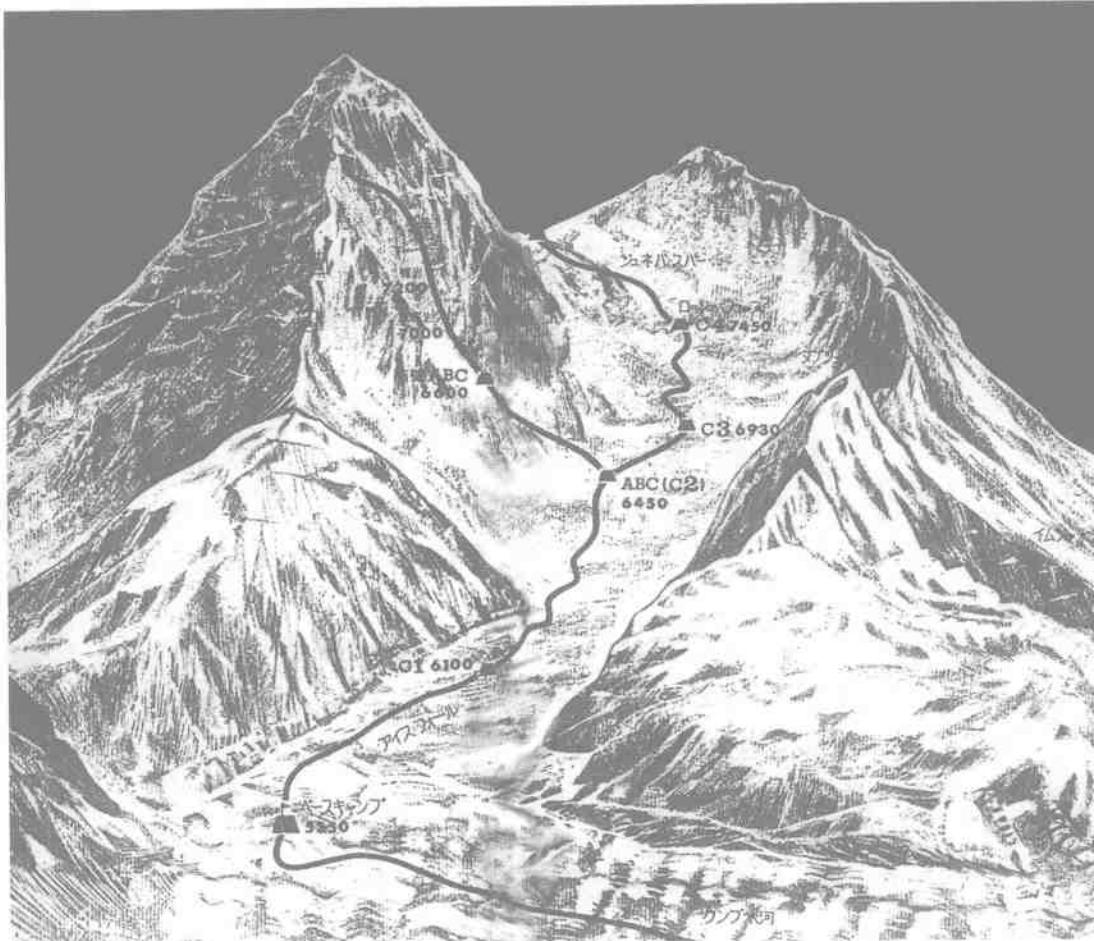
到基地营和1号营地以及高山上的其他营地，1号以上各号营地的物资总重达5.1吨。可以说，这是一支相当大的登山队。

日本队兵分两路，但主要的力量用于西南壁一路，因为这是他们要开创的新路线；另一路是保证可以实现登上世界最高峰而选择的安全可靠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计划两路人马在顶峰会师，创造一项超过美国队1963年成绩的新记录。

日本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这支珠峰队的活动。日本外交部不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尼泊尔政府给以关照，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还动员了在尼泊尔的日本商人和侨民为登山队提供各种方便，效果也确实都很好。日本队的物资和人员一到加德满都，驻尼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运输、住宿以及转运等一切事项。从1970年2月2日直到3月6日，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队所有30吨食品与装备都陆续运抵加德满都，3月6~19日，这些物资又都运抵基地营。

日本队在孔布冰川下游的向东拐弯处建立了基地营(海拔5350米)，然后沿孔布冰川向上对准洛子峰的南坡面前进，在孔布冰川海拔6100米处建立1号营地。为了能够兼顾两条路线的供应和人员休整，在孔布冰川上游海拔6450米处建立前进基地营。沿东南山脊上山的一路，继续从洛子峰南坡上山，在6930米处建立第3号营地；4号营地建在7450米的洛子峰南坡面上，然后登上南坳，在此建立第5号营地。从此沿东南山脊登顶。6号营地建在珠峰的南峰(8763米)下方8513米处，这也是东南山脊一路的突击营地。

西南壁上山的一路，是从海拔6450米的前进基地营向左登上西南壁的坡面，他们又在南坡上海拔6600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西南壁路线专用的前进基地营，因为从6450米的共用基地营通向西南壁的道路十分陡险，往返运送食品和装备比较困难和危险，不如一次多用些人力，多架些保护绳索，将物资运到6600米处的缓坡上。西南壁一线的4号营地建在7000米的陡坡上，这里有一条长



而突起的岩石，远远望去像一艘军舰，日本人给它取名“军舰岩”；再向上，坡面上有一块形似蝴蝶的岩石可以宿营，日本人称之为“蝶岩”，海拔高度是 7200 米，再往上稍左就是西山脊了。日本队拟将突击营地建在海拔 8050 米的西山脊上，就是从西南壁又转向西山脊。

日本队于 3 月 10 日前已将全部物资运抵 5350 米处的基地营，队员们开始进行适应性行军和向上方各号营地运送食品、燃料和各种装备。为解决由于缺氧而发生的各种高山病，日本队准备了一个

1970 年日本队登顶路线示意图。

西南壁一线的 4 号营地建在 7000 米的陡坡上，这里有一条长而突起的岩石，远远望去像一艘军舰，日本人给它取名“军舰岩”。

他们计划随登山队一起，登上珠峰后，脚踏滑雪板下山，开创一个攀登世界最高峰并从顶峰滑雪下山的新记录。

仿照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球用的氧气仓，其形状像中国北方农村称量谷物用的斗，里边充满氧气，放在基地营。把由于缺氧而患高山病的病员放入氧气仓中，使其恢复健康，这确实是个新事物，效果也很好。

3月12日，第一组的藤田、松浦、神崎、植村、安藤、伊藤、大森等7人，配备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各4人，从基地营出发。后来又增加了搬运工19人，将18件装备和食品、燃料运到两线共用的前进基地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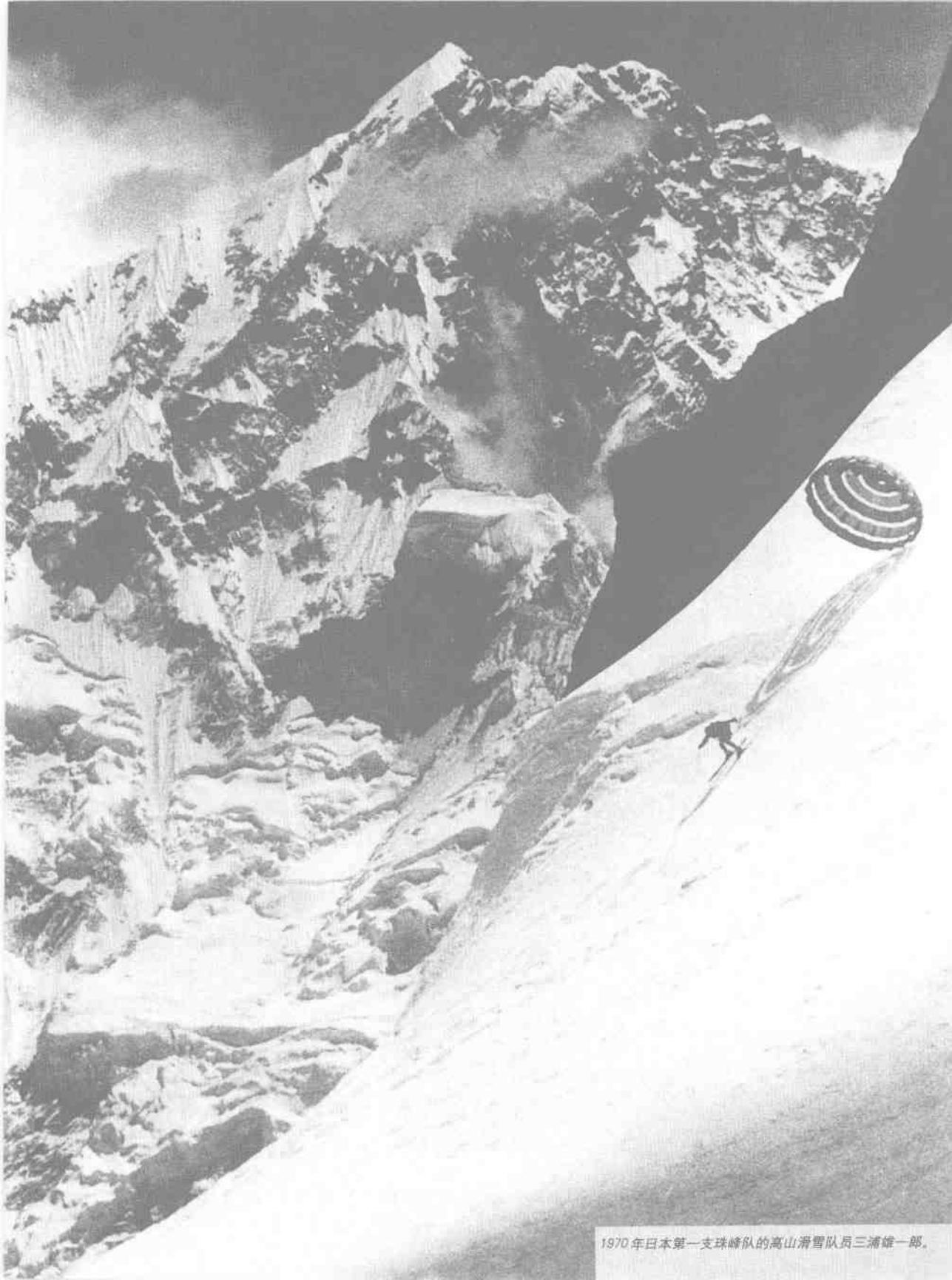
3月13日，第二组的大塚、平林、平野、锦织、鹿野、井上、渡部(女)、成田、吉川、中岛、长田、中川等12名队员和第三组的住吉、松田、田村、土肥、神田、加纳、河野、嵯峨、小西、相泽和原田等11人从海拔2443米的地方登上4243米的高度进行适应性行军。

14日，背运460箱物资的夏尔巴搬运队，从基地营出发将物资运送到6450米的前进基地营。31日，南坳以下各号营地的物资全部运送完毕，全体登山队员都返回基地营休整。

这次日本队在登珠峰的同时，还有一支由三浦雄一郎(Miura 35岁)率领的32人高山滑雪队。这是一支由公司职员、高山探险爱好者和电影、电视摄影师组成的高山滑雪队。他们计划随登山队一起，登上珠峰后，脚踏滑雪板下山，开创一个攀登世界最高峰并从顶峰滑雪下山的新记录。加上登山队的39人，日本队的总人数是71人，可以说它是历史上第二支最大的珠峰队(第一支大队是1960年的中国队，100多人)。

4月4日，日本队建好1号营地，14日建好西南壁专用的前进基地营，17日西南壁一路又建好3号营地，但4月9日一位名叫嘎科次仁的夏尔巴向导不慎在背东西上坡途中被冰崩下来的大冰块砸死。

4月20日，东南山脊一路队员平林和神崎二人，在向洛子峰南坡面前进时不慎滑坠了60米，所幸仅受了些轻伤。平林用翻身自



1970年日本第一支珠峰队的高山滑雪队员三浦雄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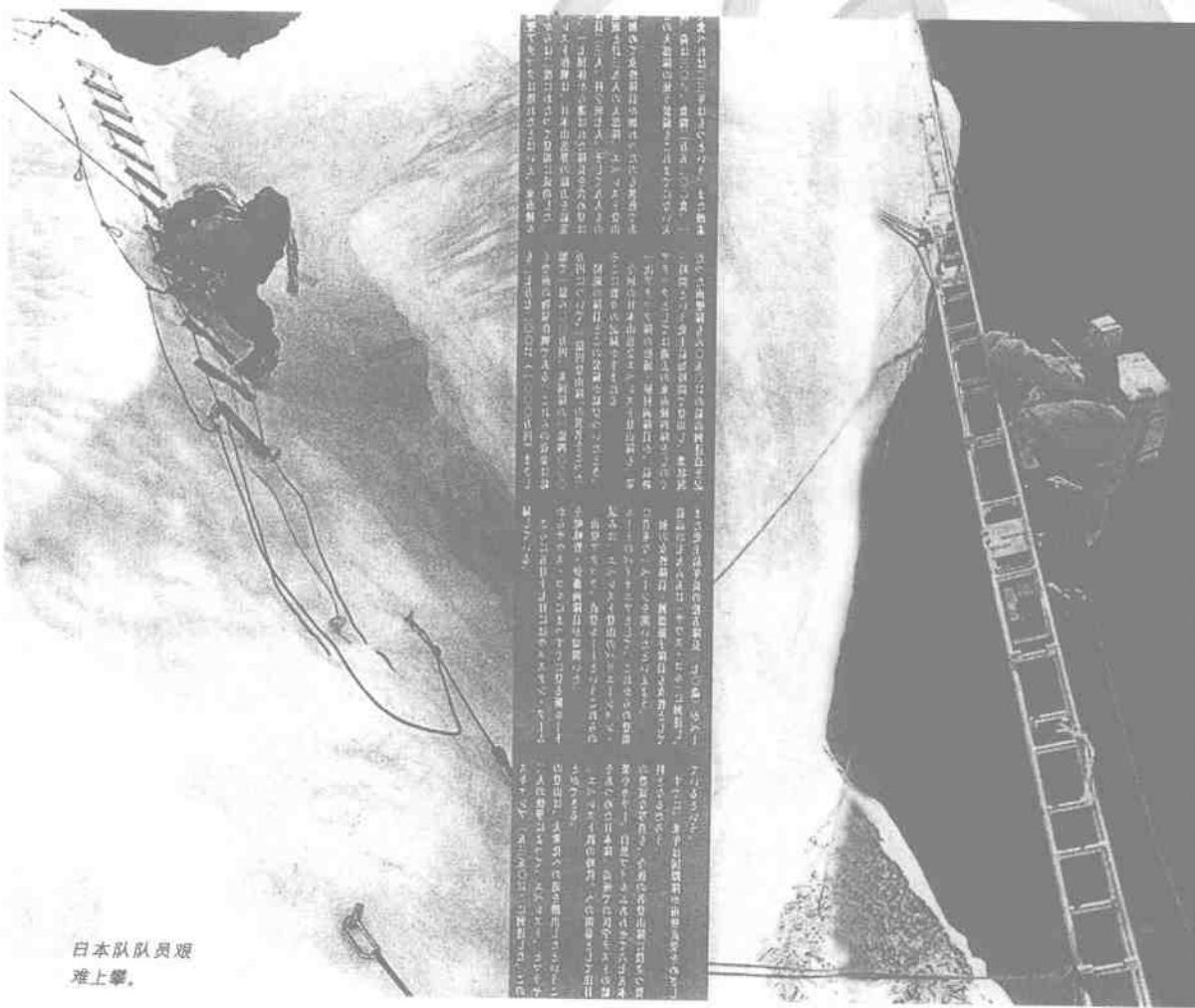
探险珠峰

5月5日，为在顶峰实现会师，决定东南山脊第一突击队由植村和松浦(35岁)组成。

救法，紧压冰镐尖头阻止了下滑，挽救了自己和神崎。21日，队员成田(Narita 28岁)因患肺水肿抢救不及时死亡。

5月5日，为在顶峰实现会师，决定东南山脊第一突击队由植村和松浦(35岁)组成。8日，西南壁一路第一突击队由小西(Konisi 31岁)和吉川(27岁)组成，并命令他们从西南壁的7500米的4号营地上到7800米的高度后，返回7500米的4号营地待命。

10日，植村和松浦两人从8000米的南坳登上8513米，并决定



日本队队员艰难上攀。

在这里建立最后一个突击营地，而在西南壁上的加纳(Kana 29岁)和嵯峨(Saka 25岁)已到达8050米的高度。但是，这一天西南壁一路的中岛(Nakasima 31岁)的右脚和加纳的腰部都被滚石砸伤，但他们还能坚持上山。

11日，东南山脊一路的植村和松浦于清晨6:10离开突击营地，向顶峰冲击，三个小时后的9:10，登上珠峰之顶。这是历史上第六次登顶成功，也是日本登山史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尤其是植村，他已先后三次参加过攀登珠峰的活动，前两次都失败了，只有这第三次才取得成功。他是日本队里最能吃苦耐劳的，为了这次登



日本队员上攀。

这是历史上第六次登顶成功，也是日本登山史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一直到登上珠峰顶峰为止，从未离开过珠峰地区一步。

顶成功，他头年春天就一直留守在珠峰脚下，住在夏尔巴人的家里，在这里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观察珠峰的气象变化，坚持每天做记录，一直到登上珠峰顶峰为止，从未离开过珠峰地区一步。他的成功，也是上天对他的奖赏吧。

12日，东南山脊一路的第二突击队，在队员平林和夏尔巴向导

祭悼死难的日本队员
和夏尔巴人。



乔达列的支援下也登上了珠峰。可惜的是，此时西南壁一路的突击队却无法从8050米的西南壁继续向上，因此西南壁一线宣告失败。

日本队没能按计划两路在顶峰会师，但有3人从东南山脊一路登上顶峰，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当然，他们的损失也不小，28岁的队员成田洁思在带领夏尔巴向导运输途中，突然患肺水肿死亡，另有一位夏尔巴人也滑坠身亡。日本高山滑雪队的32人，在登上海拔8000米的南坳之后，已很难继续前进。4月8日，他们就从南坳滑雪下山，仅用了15分钟，就从南坳上方滑到6400米的2号营地附近，再往下是冰瀑区，无法使用滑雪板而中止行动。但他们却由此开创了一项从8000米向下滑的高山滑雪新项目，也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记录，过去最高的高山滑雪记录是从7100米的高山上往下滑的。这支创造了世界记录的日本队，在登上8000米的南坳过程中，4月5日下午4时许，支援他们的夏尔巴高山向导，却因在南坳下方通过孔布冰川冰瀑区时遭遇冰崩（在5700米附近），6位夏尔巴人无一幸存。

此次活动日本队死3人伤5人。日本队和1963年的美国队都代表了攀登珠峰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从更难更险的路线攀登顶峰的新时代。

多国联合登山队鲜能成功

1971年春，由美国N.G.迪连弗思率领的一支由13个国家（美、英、法、日、意大利、西德、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士、尼泊尔）的32位队员组成的国际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前来攀登珠峰。日本队员有两名，一位是植村直己，另一位是伊藤礼造（Yi To）。他们于4月18日在孔布冰川海拔5350米处建好基地营。

这支国际队伍分两路，计划一路从西山脊上山登顶，另一路仍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并争取两路在顶峰会师。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计划。但是，国家多了，队伍大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许

此次活动日本队死3人伤5人。日本队和1963年的美国队都代表了攀登珠峰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从更难更险的路线攀登顶峰的新时代。

多国家的队员都没能按时到达基地营。从东南山脊登顶的一路，只有两位日本队员植村和伊藤登到8500米的高度，其他外国队员都只到达南坳附近，就自动下山了。当然，1971年珠峰地区从4月9日起，天气就一直不好，风雪很大。而西山脊一路，仅仅到达7200米，就因参加登山的印军少校巴胡古纳(H.V.Bahuguna)，在开路过程中被冻死在7200米的西山脊上，而引起队内混乱，有人准备撤退，有人坚持上攀，开了两天会，意见不能一致。两位法国人首先离队下山撤出，接着队长迪连弗斯等人也于5月3日返回加德满都。

这个国际杂牌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如日本队员植村直己后来回忆起这次联合登顶所说的：“队长指挥不了队员，各国队员自己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谁不想干了，中途就返回基地营，而且也不讲一声就离队回家了，完全是乌合之众，不用说是攀登世界最高峰，做任何事也都不可能成功……”这个国际队就这样今天走一个，明天又走三四个，失败了。

从历史上看，一两个国家的联合队登珠峰，在统一指挥、团结协力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成功的。如果国家多了，再加上队长没有威望，说话没人听，又不能团结互助，就很难成功了。史实也告诉我们，国家多了，本来就很难团结一致，也就很难在一件事情上取胜。

1971年秋，还有一个由托洛萨(H.C.Tolosa)为队长的18人阿根廷珠峰队，从尼泊尔一侧东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10月30日到达东南山脊8504米处，遇暴风雪袭击，不得不下撤而宣告失败。

1972年春，德国高山生理学教授海茵利希考费尔博士(K.M.Henrikoffer Karlmazia1917-)率领的国际珠峰队，由德国、奥地利、瑞士、英国、意大利和伊朗6国队员组成，全队共24人。他们选择了1970年日本队失败了的珠峰西南壁路线登顶，但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各国队员不能在指定时间集中，有的早来了三天，有的迟到了一周甚至两周；而且每人只带各自的装备，缺乏集体使用的各种装备，该有的没有，经费也不充足。只有较早到达的

两位奥地利队员库茵(F.Kuen)和胡贝尔(A.Huber)于5月20日到达西南壁的8250米高度，就无法再上攀了。这种多国队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

综观世界各国所组织的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多国联合队，成功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希拉里解析意大利队

1973年春，一支由意大利军事登山学校(专门培养山岳部队)校长蒙兹诺(G.Monzino)上校率领的64人大型珠穆朗玛峰军事登山队，前来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珠峰。这64名队员是由意大利陆、海、空三军军官和警察部队以及海关缉私队的官兵组成。他们带来了3架军用直升飞机，5辆雪地运输车，还有绞盘机和雪地摩托车等现代化山岳作战、运输装备。所有高山上各营地的食品和装备都由直升机运送，有的地方用雪地运输车和绞盘机运输，并雇用了1500多位夏尔巴向导和搬运工。

意大利军事登山队，这次非常幸运，赶上了个少有的好天气周期，队员卡列尔(R.Carrel)、米佐(M.Minuzzo)等9人，先后分两批，从孔布冰川，经南坳，上东南山脊登上珠峰，这是珠峰登山史上，到1973年12月止，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一次。

队长蒙兹诺非常得意，他特别邀请首位登顶英雄、时任新西兰驻尼泊尔大使的埃德蒙特·希拉里参观他那配备齐全、全部军事化的登山基地营。当希拉里参观完，蒙兹诺喜滋滋地请他发表意见时，这位英雄说：“你们有9人登上世界最高峰，值得庆幸！但是，这不能算真正的高山探险(Aplinesm Expedition)¹⁰¹！高山探险是完全靠登山者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登上高峰。我们应当提倡真正的高山探险，像你们有这么多军事装备，有谁用得起呀？！……”

这次意大利所带来的3架军用直升机在运输中毁坏了2架，雪

10月26日，队员石黑久(Yisikuro)、加藤保男(Kato, 24岁，死于1980年5月)两人组成的第一突击组，从5号营地直取顶峰，16:30成功登顶！这是珠峰登山史上首次在秋季登顶成功。

地运输车大部分都被摔坏，原因是珠峰山区地形和天气变化都非常复杂。

日本队秋季登顶成功

1973年秋，由桥本龙太郎(Hasimoto, 36岁，他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后来担任日本首相。在欧美各国国家领导人参加高山探险活动的并不少见)率领的日本珠峰登山队，由48人组成，这也是一支相当大的珠峰登山队。

日本队这次仍想重温旧梦，像1970年那样，兵分两路，一路沿最保险的南坳经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一路从1970年未能实现的西南壁登顶，为了保证西南壁成功，将主力队员都放在了这一路上。

但是，日本队这次虽然制作了在8000米以上高度攀登岩石峭壁的各种特殊装备，如吸氧气管加长加粗，用大容量氧气瓶等。他们在沿孔布冰川一直向上，在洛子峰的南坡面、海拔7500米处建好第4号营地，9月30日在8100米处建好第5号营地后，当天夜间强烈的大风吹起，将位于7500米附近的一位夏尔巴向导连人带帐篷刮跑，桥本龙太郎总队长只好下令停止这一路活动，人员全部撤退，转而将重点放在东南山脊一路上。

东南山脊一路于9月4日在孔布冰川上海拔6100米处建成1号营地，9日在6700米处建立2号营地，18日在7000米处建成3号营地，27日在7500米处建成4号营地。但从28日起，一连两周的大风雪，使前进受阻。直到10月7日，天气稍稍好转，他们在8000米的南坳上方建立5号营地。正当此时，西南壁一路一再受阻，这样，日本队就将希望寄托在东南这一线上了。

10月26日，队员石黑久(Yisi kuro)、加藤保男(Kato, 24岁，死于1980年5月)两人组成的第一突击组，从5号营地直取顶峰，16:30成功登顶！这是珠峰登山史上首次在秋季登顶成功。

石黑久和加藤登顶后，立即下山，当晚在海拔8765米的珠峰南峰下过夜。他们所带氧气已全部用完，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抗寒，由于帐篷被大风吹走，加藤的双脚被严重冻坏。第二天，27日，支援组上来把他接下山去，后来他的10个脚趾被全部截掉。

西南壁的一路，只有森田胜(35岁)和重广恒夫(25岁)在10月28日，到达8380米高度。日本队来了32人，只有两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但他们却创造了一项秋季(雨季后)成功攀登珠峰的新记录。

1974年春，在劳连狄(J.I.Lorente)率领下，一支由12人组成的西班牙珠穆朗玛登山队，于4月16日到达珠峰南侧山下，这是历史上第一支西班牙世界最高峰登山队。他们计划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但是准备工作太草率，而且缺乏经验，第一组虽已到达南坳，但从这里再沿东南山脊向上必须具备的人工供氧装备和食品等物资却迟迟没有运上来。5月12日第一组已在8534米的高度上建好第6号营地，等待物资运上来后向顶峰冲击，这时一场大风雪来临，并持续了一周，西班牙队撤退，宣告失败。

1974年9月2日，由法国著名登山滑雪城、世界现代高山探险运动的发源地、法国莎莫尼市(Chamonix) 市长德沃阿松(G. Devouassoux)率领的法兰西登山学校学员珠峰登山队，全队10人到达珠峰南侧山下。他们选定1963年美国队霍恩拜茵等人所开辟的西山脊路线，计划从这条路线登顶。队员中有两位高山生理学家，他们要通过这次登山，试验人体在高空的各个不同高度上的生理变化。为此，特别制作了遥控心电图仪器，准备从山下开始，一段一段地测试队员白天、夜间在每一个不同高度上的生理变化、用氧不用氧的差别等一系列的科学试验。9月19日夜间，在海拔6400~6900米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雪崩，把正在6700米的营地里的队长德沃阿松和5名夏尔巴向导全部埋葬。法国队只好终止登山，宣告失败。

队员中有两位高山生理学家，他们要通过这次登山，试验人体在高空的各个不同高度上的生理变化。



首位登顶女英雄田部井淳子

1975年春，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队一行15位女队员，在队长久野英子(Kuno)率领下于3月16日来到尼泊尔一侧的孔布冰川下方，在5350米处建好基地营。她们雇用了35名夏尔巴向导和150位夏尔巴搬运工。



田部井淳子

这支日本女子队只有一位男性记者随行，计划沿孔布冰川先登上南坳，然后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

5月1日，到达8000米的南坳，一切顺利。但3~4日夜间，海拔6450米的孔布冰川上的2号营地上方，一场突来的大雪崩，把整个营地吞没，情况非常危险。好在积雪埋得不太深，在这里宿营的7名女队员和23名夏尔巴向导均得到了及时的抢救，脱离了危



1975年5月
16日，登上
珠峰的日本
女队员田部
井淳子。她
是世界上首
位登上珠峰
的女性。



险。但全部食品和物资都被深埋在积雪之下，难以挖出而损失掉。

副队长田部井淳子(Tanabe)一个人在夏尔巴向导安·次仁(Ang Tsering)的协助下，于5月16日，在东南山脊8500米处设第6号营地。19日晨，他们踏着齐膝深的浮雪前进，于13点30分登上顶峰！田部井淳子成为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女性！

其实，田部井淳子也是在6450米营地上被崩雪埋没了的7位女队员之一，获救后，其他女队员都表示不想继续上攀了，只有田部井一人坚持上攀，大家把自己背包里的食品集中起来给了她和那位夏尔巴向导，他们最终登顶成功。登山是勇敢者的运动，也是培养人们勇敢精神的运动，在关键时刻，敢于前进，就能取得成功；反之，不敢拼搏，前怕后怕，哪怕是只差一点点路程也畏缩不前，那就只有失败。田部井淳子被雪崩埋没获救后，并不像其他6位伙伴那样被吓倒，而是继续前进，最后她果然成功了！

中国觇标与梯子

1975年春，中国珠穆朗玛男女登山队，几乎与上述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队同时进入珠峰山下，只不过日本队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东南，而中国男女队在珠峰之北侧。

中国队由299人组成，这是我国第二支珠峰登山队，其中运动员125人(女队员38人)、测绘专家74人(为了测量珠峰的确切高度)、其他学科科考人员30人，还有通讯记者和后勤人员70人。西藏自治区政府还为登山队派遣了80名官兵和55名民工负责保安和低山运输，全队总人数达434人之多，算得上最庞大的登山队了。

这次登山仍沿北坳上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基地营设在绒布寺上方、海拔5000米处。

中国队总结了1960年的经验与教训，鉴于8680米处的“第二台阶”难于逾越，特意制作了5节长1.2米的铝合金梯，这5节梯



1975 年中国队
员身背金属梯子、觇标等从
“北坳”向上前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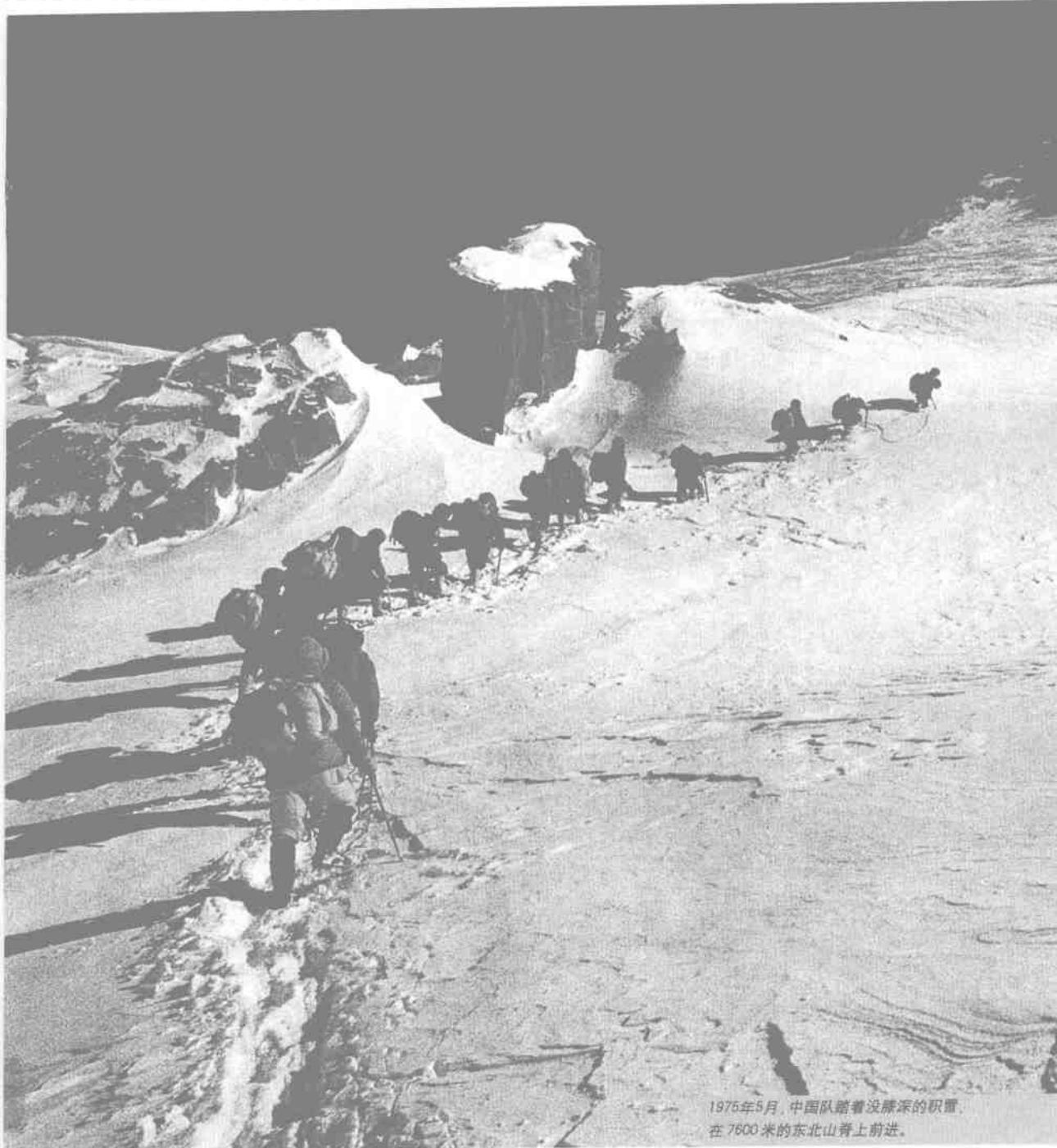
子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长达 7.5 米多的梯子，足以跨过“第二台阶”。此外，中国队还将几项科学考察和试验项目列入计划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实地测量珠峰高度。此前，珠峰共有 5 个不同的高度：8888、8882、8848、8840 和 8852 米。中国的高峰，中国人应该有准确高度，当然应该好好地测量一番。此外，还有人体在不同高度上的生理变化，珠峰的大气物理、地质结构、降水情况等课题。

这次分别在 5800、6400、7007(北坳)、7600、7800 和 8100、8700 米等不同高度上顺利建好各号高山营地。

探 险 珠 峰 ◎ 西 藏 地 区 高 山 气 象



中国队员通过 7600 米的大风口。



1975年5月，中国队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在7600米的东北山脊上前进。

3月18~24日,队员进行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和物资运输,共有133人,其中34名女队员参加了这次为期7天的活动,完成了从基地营到6000米、6500米的运输和建营,并将电话线从基地营架设到6500米的营地。

4月9~12日的4天间,队员们又将6000米营地的物资运往6500米,他们每天一次往返;另一批队员在此期间将6500米处的物资运往7007米的北坳上方营地,这些队员4天之内5上北坳,非常辛苦。

1975年
中国
队员在东北
山脊上。

4月13日,6位测绘队员登上北坳,进行重力测量。



4月17日，第一梯队47人，从基地营出发，登上6000米高度进行适应性训练；18日，第二梯队26人，其中女队员6人，从基地营出发，计划于当月25日登顶。第三梯队25人，其中女队员5人，在基地营待命，他们负责对第二梯队进行支援，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登顶峰。

东北山脊上海拔7450米附近是一个大风口，风大时，可将人吹倒和吹跑，跌进旁边的万丈深谷，这里是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的危险路段之一。5月5日，第一梯队20人，男队员17人、女队员3人和第二梯队13人，男队员11人、女队员2人登上大风口。由于风力很大，当时带队的副队长邬宗岳第一个冲到前边，趴在山坡上慢慢地向前移动，这样减少了大风将人吹倒的危险。由于大风是一阵一阵的，时大时小，所以风大时队员们们都学着邬宗岳的方法，趴在岩石坡上向前移动，风小时站起来向前走。就这样从上午9点到12点，他们走走爬爬，整整3个小时才前进了100米，可见行动之艰难。最后终于到达8200米和8600米的营地，并决定6日已到达8600米营地的第一梯队开始向顶峰突击。但是这天夜间却刮起了十级大风，6日日出后，大风有增无减，气温也下降到-30℃左右，队员米玛扎西带领突击队员继续前进，但他刚刚起步，女队员桂桑就昏倒了。他们所带的对讲机电池又已用完，无法与基地营取得联系，只得在营地上等候援助。7日下午，第一梯队在8600米的营地上已等候了50个小时，不得不下山，当晚在8200米的营地上与第二梯队会合。

就在第一梯队从8200米向8600米的营地上攀过程中，副队长邬宗岳在队列后边拍摄队员行动的电影片时，由于过度疲劳，突然昏倒，当时他身边没有其他人员，昏厥倒地时无人救护，因而从8300米的岩坡上滑坠遇险。他的遗体是队员们下撤时，在8100米处发现的，他的整个面部都被磨损得没有了。由于他的牺牲，这次突击顶峰的行动暂时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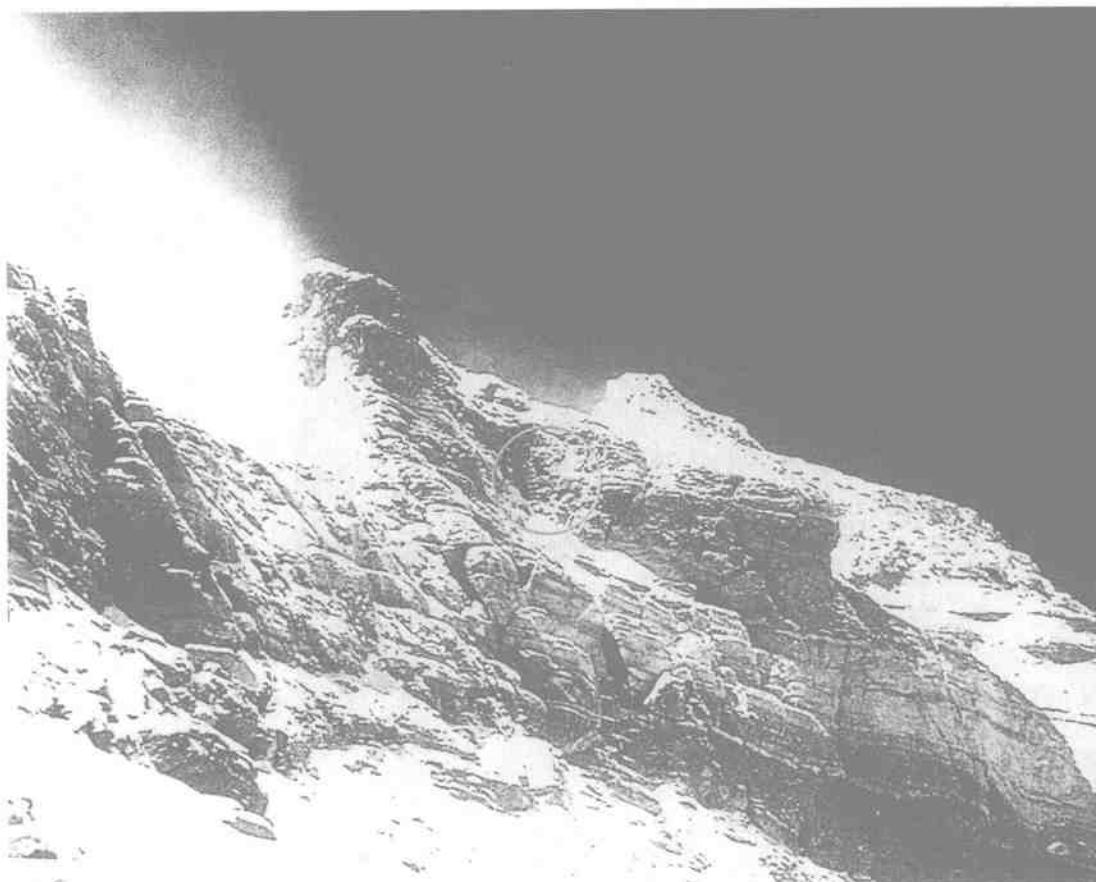
就这样从上午9点到12点，他们走走爬爬，整整3个小时才前进了100米，可见行动之艰难。

但由于前两个梯队的受阻，山上营地食品已经很少，氧气也不多了。



1975年在第6号营地，两名中国队员火线入党，成为珠峰探险史上又一盛事。

根据气象预报，5月8~10日会有3天较好的天气，中国队决定抓住这个好时机再组织一次突击顶峰。但由于前两个梯队的受阻，山上营地食品已经很少，氧气也不多了。留在8200米营地上9名队员重新组织冲击顶峰。在他们向8600米营地前进途中，仅仅上攀100米后，女队员昌措患上了高山病，只好由另一位队员拉旺护送她下山。当其他队员到达8500米，眼看就要到达下一个营地时，队员仁青平措也不行了，他的手被严重冻伤，队员罗则护送他下山。这时，突击队只剩5人。9日，5人继续前进，洛桑坚赞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法行动，只好将他留在8600米的营地帐篷中休息，其余4人继续前进，但他们却没有找到“第二台阶”，迷失了方向。这时又有两人突然昏倒，一位是成天亮，一位是王鸿宝。队员索南罗布和桑珠只好将两位病员护送到8600米的营地。就这样，第二次突击顶峰又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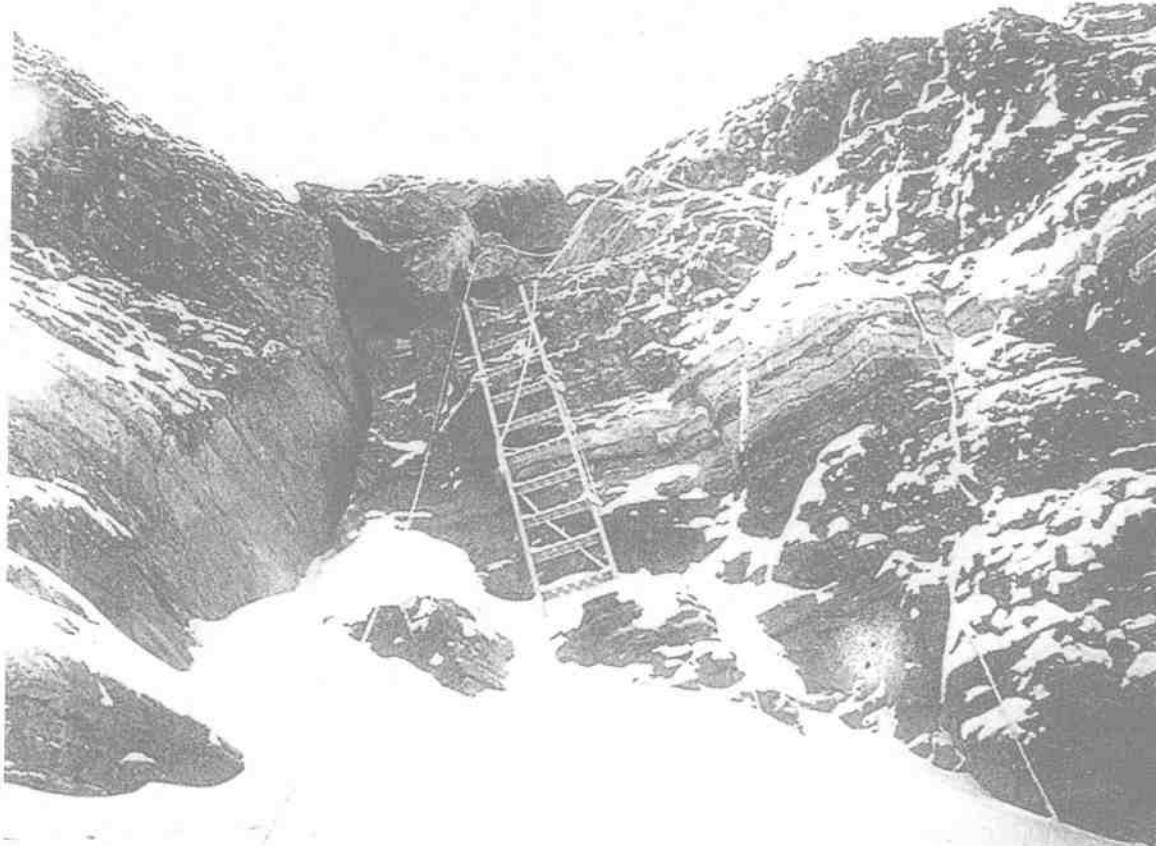


中国队员在
“第二台阶”
上安置的金
属梯位置图。

通过这两次突击顶峰，61名队员中减员达32人之多，特别是经验丰富的邬宗岳的不幸遇难，使登山队损失极大。另外，高山食品急剧减少，装备的损失也不小。要再组织突击队伍，比较困难。经过研究，登山队决定再次组织突击人员，由于减员比较大，除了重新调整突击队员之外，动员了全队包括炊事员、司机、科考人员、电台人员、气象人员、医生及其他后勤人员，凡能上山的都组织起来，为突击队向高山各号营地运送食品和装备。各族队员和科考人员以及所有能够上山的队员，竭尽全力，排除各种艰险，将物资运送到各号营地，完成了突击顶峰队员们所需要的食

通过这两次突击顶峰，61名队员中减员达32人之多，特别是经验丰富的邬宗岳的不幸遇难，使登山队损失极大。

20日起，暴风雪一连4天不断，队员们在营地里静待好天气的来临。



品、氧气及其他装备的供应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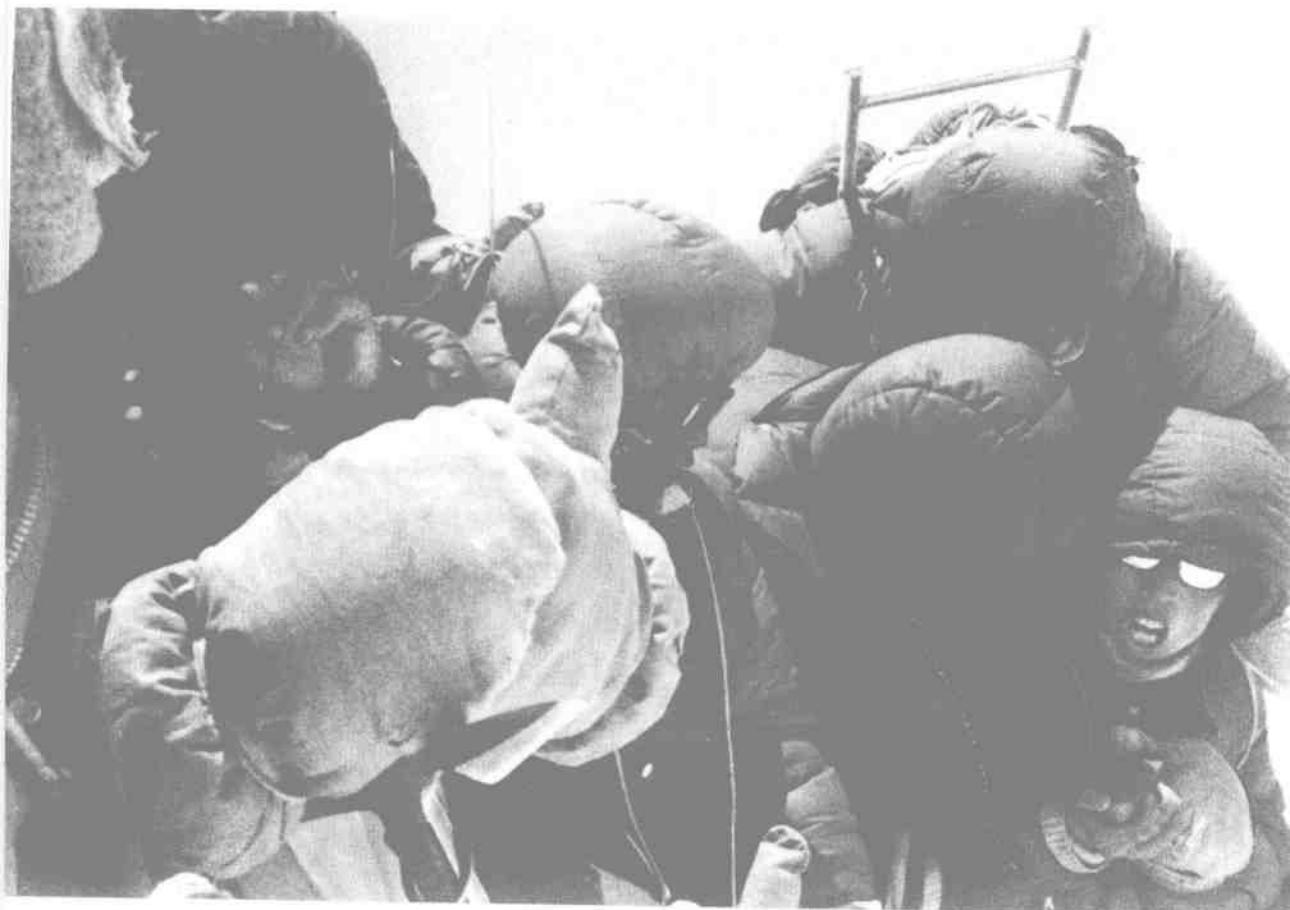
重新组建的突击队，由29岁的解放军战士索南罗布和37岁、富有经验的老队员罗则率队，共20人分作三组，做最后一次冲击。

第一组由索南罗布率领，队员4人，第三组由副队长嘎久率领，队员6人，于5月17日晨离开基地营上山；第二组共8人于18日离开基地营。在北坳上方，第三组减员一人，其余人员分别于20、21日到达7600米的5号营地。20日起，暴风雪一连4天不断，队员们在营地里静待好天气的来临。停留期间，他们研究了下一步的突击问题。由于减员不断，决定将原来的三个组，简化为两个组：第一组由索南罗布、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和



1975年5月27日，中国珠峰登山队的女突击队长潘多在8770米的“第二台阶”上方前进途中小憩。

第一组到达8680米的营地后，立即寻找“第二台阶”，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台阶，还发现了台阶岩壁上1960年屈银华打进岩石缝中的那个冰锥，更加确信这里就是“第二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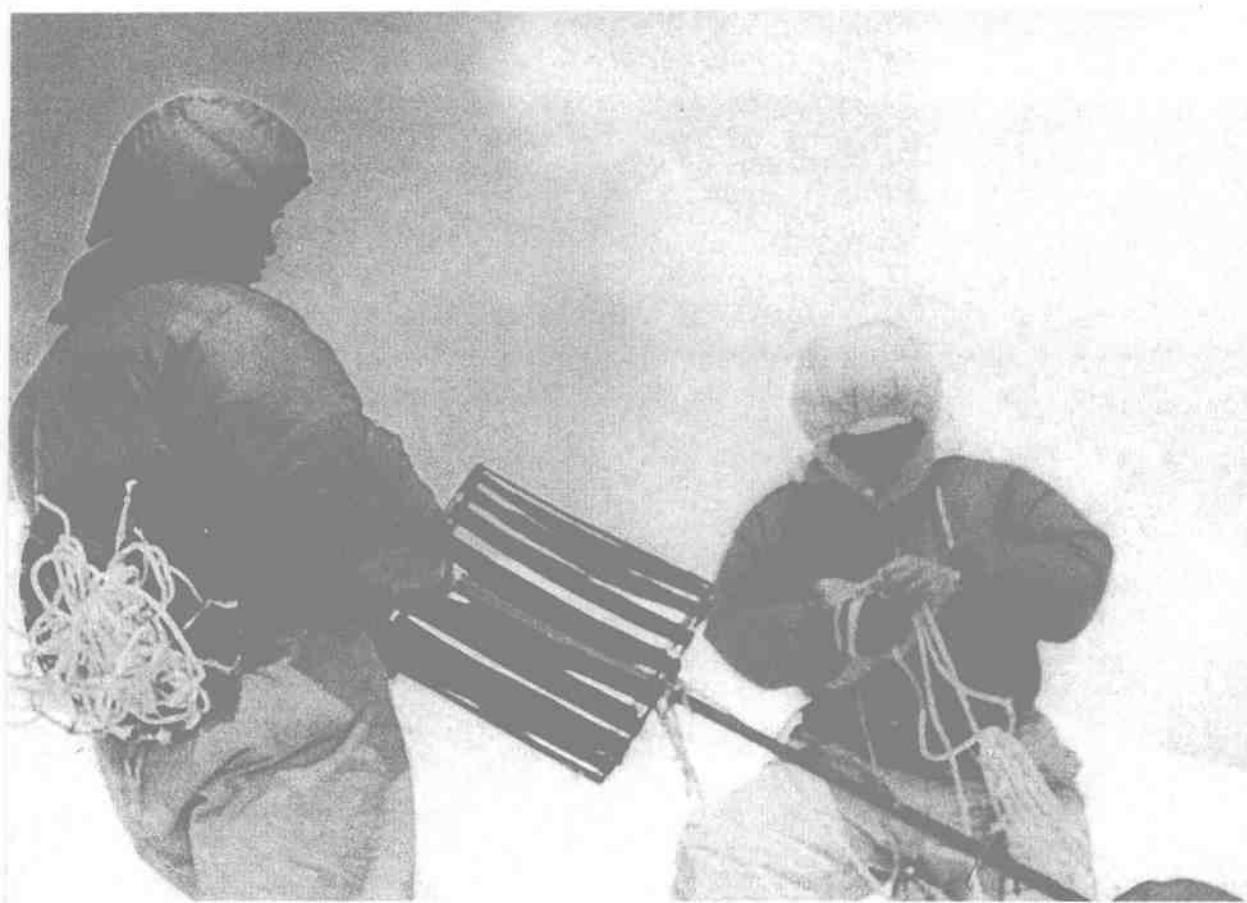


1975年5月27日。
“我们9个同志已
经胜利地登上了
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顶
峰！”队员侯生
福代表登顶队员
向基地营报告这
一激动人心的喜
讯。

杨久辉组成；第二组由女队员潘多、男队员侯生福、罗则、桑珠和阿布钦5人组成。

5月24日，下午1:00，第一组出发，直到下午6:00才到达8300米，当夜在此宿营。第二天，25日清晨，他们出发前往8680米处的6号营地(突击营地)时，杨久辉突然头昏头痛，只好将他留在营地上，其余四人继续前进，下午4:00他们到达最后一座营地。第二组的罗则和潘多两人于25日下午6:00到达8300米的营地。

第一组到达8680米的营地后，立即寻找“第二台阶”。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台阶，还发现了台阶岩壁上1960年屈银华打进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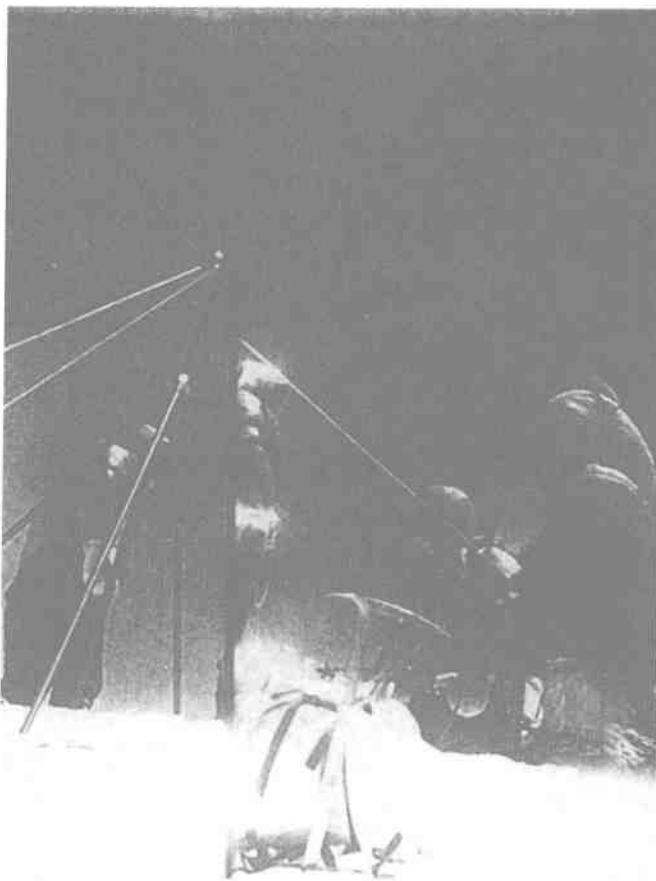
石缝中的那个冰锥，更加确信这里就是“第二台阶”。在仔细察看哪里可以支挂金属梯，哪里上攀更安全？……弄清一系列问题后，他们才返回营地，这时已是夜间9:00多了。

1975年5月27日，中国队在珠峰顶峰设置测绳觇标。

5月26日，珠峰8000米以上天空起了大风，在8680米准备突击顶峰的4位队员和在8300米的5号营地准备向突击营地进发的第二组队员们都没有行动，躲在帐篷里，等候大风停止或减弱。但是时间不等人，五月下旬，珠峰的雨季即将来临，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登上顶峰。于是，他们准备强行向顶峰冲击。这时，第二组的5位队员也来到这个突击营地，两组决定一同向顶峰冲击。

但是时间不等人，五月下旬，珠峰的雨季即将来临，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登上顶峰。

下午2时30分，全体队员集体登顶！这时的潘多，已经37岁，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成功，为世界妇女谱写了新的一页。



1975年5月27日，中国队在珠峰顶峰设置测经觇标。

他们先在“第二台阶”架起了连接在一起的金属梯，并用1960年屈银华打进的那个冰锥和他们这次又打进岩壁上的一个岩石钢锥，将长达7.5米的金属梯牢牢地固定在两条钢锥上，为明天的登顶做好准备。

5月27日上午8:00，由索南罗布、贡嘎巴桑、大平措和次仁多吉组成的第一突击组和潘多、侯生福、罗则、桑珠、阿布钦等5人组成的第二突击组共9人，从突击营地出发，冲向顶峰。他们非常顺利而安全地蹬着金属梯越过“第二台阶”，然后直向顶峰前进。下午2时30分，全体队员集体登顶！这时的潘多，已经37岁，还是



3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成功，为世界妇女谱写了新的一页。

登顶后，他们9人在顶峰上收集了岩石标本和两瓶冰雪标本，测量了浮雪的厚度，按事先计划，给潘多测试了心电图等，整整停留了长达90分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从山下背来的测绘觇标——一个金属三角架，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上竖起。这个高达3米的红色测绘觇标竖起的时候，早已守候在珠峰山坡海拔6300米、5600米高度上、距顶峰直线距离在7~21公里的10个测绘点上的测绘专家们，同时将测绘仪的镜头对准这个地球最高极——红色觇标，进行了平面和高程的交会观测，测得数据后，将它们接到黄海

1975年，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后，在珠峰峰顶架设“中国觇标”。当高达3米的红色觇标竖起。从珠峰周围10个观测点上，中国测绘科学工作者同时测量珠峰高度。与黄海海平面相接后，得出珠峰高度为8848.13米。这是人类首次科学测定地球最高点高度。之后，中国觇标成为世界各国高山探险家登顶的见证。现已为积雪掩埋。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从山下背来的测绘觇标——一个金属三角架，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上竖起。

探险珠峰

◎ 三五七零年西藏登山队



1975年5月27日，当中国登顶队员登上顶峰时，基地营的高山生理学家们遥测登顶队员“无氧”时的心电图。

海平面，得出珠峰高度为8848.13米，取得我国测绘科学史上的重大成果！这在珠峰的测绘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高山生理学方面，获取到人体在海拔8000米以上高空时，使用和不使用人工供氧情况下的生理、血压、心脏跳动次数等方面变化的科学数值和数据，对预防和治疗各种高山病，取得了宝贵的依据。

这次登珠峰，由于事先医务监督做得好，更有许多积极的预防和救护措施，虽然有不少人患了不同程度的高山病和冻伤，但却无一人死亡或重伤，这也是这次高山探险的可喜成就。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事先为攀越“第二台阶”准备的金属梯子，保证了我国队员的顺利登顶。为了让今后更多的中外各国登山健儿们都能安全而便利地越过“第二台阶”，1975年中国队登顶成功下山时，就把这个梯子永远地安放在那里。从那以后，许多国

1950年6月3日
在人类高山探
险史上第一个
登上8000米高
峰的埃尔佐格
于1978年5月，
以法国政府青
年体育部长身
份访华时，与王
富洲、潘多在京
饭店门前合影留念。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事先为攀越“第二台阶”准备的金属梯子，保证了我国队员的顺利登顶。



家的登山家都是蹬着这个梯子登上珠峰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和感激中国人为他们安放在那里的这个梯子，称它为Chinese Ladder（中国梯子），赞美中国人对世界高山探险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那个红色觇标，一度也成为后来各国登山家们登上顶峰的见证，直到1982年，它消失不见为止。

另外，9位突击队员登顶后，潘多等在顶峰东北角9米处的乱石堆中，找到了王富洲等3人1960年登上顶峰后所埋下的纪念物，他们将它们挖出，带回北京。消息由新华社播出，彻底粉碎了英国“喜马拉雅专家”们的质疑。

1975年是联合国预定的“国际妇女年”，5月16日，日本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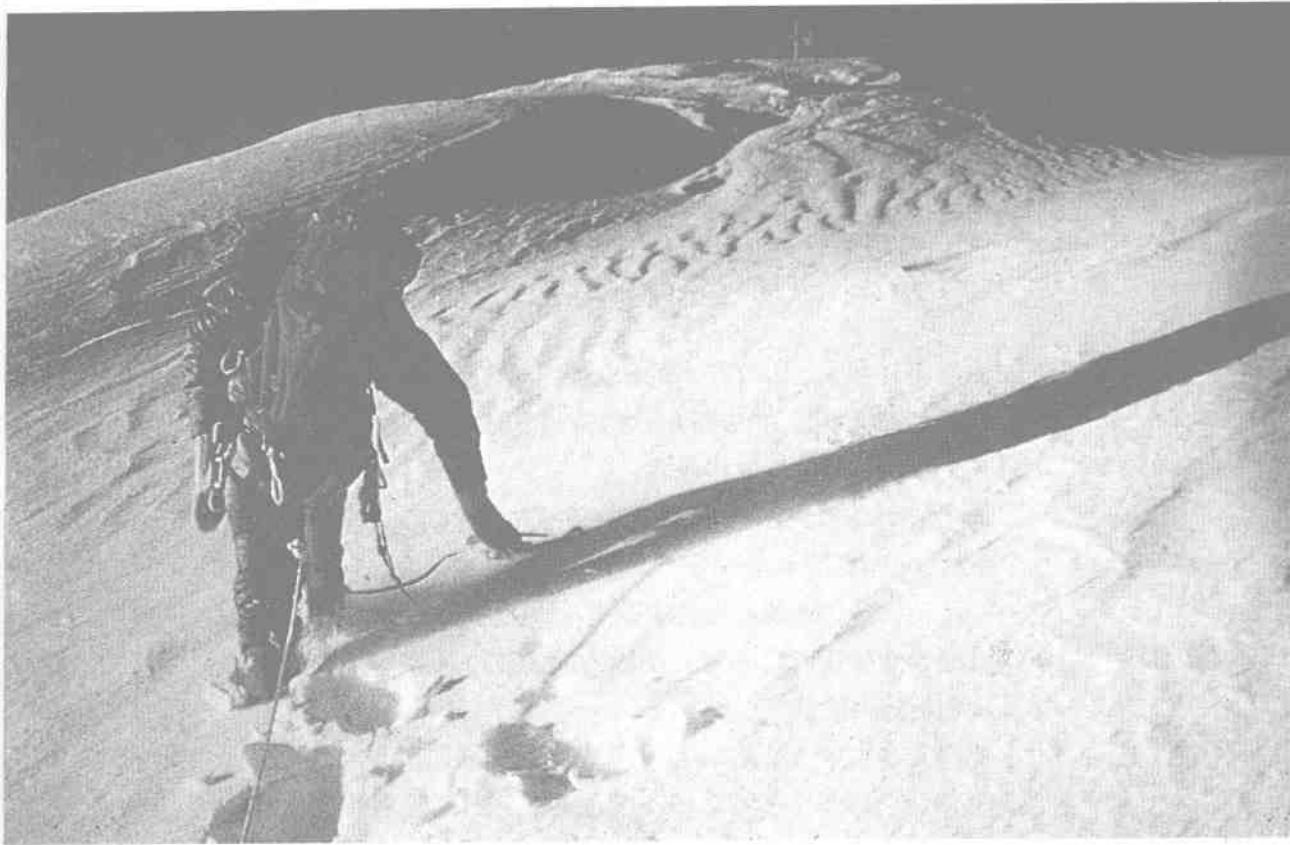
英国队的两名队员斯科特和赫斯顿从珠峰南峰向顶峰前进。

珠峰登山队的田部井淳子从东南山脊登上珠峰，仅仅过了12天，中国队的女队员潘多又从东北山脊登上珠峰，她们都为“国际妇女年”增添了光彩。

首支英国队从西南壁登顶

1975年秋，由英国著名高山探险家C.J.伯宁顿（Bonington·Christian 1934~）率领的一支19人英国珠峰登山队，到达珠峰南侧，拟从西南壁这条比较难险的路线登顶。这是二次大战后第一支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珠峰登山队。他们选择的西南壁路线，此前已有6个队败下阵来，这些队分别为：1969年秋的日本队，1970年

1975年9月24日，英国队员斯科特上攀的前方即为中国领标。



这是二次大战后第一支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珠峰登山队。



1975年9月24日，从西南壁登上顶峰的英国队员斯科特在中国觇标旁自拍留影。

春的第二支日本队，1971年春的国际队，1972年春的欧洲国际队，1972年秋的意大利队和1973年秋的第三支日本队。他们先后在四年里6次冲击，都未能取得成功。

为了取得成功，英国人为此准备了3年。他们先在侦察时，将整个路线(西南坡面)拍成录像，一段一段地仔细研究，制作特殊的工具和装备，准备了加长的登山主绳(长达80~100米)，特制了岩石楔和能膨胀的岩石锥，长短不同的软型、硬型攀岩专用挂梯，特别是较轻的氧气瓶等。

英国人本来申请的是1979年秋天攀登珠峰，因为尼泊尔政府早就把1975、1976、1977、1978年的春、秋季攀登珠峰的许可证



1975年9月24日，英国队员赫斯顿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在中国觇标前与中国队通话，报告他与另一位队员已到达顶峰。

预定给了别的国家。1975年秋季早已给加拿大队发了许可证，由于加拿大要求延期，英国人正好顶替上，得以提前4年攀登珠峰，可见各国对珠峰的兴趣之大。

英国队这次登珠峰的经费，是伯宁顿和英国高山俱乐部向英国各大银行家们请求来的赞助，队员全是从英国的优秀登山家，特别是攀岩能手中选拔出来的，如D.斯科特、T.赫斯顿、P.鲍德曼、M.哈克等，都是当年最优秀的攀岩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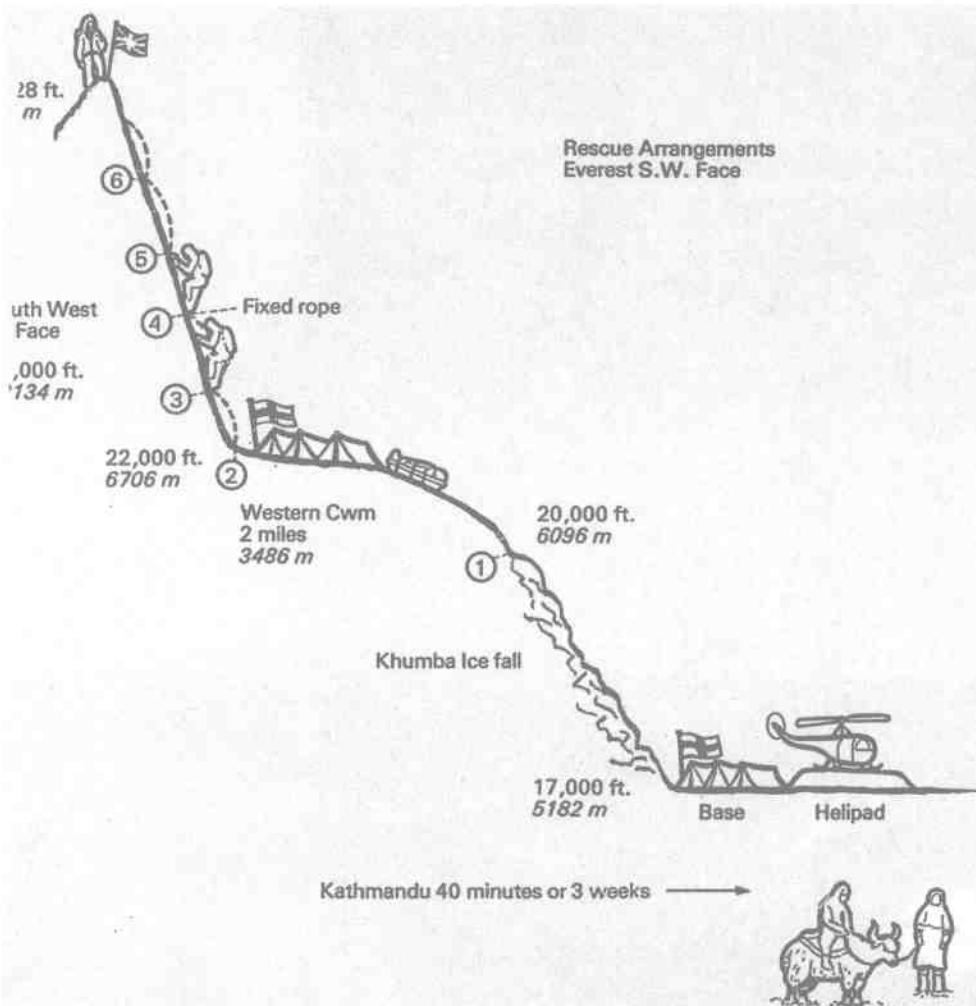
1975年9月4日，斯科特(Scott · Douglas Keith 32岁)和赫斯顿(D.Houston 32岁)两人于清晨离开8258米的西南壁上的第6号营地，向顶峰冲击。16:00，两人到达珠峰的南峰，继续前进。两小时后，18:00两人到达顶峰。他们在同年5月27日中国队竖立在顶峰上的测绘



1975年英国队员在珠峰顶峰上临时设置的帐篷。右上方就是当年春中队树在顶峰上的觇标。

觇标旁摄影留念，证明他们确实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这是世界高山探险史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两位英国人。由于他们下山时天色已晚，而且他们还想等第二批登顶的队友，所以当晚就在珠峰南峰与珠峰之间的鞍部，即山坳宿营，第二天才慢慢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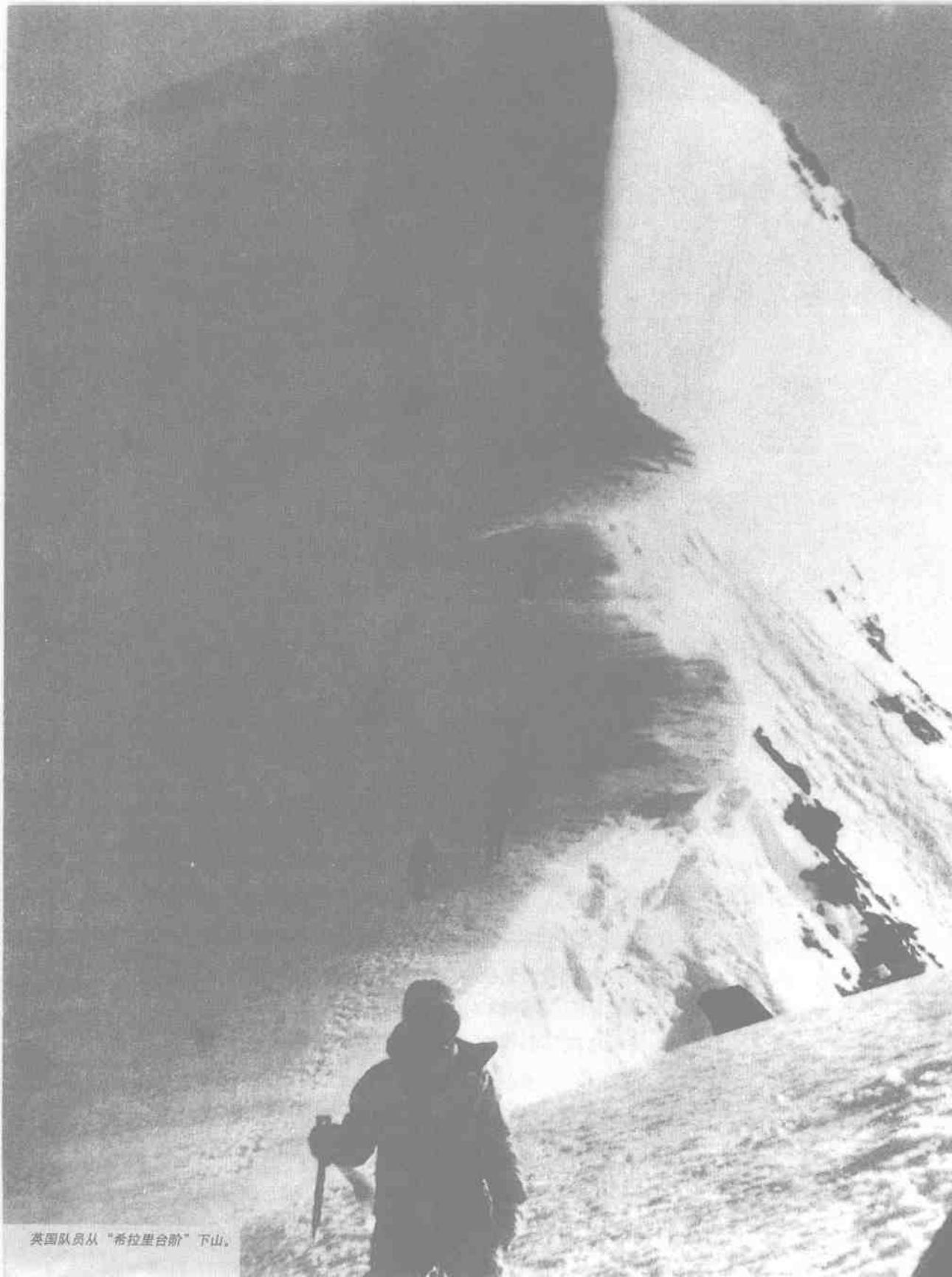
9月26日，第二批突击队员鲍德曼(32岁)在夏尔巴向导佩尔庭巴(32岁)、米克·巴克(32岁)和马丁·侯赛因(32岁)等3人的支援下，登上珠峰。他们于26日清晨离开8268米的突击营地，午后1:10



登上顶峰。途中侯赛因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只有鲍德曼和佩尔庭巴两人还能继续前进。他们两人先出发，让侯赛因修好氧气面罩后跟上来。两人到达南峰之后，在南峰与珠峰之间的山坳等了一个半小时，仍不见三位夏尔巴向导的身影，就继续前进了。他们登上顶峰后，只在顶峰停留了15分钟就下山了，但直到他们返回6号营地，仍不见侯赛因等3人。要在这个8268米的6号营地附近搜索找人根本不可能，因为这里是一条非常陡险的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峭

1975年9月
英国队登顶
路线图。

他们登上顶峰后，只在顶峰停留了15分钟就下山了，但直到他们返回6号营地，仍不见侯赛因等3人。



英国队员从“希拉里台阶”下山。



壁。5月28日，这次登珠峰活动宣告结束，但3位夏尔巴人杳无踪影，毫无疑问，他们失踪了。

这次英国队总算是从当时认为最难最险的西南壁面上成功登顶，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记录。英国队有4位队员成功登顶，成绩是很不错的。遗憾的是，牺牲了3位非常优秀的夏尔巴向导。

英国队的成功，与他们的战术和事先非常充分的准备，以及雇用了很能干、而且数量不少的夏尔巴向导是分不开的。他们采取了小分队大夏尔巴向导的战术，就是突击人数最多两个，但要两倍于小分队的夏尔巴向导，为队员背负较多的食品和装备、氧气瓶等。因此，也可以说英国队是大规模的运输队和小规模的登山队相结合的战术。当然，这种方法所要支付的费用也是昂贵的，一般高山探险队是无法承受的。

在英国队花费了高昂的经费，雇用了比常规多出几倍的夏尔巴

从西南壁登顶的英国队员下山后，医生为他检查雪盲症。

这次英国队总算是从当时认为最难最险的西南壁面上成功登顶，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1977年秋，韩国的一支8人队，在队长金永棹的率领下，从传统的东南山脊上山，9月26日有两名队员登上珠峰顶峰，从而使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亚洲国家增加到5个。

探险珠峰

高山向导，专门制作了特殊的8000米以上的攀岩装备和器材，从西南壁路线登上珠峰之后，可以说最难最险的路线都被征服了。人类高山探险，从无到有，从50年代的“无高不可攀”（人类先后向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峰群中的最高山峰冲击）的时代（1950年6月2日～1964年5月2日，国际上称这一时期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跨进了“无险不可克”的时代（各国健儿从难和险的路线上攀登8000米以上各座山峰，1964年5月2日～1975年9月26日），国际上称之为“喜马拉雅的白银时代”。此后，人类就在跨进“无氧”和“全天候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新时代（因为它要使用大量的金属工具和装备，所以国际上又称之为“喜马拉雅的铁器时代”）。

1977年秋，韩国的一支8人队，在队长金永棹的率领下，从传统的东南山脊上山，9月26日有两名队员登上珠峰顶峰，从而使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亚洲国家增加到5个。此前最早的是1953年5月参加英国队的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后来是1960年的中国队，1963年的印度队有9人登顶成功，1970年日本队有3人登顶成功，1975年中国队有9人登顶成功，所以这次韩国队是第五个攀登珠峰成功的亚洲国家。

“无氧”与“全天候”攀登珠峰的新时代

1973年意大利军事珠峰队动用了大量的陆海空军装备，包括直升飞机、雪地运输车、雪地牵引车、各种绞盘机和大批的夏尔巴人向导和搬运工，最后有9人从传统的东南山脊登上珠峰。著名新西兰高山探险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位（1953年5月29日）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勇士，时任新西兰政府驻尼泊尔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埃德蒙特·希拉里对意大利军事珠峰队队长、意大利陆军登山学校校长蒙吉诺上校说：“你们这不是登山运动（阿尔卑斯运动），你们简直是一场陆海空军山地作战大演习。真正的登山运动应当自始至终完全靠登山者自己背负各种

装备、食品和燃料登上高峰，然后又安全下山的运动。我们今后应当大力提倡真正的高山登山运动，而反对像你们这样动用这么多的军事装备和大量的夏尔巴人为你们背运物资的登山运动……”

在那以后的1975年，英国队虽然没有使用大批的军事装备，但他们耗资巨大，雇用了两倍三倍于实际登山的英国队员的夏尔巴向导。他们从当时认为最难最险的西南壁登上了珠峰，也推动了真正高山探险运动的水平。

所谓真正的高山探险，国际上公认的是：从始至终完全靠登山者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不求助于夏尔巴向导，登上高峰，并安全地返回出发地，才是真正的“阿尔卑斯运动”。

1978年2月，美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李奇微(T.Litchwe)教授和德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海茵利希考费尔(K.M.Herrligkoffer)博士，两人联合发表了论文，提出：“正常人只要经过系统的耐缺氧和耐高寒训练，可以不使用任何人工供氧，登上地球上的任何一个高点。”

无氧登山理论发表后，第一位以身试“法”的意大利高山探险家梅斯纳。他于1978年5月8日，从西山脊成功登顶并安全返回基地营。他的成功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无氧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时代的开始。他也是首位将世界8000米以下高峰全部踩在脚下的人。



从始至终完全靠登山者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不求助于夏尔巴向导，登上高峰，并安全地返回出发地，才是真正的“阿尔卑斯运动”。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他们反复观测和分析的结果。两位科学家对那些前往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去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家们出发前、登山过程中以及登山后，在训练空军飞行员用的低压舱中的测试进行了直接观测，记录下所有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反复研究了1922年英国珠峰队的索马威尔、1924年的马洛里、欧文和埃德尔等人在8600米的高度上，在氧气装备发生故障无法用氧，却仍能够继续登山的实况；特别是1960年中国队的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以及刘连满等4人在8700米以上，在完全没有了人工供氧的情况下，不但坚持从8700米的高度，继续攀登上了珠穆朗玛顶峰，而且还能安全地返回出发地，长达14个小时的“无氧”生活的实践；以及1975年中国队的9位队员，在登上珠峰后，在珠峰顶峰上长达90分钟不但未用人工供氧，而且还做了心电图和采集标本的各种生理试验的实况。他们得出结论：“正常人，只要经过系统的耐高山缺氧的训练，人的器官是能够适应高山缺氧的。如果预防和救护及时，也能够克服各种冻伤。”

这一新理论发表后3个月，1978年5月8日，在经过多次低压舱耐缺氧训练后，意大利的优秀高山探险家、多次单身一人登上过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上8000米高峰的莱茵霍尔特·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 1944~）和他的伙伴哈贝勒（Peter Habeler 1942~1984），在从始至终未使用人工供氧的情况下，从西山脊成功地登上珠峰，并安全返回基地营。梅斯纳说：“我们去掉了像婴儿离不开母亲脐带那样的累赘，轻装而轻松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海恩利希考费尔博士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他给世界高山登山运动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梅斯纳和哈贝勒两人是在没有雇用夏尔巴向导的情况下登上珠峰的。当然，他们并不是从西山脊直接登顶的，而是沿着1963年美国队开创的在西山脊8100米的地方转入北壁上右侧的那条岩沟，也即霍恩拜因岩沟，从岩沟里登上顶峰的。他们只是在从尼泊尔的



梅斯纳从西山脊登上顶峰后，在中国觇标旁留影。当时中国觇标上还有绳子。

从这个时候起，无氧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就成为了世界高山探险活动的新项目。

机场(离珠峰基地营最近的鲁库拉小型机场)到基地营雇用了30多位夏尔巴搬运工，而上山时所有的食品、燃料和装备都是两人自己背负的。

从这个时候起，无氧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就成为了世界高山探险活动的新项目。



第六章 喜马拉雅的“铁器时代”



1979年春，南斯拉夫队一行31人，在队长托尼·修卡利雅的率领下，从1963年美国队开创的西山脊转北壁上的霍恩拜茵岩沟，有2人登上顶峰。他们是斯特瑞弗利兹(A.Stremflez)和扎普洛德尼克(N.Zaplotnik)，这是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东欧国家队。

1979年，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开始对外开放高山区，接待世界各国的高山登山团队。多少年来想到中国这个多高山之国攀登高山的各国登山家们，总算有了机会。由于中国对外开放高山区，攀登珠峰的人骤增，国际高山探险事业从此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珠穆朗玛的登山活动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已经进入“喜马拉雅热”和“珠穆朗玛热”的时代，再一次加热升温。国际上比照60年代的黄金时代，把它称之为喜马拉雅的“铁器时代”。

日本队捷足先登

中国的近邻日本，捷足先登。日本最大的登山组织——日本山岳会首先获得1980年春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为此，1979年秋(10月)，日本山岳会派出以斋藤惇生(Saito Azuo 1929-)为首的9人珠穆朗玛峰东北山脊路线侦察队，为1980年春季的攀登作好各项准备。

中国登山协会派出王鸿宝等6人协助日本侦察队，从绒布冰川，经6400米登上北坳。在此期间侦察队遇到了雪崩，中国的王鸿宝、尼玛扎西(藏族)和洛朗(藏族)遇难牺牲。还有一位日本队员，也被大雪埋没，但他正好处在雪崩边缘，被埋得较浅而获救。从东

探险珠峰 ◎

新华社稿 1978年9月10日



1978年9月10日，藏族女登山运动员桂桑（右）与苏联运动员叶卡琳娜·伊万诺娃在珠峰顶上。这次中苏美联合队共有20人成功登顶，其中中国7人、美国5人、苏联8人。

北山脊登顶的路线是侦察清楚了，但是却损失了三名中国协作队员。

日本侦察队长斋藤惇生等人回国后，为了集资拉赞助，大张旗鼓宣传他们要在1980年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自1950年6月3日法国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安娜普尔纳峰8091米)成功后，掀起了世界各国前来亚洲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高潮，而各国登山家都希望能从中国一侧，也就是1921年起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8年，英国人七次从西藏一侧登珠峰失败的这条登山路线。现在日本人首先获准进入中国一侧，他们都很羡慕，非常渴望自己也有这么个机会从中国一侧登珠峰。日本全国最大的报纸、每天发行达800多万份的《读卖新闻》，在1980年元月1日以四大版全面介绍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地理、地质、气象和攀登历史，报道了日本有幸获准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的欣喜情景，以及他们1979年10~11月间侦察东北山脊路线的经过。文中特别提到在侦察过程中，中国的协作队员王鸿宝曾对日本队员说过：“1975年中国队登珠峰时，曾在途中发现过一具欧洲人的遗体……”这下子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英国人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这可能就是1924年在珠峰东北山脊上失踪的英国优秀登山家马洛里或欧文的遗体。《读卖新闻》的这一介绍，被许多欧美国家的报刊和电视、电台转载和评论，从而掀起了1980年以后“中国的喜马拉雅登山热”。

中国对外开放高山区，得到各国的赞赏。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他们高兴地认为1924年失踪的那两位英国优秀高山探险家马洛里和欧文的下落可以找到了。因为英国人始终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登上珠峰之后，在下山途中，在海拔8100米的东北山脊“第一台阶”附近滑坠而失踪的。如果能在东北山脊的下方坡地上找到他们的遗体或者遗物，就能证明英国人早在1924年就已经登上了世界最高峰，那么世界登山运动历史就必须重写或修正。1953年5月29日

《读卖新闻》的这一介绍，被许多欧美国家的报刊和电视、电台转载和评论，从而掀起了1980年以后“中国的喜马拉雅登山热”。



是人类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日子，登顶者虽然是英国队的队员，却没有一位是真正的英国人。

1980年春，以渡边兵力(Watanabe Siyeliki 1914~，日本山岳会副会长，大学教授)为队长、日本登山界元老，77岁的西堀荣三郎为总队长，组成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共有39位队员。日本媒体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为日本在全世界首先获准从中国境内攀登珠峰而欣喜。日本山岳会为这次从中国境内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募集到大量的赞助资金。日本的各大公司，包括三菱、三井、安田、新日铁等大公司、大银行、电气、汽车、房地产等1300多家企业都给了赞助，所以日本队的装备包括通信设备、电视拍摄、食品及运输等都是当时最好、最先进的。日本广播公司(NHK)还专门为登山队配备了刚刚研制成功的超轻型摄像机。队员是从数百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强者，如加藤保男(31岁)、中村进(34岁)、浜野吉生(42岁)、宫下秀树(49岁)、重广恒夫(32岁)、尾崎隆(27岁)、小林利明(31岁)、宇部明(31岁)、和田昌平(26岁)等人都是当时日

中国第二位成功登上珠峰的女英雄桂桑。这是她参加五国女子登山队，攀登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前与儿子合影。





本最强、具有喜马拉雅登山经验的。很明显，日本人是要一举取得成功。

1980年3月5日，日本队从东京出发抵达北京，然后飞往西藏，进入珠峰北侧绒布寺上方、海拔5250米的基地营。日本队在总队长西堀荣三郎和队长渡边兵力(65岁)的率领下，包括三位副队长、22位登顶队员、报导组(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师)13人，共39人。中国登山协会为日本队派出56人的协作队，全队共95人，算是一个大的登山队了。

早在日本队从东京出发的当天，中国的支援人员已在3月5日将基地营建好。日本队员于12日抵达基地营，然后立即兵分两队，一队从珠峰的北壁上方侦察。日本队这次计划一路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另一路从北壁直取珠峰。过去曾有两个队计划从北壁登顶，一个是1922年英国队的诺顿，他是在“第二台阶”下方走错了路，走到了北壁的边缘上发现了北壁上靠近左侧的岩沟，他曾试着进入这条岩沟向上攀登，但失败了；另一起是1963年美国队原计划从珠峰的西山脊直上到顶，但在西山脊8200米处遇到了悬崖，无法绕过，而发现了他所在西山脊的左侧(实际上是北壁的右侧)的一条直通顶峰的岩沟，美国的霍恩拜茵和另一位队员最后是从这条岩沟登上顶峰的，所以后来就把诺顿发现的珠峰北壁上左边的那条岩沟叫“诺顿岩沟”，而把北壁上右边的那条岩沟叫作“霍恩拜茵岩沟”。日本队这次计划从珠峰北壁的下方直上，然后进入“霍恩拜茵岩沟”登顶，这样就与1963年美国人开创的西山脊转北壁登顶的路线不完全相同，也算他们新开创了一条路线。但日本人对这条新路线把握不大，所以他们另一路又沿比较安全保险的东北山脊，也就是中国队1960年、1975年先后两次登顶成功的路线登顶，目的很清楚，就是保证登顶成功。

日本电视台这次计划拍摄一部从开始到登顶全过程的录像片。为此，电视台不仅花费相当大的资本专门试制了轻型摄像机，还专

门选拔了能与登顶队员一同登上顶峰的记者中村进等。

日本队东北山脊一路，加藤保男等3位登顶队员和摄像记者中村进4人，在4位中国协作人员(实际上与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起相同的作用)的协助下，于3月25日从绒布冰川上越过冰瀑区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4月4日前他们已将134公斤的食品和装备运到了北坳上方的营地。计划往第5号营地(8100米)运送17瓶氧气和230公斤重的食品和装备。

5月1日，加藤保男等3位队员和记者中村进，在4位中国协作人员的支援下，从6号营地(8620米)出发向顶峰冲击，但当天没有成功。他们又返回6号营地宿营。3日，4人再次向顶峰冲击，记者中村进勉强登上8750米的高度后就昏倒了，除加藤保男外，其他两名队员也不行了。只有加藤保男一人坚持向顶峰冲击，他在北京时间20:55登上顶峰。由于他曾于1973年从尼泊尔一侧登上过珠峰，因此他成为日本两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第一人。

而北壁一队，在宫下秀树的领导下，共有11位队员，他们已经上到了8100米的高度，5月2日，由重广恒夫、尾崎隆及和田昌平3人组成突击组，从8100米的第5号营地出发，他们进入霍恩拜茵岩沟，向上攀登，但只是到达了8500米的高度就累得不能再前进了。同一天，小林利明、宇部明两名队员在北壁7900米处遭遇雪崩，宇部明被雪崩砸到北壁下方的万丈深谷中身亡。

5月10日，重广恒夫和尾崎隆二人终于从北壁的霍恩拜茵岩沟登上顶峰。

日本队登顶成功的消息传到东京之后，各大媒体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报道，重点报道了给予大量赞助的单位，他们为整个活动提供了4亿多日元的赞助，这些报道实际上是给一千多家赞助单位做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宣传广告。当然，它也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队回国后，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政府要员和财界赞助的知名人士1200多人参加了欢迎会。5月11

日，中国总理华国锋访日，日本媒体又大量报道了日本队从中国西藏一侧两条路线上登上世界最高峰，这是对日中友好的重大贡献……应该说，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之一。

莫须有的贡嘎山特务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件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有的人作出的一些傻事：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登上四川境内、我国横断山脉的最高峰贡嘎山(7556米)，其时，队长S先生硬说这是人类首次登上这座高峰，并说过去美国人都登过，但失败了。后来又说美国人登贡嘎山是一种特务活动，也就是说那时的美国人都是为政治目的而来的特务。1932年参加攀登贡嘎山的美国人得知这种说法后非常气愤和不满，早在1932年来过贡嘎山的瑞士人和法国人也对此感到愤慨。那些满脑子极左思想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来中国登过山，或者作过科学考察的人，全都是特务。

事实如何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侵占我东北四省(吉林、辽宁、黑龙江和热河)之后，又发动了侵占上海的“12·8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意在将整个中国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人民都变成它们的奴隶，任它们宰割。这时，4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哈佛大学学生，他们是：特瑞斯·莫瑞(Teris Moore 1912~1992)、理查德·布德塞尔(Richard L. Bundsall 1913~1989)、亚瑟·埃芒斯(Anthur B. Emmons 1913~1994)和中国在美留学生杨帝泽(1916~)。杨帝泽的英文名字是特奥多·杰克·杨Jack Theodore Young，原籍广东中山人，老家和孙中山先生是邻居，他的祖父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因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被清政府所杀，成为民族烈士。杨帝泽本人非常热爱祖国，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蒋介石反动政权不允许人民抗日，杨帝泽就和他的几位美国同学以攀登贡嘎山的名义

应该说，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之一。



申请入境，得到许可。他们从旧金山出发，乘船在上海登陆后，在上海特别是闸北地区拍摄了许多照片，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毁了的工厂和建筑以及死难人民的悲惨景象，目的是要在美国和世界的媒体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暴行。他们于1933年在西雅图出版的《西康探密》(Sikong Expedition)一书中，用较大篇幅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烧、杀、抢、掠暴行做了介绍。当然，他们从侦察登顶路线到最后把中国和美国国旗插上海拔7556米(当时用的高度是7595米)的贡嘎山顶峰的全过程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贡嘎山登山队的登顶路线，实际上完全是1932年美国队的路线。但S先生们却硬说这是他们自己开创的、从未有过人迹的新路线，贡嘎山是他们首次登顶的，等等。这件事对美国人来说，特别是到1997年还健在的两位美国人莫瑞和杨帝泽(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远东美军对日作战，因战功多次受奖，战争结束时，他是美国陆军少将，我于1987、1993年访美时曾两次与他会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深感不平。我先后在美国高山俱乐部的年会学术报告会上，为我的同胞对美国友好人士攀登贡嘎山说了不好的话，向美国友好人士道歉，专门拜访了莫瑞和杨帝泽两位老人，介绍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对过去某些人由于思想认识或无知而说的怀有敌意的话，慎重道歉，请他们谅解。这之后，两位老人十分信任地请我为他们办一件事。那是1932年，他们登贡嘎山时，路经山下的贡嘎寺，见占据寺院的一群土匪正在佛堂里燃烧经书取暖，经书烧完又摘下墙壁上挂的丝绢佛像接着烧。当时寺中的所有喇嘛都被赶跑或逃走了。土匪们对他们这小队外国人不敢伤害。莫瑞和杨帝泽见此情景，立刻上前制止他们焚烧画在丝绢上的佛像，并从他们准备焚烧取暖的一堆丝绢佛像堆中选出一张非常精美的明代制作的丝绢佛



1932年10月28日，特瑞斯·莫瑞等3位美国青年和中国留学生杨帝泽登上贡嘎山。图为莫瑞手持国民政府国旗在贡嘎山顶峰。

像带走。他们说：“等到这里平静后，不闹土匪时，我们再把它送回来。这么好的佛像是很珍贵的艺术品，让土匪烧毁太可惜了！”一晃几十年，战争和其他的原因，使他们无法再来中国。1994年10月，莫瑞老人也辞世了，杨帝泽老人身患不治之症，行走困难，他们委托莫瑞的夫人卡塔琳娜（Katrina·H）老人专程来到北京，将这幅珍贵的丝绢佛像亲手交给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王富洲，请他转交给四川康定的贡嘎寺。

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都是爱好和平和希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的。



1980年8月20日，梅斯纳快到顶峰时，瞥见中国觇标，精神为之一振，成功登顶。

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都是爱好和平和希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的。邓小平这位英明的领导人，他把受极左思潮影响很深的人民，引导到正确的大道，把国家引向发展的道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种政策的泽被所至，也使得一些旧案得以圆满处理。

突破“季节禁区”

1980年11月，由安吉·扎瓦达（Anji Zawata）率领的波兰冬季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7人来到珠峰脚下，目的是从南坳下方、孔布冰川中游向左，从东南山脊的一条小支山脊绕过南坳，登上东南山脊，再沿东南山脊登上顶峰，开辟一条攀登珠峰的新路线，创造

一项严冬季节(突破季节禁区)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世界新记录。他们前后经过一个月的奋战,于12月17日由两名队员从东南山脊的支山脊(南山脊)登上珠峰,实现了他们创造两项世界新记录的愿望。

1981年秋季,一支由中岛信一率领的日本明治大学珠峰队,拟从西山脊登顶,在到达8750米的高度后,暴风雪把他们击退了。

1981年由植村直己率领的日本冬季珠峰登山队一行7人,拟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他们于11月27日进山,越过南坳,但夜问一阵暴风,把他们的一顶帐篷连人都吹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只好撤退,没能创造在严冬的最寒冷季节登顶的记录。

1982年,苏联春季珠峰登山队,在队长叶夫戈尼·达姆的率领下,拟从尼泊尔一侧东南山脊登顶,这是苏联第一支珠峰登山



1980年梅斯纳单身一人从东北山脊登上珠峰后在中国觇标旁留影。此时的觇标只剩下4条支柱,而且大部分都被埋在冰雪里,与两年前相比矮小了许多。

他们只好撤退,没能创造在严冬的最寒冷季节登顶的记录。

队，共12人，他们从西南壁的左路登顶成功。

1982年冬，由当时非常优秀的日本高山登山家加藤保男任队长的日本冬季珠峰登山队，从东南山脊登顶，结果加藤保男失踪，另一队员滑坠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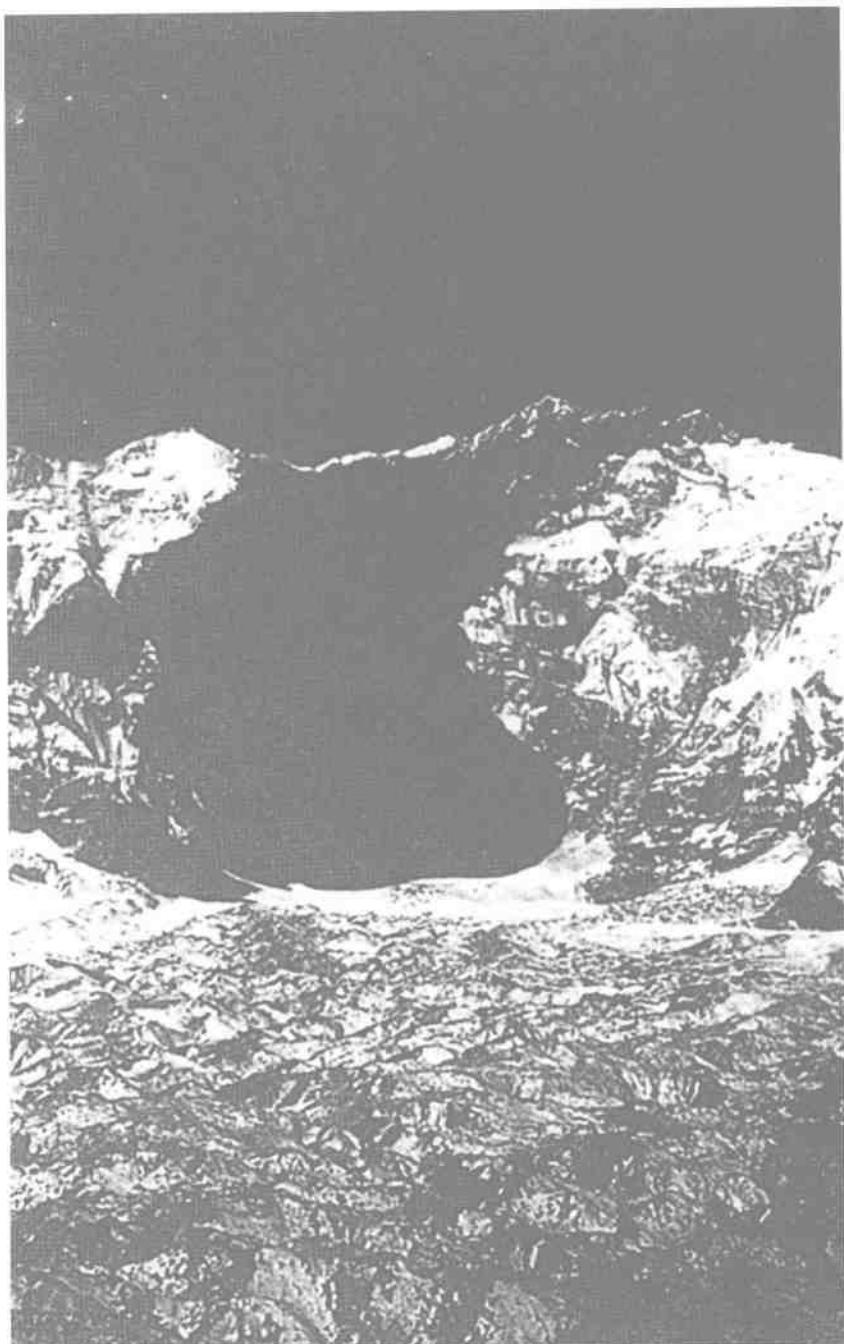
看来，在严冬季节这个“季节禁区”里攀登珠峰确实凶多吉少，因为难度和险度都很大。

美国队开创东壁路线

1983年8月，由詹姆斯·莫瑞希(James D.Morrissey)率领的美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14人，于12日抵达北京，然后飞往西藏，他们的目的是从珠峰的东壁下的康雄冰川(Kang Shung Glacier)登上南坳的北侧东壁，从东壁登上南坳，再沿东南山脊登顶。东壁是珠峰各条登顶路线中雪崩最频繁的地方。

美国队队员都是当时美国登山家中的最优秀者，他们在珠峰东壁下方康雄冰川的边缘建立了营地(海拔5180米)。但是这个营地曾多次受到雪崩滚坠形成的大小雪球(直径1~3米)的袭击，有的大雪球几乎滚到住人的帐篷上，而且常常是夜间袭来，非常吓人。由于东壁十分陡峭，所以经常发生大小雪崩。

美国队员先后在5800米、6096米、6553米、7160米的高度上建立起1至4号营地，10月6日他们又在7860米处建好了第5号营地，8日队员布勒(C.Buhler)、莫布(K.Momb)和理查德(L.Richard)等3人从清晨4:30离开7860米的5号营地，向顶峰冲击，于下午4:00到达顶峰，摄影留念后下山。第二批队员卡赛尔(J.Cassell)、劳威(George Lowe)和瑞德(Daniel Reid)3人，于9日下午4:30登上顶峰。美国队有一名队员在从康雄冰川向珠峰东壁攀登过程中遭雪崩袭击身亡，但他们却开创了一条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新的又难又险的路线，这是很不容易的。



珠峰东壁面。左侧小凹处为南坳，正中高处为珠峰，下方就是险峻而危险的东壁，最下方为康雄冰川。1983年10月8日和9日，以詹姆斯·莫瑞希为团长的美国队，分两批从这条线登顶，创造珠峰探险史上的又一奇迹。

4 支日本队各出奇招

1983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他们攀登珠峰队数最多、人数也最多的一年。这年的春、秋和冬季，共有4支日本队分别从不同路线攀登珠峰，特别是严冬季节，日本人也敢于大胆尝试。

1983年春，由川村晴一为队长的日本珠峰“无氧”登山队，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有两人始终未用人工供氧，登顶成功；另一支由吉野宽率领的日本耶提(Yiti是尼泊尔语“野人”的意思)同人珠峰队，也是未使用人工供氧登顶的，全队共5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结果成功登顶的3人中，有2人在下山途中因极度缺氧而死亡。

9月，川村晴一率领日本山学同志会(一个地方登山协会)珠穆朗玛峰登山队5人，于5日在孔布冰川海拔5120米处建立基地营，拟从西南壁不用氧气登顶。15日，在6400米处建立2号营地，19日在7300米处建3号营地，30日到达8100米处，就再难前进了，后来索性撤回到2号营地。在这里分析情况后，他们决定放弃西南壁路线，改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因为这条路线比较安全可靠，有把握登顶。他们从10月2日起在第2号营地上休整了两天，4日开始向洛子峰南坡前进，为的是先登上南坳，5日登上南坳，建4号营地，8日从南坳营地向顶峰冲击，凌晨5:00出发，9:30到达8400米，10:00左右与从东壁上来的美国队员相遇。3位美国队员使用氧气，所以美国人比日本人(不用氧气)走得快得多，很快与日本人拉开了距离。不久，美国人登顶后下山途中又遇到了日本人，地点是8700米的南峰附近。随日本人登顶的夏尔巴向导边巴因背负的东西太重，不幸在8700米的南峰附近滑坠身亡。下午1:00，川村和铃木两人登上顶峰，但他们下山时疲惫不堪，行动非常缓慢，只得在8400米宿营过夜，第二天才慢慢下山。

从日本队“无氧”登珠峰的疲惫情况，和1960年中国队的刘连满在到达8700米后，再也无力前进而在8700米的营地上过夜休息后又有了力气可以下山的情况看来，在8000米极其缺氧的高山上，在完全不使用人工供氧的“无氧”情况下，只要经过耐缺氧的适应过程，登山者在得到必要的休息后，体力是可以继续在“无氧”情况下得到恢复的。但下山之后却会留下较长时期的后遗症，表现为心脏功能减弱、经常头晕、头发长时间脱落和记忆力减退。有的人甚至从此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心脏病而过早死亡。所以我认为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还是要用氧气，尽管有人要创造“无氧”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新记录，但是后患无穷。无论是中国人、欧美人，还是日本、韩国人都是如此。

日本耶提同人会珠峰登山队一行5人，在队长吉野宽的率领下，于1983年9月4日来到尼泊尔一侧，在珠穆朗玛峰南侧山下孔布冰川侧碛上建立了基地营(5340米)，计划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9月14日开始上山运送物资，28日在洛子峰南坡7500米处建成3号基地，31日登上南坳，并修好从7500米到南坳上方的道路。10月4日，吉野、秃博信(31岁)、远藤(26岁)和泽上(31岁)等4人，在6位夏尔巴向导的支援下，进入8100米的4号营地，8日凌晨5:00他们离开4号营地向顶峰冲击，途中遇到日本山学同志会队的3位队员，于是结伴同行。队长吉野和秃博信两人在8500米处放下背包，轻装前进。另一位队员泽上在到达珠峰南峰(7720米)稍前一点的地方已精疲力竭，于是他自己返回了南坳。其余3人继续前进。与他们同行的山学同志会的3位队员行走得比他们三人快，这时已登上顶峰。可是将背包放在南峰附近的队长吉野和队员秃博两人，原以为登顶后很快就可以下山，他们只顾轻装，既没有氧气供应，更没有携带抗高寒的装备(羽绒衣裤和睡袋等)，当天夜里两人在8800米附近被冻死。美国队员后来发现了吉野的遗体和秃博的冰镐以及他的一支登山靴，人们推测秃博可能滑坠死了。

所以我认为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还是要用氧气，尽管有人要创造“无氧”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新记录，但是后患无穷。

1983年冬日本卡摩希加(奔鹿的意思)同人会(日本一小登山协会)珠峰冬季南北两侧登山队，一支由著名的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原姓今井)率领，17人，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另一支由高桥通子的丈夫、卡摩希加同人会会长高桥和之率领，全队10人，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两队计划在顶峰会师，然后从南来的一队登顶后从北侧东北山脊下山，而从北上的一队登顶后从东南山脊下山，创造一项严冬季节南北两路顶峰会师的“高山纵走”世界记录。

南侧由高桥和之(41岁)队12月1日在孔布冰川的侧碛上建立了基地营，3日建好2号营地，8日建好3号营地，13日在南坳稍上建好4号营地，16日凌晨2:00，队员山田(33岁)、尾崎(31岁)、村上(28岁)和夏尔巴向导那旺4人，从南坳出发向顶峰冲击。他们于上午9:30~10:00，相继登上珠峰顶峰，其中尾崎已是第二次登上珠峰(第一次是1980年从中国一侧)。从中国西藏一侧登山的17人，除队长高桥通子之外，全是男性，队员大藏(32岁)，高野(24岁)等人都是很强的攀岩能手。这是珠峰探险史上惟一一支由女子担任队长指挥男队员登山的队。他们于10月18日在珠峰北坡山下主绒布冰川海拔5620米处建好了基地营，26日在6170米处建立第1号营地，11月5日在6900米建好2号、16日在7700米(东北山脊)建好3号营地，但从此困难和危险不断出现。12月1日大藏等3人将安全绳索架设到8080米处，9日，队员高野上到8100米时，因大雪太深厚，无法继续前进而宣告北侧一路登顶失败。日本卡摩希加同人会这次从南北两侧登顶共耗时90天整，但只有一边登顶成功。卡摩希加意为奔鹿，是高桥通子(医生，也从事高山生理研究)和她丈夫高桥和之开设的一家登山和滑雪用品专卖店的名字，并组建了一个登山协会，名称是“卡摩希加同人山岳会”，以此来组织高山探险活动和出售登山、滑雪商品，应当说这也是一种经商的形式。

《植村直己的故事》拍摄奇迹

1984年春，奥地利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7人，在队长乔夫·巴特拉姆率领下，于5月6日在中国西藏一侧的东绒布冰川5160米处建立了基地营，从珠峰的北壁沿“霍恩拜茵岩沟”登顶。队员斯涅普和莫狄玛两人未使用氧气登上顶峰，为奥地利创下攀登珠峰的新纪录。



1985年，日本文部省(政府文化部)决定出资拍摄电视《植村直己的故事》，以纪念日本杰出的探险家植村直己。植村直己，他是全世界第一位单身攀登五大洲最高峰的英雄，在从1966~1984的17年间，他独自一人，在地球各地探险。1976年，他用15条木桩扎成一个木筏，从南美最大的长6000公里的亚马逊河上游，顶着狂风恶浪，顺水漂流，途中吃尽苦头，险些被土著杀死，被食人鱼吞食，最后成功到达这条大河的大西洋入海口。1977年，他又单身一人，乘着17条爱斯基摩犬拉的雪橇，从加拿大最北端的哥伦比亚角，直闯北极点，途中两次遭遇白熊，几乎被吃掉；另一次是连人带犬掉进冰裂缝中。1984年2月17日，他在创造一项严冬季节攀登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力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境内)的新纪录时，不幸滑坠身亡。植村确实是位勇敢的探险家。

为了拍好这部电视剧，日本要让演员们真实地在植村所去过的每个地方，如实地表演植村的业绩，而攀登珠峰是这个故事片的第一部，为此要求演员必须实地从珠峰南坡孔布冰川上的基地营出发，一直登上南坳，从南坳登顶并安全返回基地。当时为顺利完成拍摄，特意选用了影坛身强力壮的著名影星西田敏行扮演植村，导演是日本国内的名导佐藤纯弥。电视摄制组的演职员在经过一系列的攀登高山和耐缺氧训练后，才从国内出发。要求演员和导演，以及全部拍摄人员能够实地扮演这个角色，或者导演攀登珠峰的全过程，像这样拍摄一部故事片，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植村直己，他是全世界第一位单身攀登五大洲最高峰的英雄，在从1966~1984的17年间，他独自一人，在地球各地探险。

《植村直己的故事》第一部拍得非常成功，一个电视摄制组的主演、导演和摄影师都能登上珠峰，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摄制组于1985年10月1日来到尼泊尔一侧珠峰山下，全体演员、导演及拍摄人员共11人，在48位夏尔巴向导的支援下，3日，在6400米处建成第2号营地。队长是日本登山家八木原(38岁)。14日，在7400米处建立第3号营地，30日，导演佐藤和男主角西田在7位著名日本高山探险家山田升、名塚秀二、佐藤木本、三枝以及摄影师阿久津悦夫(47岁)和两位夏尔巴向导的协助下，清晨一时从南坳出发，上午11:30到达顶峰！由于摄像的需要，摄影师阿久津常常要摘下防护眼镜，因而患上了雪盲症，双眼红肿失明，在其他队员帮助下得以安全下山，另一位队员木本哲(29岁)也被冻掉了10个脚趾。《植村直己的故事》第一部拍得非常成功，一个电视摄制组的主演、导演和摄影师都能登上珠峰，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1985年，日本武丹山岳俱乐部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7人，在攀岩能手长谷川恒男(1947~，曾多次攀登过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擅长攀岩)的率领下，于这年9月从中国一侧的珠峰北壁向上攀登，计划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上山。长谷川队长和队员岛田(33岁)、大田(22岁)3人到达8200米高度，因天气变坏被迫中止。活动中，队员石井慎一(33岁)在北坳下方的下山途中遇雪崩身亡。

1985年冬，由女登山家高桥通子率领的“日本奔鹿同人会珠穆朗玛峰冬季登山队”一行9人，于1985年10月25日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经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口岸樟木乘汽车到达西藏珠峰北侧主绒布冰川附近，在海拔5600米处建立基地营，他们还从尼泊尔雇来10名夏尔巴高山向导，并为他们办理了入境手续。

这是继两年前，即1983年高桥通子率领的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北壁登顶失败后第二次从这条路线登顶的尝试。

11月15日，他们在7600米处建立了第4号营地，并将所需

要的登顶食品和装备也都运上了4号营地。但16日的一场暴风雪将4号营地上的所有东西连同帐篷全都吹跑了，他们天天在附近找寻，过了一个星期，才将被暴风雪吹走的食品和装备找回一半，后来又从基地营补充了一些。12月3日，他们到达8200米处。此后，队员大藏(34岁)、近藤(23岁)两人沿着北壁右侧的那条“霍恩拜茵岩沟”，一直向上攀登，到达了8450米的高度。眼看胜利在望，天气突然变坏，暴风雪一连几天不断，他们只好下山，宣告第二次失败。

严冬季节本来是攀登珠峰的“季节禁区”，1978年以后，人们要突破这个禁区，创造新的攀登珠峰记录。但是在零下30℃左右的严寒情况下，再加上暴风雪气温降低到零下40℃~50℃，攀登就更困难也更危险了，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关于高山向导的思考

这里还有一个不大，但值得一提的问题。那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引来了更多的外国团队，从西藏一侧的珠峰北坡攀登珠峰。但是，这些外国团队却从尼泊尔雇来许多高山向导为他们服务，这笔费用是相当可观的。

他们为何不从当地，也就是雇用我国的藏胞做向导呢？后来我从外国人那里了解到其原因。他们说：“尼泊尔的夏尔巴人登高山的经验比西藏的藏族人丰富，还能讲英语，懂得什么样的高山物资该如何背运。每到一地，他们懂得选择适于搭帐篷的地方，并很快帮你把帐篷搭起来，让你先进帐篷休息。他们去找干净的积雪，点燃汽油炉，为你做饭、煮咖啡，他们服务很周到，很能吃苦耐劳。而中国的藏族只能当运输工，他们驱赶牦牛帮你驮运东西，往往把东西摔坏，又不懂外语，所以我们宁肯多花些钱从尼泊尔那边雇夏尔巴人，并为他们办理入中国国境的手续。”

这些年来，有的外国队到我国的新疆攀登高山，也有的去云南和四川登山，不少人仍从尼泊尔雇来高山向导和搬运工。我想，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够在邻近珠峰和其他高山地区的当地居民中，选择一批年轻的壮工，花费些时间培养他们学习英语和高山向导的本领和必要的知识吗？这不但为当地人民解决了就业，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还可以为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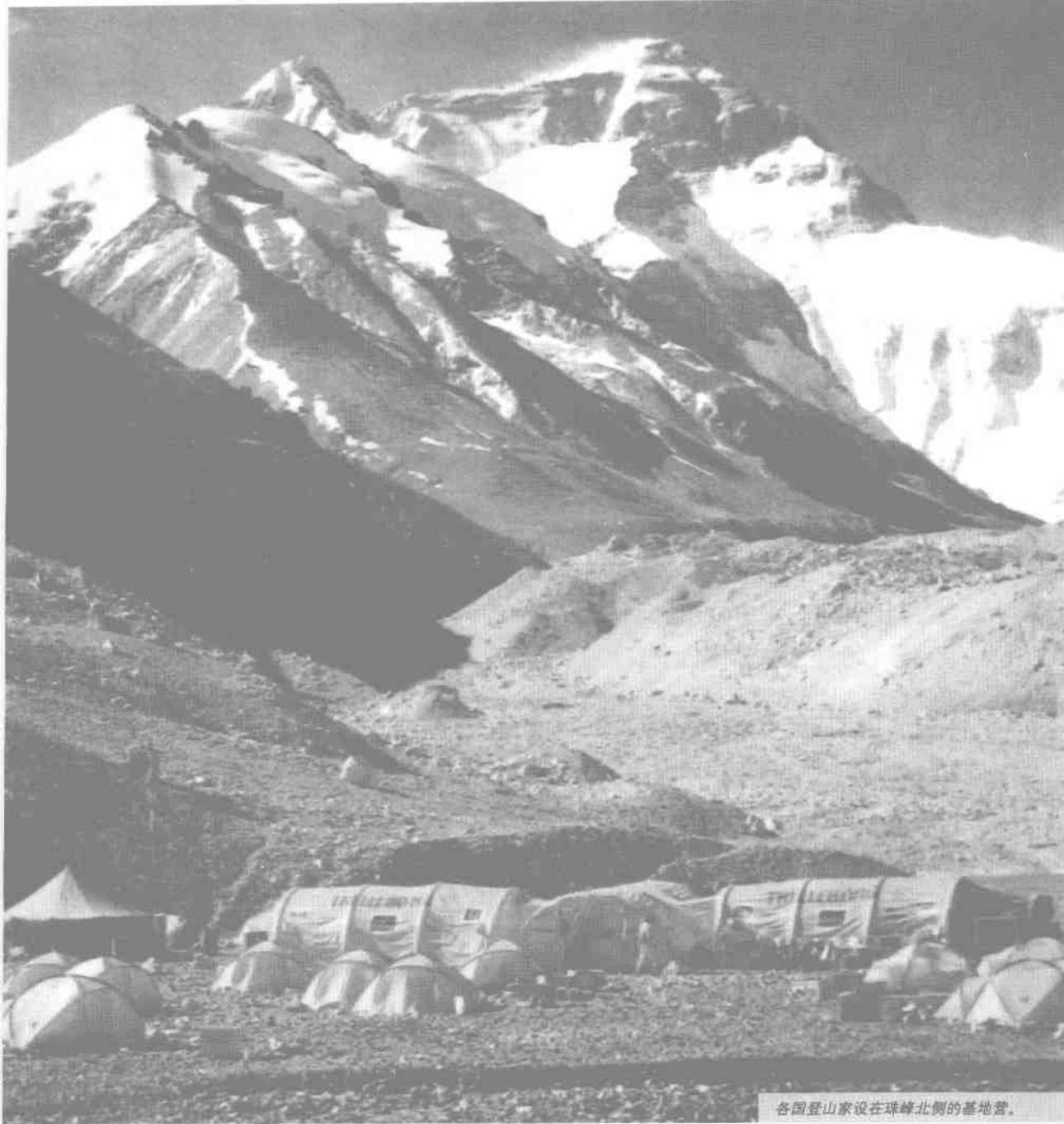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多高山的国家，与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不同，他们虽然有不少高山，每年也有不少外国团队前去登山，但近年来他们的所有高山几乎都被人攀登过。而我们的高山比他们多，还有许多高山尚无人迹，这正是各国高山探险家们向往的；我们的高山资源还正在开发之中，他们的则已经开发完了。如果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跟上形势的发展，不但能为国家增加更多的外汇收入，提高我国的登山技术和战术水平，更能为世界高山探险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或成功或失败的各国珠峰队

1986年春，法国·瑞士珠峰联合登山队，在队长托拉伊列特(J.Traillat，法国人)和罗瑞坦(E.Loretan，瑞士人)的率领下，5月7日从拉萨到达珠峰北侧绒布寺上方，主绒布冰川上海拔5260米的基地营。联合队一行10人，计划从北壁霍恩拜茵岩沟登顶。

法瑞联队共有4人登顶成功，其中两人自始至终未用氧气。用氧气的两人从基地营出发、登上顶峰到返回基地营共用了44个小时，创造了当时登顶速度最快的记录。

1986年10月，日本高山研究所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6人，4男2女，来到尼泊尔一侧的孔布冰川建立基地营，计划从孔布冰川经南坳上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队长是29岁的远藤晴行，队员冈留恒建(52岁)、松本忠则(34岁)、长尾妙子(30岁，女)，这4人都是研究高山生理和高山用氧、登山战技术的科研人员，另外一



各国登山家设在珠峰北侧的基地营。



男一女队员是他们年轻的科研助手。远藤和松本两人三年前曾攀登过珠峰。

10月10日凌晨2时，队长远藤和松本、冈留、长尾4人，在5位夏尔巴向导的协助下，从南坳(8000米)的营地出发，向顶峰冲击，当他们于上午10点左右到达8500米时，风力越来越大，人在山脊上难以站立，危险随时可能发生，迫使他们放弃登顶而下山。

1987年8月，以川上隆为首的日本防卫大学(国防大学)山岳会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24人，全是日本国防大学的教官和军事学员。川上隆本人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青年军官，也是日本国防大学山岳会的会长。他们从中国西藏一侧登山，计划从西山脊直上顶峰。他们不用当地的藏族人来搬运物资和担当高山向导，而是从尼泊尔雇来18名夏尔巴人，加上中国的联络官和翻译，日本防卫大学队共有53人。

8月4日，在东绒布冰川海拔5050米建好基地营，9月2日登顶队长横山正夫(44岁)在5800米处建好1号营地后，在返回途中不幸滑坠，被他滑坠时落下的滚石砸死。9月15日，在登顶队员向4号营地运送物资时，由于发生了60年来未有的特大暴风雪和频繁不断的大小雪崩，在到达8200米的高度时，他们已不能继续前进。10月19日宣告失败。

1987年冬，日本“冬季俱乐部”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在队长长谷川恒男率领下一行4人，于12月9日，在中国西藏一侧的主绒布冰川5260米处建立基地营。他们计划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但在北坳下方比通常的传统路线稍向东移，并在北坳上方7500米处建好4号营地。但是，1987年冬季的风特别大，简直无法通过海拔7500~7600米处的大风口，大风几次把人吹倒，他们只好俯卧、爬着慢慢向前移动，比原计划拖后了整整一个月。由于无法通过7600米的大风口，于是改变路线，从北壁上到霍恩拜茵岩沟，沿沟

一直向上攀登顶峰，但也不行。他们又改由珠峰北壁靠左侧的“诺顿岩沟”登顶，直到1988年元月8日，才在7250米处建好第3号营地，但一夜之间却被厚厚的大雪掩埋，幸好人员都及时逃了出来，多少抢出些食品和装备。他们准备休整一下再登。2月8日，队员内海正义被滚石砸成重伤，只好派一人将他送下山。这时只剩下长谷川队长和队员星野清隆，他们于12日在登到7650米时，暴风雪更大，宣告失败。

中日尼三国队员成功“双跨”

1987年2月24日，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达成协议，三国队员共265人组成中日尼三国联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其中登顶队员每个国家30人。登顶路线是：北侧，东绒布冰川—北坳—东北山脊—顶峰；南侧，孔布冰川—南坳—东南山脊—顶峰；北侧（中国一侧的北坡）三国队员于3月10日进入基地营，南侧（尼泊尔一侧的南坡）队员于3月29日进入基地营，经过一个半月的适应性训练和物资运送，完成登顶前的训练和准备工作。计划5月5日，南北两侧同时登顶，在顶峰上会师后，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的人越过顶峰，从东北山脊下山到达中国一侧的基地营，而从中国一侧上来的人越过顶峰后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下山，到达孔布冰川上的基地营。这种登山的形式，中国人称之为“双跨”，国际上称为“高山纵走”。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也是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的重大创新，它标志着高山探险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根据协议，1988年春，中日尼珠穆朗玛（萨迦玛塔）联合登山队，都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登山家参加这次“双跨”。中国队员有仁青平措、李志新、王勇峰、次仁多吉、大次仁等藏汉族中最优秀的高山探险家；日本队的山本宗彦、中村进、中村省尔、三枝照雄、山田升和尼泊尔的拉克巴索那、安格·鲁巴、森达列和巴哈杜尔等，都是各该国最优秀的登山家。

这种登山的形式，中国人称之为“双跨”，国际上称为“高山纵走”。



1988年中日
尼三国“双跨”
路线及
营地示意图。

这次登山活动，按事先三国商定的，将三国队员混合编组，共分成两个队，一队是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的队员，一队是从中国一侧登顶的队员。两队中每个结组都由三国队员组成。

日本广播公司(NHK)为这次“双跨”特别制作了超轻型的电视摄像机，并利用通信卫星将两边登山队员的活动实况，特别是两队在珠穆朗玛峰顶峰会师的场面向全世界播放。这就必须配备掌握高超摄像技术和熟练使用这些拍摄器械的摄影师，这位摄影师本人也得是有经验的登山家。

这是一次难度很大的攀登珠峰活动。尽管两个队使用传统的东北、东南山脊路线，但两边的路线长短不一，而且整个路线上的难

险地段也各不相同，要准确地掌握好时间和机会是很困难的，但这次活动的政治因素是首要的。

为了使三国登山队员能按计划在顶峰实现南北两路会师，进行编组混合，将南北两个队又各分成两个分队，南侧两个登顶分队，北侧也是两个登顶分队。其实等于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两个队，加起来实际是6个队，相当于通常一个世界最高峰登山队的六倍。再加上三方的官员、医生、教练、翻译和后勤队员，每个国家至少也要出40多人。仅以中国一侧三国混合队为例，中日尼三国各一位队长、登顶队员各7人，加上后补队员、高山向导和后勤人员(运输队员、医生、翻译、教练、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等)，总人数达152人。南侧一队同样有三位队长，加上上述人员，总人数是132人，两边人数总和超过300人(包括司机、炊事员、电台等人员)。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作为东道主，付出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日本提供了摄影和通讯器材以及部分登山装备，这笔费用虽然可观，但他们从电视转播费和广告费中所得，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回报。

整个活动从1988年3月6日开始，北侧一路于6日在东绒布冰川5200米处建立基地营，4月6日计划建好海拔8200米的第六号营地以下各号营地，并架设好电视拍摄的中继线和危险地段的保护绳索。

珠峰南侧的三国联队，3月27日在孔布冰川建好基地营，4月20日，在基地营里的日本队随队医生水腰英隆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时，死于基地营。因此，南侧一路直到4月23日才修好通往8000米的南坳的道路，这样一来，他们登顶的时间也就被迫滞后。

5月3日，一场大雪，无法前进。南侧队的队员都暂停于7400米的3号营地，等待好天气的到来。4日，日本队员北村贡(29岁)等3人开始从3号营地向上，原计划当天到达8380米的第5号营地，但这天大雪又下个不停，他们无法离开5号营地向顶峰冲击；另一

探险珠峰 ◎ 三國聯合登頂珠峰



1988年中日尼
三国“双跨”行
动中中国一侧
的联合队在艰
难攀登。

阿克布 摄

结组的中国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的安格·普巴等也在大风雪中从3号营地登上5号营地。

5月5日清晨8:55，珠峰北侧的中国队员次仁多吉(37岁)、日本队员山田升(38岁)和尼泊尔的拉巴拉(34岁)组成的第一突击组，越过8200米的第6号营地到达8610米的第7号营地之后，未作停留继续前进。12:15，次仁多吉用对讲机向基地营报告：“我们已到达雪坡！”他们从这里先向右横切一点再向左就是顶峰。27分钟之后，也就是12:42，次仁多吉、山田升、拉巴拉3人登上顶峰！

南侧队员此时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非常缓慢地用冰镐锄雪开路，在雪沟中前进。而北侧已登上顶峰的次仁多吉等三国队员为了等候他们，就在地球之巅，在零下30℃的气温中伫立。10分钟、20分钟，过了一个多小时，仍然看不到南侧队员的踪影。90分钟过去，他们所带的氧气全部用完了，次仁多吉的手脚都被冻得麻木。可中方在京的总指挥却通过对讲机命令：“再坚持半个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时基地营的队长用对讲机问：“你们还有多少氧气？”次仁多吉回答说：“没有了！连氧气瓶都扔掉了！”又问：“手变颜色了吗？”次仁多吉答：“手都黑了。”队长命令：“立即下撤！跨过顶峰从另一侧下山！”这时已是14:23，他们在顶峰无氧的情况下，已经坚持了90分钟之久。

次仁多吉等人从南侧——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下山后不久，作为第一突击组的支援组(实际上是第二突击组)的3名队员：中国的李志新、尼泊尔的拉克巴索那和日本的山本宗彦(28岁)也在大风雪中向顶峰冲击。后来，日本和尼泊尔队员体力不支，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剩下李志新一人孤军上攀。14:20，他成功登顶。李志新的任务原本是为了把南侧上来的队员接应到北侧，从北坡下山，但他在顶峰上等候了65分钟，仍不见人上来，只好下撤。

李志新的支援组之后是由3位日本摄影师：中村进(42岁，已两次登上珠峰)、中村省尔(45岁)和三枝照雄(30岁)组成的电视摄制



1988年“双跨”队员正在翻越北坳。

组，3位摄影师在支援组登顶15分钟之后即14:35也登上顶峰。摄影组不但拍摄下前两组登顶的全过程，自己也成为世界最高峰登顶的胜利者。他们当时所拍摄的画面通过卫星立刻转播传遍全世界，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15:25，从南侧上来的尼泊尔队员拉克巴登上顶峰，因风雪太大，他只在顶峰上站了一下，就很快下山了。这第一次在顶峰上的南北两侧会师，就这样错过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从北侧上来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了。山本宗彦不仅是登山队员，还是日本广播公司特派的电视摄影记者，随身携带着摄像机。

15:53，南坡上山的中国队员大次仁终于登上顶峰，但他的嗓子已经哑了，他只在对讲机里向基地营说了句：“我是大次仁！”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仁青平措和尼泊尔的安格·普巴先后也上来了。这时，从北侧上来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离顶峰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但他突然摔倒在地，由于十分疲惫，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拖着氧气瓶和摄像机，在冰雪和岩石上向顶峰爬去，爬一段，休息一会，喘几口气，再爬，再歇，再喘……终于在16:05爬上顶峰！南、北两侧队员在顶峰上紧紧地握手拥抱。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拼搏，中日尼三国队员终于在世界最高峰上会师了。这天共有12名队员从两侧登上顶峰，在顶峰上会师后交叉跨越珠峰从另一侧下山。从北侧登上顶峰的队员有9人，其中有次仁多吉和李志新两位中国队员，次仁多吉实现了双跨；日本队员5人，尼泊尔有2人；从南侧登上顶峰的队员有3位中国队员，他们是仁青平措、大次仁，尼泊尔2人，日本1人。三国两侧队员当天都平安回到突击营，后来又都平安回到基地营，无一伤亡。

这次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创造了六项新的珠峰世界记录：人类第一次从南北两侧跨越珠穆朗玛峰成功，第一次实现了在顶峰会师，第一次完成了电视现场实况直播，第一次在高空使用飞机拍

南、北两侧队员在顶峰上紧紧地握手拥抱。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拼搏，中日尼三国队员终于在世界最高峰上会师了。

摄登顶实况，在珠峰登山史上第一次在一天之内有12人登顶，登顶队员在世界最高峰顶上停留的时间最长。

按原计划，中日尼三国联合队于1988年5月5日中午12:00~13:00间，至少有两个组，即从南坡上来的一个组和从北坡上来的一个组，必须同时到达顶峰，在顶峰会师。可这是一个多么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啊！对三国队员来说，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其实，这个计划以及最高指挥者们的决定本身就是不正确的，缺乏科学性。

这个计划的制定和最后的决策者完全没有考虑珠峰地区地形、气象的变化，更没有考虑珠峰7000多米以上的南坳或北坳以上的珠峰天气的随时变化；没有考虑珠峰南坡、北坡两条登顶路线上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各自的难险路段；没有考虑当时各组3个队员中每个队员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情况，也完全忽视了通讯联络、及时沟通的需要与可能……硬性规定5月5日中午12:00~13:00在顶峰会师，这对三国队员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都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日本队员来说，情况就更为严重。日本队员都是富有经验的喜马拉雅高山登山家，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能登上顶峰，成为南北会师“双跨”的参加者。但每一个结组却规定只能是3人——来自中日尼3国的3人，日本队一共有20多位登山家，队长让谁上不让谁上？这是很令日本队伤脑筋的问题。因为所有日本队员必须自行负担全部登山费用和往返日本—珠峰的所有差旅、食宿费用。对于中国和尼泊尔队员来说，他们虽然没有个人出资的负担，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在规定的这一天、这一时刻到达顶峰；万一方暂时上不来，一方先上去了，那么，他得在8848米的高空里等待多久才能等到会师？等一小小时、两小时还是更多时间？有没有考虑登山家的身心状况？这种不按实际情况，武断作出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它使所有的参加者都感到为难和不满。

关于顶峰会师的实际情况：

5月5日，北侧一组，由中国的次仁多吉、日本的山田升和尼泊尔的拉巴于早晨8:55从8610米的东北山脊上的第7号营地出发，12:42登上顶峰，他们是按规定时间和计划登顶的。他们三人到达顶峰之后，原定应与从南侧上来的一组三人在顶峰会师。

但是，从南侧上来的中国队员仁青平措(36岁，优秀藏族登山家)、日本的三枝照雄、尼泊尔的安格·普巴、中国的大次仁等4人组成的突击组，5日晨8:25离开突击营地后，走不远，日本的三枝照雄已行动困难，其余3人踏着深到腰部的积雪极其艰难的向前移动，他们实际上是在深厚的雪坡上边挖雪沟边前行，行动之缓慢非常人可以想象。而此时已到达顶峰的次仁多吉等3人已经在8848米的高寒极点上等待了90分钟，他们氧气瓶中的氧气已消耗殆尽，从南侧攀登的仁青平措等人这时仍然踪影全无。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次仁多吉用对讲机向北侧基地营的指挥者报告，“我们一点氧气都没有了。我的手已被冻黑，没有知觉了！”而远在北京的那位总指挥，根本不考虑当时的危急情况，竟命令他们再坚持等待南侧的队员！

时针指向下午2:23，次仁多吉小组在世界最高极上已经伫立90分钟，一个半小时！寒风劲吹，空气稀薄，他们从第6号营地出发，经第7号营地未作休息，继续向顶峰冲击，到达顶峰后，又在没有人工供氧的情况下停留90分钟，还能与下边基地营通话，这在珠峰探险史上是空前的。

ABC (C2) 6450 这天中午的顶峰会师已完全不可能了。

次仁多吉等只好从南侧下山。这时在北侧突击营地担任对次仁多吉等人支援的李志新(中国高山登山的新秀，地质大学毕业生、多次攀登过高峰)在14:20实现单身一人登顶的中国新纪录。他在顶峰等候南侧队员达65分钟之久，仍不见南方来客，只好下山。

再说南侧一组，直到15:25，尼泊尔的安格·普巴才第一个登上

顶峰，那时的风特别大，他还没站立好，就被大风吹倒了。15:53，中国队员大次仁登上顶峰，他只在对讲机里用嘶哑的嗓子说了一句“我是大次仁！”在他后边登顶的是中国另一名队员仁青平措。此时只有日本的山本宗彦还在向顶峰冲击。

经过一整天的拼搏，三国两侧共有12人成功登上顶峰，实现了会师和交叉下山，其中北侧有9人登顶（中国队员次仁多吉和李志新，日本5人，尼泊尔2人），南侧有4人登顶；完成跨越的队员中国3人（次仁多吉、大次仁和仁青平措）、尼泊尔2人、日本1人。这天夜里，三国队员均安全返回突击营地，无一伤亡。

总之，三国队员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实现了顶峰会师的政治目的，也为世界高山探险作出了新的贡献。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了要在顶峰会师，中方的最高指挥竟然不顾珠峰峰顶的具体情况，命令队员在无人工供氧的情况下，在顶峰停留长达90分钟。这种武断的、完全无视实际情形的瞎指挥，简直是草菅人命！次仁多吉此后心脏一直不好，身体也大不如前，一个优秀登山家的运动生涯，就此打上句号！

对这次登山的结果，尼泊尔和日本方面都表示遗憾，因为他们上去的人太少了；真正实现会师的只有日本的摄影师和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也就是说，没有实现原定会师的时间、人员，而是计划之外的人员和时间。但是，这次登山事前事后的宣传报道却是世界登山史上空前的宏大，其迎送活动、庆祝宴会场面之大也是空前的，当然耗资之巨也是史无前例的。毕竟，这是一次政治气氛很浓的攀登活动。

22小时登顶与乘滑翔器下山

1988年9月，法国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6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9月16日，只有队员M.巴达尔登上顶峰，其他5人分别在登顶途中退下。这位巴达尔从基地营出发到登顶仅用

22 小时，是当时攀登珠峰速度最快的，也是一项新的攀登珠峰的世界记录。

也是在这个月，法国第二支珠峰登山队一行4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21日，4人全部登上顶峰，下山时 J.M. 鲍恩从峰顶乘滑翔器下山成功，创造了又一项攀登珠峰的世界新记录。

这年秋，一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4人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队长为伊凡·菲阿拉，他们选择1975年秋英国人开创的珠峰西南壁路线，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次攀登珠峰。他们没有雇用夏尔巴向导，只雇了些夏尔巴人为他们从机场将登山物资背运到孔布冰川中游的基地营。之后，就完全依靠队员们自己的力量，将这些物资和装备背运到83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10月17日，伊凡等4人从8300米的营地直上西南陡峭的岩壁，只有1人登顶成功，其他3人失踪，此后也再未找到他们的踪迹。

1988年秋，日本冬季俱乐部“秋季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再次前来攀登珠峰。一年前的冬天，他们于12月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登顶失败，他们决定秋季再来一次，队长仍是长谷川恒男，一行4人。

这支日本登山队计划从传统的东北山脊登顶，基地营设在海拔5200米的绒布寺上方，就是中国队1960年和1975年攀登珠峰时的基地营营址。10月11日，他们开始侦察路线，到达6700米的北坳上方。11月6日，由队长长谷川恒男、队员星野清隆(28岁)、内海正义(32岁)3人在北坳上方的7350米处建立第3号营地。24日夜间，一场大雪崩从上方袭来，虽然没有击中他们的这个营地，但情况十分危险，雪崩带来的强风几乎把所有的帐篷撕碎，而雪崩所形成的雪粉则掩盖了整个营地，加之雪崩过后，大风不停地吹刮，迫使他们立即下撤到基地营。直到29日，他们再次离开基地营上山，重新修建第3号营地，这次把营地移到上方一点。12月1日，他们从3号营地上攀到7800米，但是严寒(零下28℃)和强风再次使他们

12月1日，他们从3号营地上攀到7800米，但是严寒(零下28℃)和强风再次使他们难以坚持，只好撤退，宣告失败。

但 28 日起，一连三天大雪，只好暂时下山返回基地营，待到天晴后，再冲击登顶。

难以坚持，只好撤退，宣告失败。

1989 年夏，大西宏率领的日本“加德满都登山俱乐部”珠穆朗玛队共 7 人。8 月 18~25 日，登山队 7 人先后抵达基地营，因为这些人当时都参加了日本攀登喜马拉雅其他高峰的登山活动，活动结束临时召集到一起，他们都是 1985 年才成立的加德满都登山俱乐部的会员。9 月 17 日，他们在洛子峰南坡——南坳下方 7300 米处建立 3 号营地，19 日在南坳上方建成第 4 号营地，25 日已将登顶必需的食品和装备运达 8300 米处的第 5 号营地，准备从这里沿东南山脊直取顶峰。但 28 日起，一连三天大雪，只好暂时下山返回基地营，待到天晴后，再冲击登顶。

进入 10 月，洛子峰南坡连日雪崩不断，日本队在这里固定好的保护绳索几乎都被砸坏，队员们重新架设保护绳索，5 日、6 位队员从南坳出发向顶峰冲击，但天不作美，到 8200 米处又来了雪崩，6 位队员只好下山，再作打算。13 日，进行第三次冲击，这次 7 人全部参加，但当他们行进到 8600 米时，有两人因身体不适撤退，其他队员三谷、大西、山本等 3 人以及奇林·拉玛、乔尔丁两位夏尔巴向导共 5 人登上顶峰。14 日，7 人第四次向顶峰冲击，其中三人试验“无氧登顶”，但在 8500 米附近，遇到大风的强烈袭击，被迫撤退，从而结束了这次登顶活动。

1989 年秋，以尾形好雄为队长的日本喜马拉雅协会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 9 人，选择从中国西藏一侧的珠峰北壁路线登顶。日本喜马拉雅协会创建于 1967 年 10 月，曾多次组织喜马拉雅的高山攀登活动，每年都派队前来喜马拉雅山登山。8 月 30 日，他们在主绒布冰川 5500 米处建立基地营，9 月 12 日起在北壁上方侦察并设置保护绳索，24 日，在 6900 米处建好 1 号营地。10 月 12 日建好 7500 米处的第 2 号营地，第 3 号营地建在 8000 米，然后从“霍恩拜茵岩沟”直取顶峰。但当他们到达岩沟 8200 米处时，大雪下个不停，风力也很大，只好撤退。

登顶人数最多的中美苏珠峰联合队

1990年春，由中美苏三国47人组成的“中美苏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队”，在三国队长——中国的洛桑达瓦、美国的威特克和苏联的沙达也夫的率领下，3月8日到达绒布寺上方5200米处的基地营，这个基地营就是1960年、1975年中国队的基地营址，也是1988年中日尼三国联队北侧的基地营址，它距上方的东绒布冰川20公里，距下方的绒布寺10公里，是卡车可以直达的地方。

联合登山队的登顶路线沿传统的东绒布冰川—北坳—上东北山脊登顶。4月6~12日，联合队通过北坳和7600米的大风口地区，队员有中国的加布、大齐米、达穷、洛则和仁那5人和3位苏联人，美国队两人因身体不适留在北坳上方的营地。

由于高空风特别强大，经三国队长协商，决定将原定在22日——世界地球日那天的登顶，推迟到5月4~7日相机而行（这个决定比较合理，因为它已考虑到天气和人员身体情况等因素）。因此，早已在美苏队员之前到达8300米第6号营地的5位中国队员，暂时下撤到6300米的前进营地休整，他们在下撤途中，先后在8000米和7000米处遇到正在运输物资的苏联和美国队员，在完成了8300米以下各号营地的物资运送任务之后，联合队全体队员返回基地营休整。

5月1日，联合队的第一突击组6人，离开基地营上山；3日，到达7790米的第5号营地，计划次日——4日到达6号营地，5日到达8700米的7号营地，也就是突击营地，6日登顶。但4日风云突变，暴风夹雪，无法行动，队员们在5号营地等待天气好转。

5日，第一突击组顶风雪向6号营地前进，下午安全到达。6日天气好转，第一突击组6人于中午12时离开6号营地向突击营地前进，但这6人都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不仅速度较慢，而且走错了路，后来慢慢转回“第二台阶”（8680米）下方，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从7028米的4号营地出发的第二突击组6人，于5日下午4:30到达



联合登山队的登顶路线沿传统的东绒布冰川—北坳—上东北山脊登顶。

按照高山探险运动的惯例，凡登上一座高峰的人，都要在顶峰上埋藏纪念品或登顶纪念文字记载。



7790米的5号营地。

7日10:30，第一突击组从突击营地向顶峰冲击，但由于高空风大，于11:38才登上“第二台阶”；12:42，中国队员加布等人已到达8760米；12:55，加布通过对讲机向基地营报告，他和大齐米，还有美国队员林克走在前边，正在冲向顶峰，美国队员高爾和苏联队员阿尔先季耶夫和伦加科夫在他们后边40米，加布准备等他们上来，一齐登顶。13:13(当时是北京夏时制时间)，加布、大齐米、美国的林克、高爾和苏联的阿尔先季耶夫、伦加科夫6人登上世界最高峰。当时顶峰风力不大，气温比较温暖，三国6位队员在此停留了92分钟(均携有氧气)，拍照、寻找其他登顶队所存放的登顶纪念物。按照高山探险运动的惯例，凡登上一座高峰的人，都要在顶峰上埋藏纪念品或登顶纪念文字记载。下一次登上顶峰的人要把前一次的登顶纪念物或文字记载找到，并寄回原放置者或所属登山组织，以证明对方确已登顶，同时也证明自己已登上顶峰。当然，他也必须在顶峰上放置自己的登顶纪念品或文字记载资料。不过，这次三国联合队只找到了不久前登上珠峰的尼泊尔队留下的登顶纪念物，没能找到中国队1975年专门安置在顶峰上的金属觇标(其实这个觇标在1982年之后就不见了，是被人拿走还是被冰雪所掩埋，就说不清了)。

14:45，6人开始下山，两位苏联队员体力消耗过大，留在突击营地过夜。两位美国队员于20:00到达第5号营地，在此过夜。只有两位中国队员返回到6500米处的3号营地，时间是21:30。可见中国藏族队员身体素质之好。

在第一突击组，各国都有两名队员成功登顶并返回基地营，三国队长经过协商，决定下一步各国自行决定本国的登顶队员，自行登顶，不受人数和结组的任何限制。这样，5月8日，苏联的采力谢夫、戈尔宾科，美国队员E.K.维斯塔斯3人从6号营地出发，登顶成功；9日，夏令时间11:30，中国队员达穷、女队员桂桑和美

国的Y.R.威德登顶成功。桂桑是中国第二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性。27分钟后，也就是在11:57，中国队员洛则、仁那登顶成功。12:16，桂桑和美国的威德下山，33分，洛则和仁那下山。

5月10日，三国联合队的最后一批登顶队员共7人，清晨7点从6号营地出发，中国队员旺加和加措一直在前领路，到达8700米时，加措体力不支，而且两脚打泡，只好停止前进，旺加单身一人冲向顶峰，10:25成功登顶！正巧与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的几位外国登山者相遇。这时，苏联的托卡列夫、莫什尼科夫、伊尔金斯基、女队员伊万诺娃，美国队员M.斯科特·塔克等5人相继登上顶峰。伊万诺娃成为全苏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性，也是全世界第十位登上珠峰的女性。

中美苏联合登山队先后共有4批20人成功登上珠峰，无一伤亡。这在珠峰登山史上是登顶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中国7人，美国5人，苏联8人，中苏方各有一位女队员。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团结友好的国际合作登山活动。

切森单人“无氧”登顶

1989年春，以意大利著名高山登山家、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征服者R.梅斯纳为首的国际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由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四国11名队员组成，预计从珠峰的西山脊经北壁霍恩拜茵岩沟登顶，但他们只到达7200米的高度就因大雪而撤退了。

1989年冬季，在扎瓦达领导下，波兰冬季珠穆朗玛登山队9名队员来到珠峰下。队员中的J.库古奇卡与意大利的R.梅斯纳一样，是登上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英雄。这支波兰登山队选择的登顶路线是从孔布冰川上游、珠峰东南山脊的一条支山脊上山，绕过南坳，从这条山脊向上走到支山脊的尽头登上东南山脊，再沿东南山脊登顶。他们选择的是珠峰登山的“季节禁区”——冬季，若能成

这在珠峰登山史上是登顶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中国7人，美国5人，苏联8人，中苏方各有一位女队员。

不过，5个月后，苏联队登上珠峰，发现了切森的登顶纪念记载，证明他确实登上了这座世界最高峰。

功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当他们到达东南山脊8350米处，眼看顶峰在望的时候，闻名世界的优秀高山探险家、波兰人心目中的英雄、31岁的库古奇卡却不慎滑坠身亡，全体队员立刻放弃登顶下撤，结束了此次登顶活动。

1989年冬，法国珠穆朗玛冬季登山队，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山，这支6人队，一开始就不顺利，不断减员，最后只剩下一个M.巴达尔。11月29日，巴达尔到达7000米处，因山坡上积雪深达腰部以上，雪崩不断，只得退回。另外，一支由C.勃罗菲(法国)和E.卢卡斯(西班牙)率领的法国西班牙冬季珠穆朗玛联合登山队一行8人，也是从孔布冰川经南坳，上东南山脊的传统路线登顶。但由于极度寒冷，气温降到零下36℃，12月28日，联队从7200米撤退。第二年，勃罗菲又组织了另一支法国秋季珠穆朗玛登山队，但他们也只到达南坳下方7600米处，就无法前进，再次遭受失败。

1990年春，南斯拉夫的T.切森单身一人从东南山脊的支山脊登上东南山脊，沿东南山脊于4月22日清晨离开他的基地营。因为他没有雇用夏尔巴人，基地营也就是他的一顶小帐篷，这顶小帐篷就是他的随身营地。23日晚间，他到达7500米处，在此宿营过夜，24日下午7:00到达8200米处，25日14:20登上顶峰。切森下山后，大吹他单身一人，既没有夏尔巴人协助，也没用氧气，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此举召来了在他之前单身一人登上珠峰的R.梅斯纳的攻击，他在报纸上撰文，公开指责切森欺骗世人，认为切森不可能自始至终一人，不用氧气登上珠峰。不过，5个月之后，苏联队登上珠峰，发现了切森的登顶纪念记载，证明他确实登上了这座世界最高峰。

这年秋，由A.谢甫琴科率领的17人苏联珠穆朗玛登山队，选择从东南山脊的支山脊先登上东南山脊8200米处(这条线不经过南坳，而是在南坳下方左侧的支山脊，也可以叫南山脊)，沿东南山脊登顶。他们的第7号营地位于8300米的东南山脊与其南支山脊

交汇处，由于积雪又硬又厚，苏联队挖雪洞作为宿营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科学的，因为挖雪洞宿营比用帐篷更安全，雪洞不但保暖，还避风。苏联队于10月16日19:25，两个结组共9人登上珠峰。

同年秋，以桑原信夫为队长的日本、韩国联合珠穆朗玛登山队一行14人，其中日本3人，韩国2人，还有9位夏尔巴向导。这是日本与韩国首次联合攀登珠峰。他们取道东南山脊的传统路线，10月2日，首次从南坳向顶峰冲击，但因风大被迫暂停；6日，第二次向顶峰冲击，日本队员杉山耕一(22岁)、韩国队员金燮实、朴勇、朴清武和夏尔巴向导达瓦·边巴等6人，除日本队员杉山在8500米处疲劳过度退下，其余5人均登上顶峰。10月7日，随队的韩国记者韩杉奉为拍摄顶峰图片，单身一人，未使用氧气向顶峰冲击。他在珠峰的南峰下方与前一天登顶的人相遇，还使用了下山者所携带的氧气，但他究竟到没到达顶峰？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因为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8日韩联队组织第二次冲击登顶，日本队员柳原从南坳上方8200米的营地出发，在南峰稍下方发现了韩国记者韩杉奉的背包，但没有找到这位记者。这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世纪末创造奇迹

1990年以后各国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团队和个人一年比一年多，形成第三个“珠穆朗玛热”。在这个“热”里，出现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特殊的、更感人、更有趣的攀登事迹。

1990年10月7日，一对斯洛文尼亚夫妇安德列吉和玛利娅，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这在珠峰登山史上是第一次。

同日，法国的简·诺耶尔·若切和他的长子贝尔特兰德·阿卡·曾布隆·若切二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顶峰，并从顶峰上驾驶滑翔伞飞翔下山成功，他们创造了两项攀登珠峰的新记录：父子

同时登顶和驾滑翔伞安全飞返山下。儿子阿卡·曾布伦当时刚满17岁，是历史上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最年轻的人。

1990年春，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53年5月29日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首次登上珠峰的勇敢者、新西兰的埃德蒙特·希拉里的儿子彼得·希拉里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他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联合珠峰登山队的队员。

同年5月11日，澳大利亚的提姆·马卡提尼·斯纳佩单身一人从东南传统路线“无氧”登上珠峰。

1991年5月，历史上第一支尼泊尔夏尔巴人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这是一支完全由尼泊尔的夏尔巴人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由尼泊尔王国政府补贴，夏尔巴高山向导们自己出装备。队员中的许多人过去只是为外国登山团队或个人服务，都是多次登上过珠峰的高山向导，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攀登高山经验。2日，他们从基地营出发，先后经过6000、6400、6900、7500和8100米的各号高山营地，5月8日12:30，3人全部登上顶峰，下山的速度更快，只用了一天半，10日下午4:20安全返回基地。不论战术还是速度，这支队伍都是当时最好的。

1991年，以贯田宗南(40岁)为首日本珠峰登山队一行2人，选择从中国一侧的东北传统路线登顶。3月6日进入尼泊尔，12日到达珠峰南侧山下，为了进行适应性锻炼，两人于19日先登上位于珠峰附近海拔6160米的爱兰德峰和6273米的巴尔卡摩峰(爱兰德峰之右邻)。在这个适应性锻炼过程中，贯田宗南曾被滚石砸断了一根肋骨，或许是珠穆朗玛女神保佑他，后来这根肋骨自然地恢复了。4月9日，他们进入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珠峰北侧绒布冰川下方5100米处建立基地营，19、21日，他们两次往返于基地营和7007米的北坳，运送登顶必需的食品和装备。之后，他们返回尼泊尔加德满都休整了几天。5月1日，从加德满都雇来8位夏尔巴向导，一同进入西藏一侧的基地营，3日，在5500米处建立1

号营地，4日在6000米处建立2号营地，3号营地建在6500米处，13日建好北坳上方的4号营地，14日在7790米处建5号营地。攀登过程中，他们从5号营地开始用氧，15日到达8200米处，并往返于北坳之间运送食品和装备，但是队长贯田身体不适，伤痛，不得不去协格尔的旅馆休养了几天。26日贯田和队员二上纯一（39岁）在两位夏尔巴人的支援下，建成第6号营地。27日，贯田和二上分成两组，贯田和夏尔巴人尼玛一组，二上与夏尔巴人菲觉一组，几乎同时于凌晨1:45离开第6号营地向顶峰冲击，当地时间13:00两组4人均登上珠峰顶峰。贯田后来在他的文章中说，他们通过“第二台阶”时，就是从中国队安放在那里的金属梯子爬上去的，所以没有费太大的力。但是，下山时，队员二上在刚刚离开顶峰下行了150米左右就滑坠了，是否坠进了东壁下方，不得而知。因为二上当时急于下山，而与他一起结组的夏尔巴向导菲觉离他尚有一段距离，没能看清他是从哪里滑坠下去的。当时贯田、尼玛和菲觉曾努力寻找过，但不见踪迹，只好自己下山了，21:30，到达6号营地（8200米）。这个两人珠峰登山队，就这样以百分之五十的损失结束了他们的活动。

从事高山登山活动的人都知道，登上顶峰并不是胜利，只有在登顶后安全下山、返回基地营才算是胜利或成功。单单登上顶峰，下山时滑坠、死亡，这就不能算是成功。所以。虽然1978年以后有不少人主张单身一人攀登珠峰，而且他们也曾经取得过成功，但死亡的人也不算少。客观地说，高山探险本来就是一个集体项目，要靠集体的团结、友爱、智慧来共同克服各种困难和险阻，这些才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主张多人合作的。

1991年春，另一支日本明治大学珠峰登山队一行9人，在队长平野真市（52岁）率领下，拟从中国西藏一侧的珠峰东壁康雄冰川上山，从东壁上攀到南坳（8000米），然后沿东南山脊登顶。这是过去美国队曾使用过、由美国高山俱乐部队开创的新路线，也是比较难

从事高山登山活动的人都知道，
登上顶峰并不是胜利，只有在登顶后
安全下山、返回基地营才算是胜利或
成功。

10年前，明治大学队曾对珠峰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攀登。

险的一条路线。日本明治大学山岳会，在日本的各个地方性或大学的登山组织中，是比较强的，历史上日本最著名的高山探险家植村直己就来自这个协会。10年前，明治大学队曾对珠峰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攀登。他们这次本来还想从西山脊登顶，但主流派认为再从西山脊攀登是不吉利的，于是改由更难更险的东壁登顶，这不完全是美国队开创的东壁路线，而是在美国队路线旁边的一条小支山脊，即从康雄冰川先登上东壁的一个凸起的小支山脊，再从这个小支山脊登上南坳上方，之后沿东南山脊登顶。

明治大学队从尼泊尔雇用了400名夏尔巴人为他们搬运物资，从尼泊尔运到中国西藏珠峰东壁下方的基地营(5400米)，再从基地营向高山上各号营地背运物资。这项工作用了整整12天。4月17日，开始攀登活动。他们从康雄这条巨大的冰川的最右端的冰瀑区，登上东北山脊的东侧小支山脊，21日在5900米处建1号营地，30日在6100米处建2号营地。这时从上边下来的雪崩频繁，而且不断有冰崩，他们只到达了6400米的东北东支山脊上，就无法再前进了。不少物资虽然都已运到了1号营地，但全都被雪崩埋没或冲走了。日本明治大学队只好宣告失败。

1991年的第三支日本“G攀登俱乐部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8人，在队长岩添保夫(41岁)的率领下，于9月份拟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这个“G攀登俱乐部”于1984年2月组建，是从日本“绿山岳会”中分裂出来的。10月5日，他们登上东南山脊的8750米后，就再也上不去了，原因是风大雪深，这次活动失败。1991年冬季，日本群马县山岳会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在八木(45岁)率领下，包括医生记者共17人，于11月11日在孔布冰川上建立了基地营。12月1日，他们已经越过6000米下方的冰瀑区，在6020米处建成1号营地，后来又在6500米处建成2号营地，并开始向珠峰西南壁进行侦察。11日，在7650米处建成第4号营地，计划从这里向上攀登时再使用氧气，并在15~16日两天内通过珠峰南壁上偏左

侧的一条冰沟槽。这个冰沟槽长达 100 米，宽 3~4 米，平均坡度为 50°。他们本拟在这个槽上 8350 米处建 5 号营地，然后直冲顶峰。但 24 日一场大风，特别是夜间风更大，把第 2 号营地上大小共 10 顶帐篷全部吹破撕裂，无法住人。队员们只好暂时撤退返回基地营，等待好天气的到来。1992 年 1 月 8 日，为了重新修建 2 号营地，并争取建成 5 号营地，队员佐藤光由和名塚秀二两人再次从基地营出发上山，但从 17~24 日，整整刮了一周的大风，队员只好再回到基地营休整，等待好天气的到来。29 日，虽然有两人上到了 5 号营地，但强风又把他们吹回来了。最后直到 2 月 9 日，天气仍无好转的迹象，而且在攀登西南壁时有三人被落石砸伤，4 人冻伤。2 月 14 日决定撤退。

冬季从西南壁上攀登珠峰，虽然先后已有 4 起，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高难度。攀登不能带手套，可是严冬季节不带手套是不行的，因为手指与冰冷的岩石接触很快就会冻僵，不能抓握住岩石上的支点。再就是落石太多，这些落石不像一般的滚石，而是因为时常下雪使浮石重量加大，加上大风，高处的石块常常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落下来砸伤人，往往鸡蛋大的一块浮石砸在头上就能致死。几年来各国健儿都想创造突破严冬“季节禁区”，从最难攀登的西南壁上登上珠峰的记录，却多半无法实现。

102 人登顶的 1992 年

1992 年春，一支由日本和苏联高加索登山俱乐部(CIS)组成的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队，从中国一侧尚未有人登过的东北东山脊登顶。所谓东北东山脊，就是从东北山脊东侧的支山脊上登上 7800 米处的东北山脊，再从东北山脊登顶，即不走北坳，而从珠峰东侧先登上东北山脊东侧的支山脊——东北东山脊，再上到东北山脊。这样不但绕过了北坳，也绕过了 7600 米附近的大风口。

日方队长大宫求(43 岁)率领日本队 11 人，苏联高加索登山俱

后来他们把照片寄到英国给了伯宁顿，被确认为鲍特曼。



乐部队 4 人由瓦列里·弗里奇加迪(Waleli Fliechikadi, 40 岁)率领。日本队从东京飞上海，再转飞拉萨进入西藏一侧的珠峰山下基地营；苏联队 4 人经乌鲁木齐飞往拉萨，进入基地营。他们从尼泊尔雇用了 42 位夏尔巴高山向导，4 月 2 日在基地营集中。3 日在东绒布冰川上建好基地营，此后在 5500 米处建 1 号营地，6000 米处建 2 号营地，从这里登上东北东支山脊。18 日，在 7990 米处建好 5 号营地，5 月 6 日修好通往 8270 米的道路，16 日 4 名苏联队员在 8360 米处建 6 号营地，计划 17 日向顶峰冲击，但因强风而暂停，返回基地营休整。4 天后，准备第二次冲击顶峰，由夏尔巴人达娃次仁和夏嘎两人背运物资送上 6 号营地。22 日，日本队长大宫和队员星学(28 岁)两人从 5 号营地出发前往 6 号营地，走到中途由于雪深及腰，过于疲劳，他们只好在中途过夜，第二天队员星学单人向 6 号营地前进，后失踪。24 日，苏联队员决定不再突击顶峰，而是上山去抢救已被冻僵的日本队长大宫。当天下午 2:30，他们在山上找到了大宫队长，但大宫已不能行动。4 位苏联队员抬着他下到北坳上方的德国珠峰队 4 号营地，在那里休息了一夜，并使用德国人的氧气对大宫进行抢救，25 日返回基地营。由于苏联队员已没有氧气可用，决定全部撤退。但苏联队员和那两位夏尔巴人曾在 8250 米处发现了一具白人遗体，他们拍了照片，估计可能是 1982 年春，由伯宁顿率领的英国东北山脊队失踪的两名队员(约翰·塔斯卡和彼得·鲍特曼)之一的遗体。后来他们把照片寄到英国给了伯宁顿，被确认为鲍特曼。

1992 年春，在尼泊尔一侧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的外国队共有 9 个，分别为：

印度珠峰队；

新西兰珠峰队；

荷兰珠峰队；

美国珠峰队；

苏联珠峰队；
西班牙珠峰队；
英国珠峰队；
奥地利珠峰队；
保加利亚珠峰队。

这9个队都取得了登顶成功，共有65人登上顶峰。几乎同时，从中国一侧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的有中国香港登山队，队员湛易佳成功，成为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中国香港健儿。加上另外4人从中国一侧登顶成功，这个春季，共有70人登上珠峰。

1992年秋，英国队、意大利队和南斯拉夫队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共有32人成功，加上春季的成功人数，1992年共有102人登上珠峰顶峰，是历史上登顶人数最多的一年。



攀登珠峰的各种第一

1993年4月，一支由9人组成的尼泊尔男女混合珠峰登山队，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25日，5名队员登上顶峰，其中惟一一位女性、28岁的巴桑·洛姆(夏尔巴人)，是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尼泊尔妇女，不幸的是，她在下山途中因滑坠身亡。

5月，由祖国大陆和台湾组成的中国海峡两岸珠峰联合登山队一行18人，计划从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5日12:40，共有6名队员成功登顶，他们是大陆的普布、其米、开村、加措、王勇峰和台湾的吴锦雄。吴锦雄是中国台湾首位登上珠峰的人，这对增进祖国两岸人民的友好和团结，是一件很好的事。

1993年是人类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的40周年。在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前来攀登珠峰的各国高山登山队达15个294人之多。仅5月10日这天，从珠峰南北两侧登上顶峰的人数就达81人之多，是历史上一天之内登上珠峰最多的。

1993年起，尼泊尔政府将攀登珠峰的注册费从10000美元提高到50000美元，使各国登山者感到吃惊。费用五倍增长当然不是一件小事，但尽管如此，每年春秋两季甚至严冬季节和雨季前来攀登珠峰的团队和个人仍然有增无减，尼泊尔政府的外汇收入自然也多了起来。

1994年，居住在南美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人R·弗朗格·撒列斯于10月7日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这一天正是他的70周岁生日。他是历史上登上珠峰的勇士中的最年长的。而在1990年的10月7日，法国17岁的贝尔特兰德·阿卡·增布隆·若切与他的父亲，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安德列吉和玛利娅夫妇，也都登上世界最高峰，这个奇妙的巧合，能不能说秋季攀登珠峰，10月7日是个“吉日”呢？

1994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日本群马县山岳会登山队和队长八木，不甘心1991~1992年跨年度的严冬季节从西南壁攀登珠峰失败，于1993年12月18日原班人马再次在严冬季节从西南壁攀登珠峰。全队8人中，有7人于1994年元月9日实现了理想。他们说：“我们洗掉了1991~1992年失败的耻辱！”日本群马县山岳会队，成功地创造了一项严冬季节从西南岩石峭壁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新记录。高山探险确实磨炼人的意志。

1994年5月，中国台湾省珠峰队从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有两人登顶成功，但下山时队员石方方不慎滑坠遇难。

1995年春，日本大学(这是日本一所私立大学)珠峰登山队一行8人，在队长平山善吉带领下，前来中国西藏，拟从东北山脊左侧的支山脊——东北东山脊登上东北山脊，沿东北山脊登顶。此前，已经有7支外国团队希望从这条路线登顶，但都失败了。日本大学队在5月11日这天，有4人成功地从这条路线登顶。

1995年春，另一支吸引全世界注目的珠峰登山队是美国队，他

们8人，于4月6日在中国西藏一侧珠峰山下5260米处建立基地营，选择的是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特别是1924年英国人走过的、经北坳登上东北山脊的路线登顶。因为队员中有两位是来自南非麦尔布隆的英籍登山家，一位是1924年失踪的乔治·马洛里之孙G.L.马洛里，另一位则是其父约翰·马洛里。1924年，乔治·马洛里失事时，约翰才4岁，但1995年他已71岁高龄，不可能上山了，算是陪儿子前来。两位马洛里的加盟，使这支美国队既要从东北山脊登顶，又要在攀登和下山过程中寻找乔治·马洛里的遗体或遗物，为“早在1924年英国人就已经登上珠穆朗玛峰”之说寻找证据。而马洛里后人的亲自上山，哪怕只找到一点点痕迹，也将是意义非凡的。5月24日，美国队有4人登上珠峰，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失踪者的任何迹象。

这年5月，英国女攀岩能手A.哈克莉渥丝单身一人“无氧”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单人“无氧”登上最高峰的女性，时间是13日。当年她已32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94年秋天，她曾从珠峰西山脊登顶，可惜失败了。这次的成功，酬了英雄志，或许更鼓舞起她的斗志。她在当年8月又前往中巴边界地区的喀喇昆仑山，攀登海拔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8月13日，她失踪了。一个人，一位女性，一年之内连续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是一件非常艰险的壮举。而这位英国女子竟勇敢地实现了这个愿望。虽然她失踪了，但她的这种勇于拼搏的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

还是这年5月，俄罗斯4人珠峰登山队，在6位夏尔巴向导的支援下，从珠峰东北山脊上的支山脊(北山脊)上攀，13日取得成功。这里有一件趣事，随俄罗斯队上山的夏尔巴向导安·利达(44岁)已经是第9次登上珠峰了，不过此次他是从中国一侧登顶，而且自始至终未用氧气。他从1983年开始担任高山向导，当年就随美国队登上珠峰。

一个人，一位女性，一年之内继续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是一件非常艰险的壮举。





5月12日，中国台湾登山家陈国均和江秀真(女)两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3天后，即15日，尼泊尔一对夏尔巴兄弟阿帕和阿利达，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当时哥哥39岁，弟弟37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共同登上珠峰的亲兄弟。

1996年又是一个攀登珠峰的高峰年，这年春天就来了16支登山队，他们中有：

新西兰“探险家顾问协会”珠峰登山队 队长 R. 哈尔(Rob Hall 35岁)，队员麦克(Mike)、安狄(Andy)、海伦(Halen)、卡洛琳(Caroline)，他们是新西兰人；还有汉森(D.Hansen美国人)、贝克·威泽斯(Beck Weathers 医生，美国人)、斯图尔特(H.Stuart 加拿大人)、难波康子(女，日本人)、法兰克(F.Frank在香港的英国人)、卡西斯奇克(L.Kasischke 美国人)、塔斯克(John Taske 澳大利亚医生)、克拉库尔(J.Krakauer 美国记者)、艾伦(S.Allen 澳大利亚登山家)、赫奇逊(N.Hutchison 加拿大登山家)等17人。他们雇用了尼泊尔向导、搬运工和营地管理员、炊事员等42人。这是一支由新西兰的哈尔——他本人是研究高山生理和登山技术与战术的专家——组织的，由6国高山生理学者和高山登山战术技术研究专家们组成的珠峰登山队。6国登山家于4月6日抵达珠峰南侧孔布冰川上的基地营(5365米)，计划经南坳沿东南传统路线登顶。4月13日，在5944米的孔布冰川上方建成1号营地，28日在6492米处建成2号营地，29日在洛子峰南坡上7132米处建成3号营地，5月9日在南坳上方建成4号营地。由于天气将变坏，他们抓紧时间向上攀登，10日在8413米的东南山脊上建成了5号营地，11日16:45，第一批突击队员4人登上顶峰。这一天，多个团队的登山者都集中在顶峰附近，大家排成一列纵队，慢慢地向上冲击，这也是1996年出现的新事物。

当这支登山队队员们分批向顶峰冲击时，从5月10日起，一场暴风雪开始了。日本女队员难波康子、澳大利亚队员艾伦、美国队员汉森和队长哈尔等4人有的被冻死，有的滑坠身亡。最可怜的是难波康子和艾伦，两人勉强奋力登上顶峰后，下到南坳附近8700米处，这时难波康子因疲惫不堪，就在雪地上躺倒下来，准备稍事休息后再下山。但未曾料到的是，纷纷扬扬的大雪不久就把她盖住，待到美国队员克拉库尔下山发现时，她还能睁开眼睛，但讲话已经很困难。克拉库尔当时也已非常疲劳，就要求随行的两位夏尔巴向导把她扶起来，带她下山。但夏尔巴人却说：“她已经不行了，就是我们扶她或背她下山，走不多远，她也会死的！倒不如就让她慢慢地死在这里吧！”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愿救护。至于艾伦，他因疲劳过度，倒在雪地上挣扎着往山下爬，最后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当他的队友们登顶后遇到他、看到他悲惨的样子时，也只是快步走过，赶快下山，没有人向他伸一伸手。就这样，两位队员眼睁睁地看着他人匆匆下山，自己却无法动弹，终于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这场悲剧的发生，关键在于这个队的组织工作极差。按高山探险的常规，登顶时必须事先考虑到抢救问题，要求一个突击组从突击营地向顶峰冲击时，另一个突击组必须紧随其后，进入突击营地；当第一突击组的队员遇到危险或已有人疲劳过度无法下山，或因高山病而倒地时，第二突击组必须放弃登顶，立即上山抢救遇难者，尽快将他们抬或背往山下。因为海拔每下降100米，气温就会升高1℃，而空气中的氧成分也会多一些，如果下降1000或2000、3000米，那就更好了，不少人就是在被往山下背或抬的抢救过程中得到恢复而活下来的。当然，从8000米以上的高山上往下边抬人或背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往往背人或抬人者也会倒地不起，这是常有的，所以那些夏尔巴人说：“这种情况我们看得多了，就是抬下去她也会半道死去的……”当然，他们不愿意，也

就这样，两位队员眼睁睁地看着他人匆匆下山，自己却无法动弹，终于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不排除担心自己遭到不幸。如果组织工作做得好，有的人中途已经明显跟不上队了，队长就应当马上派人把掉队者护送下山，不能让他再坚持上山，以减少登顶后发生更大的伤亡。所以组织工作和队长的能力、权威以及他的人格也是保证高山探险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这支国际联队的队长自己不但没有很好地组织这个队，更没有考虑到抢救和救护，只定了个计划，编了4个组，自己就上山了，最后连他自己也滑坠而亡，哪有什么组织纪律、救护可言呢？所以这支国际队，虽然名叫“探险家顾问协会登山队”，也有人登上了珠峰，但这却是一支失败的登山队，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登山队。

中国台湾省珠穆朗玛登山队 这是一支完全由台湾省登山家组成的10人队，队长是高铭，副队长余彰芬，还有郑荣窗、刘贞秀、陈玉南等8位队员。他们从尼泊尔一侧的南侧攀登珠峰，雇用了次仁等13位尼泊尔夏尔巴向导和炊事员，4月6日进入孔布冰川上海拔5260米的基地营，那时的基地营已经有了上百顶帐篷，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10个队在这里落户了。19日，3名队员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

国际商业珠穆朗玛登山队(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Qomolangma Expedition) 这是一支由英国人马尔·杜夫(Mai Duft)为队长的国际商业人士组成的登山队，队员有来自香港的英国人麦克·楚曼(Mike Trueman)和米契·奔兹(Micharl Burns)、丹麦医生亨瑞克·汉森(Dr. Henric Hansen)、芬兰人维卡·古斯塔夫逊(Veikka Gustafsson)、丹麦人吉姆·斯季帕(Kim Sejberg)、英国人金吉·富林(Ginge Fullen)、芬兰人雅可·库尔温(Jaako Kurvinen)和英国人佑安·顿肯(Euan Duncan)等9人，计划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结果4人成功，1人失踪。

英美喜马拉雅·珠穆朗玛峰登山队(The Himalaya Qomolangma Guides Commercial Expedition) 这是一支由美国商人亨利·托德

(Henry Todd)为首的，包括美国商人马克·普菲泽(Mark Pfetzen)和英国商人瑞·多尔(Ray Door)3人组成的珠峰队，原计划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但后来在南坳稍上一点的8350米处，一人滑坠(后得救)后，宣告失败。

由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日本人组成的IMAX珠穆朗玛远征队(IMAX/TWERKS Ma-Cgillivzay Freema Qomolangma Expedition)由美国人大卫·布瑞谢尔斯(David Breaxuars 电视影片公司导演)任队长，队员有：印度电影公司制片人贾木林(Jamling)，印度籍夏尔巴人、美国登山影片制作商艾德(Ed)、西班牙电影制片人阿拉赛里·希卡纳(Araceli Segarna)、日本影片制片人续素美代(女，Tsuzuki Sumiyo)、罗伯特·邵威(Robert Schauer)、还有英国记者奥代瑞·沙尔克德(Audrey Salkeld)和两位美国电影制作商利兹·柯亨(Liz Cohen)和里赛尔·克拉克(Liesl Clank)。这支队伍4月27日进入孔布冰川上的基地营，5月4日，到达南坳上方海拔8370米处，23日登顶成功。

南非约翰内斯堡《星期时报》珠穆朗玛峰登山队(*Johannesburg Sunday Times Qomolangma Expedition*)一行16人，其中有4位英国人，1位法国人。队长是英国人伊安·伍达尔(Ivan Woodall)，队员中有记者、医生、电台技术人员等。这是历史上第一支南非珠穆朗玛登山队。他们从珠峰南侧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攀，有15位夏尔巴向导协助他们，但他们只到达南坳上方8300米处就因风大雪深而撤退。

美国阿尔卑斯俱乐部珠穆朗玛峰登山队 一行6人，队长托德·伯尔列逊(Todd Burleson)，女队员贝基·江斯顿(Becky Johnston)是位作家。这个队也是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有随行支援的夏尔巴向导8人，他们中有2人成功。

瑞典人戈兰·克罗普单人攀登 3月24日，戈兰·克罗普(Gran Kropf)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随他前来的还有两位电视



摄影师，一位是瑞典的电视电影制作人菲德列克·布鲁姆斯特(Frederic Bloomquist)，另一位是尼泊尔的电影摄影师安利塔(Angrita)。戈兰·克罗普和为他拍摄攀登珠峰的两位摄影师只到达南坳稍上方8350米处就撤退了。

挪威彼特·耐贝单人登珠峰 5月18日，彼特(Petter Neby)雇了两名夏尔巴向导协助，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但仅仅到达洛子峰南坡7780米处就因大风雪而退回，宣告失败。

新西兰、马来西亚珠峰联合登山队 以新西兰人古伊·考特尔(Guy Cotter)为队长，一行4人，实际上这个队里没有一个马来西亚人，队长和队员戴维·希德斯顿(Dave Hiddleston)、克里斯·吉利特(Chris Jillet)等都是在马来西亚经商的新西兰人，他们计划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但失败。

尼泊尔珠峰朝圣队 5月24日，由夏尔巴人索纳姆·葛尔钦(Sonam Gyalchen)为首的夏尔巴珠穆朗玛峰(尼泊尔称萨迦玛塔峰)朝圣队，一行6人，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他们都获得成功，并在顶峰上做了朝拜仪式。这是第4支完全由夏尔巴高山向导们自己组织的珠峰队。队员安格·利塔(Ang Rita)是第12次登上珠峰。

印度边境警察珠峰登山队 5月，由莫欣德尔·辛格(Mohindor Singh)为首，一行10人，其中有3人是印籍夏尔巴人，他们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实际上他们是驻守在中印边境上的印度警察部队，23日，有3人登顶成功，其中一位叫贾姆林·丹增·诺尔盖的44岁登顶者，就是1953年与希拉里一同登上珠峰顶峰的丹增·诺尔盖的小儿子。

日本福冈县山岳会珠峰登山队 5月26日，以矢田浩二(Yada Koji)为队长，一行3人从尼泊尔雇了3名夏尔巴向导，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他们中只有矢田队长和队员重川英介两人在巴桑等两位夏尔巴人的支援下成功。

美国喜马拉雅救难协会珠峰登山队(The Himalayan Rescue

Association) 由 3 位美国高山生理学家吉姆·利奇(Jim Litch)、拉瑞·西尔渥(Larry Silver)和劳拉·吉玛尔(Laura Ziemer)组成, 5月 17 日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探查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其他 8000 米以上高峰遇难者的失事原因和救助方法。最后没有登上珠峰。

俄罗斯珠峰登山队 队员彼得·库兹涅佐夫(Peter Kuznetsov)从中国西藏一侧北壁上的“诺顿岩沟”登上珠峰。这是俄罗斯人登顶成功的第三条路线, 此前他们有人先后从东北、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

意大利珠峰登山队 5月 24 日, 汉斯·卡麦尔兰德(Hans Kammerlander)创造了一项攀登珠峰的新记录。他从绒布冰川海拔 6400 米的 1 号营地出发, 经北坳沿东北山脊传统路线, 从“第二台阶”登顶, 下山时在较适于滑雪的地段滑雪下山。从上山、登顶、下山返回基地营仅用了 16 小时 45 分钟, 创造了快速登顶的世界新记录。

这样, 在 1996 年春秋两个登山季节, 从珠峰的中国一侧和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团队共有 34 个, 有 87 人登上珠峰, 但也有 37 人不幸遇难身亡。

1997 年 5 月 23 日, 随英国珠峰登山队担任高山向导的夏尔巴人扎西·诺尔盖登上珠峰, 他是与 3 位英国登山家一同登顶的, 作为丹增·诺尔盖之孙, 连同上一年登顶的贾姆林·丹增·诺尔盖, 丹增·诺尔盖一家祖孙三代, 在从 1953~1997 年的 44 年间, 从同一条东南山脊上, 在同一个五月份内, 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这也是一个世界第一。

1997 年 5 月 24 日,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珠峰登山队, 从中国西藏一侧, 沿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 但只有中国队的丹增多吉、大齐米和开村登上顶峰。同月里还有两支日本队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



令人称赞的是，在这10人中，女队员桂桑已是第二次登上珠峰，成为中国第一位两上珠峰的妇女。

1998年5月24日，中国、斯洛伐克联合珠峰登山队，从中国西藏一侧东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两国各有一人登顶成功，中国队员是藏族次洛。10月27日，尼泊尔珠峰登山队的夏尔巴队员卡吉(Kaji)，从孔布冰川上海拔5250米的基地营出发上山，仅用了20小时24分钟就登上顶峰。

1999年5月27日，中国西藏登山队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再次实现了10人集体登上珠峰顶峰的好成绩。令人称赞的是，在这10人中，女队员桂桑已是第二次登上珠峰，成为中国第一位两上珠峰的妇女；另外，女队员吉吉和她的丈夫仁那双双成功，成为中国第一对同时登顶的贤伉俪。两天后，南非妇女卡泽·奥当德与南非珠峰登山队一起，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传统路线登上珠峰。此前，她曾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这样，她就成为全球分别从南北两侧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第一位女性。

2000年5月21日，中国大学生阎庚华单身一人在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珠峰的上山途中，遭遇暴风雪遇难。同日，为外国队担任高山向导的夏尔巴人巴布·赤列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上攀，从基地营出发到登上顶峰仅用了16小时36分钟，成为全球攀登珠峰速度最快者。22日，著名波兰女登山家安娜·谢宾斯卡，以51岁的大龄，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第二次登上珠峰。24日，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阿帕第11次登上珠峰。10月7日，斯洛文尼亚高山探险家达渥·卡尔尼卡以5小时的速度从珠峰顶峰滑雪下山成功，创造了从顶峰滑雪下山的最快速度。

2001年5月22日，一对法国夫妇若切·贝尔特兰德和克拉瑞·贝尔尼尔在从南侧东南山脊登顶成功后，驾滑翔伞下山，仅用了8分钟就回到基地营，创造了又一个新的珠峰探险记录。23日，一

位名叫斯切凡·盖特的高山探险家，在从东南山脊登上顶峰后，脚踩单滑雪板下山成功，这也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同日，一位16岁的夏尔巴少年丹巴·蒂切里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他是目前登上珠峰的勇士们中最年轻的。25日，72岁的美国人切尔曼·布尔从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成为最年长的勇士。同日，美国盲人艾利克·威汉麦耶尔与4位美国友人(同为登山者)一起，在8位身上挂着铃铛的夏尔巴向导的扶持下，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26日，俄罗斯珠峰登山队的季米特里·鲍切科夫成为第1500位登上珠峰的胜利者。

2002年5月16日这天，从尼泊尔一侧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峰的总人数达到63人，并全部安全返回基地营，而从北侧成功的有14位。17日，一位名叫王天汉的中国和尚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登上珠峰，成为珠峰探险史上的首位登顶成功的和尚。在这个月里，从中国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成功登顶的人数为75人，加上从尼泊尔登顶成功的人数，这个春季里登上珠峰的总人数达到155人之多。

根据不完全的年份统计，1993年全年春秋两季共有129人登上珠峰，2000年为145人，2001年182人，2002年159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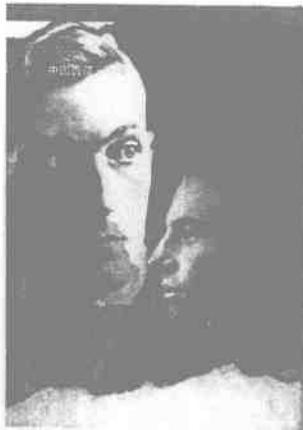
根据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生理和医学研究院的霍恩拜茵教授等专家们的统计，从1978~1999年的21年间，攀登珠峰时用氧和“无氧”登山者的死亡人数比例为1:3，不用氧者比用氧者的死亡人数高两倍。在这21年间，共有1173人登上顶峰，其中1077人使用了氧气，死亡32人，而不用氧者的死亡人数为96人。

从1921年起，到2002年的81年间，全世界共有1648人从不同的38条路线上登上珠穆朗玛峰，共有472人遇难身亡。但攀登珠峰的勇敢者们仍在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就是珠峰的魅力，就像马洛里说的，Because it is there.“因为它在那里！”

“马·欧之谜”困扰了世界登山界 75 年，也成为世界最高峰上一朵挥之不去的疑云。

第七章 长眠珠峰

“马·欧之谜”困扰了世界登山界 75 年，也成为世界最高峰上一朵挥之不去的疑云。20 世纪末期随着全球气温的持续燥热，使珠峰上的积雪一点点融化，这朵疑云也终于有了消释的机缘。这就是 1999 年以埃利克·希蒙逊为首的美国国际探险调查基金会珠穆朗玛峰攀登遇难者搜索队。他们一行 11 人，经过认真的搜索，终于找到了马洛里的遗体、遗物，从而揭开了弥漫在世界最高峰上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马·欧”谜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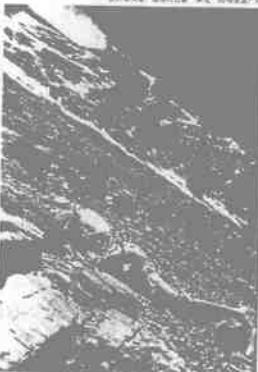


1924年失踪的马洛里和欧文，英国人以此为题，宣称他们有可能在当时已登上顶峰，造成了世界登山探险史上的最大迷案——“马·欧之谜”。

1924 年失踪的马洛里和欧文，英国人以此为题，宣称他们有可能在当时已登上顶峰，造成了世界登山探险史上的最大迷案——“马·欧之谜”。



从中国一侧登珠峰的黄金时代



该探险队由

马洛里(George Mallory, 1886~1924)是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学教师，欧文(Andrew Irvine, 1902~1924)是牛津大学的三年级学生。1924年，这两位优秀的高山探险家，作为英国第三次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主力队员，在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途中失踪。

对此，欧美各国纷纷猜测：他们很可能是登上珠峰后，在下山途中遇难的。英国人曾多次宣称，如果能证明马洛里和欧文已登上世界最高峰，人类高山探险的历史就要改写！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可能越过第二台阶，也就不可能登上珠峰。

因此，马洛里、欧文的失踪，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马·欧之谜”。70多年来，人们一直为揭开这个谜而努力。1999年美国派出一支专门寻找马洛里和欧文下落的高山探险队(*The 1999 Mallory & Irvine Research Expedition*)，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支援下，从中国西藏一侧沿东北山脊上山，终于找到了马洛里的遗体和遗物，还找到自1921年以来近80年里，从西藏一侧攀登珠峰时不幸遇难的17具登山者的遗骸、遗物。

自此，“马·欧之谜”基本揭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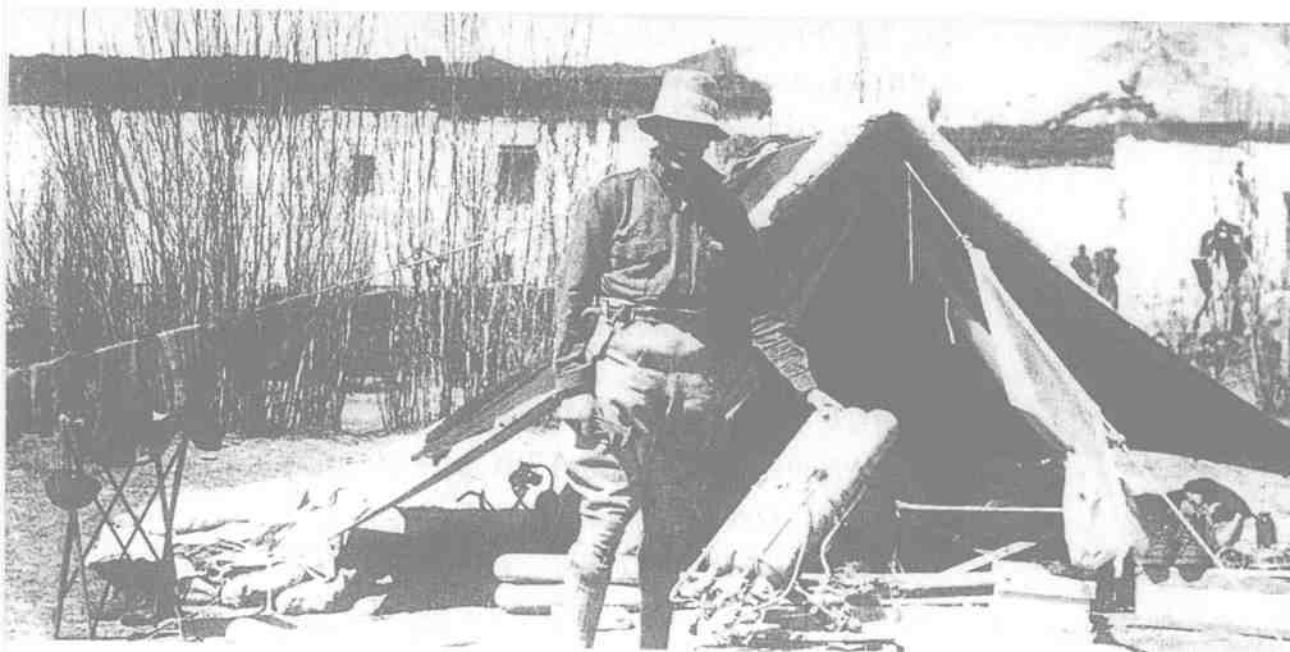
英国人的质疑

1960年5月25日凌晨4:25，天色还相当黑暗，但三位中国勇士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这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是一个壮举！这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正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和美苏等国封锁中的中国人民，它让世人了解到，任何困难或艰难险阻都将被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踏在脚下！

当时，各国媒体都对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作了报道，只有英国

英国人曾多次宣称，如果能证明马洛里和欧文已登上世界最高峰，人类高山探险的历史就要改写！

在此之前，英国人有过多次攀登珠峰的经验，称得上是从东北山脊攀登的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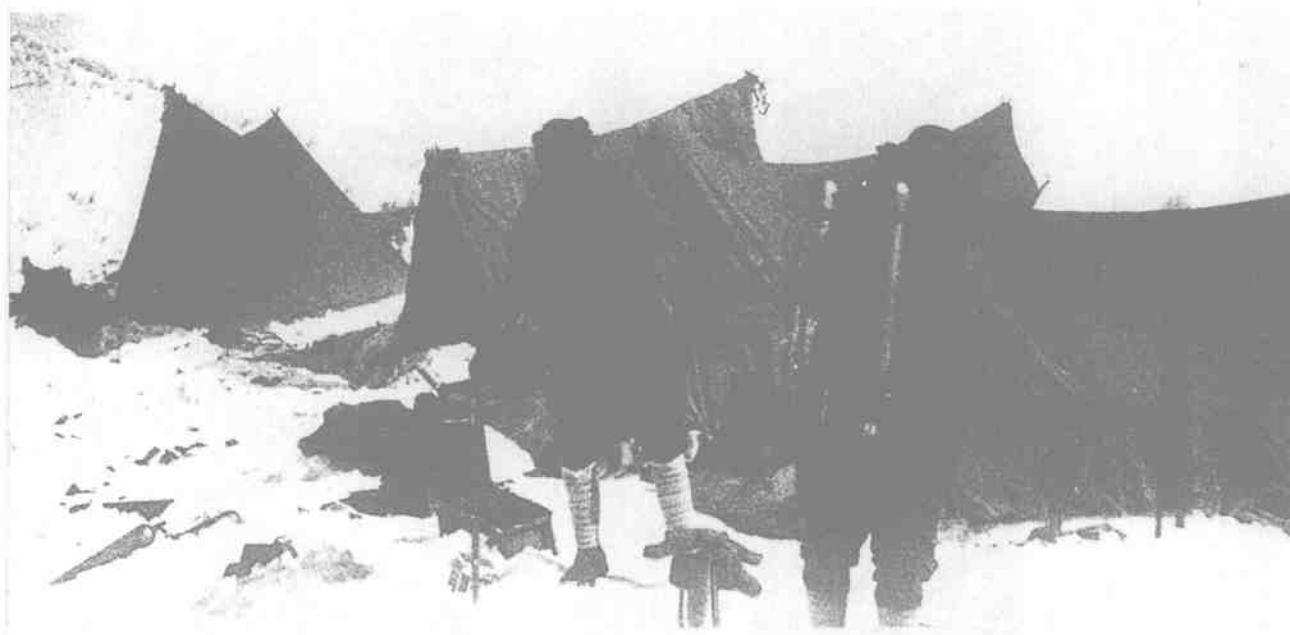


欧文与他经过改装的氧气设备。当时的氧气瓶自重8公斤，容量2公升，光是他的这排氧气就近30公斤，可见当年攀登之艰辛！

高山探险家悻悻地说：“中国人从东北山脊登上埃佛勒斯峰，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英国的马洛里和欧文两人极可能早在1924年就已从东北山脊登上它！中国人最多也只到达8700米的高度！”

英国人关于“中国人最多也只到达8700米高度”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当时中国队员是从5月24日21点，在越过第二台阶后，继续向顶峰进发，整整走了8个多小时的夜路后，才成功登顶的。那时天色还很暗，无法拍摄照片。但在微弱的月光下，他们把登顶的书面留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塑像和一面五星红旗安放在了顶峰，并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后下山。下到8700米高度时，天色已亮，屈银华从背包中取出小型电影摄影机，对着顶峰拍了一串镜头。之后，中国媒体做登顶报道时，就从其中选取了一幅。

在此之前，英国人有过多次攀登珠峰的经验，称得上是从东北山脊攀登的专家。这是因为，英国通过两次侵藏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打开了西藏地区的大门，并通过在西藏



地方上层培植亲英势力，他们得以在西藏为所欲为。1921年开始，虽然西藏人民向来视珠穆朗玛等山峰为神圣之地，不容触犯，但西藏地方政府内的亲英势力逐渐抬头，这就使英国得以先后于1922、1924、1933、1934、1935、193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从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向珠峰冲击七次。或许老天真的有眼，他们从未成功，最高也就是1924年创造的8572米。英国人对东北山脊的情况相当熟悉，当他们看到中国媒体公布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是在8700米处拍摄的，并产生疑问。

1924年6月6日。
英国珠峰探险队的马洛里
(后)和埃文离开北坳营地。

英国人对解开“马·欧之谜”的执迷

新中国诞生后，暂时不允许外国队进入中国境内进行高山探险活动。因此，二战结束后，西方人都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1952年5月，瑞士队越过孔布冰川，经过珠峰与洛子峰(8511米)之间的山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坳(South Col, 8000米)，沿东南山脊到

这年秋天，瑞士人再从东南山脊上山，天公仍不作美，迫使他们上到8100米转回。



马洛里(后)和
欧文在东北山
脊8500米附近。
这是他们的最
后几张照片之
一，为其队友奥
戴尔所摄。

达8559米处，顶峰在望，眼看成功登顶，天气骤然变化，大风雪使人无法前进，瑞士队只好撤退。这年秋天，瑞士人再从东南山脊上山，天公仍不作美，迫使他们上到8100米转回。

在瑞士人几乎登顶成功的压力下，英国队于1953年来到尼泊尔，从当地夏尔巴人中雇用了200多名搬运工和25位高山向导，这些人前一年都曾为瑞士队服务，在他们的帮助下，英国队两名队员

于5月29日下午从东南脊登上珠峰。这次成功登顶作为贺礼，献给当天加冕的伊丽莎白女王，而当队员们回到伦敦时，理所当然受到王室和各界的盛大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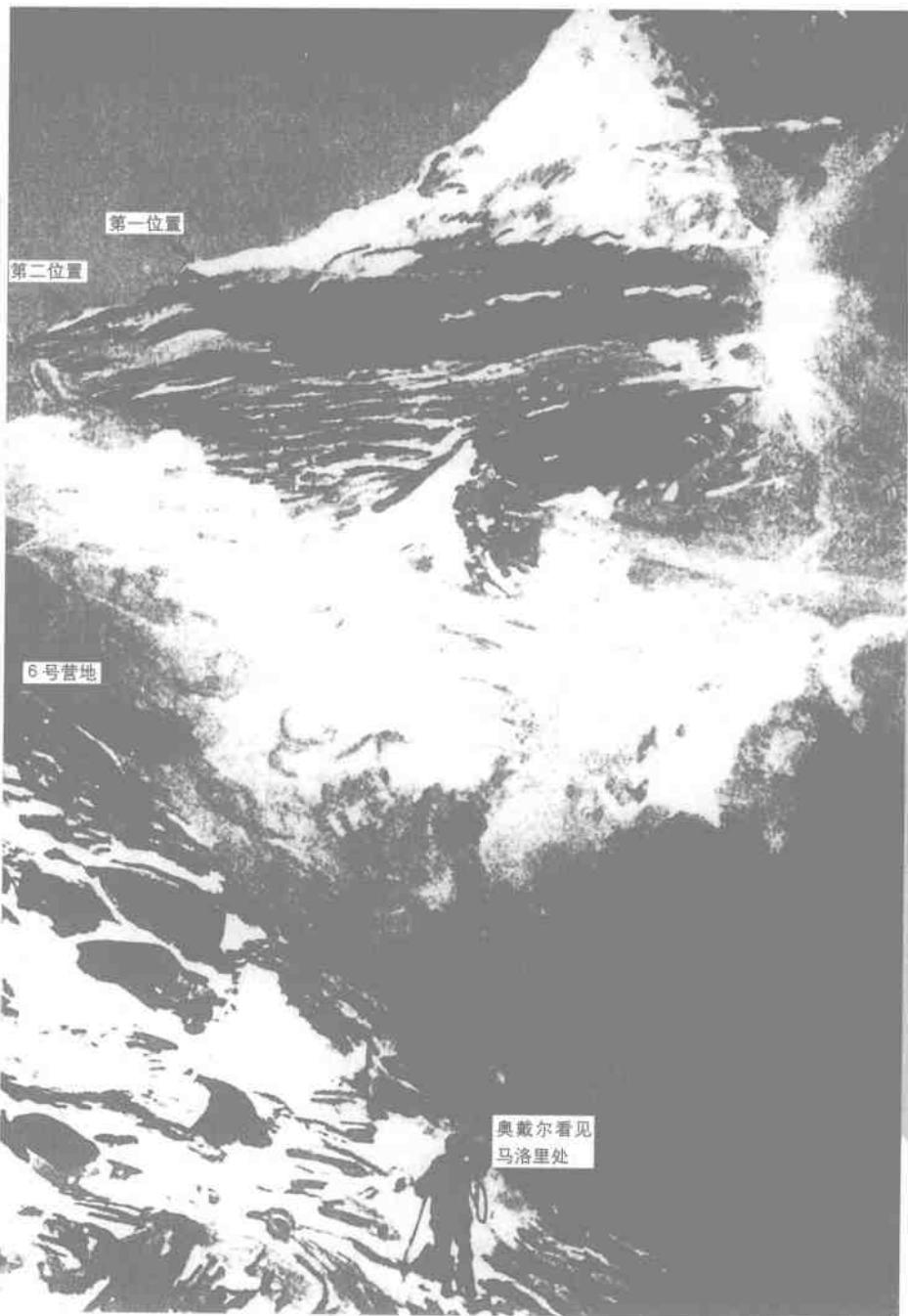
虽然赢了，英国却喜忧参半。喜的是英国队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拔了头筹，忧的是两位登顶者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英国人。为了这次探险，英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多方面的组织和准备，但到头来真正将珠峰踩在脚下的，一个是应邀参加的新西兰人埃德蒙特·希拉里(Hillary Edmund 1919 ~ , 养蜂专家)，另一位是英国队的向导、曾两度为瑞士队服务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 1914 ~ 1986)，这又勾起了英国人查清“马·欧之谜”的念头。

为什么英国人会确信马洛里和欧文两人极可能是在登上顶峰后，在下山途中遇难失踪的？1933年5月，由鲁德列吉(Ruttledge Hugh, 1884 ~ 1961)率领的第四支英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又来到西藏，再次冲击。他们没能越过第二台阶(8700米)，但队员哈里斯(W. Hallis)在东北山脊8100米的第一台阶附近发现了欧文的冰镐。冰镐是高山探险者必须随身携带的“武器”，就像士兵的枪一样。冰镐在此，那欧文的遗体呢？是否欧文从顶峰下来，因过度疲劳，体力不支，从这里滑坠到北坡下的万丈深谷？

揭开谜底的一线希望

70年代末改革开放，我国政府对外开放高山区，接待前来高山探险的外国团队。中国的近邻日本捷足先登，第一个获准在1980年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1979年10月，日本派来侦察队，前往西藏进行路线探察。期间，中国协作队员王鸿宝言谈中透露，1975年中国队从东北山脊登顶时曾发现一具欧洲人的尸体……

不久，日本的《读卖新闻》(YOMIURI)在1980年元旦专刊上，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日本队将于1980年春从中国西藏一侧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的消息和大量有关珠峰及攀登珠峰的历史背景资



1924年6月8日，奥戴尔到达6号营地，准备迎接成功归来的马洛里和欧文。但他只在这里看见马洛里和欧文正在第二台阶上攀。当年的情景示意图。



料，其中还特别提到王鸿宝透露的信息。很快，王鸿宝的这条信息在世界各国媒体的显要位置纷纷登场。

寻找马洛里、欧文遗体、遗物的事情，重新引起英国和欧美各国高山探险界的关注。英国立即派出 89 岁高龄的奥戴尔(Noel Odell, 1889~1986)飞往东京，请求日本队协助在东北山脊上寻找马洛里和欧文，特别希望找到马洛里用过的相机。英国人认为，相机里的胶片或许能证明他们已经登上珠峰。

与此同时，早已于 1932 年就移居美国的马洛里的大女儿加洛琳夫人(Karolina, 1917~)也通过美国高山俱乐部(The American Alpine Club)向日本山岳会(The Japanese Alpine Club)提出请求，希望在登山途中帮助寻找父亲和欧文的遗体遗物，并查证当年他们是否登上峰顶。英国派遣时已 89 岁高龄的奥戴尔访问日本，则因为他不仅是 1922 和 1924 年英国队的主力队员，还因他 1924 年 6 月 8 日在“第一台阶”与“第二台阶”间的东北山脊上送别马洛里、欧文，并一直用望远镜观察他们的行踪，只是在他们快接近第二台阶时，因为一片乌云中断了他的持续观察，等他再睁开眼睛时，两位登山家已消失了踪影。他写道：

At 12:50, just after I had emerged from a state of jubilation at finding the first definite fossils on Everest, there was a sudden clearing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entire summit ridge and final peak of Everest were unveiled. My eyes became fixed on one tiny black spot silhouetted on a small snow-crest beneath a rock-step in the ridge; the black spot moved. Another black spot became apparent and moves up the snow to join the other on the crest. The first then approached the great rock-step and shortly emerged at the top; the second did likewise. Then the whole fascinating vision vanished, enveloped in cloud once more. There was but one explanation. It was Mallory and his companion moving, as I could see even at that great distance, with considerable alacrity, realising doubtless that they had none too many hours of daylight to reach the



summit from their present position to Camp VI by nightfall. The place on the ridge referred to is the prominent rock-step at a very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base of the final pyramid.¹¹ (节选自 Jochen Hemmleb, Larry A. Johnson & Eric R. Simonson, Ghost of Everest: 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the Mountaineers Books,1999, p17)

12:50，正当我在珠峰上发现第一批确定的化石的狂喜中探出头时，天空突然明澈起来，这使得整个顶峰一览无余。我的双眼不由凝注于一个小小的黑点，那个黑点就在雪峰下的某个岩石台阶下，慢慢移动着。另一个小黑点变得清晰起来，它也在向着顶峰向上移动着并紧随另一个身后。接着，第一个接近了那个巨大的岩石台阶，很快出现在顶部；第二个也同样。之后，这整个激动人心的景象消失了，再次被云层吞没了。只有一个解释而别无其他，那就是马洛里和他的同伴在前进，由于我在那么远的距离之外都能看到他们，我就带着无比的快意，想着他们要不了太多的白日时光，就能从他们宿营的6号营地，在天黑之前到达顶峰。实际上，那个边缘突出的岩石台阶离金字塔的塔尖并不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奥戴尔从那一刻起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后，他出去找，疯狂地找，仍是一无所获。他的朋友失踪了。

话说1980年春，日本队确实发现一具登山者的遗体，但那是1975年遇难的中国队员邬宗岳，而不是欧洲人。随着日本队此次登山的完成，破译“马·欧之谜”的这一线希望再度破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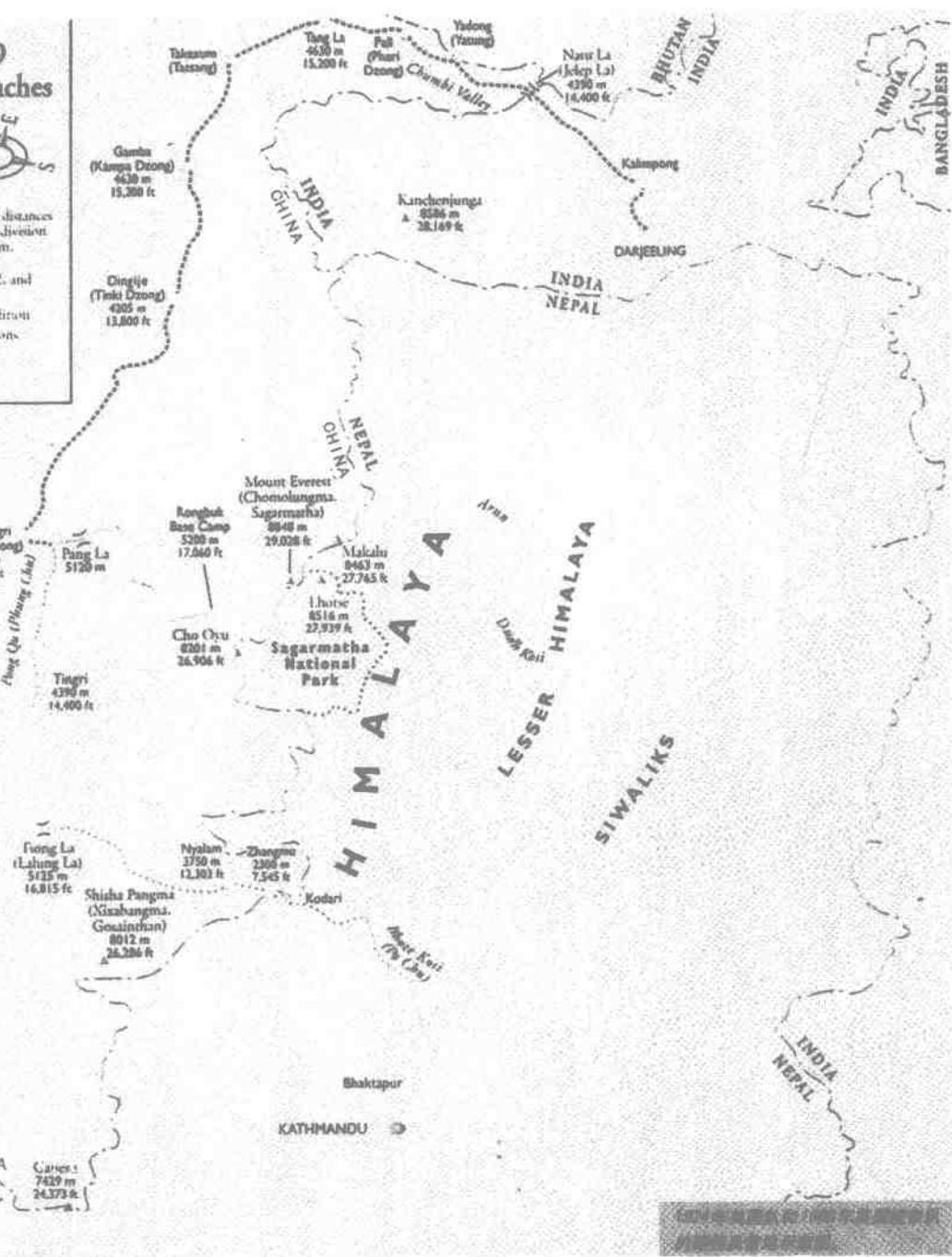
多年努力

在此之前，1975年秋天，以博宁顿(Bonington Christan,1934~)为首的英国队一行19人，到达尼泊尔，9月24日，赫斯顿(Haston)和斯科特(Scott)等4人，从西南坡面路线再次登上珠峰。他们的登顶照片，就是在4个月前中国队所安放的觇标旁拍摄的。这次登顶

and 1999 on Approaches

distances are distorted. Each division
represents 20 km.

- 1921, 1922, and
pedestrian
- 1930 expedition
- all expeditions
- good roads
- country boundaries



从这里推断，1924年，以当时的条件和马洛里两人并不完善的设施，要顺利通过“第二台阶”，登上珠峰是不大可能的。

路线相当艰险，登顶的又确实都是英国本土人，说明英国的高山登山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法跨过北坡来寻找马·欧的遗体。

中国向世界开放山峰后，从1980年到1999年的19年间，法、德、日、奥地利、意、瑞士、美、俄等国的高山探险队多次从中国西藏一侧，从东北山脊传统路线，靠着1975年中国队凿入的冰锥以及由此而悬挂的金属梯子，顺利通过“第二台阶”，登上珠峰。从这里推断，1924年，以当时的条件和马洛里两人并不完善的设施，要顺利通过“第二台阶”，登上珠峰是不大可能的。此后也有人陆续在东北山脊附近发现过遇难者的遗体遗物，但都难以确认它们的身份。

同时，这19年也是各国探险家攀登珠峰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创造了诸如严冬季节(12~2月)、雨季(6月下旬~9月上旬)、不使

1999年美国
搜索队全体队
员。右一为队
长埃利克·西
蒙逊。



用人工供氧、自始至终单身一人、快速登顶(最快的法国登山家从基地营出发到登顶之后返回基地只用了20个小时)以及高山滑翔(登顶后乘悬吊式滑翔机滑翔下山)、高山滑雪等更快更强的高山探险，这就使英国和各国探险家们更加关切“马·欧之谜”了。

美国探险调查队找到马洛里

为了解开这个世界关注的“马·欧之谜”，美国国际探险调查基金会(American F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Mountaineering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派遣了一支由埃利克·西蒙逊(Eric R. Simonson)率领的十人调查队，其中还有一位德国人约亨·赫姆莱柏(Jochen Hemmleb)。

1999年4月下旬，调查队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从北坳沿珠峰东北山脊路线上山，经“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直到顶峰，一路搜索过去，特别着重从7600米到第一、二台阶之间的道路两侧，搜索过去75年间从这条路线攀登珠峰过程中的失踪、遇难者的踪迹，包括遗物、遗体。其最主要的目标，则是搜寻马洛里和欧文的下落。

调查队从尼泊尔雇用了10位夏尔巴向导，至于地面运输则请的是西藏当地的民工。他们设立了6个高山营地，5月1~12日，他们共发现17具过去80年间从这条路线攀登珠峰遇难者的遗骸。

4月30日，

Conrad Anker had been going on intuition, and his intuition had told him to look low. He had climbed down to the lower edge of the terrace, the point where it dropped away some 6,600 feet (2,000 m) to the main Rongbuk Glacier, and had started zigzagging back up the slope when he saw “a patch of white that was whiter than the rock around it and whiter than the snow.” Climbing toward it, he realized the patch of white was another body. But the one was different: “... this wasn’t a



1999年美国队 body from recent times; it was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there for quite
沿1922、1924年 awhile.” (Ghosts of Everest, p119)

英国队路线，穿行过2号营地
上，东绒布冰川间的沟槽。

考雷德·安克继续凭直觉搜寻，而直觉告诉他往低处去。他已经爬下台阶的比较低的一边，一个离主绒布冰川约有6600英尺（约2000米远）的地方，再开始曲折迂回地往山坡上攀爬时，他突然看到“一小堆白色，它比周围的岩石和雪都要白”。径直爬到那里时，他意识到这是另一具尸骸，但这一具完全不同：“这不是近期的尸体，而是有相当一段时间的遗骸。”



美国搜索队找到的马洛里的手表。

尸首趴着，身材硕大，背部、臀部以及左脚、右臂都很完整，只有右腿断过，头部已腐烂。其他5名队员都赶了过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欧文。

Tap Richards, who had training in archeology, and Jake Norton began gently separating the ragged layers of clothing that were left around

其他5名队员都赶了过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欧文。



原坡积雪深埋。发现时已被革化的马洛里尸体。尸体俯伏，可见当时富于经验的马洛里曾采取应急方式自救。可惜滑坠路程过长，他的脸部已完全被岩石削没，右腿几乎从根部折断。

the protected edges of the body: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and silk underwear, a flannel shirt, woolen pullover and trousers, a canvaslike outer garment. Near the nape of the neck, Norton turned over a piece of shirt collar and reverled a fragment of laundry label: G. Mallory.

Why would Irvine be wearing Mallory's shirt?

Then they found another name tag: G. Leigh Ma[llory]. Then a third.(节选自 Ghosts of Everest,p122)

塔普·理查德受过考古学训练，杰克·诺顿开始轻轻地揭开那些遗留下来、仍裹护着遗骸的残破衣服的周边：几层棉布和丝织的内衣裤、一件法兰绒衬衫、羊毛套衫和裤子，一件帆布式的外套。在脖子的颈背处，诺顿翻过一件衬衫领子，发现了一个洗熨店标签的残片：G.马洛里。

为什么欧文会穿着马洛里的衬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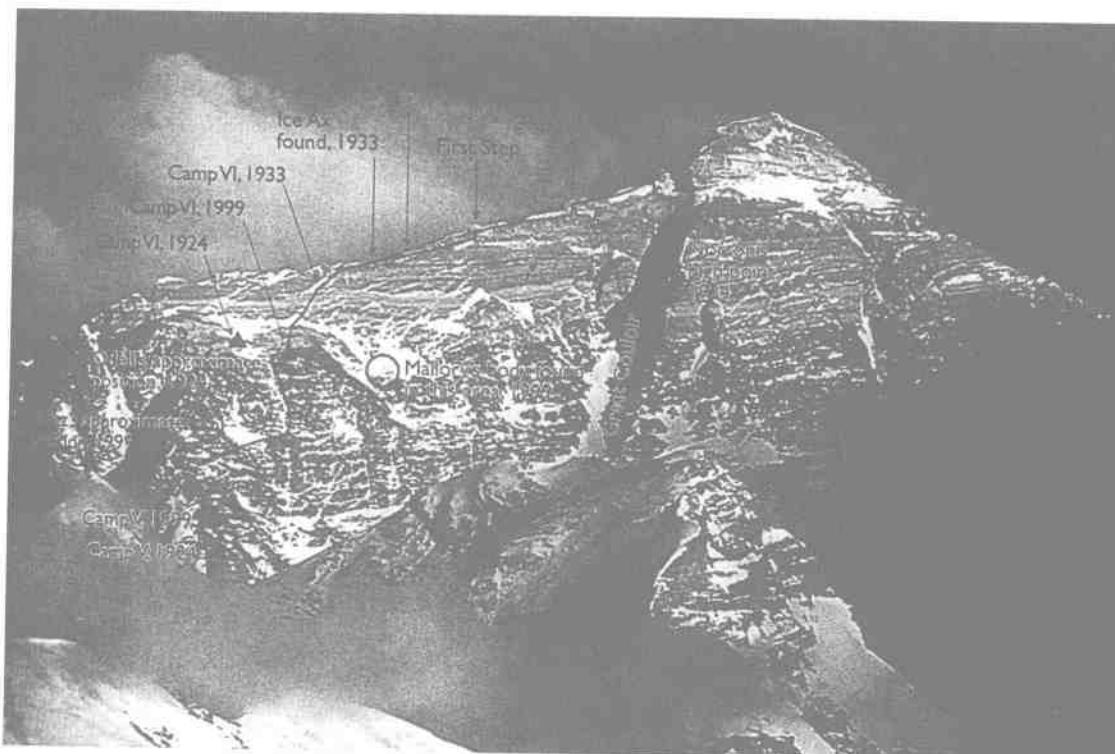
接着，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名签：G.莱格·马(洛里)。然后是第三个。

随后，他们又在遗体周围发现了到处散落着的睡袋、手套、小刀、手表、防护眼镜和衣物，还有压在身体下的信件。这些物件上都有马洛里、马洛里。毫无疑问，这是马洛里！

马洛里的尸体已“革化”，这是因为长期埋在冰雪下，没有因细菌而腐烂，但身体里的水分被蒸发后，就变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动物的皮革一样了。这个位置离1933年在第一台阶附近发现欧文的冰镐不远，所以大家最初都以为他们找到的是欧文。

两处地方相距不远，因此我们推测，当年的遇难，很有可能是他们在下山时在这一带滑坠，无可依附，欧文可能突然滑落到珠峰北壁下的万丈峡谷里，而马洛里或者因为位置有利，或者因为经验丰富，立即采取了遇到滑坠时惟一自救的方法：俯面朝下，加大身体附着坡面的面积，减小继续滑坠的速度和重力。这就使得他得以伏卧在这个坡面上，也使得人们能在75年的不懈努力后，终于找

不过，当初他滑坠时的情景以及滑坠后他是立刻死亡还是被冻死等等，就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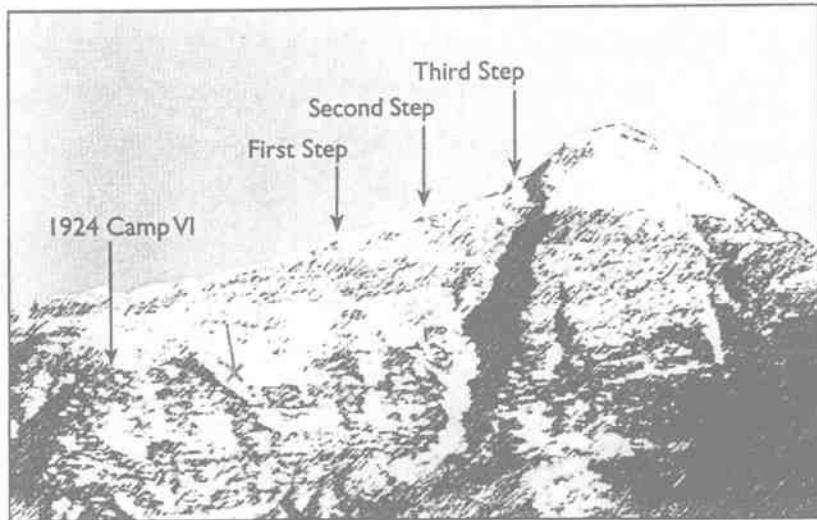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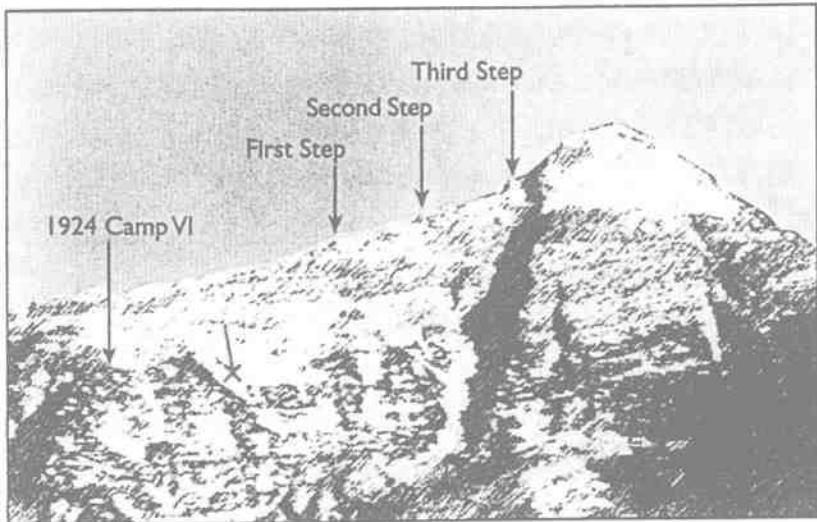
珠峰的三个“台”到他的遗骸。不过，当初他滑坠时的情景以及滑坠后他是立刻死亡阶”和1924年英
1933、1999年英还是被冻死等等，就不得而知了。

国和美国队的
路线图及马洛
里尸体被发现
的位置。

美国队成功的原因

美国队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并采集到回国进行DNA认证的样本后，掩埋了马洛里的遗体，并将所摄取的照片和收集到的遗物都带回了美国。这些物品曾在加德满都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展示过，后来又在旧金山展览，最后送到伦敦展览，并举行了报告会。同时，调查队的三位成员约亨·赫姆莱柏、拉里·乔逊和埃利克·西蒙逊还将事件的前前后后合写了一本书，即 *Ghosts of Everest: 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美国队这次之所以能成功找到马洛里等人的遗体，除了他们的精



1999年美国搜索队经过实地踏勘后，认为当年马洛里和欧文不可能越过“第二台阶”登上珠峰峰顶。这是他们给出的两种假设：白天(6月8日)上攀，未能越过第二台阶或者从第二台阶转回6号营地，途中滑坠。

心准备，专业搜索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条件。近年来，全球持续升温，珠峰地区天气变暖，降雪减少，过去终年被积雪覆盖的东北山脊两侧的雪都已融化，使得多年来埋藏在积雪下的遇难者尸体显露出来。而1960年、1975年中国队两次从这条路线上山时，根本看不到这些。至于1979年王鸿宝对日本人提起的那具欧洲人尸体，已很难核对。他是怎么对日本人说的，那具遗体的特点及所在的位置等，都已无法对证。王鸿宝就在与日本人说起此事后两天，被一场雪崩夺去了性命。

美国队在第二台阶下方仔细观察了那里的地形和被各国高山探险家称道的“中国梯子”后认为：1960年中国人能够攀越这道陡峭的岩壁，确实不易；而对1924年时的马洛里和欧文来说，则是很難越过的。他们也没有能够找到欧文的遗体或遗物。但他们揭开了近一个世纪的“马·欧之谜”，这是对世界高山探险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2001年9月，美国调查队的队长埃利克·西蒙逊和队员约亨·赫姆莱柏专程前来北京，请1960、1975年先后登上珠峰峰顶的中国探险家王富洲、屈银华、王勇峰等人座谈，主要是核对中美探险家们在东北山脊路线上发现的遇难者情况，以全面廓清“马·欧之谜”。他们这种认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令人赞赏。



第八章 珠峰气象知识与天气预报¹²



登山是人们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并逐渐认识自我的极好途径，是人们户外休闲的活动形式之一，也是人们体育锻炼的一种极好方式。登山爱好者除了必须具备登山方面的体育知识和医学知识外，还必须了解与登山有关的气象知识，了解与气象有关的自然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来安排登山活动，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在世界最高峰登山更应该如此。

一般说来，登山爱好者在制订自己的登山计划时必须了解登山地区的气候状况和天气条件，以及与上述气候状况和天气条件有关的自然规律。

登山者若要制订攀登珠峰的计划，更应了解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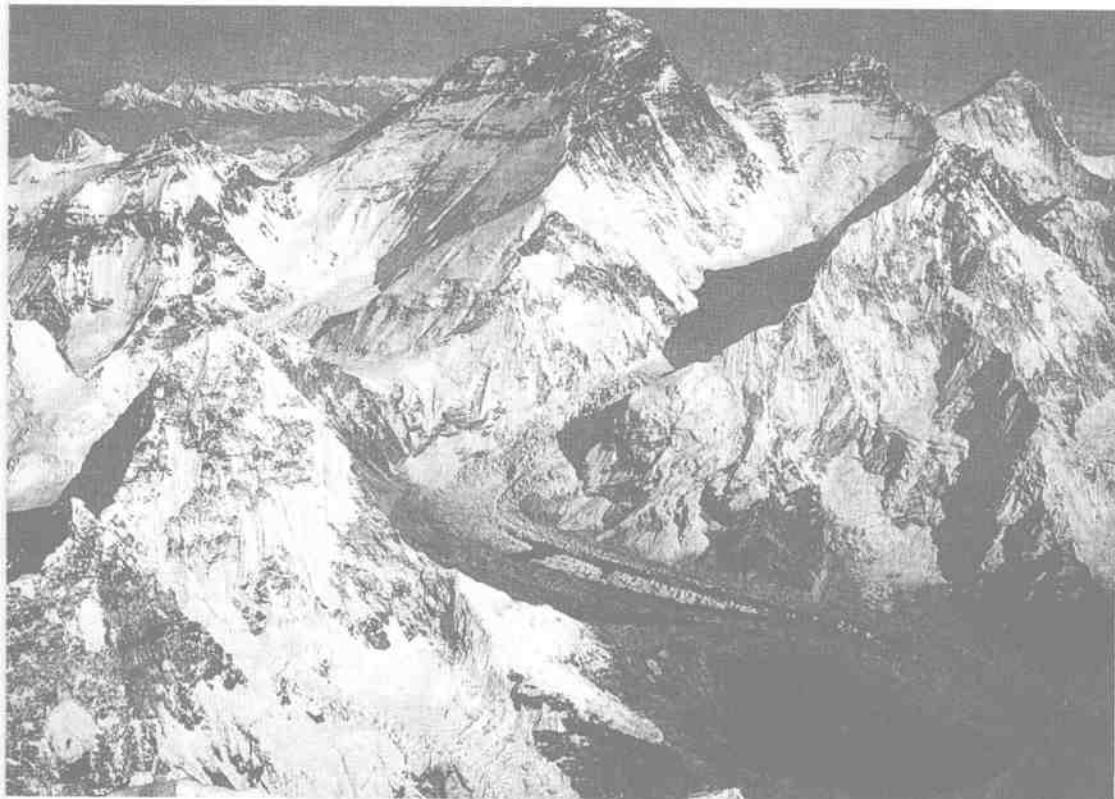
珠峰南北气候不同



横亘于青藏高原南缘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面为世界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南面为印度平原。当西南季风把印度洋的暖湿空气向北输送时，受喜马拉雅山脉屏障作用的影响，山脉南北的气候和自然景观迥然不同。珠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部分，对于印度洋暖湿空气的屏障作用更为显著。以降水为例，在珠峰南侧，多站多年降水平均为2000~3000毫米，为其北侧多站多年平均降水量的7~8倍。与此相应，珠峰南北的气候带和自然带也差异颇大。在珠峰南侧，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人们可以见到从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到高山冰雪带的各种气候带和自然带，而北侧却只能见到从高原寒冷半干旱草原带到高山冰雪带的三个气候带和自然带。

¹² 横亘于青藏高原南缘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面为世界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南面为印度平原。

从南坡攀登顶峰的主要危险是大雪与雪崩带来的生命威胁，尤其是在海拔5000、6000米的雪崩区。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及周围高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和章子峰。

珠峰南北攀登气象条件不同

珠峰南北气候和自然带的迥然不同给登山者在南北坡攀登带来不同的机遇。从南坡攀登顶峰的主要危险是大雪与雪崩带来的生命威胁，尤其是在海拔5000、6000米的雪崩区；从北坡攀登顶峰的主要危险是大风带来的冻伤和生命威胁，特别是在海拔7400米以上。

在1975年以前，从珠峰南北两侧攀登顶峰的成功者共有17次，其中，从北坡攀登顶峰的成功者只有两次。以北坡攀登顶峰成功的天气条件来看，8000~9000米高度的高空风速在12~18米/秒，无降水或微量降水。以南坡攀登顶峰成功的天气条件来看，在15次中有6次无降水，5次微量(0.0mm)降水，其余4次为1~2mm降

水，但8000~9000米高度的风速却有8次在20~36米/秒，其余7次在20米/秒以下。在1975年以前从南坡突击顶峰失败的有6次，突击顶峰的起始高度为8200~8600米，6次失败中有5次的天气条件为大雪，降水量为13~98mm，8000~9000米高度风速不大，均在20米/秒以下，只有1972年11月15日登顶失败的天气条件是无降水、大风，8000~9000米高度的风速达到20~24米/秒。在1975年5月6日从北坡8600米突击顶峰失败的天气条件为无降水、大风，8000~9000米高度风速为20~24米/秒。由上可见，在珠峰南侧，攀登成功的重要天气条件是无降水或微量降水，而北坡登顶成功的重要天气条件是小风(8000~9000米高度的风速小

晴空中的珠峰。



于20米/秒)；相反，南坡登顶失败的关键是大雪，北坡登顶失败的主要天气条件是大风(8000~9000米高度的风速大于20米/秒)。

以1960年5月26日印度登山队从南坡攀登顶峰失败和1975年5月6~7日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攀登顶峰失败为例：

1960年5月26日，印度登山队从南坡8600米营地突击顶峰失败。5月26日，珠峰南北两侧8000~9000米风速小于16m/s，风速宜于登顶，南侧日降水量为16mm，北侧为0.1mm。印度气象学家Nedngadi和Srinivasan于1964年在《印度气象与地球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季风暴发与珠峰探险”中指出：“1960年5月26~30日的大雪是由Baig. Gyon Simgh领导的印度第一次珠峰探险失败的原因。5月26日登山队最后突击珠峰顶峰时，击败他们的是大雪，并不是风。”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等在25日登顶成功，25~26日下山途中，山上下雪，但他们仍安全返回。上述例子表明，在南坡攀登珠峰必须降水小，若降水大于5mm，即使高空风速宜于登顶，也很难成功。

1975年5月5日，中国登山队16人到达8600米营地，5月6~7日两天突击顶峰未成功。据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说，“当时，风太大，我们无法接近‘第二台阶’；我们先后几次想在‘第二台阶’上架起金属梯通过，但都被大风刮回来了。”5月6~7日，珠峰8000~9000米的风速为22~24m/s，晴天。

正确选择登山季节

珠峰山区气候知识主要应包括雨季的起始与结束时间，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空风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海拔高度的地面风速的日变化情况。了解珠峰雨季的始末时间主要是为了安排珠峰登山计划，登山时段应尽力避开雨季，选择旱季。了解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空风变化情况对于从北坡攀登珠峰更为重要。根据我国登山家的经验，在珠峰地区登山应选择海拔7000~9000米风速小于7级风

的季节。前面提到的气候状况是登山者选择珠峰登山季节的重要气象依据。了解山区地面风速的日变化情况主要是为了安排每天登山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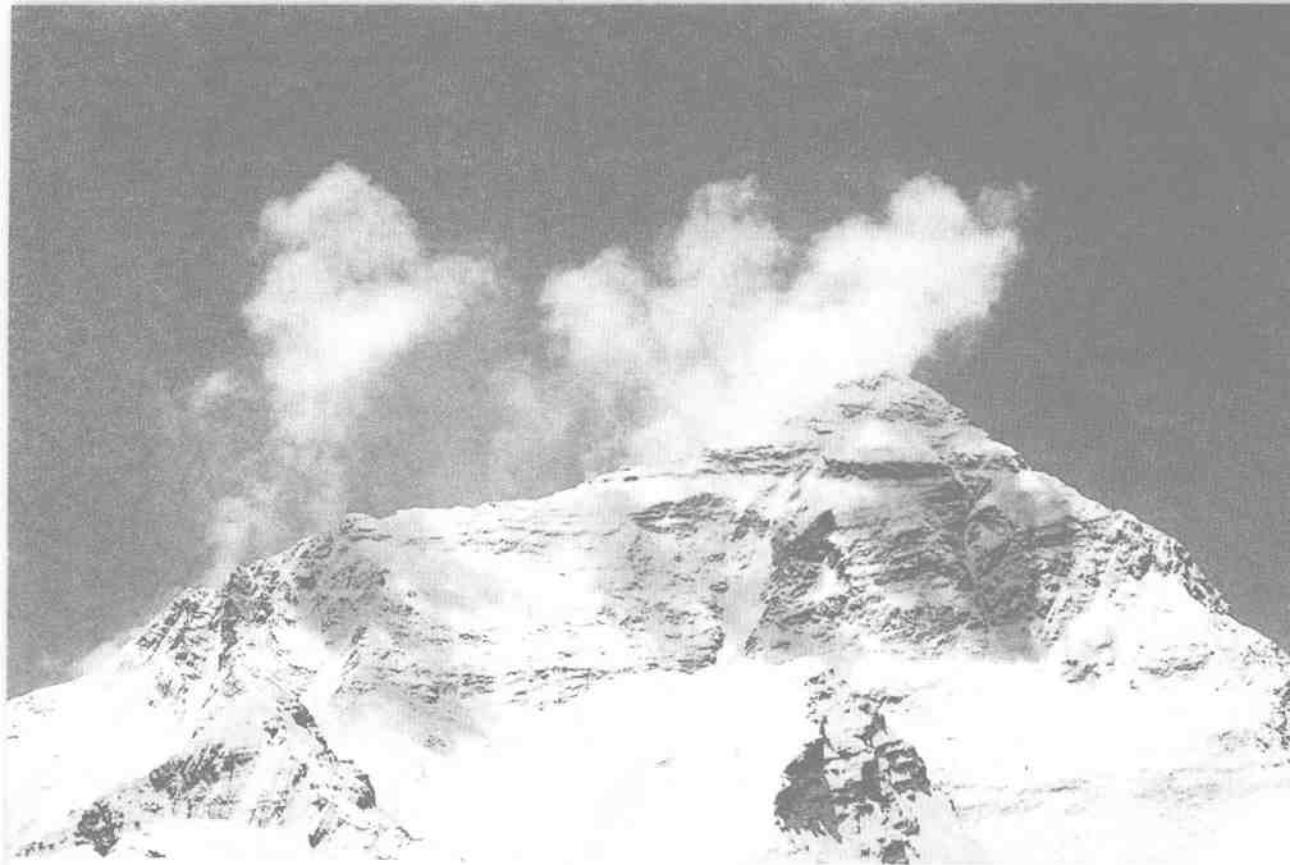
珠峰北侧地区的雨季时段为6月中旬~9月上旬，其中以7~8月降水量最大。珠峰地区海拔7000~9000米高空风速的季节变化主要决定于副热带西风急流带(亦称“南支西风急流带”)的变化，副热带西风急流带所处的位置即是出现大风的位置。据统计，珠峰上空(7000~9000米)的风速在1~3月和11~12月最大，一般不宜于攀登。综合上述两个条件，在从珠峰北侧攀登顶峰的登山季节以4月下旬至6月上旬、9月中旬至10月上旬为最好。

扬起哈达暗示风云

藏族同胞崇敬“珠穆朗玛女神”，每年都要来到珠峰北坡绒布寺朝拜，献上洁白的哈达，乞求女神降福人类。有传说，每到明月之夜，在献给女神的哈达中，最真诚奉献者的哈达会冉冉升起，系在女神头顶，随风飘动，宛如挂在顶峰的一面旗帜，故曰“旗云”。人们看到的挂在珠峰顶上随风飘动的“旗云”，正是若干年来无数真诚奉献者的哈达所组成。“旗云”并不是日夜出现，只有当女神需要向人们提示时，她才扬起哈达，以不同的舞姿暗示珠峰山上风云的变化。若朝山者心诚志坚，聪明睿智，便能从“旗云”的千姿百态中领悟风云的变化，遵照女神的旨意，审时度势，登上峰顶。若不按女神的旨意，一意孤行，必将受到惩罚，不能接近峰顶甚至有生命之虞。

神话传说固然是传说，但其中却暗藏着传说者不明白的科学真谛。我在珠峰地区度过了8个春秋，仔细观测、记录和拍摄了珠峰“旗云”的变化，领悟到了一些女神的示意，发现了“旗云”变化所蕴藏的点点科学奥秘。

藏族同胞崇敬“珠穆朗玛女神”，每年都要来到珠峰北坡绒布寺朝拜，献上洁白的哈达，乞求女神降福人类。



峰顶云直上。
小风好天，一
等天气，最宜
登顶。

所谓“旗云”，那是在珠峰顶上不断生成的对流性的“积云”，受高空强风的影响，随风飘动，波涛起伏；远望，宛如一面旗帜飘挂在峰顶，故曰“旗云”。在我国，最早在书面上提出珠穆朗玛峰“旗云”概念的是地理学界前辈徐近之先生。他在一本内部出版物中指出，“旗云”是“从珠穆朗玛峰东南面上升的潮湿气流和强烈的西风相遇时，山头遂有向东伸出的旗状云。”

8个春秋的观测研究表明，珠峰顶出现的“旗云”绝大部分是自西向东飘动，但当特殊天气系统来临时，“旗云”也会自东向西飘动。

据多年观测研究，有利于珠峰顶出现“旗云”的条件至少有三个：

- 1.一个孤立的高海拔的山头。
- 2.山头有生成云的条件。

3.山头有较强的风。

从我们多次制作攀登珠峰的登顶天气预告中，我们认识到，珠峰顶上的“旗云”的确可称作“世界最高的风标”。

首先，从珠峰“旗云”飘动的方向可以判断珠峰顶高度附近(海拔8000~9000米)的风向；其次，从“旗云”顶部起伏波涛的状态可以估计高空风速的级别大小。

细心观测研究珠峰的“旗云”变化与天气和天气系统的关系，我们发现，从珠峰“旗云”的状态不仅可以知道当天的天气，而且还可以预测未来13天内珠峰地区的天气状况。

若“旗云”自西向东飘动，云的顶部平而光滑，并在离开峰顶后云顶高度逐渐下降时，高空西风风速在每秒20米以上，当日不宜于登顶活动。1975年5月5日，由登山家邬宗岳率领的突击队从

峰顶云直上，
小风，风速小
于15米/秒，属
一等天气，最
宜登顶。



从我们多次制作攀登珠峰的登顶天气预告中，我们认识到，珠峰顶上的“旗云”的确可称作“世界最高的风标”。

如果“旗云”自东向西飘动，表明高空有偏东风气流，未来13天内会有印度低压来临，带来大雪伴随小风的天气。一般不宜7400米以上的登山活动。

8100~8600米攀登的过程中，峰顶的“旗云”正是呈现上述状态，8000~9000米的风速在每秒20~24米左右，邬宗岳不幸牺牲，攀登顶峰因大风阻挡而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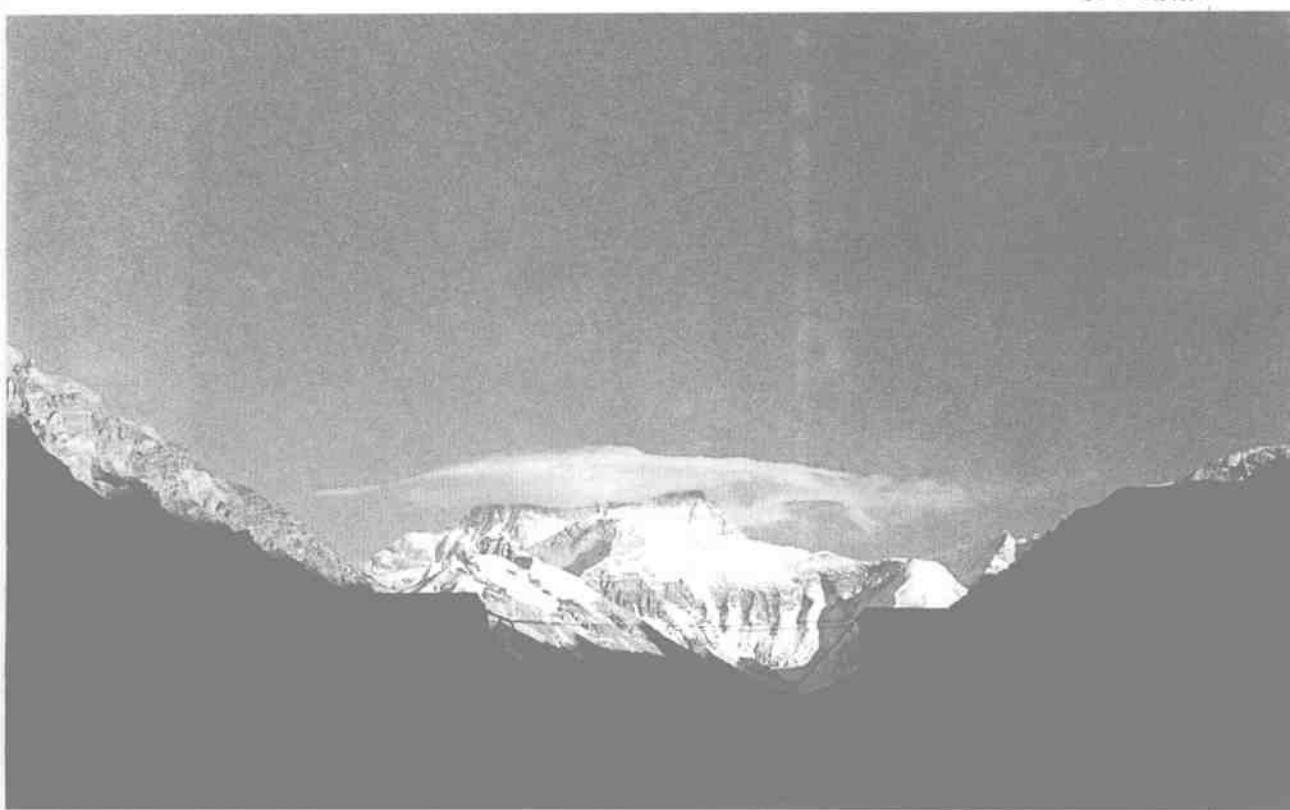
若“旗云”自西南向东北飘动，云顶起伏波动大，且其在离开峰顶后云顶高度逐渐上升，表明高空风速不超过15米/秒，当日还可以在7000米以上进行登山活动，但1天后会有高空西风槽来临，大风伴随降雪发生，23天内不宜于登顶活动。

如果“旗云”自东向西飘动，表明高空有偏东风气流，未来13天内会有印度低压来临，带来大雪伴随小风的天气，一般不宜7400米以上的登山活动。然而，在珠峰北坡，对于熟悉登山地形和路线的登山家，也可利用这种小风而气温高的天气，在8600米以下从事登山活动，因为从北坡攀登顶峰的主要威胁是大风。1966年5月1~3日，登山家王富洲就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率领20来名登山队员安全完成8100米的运输任务的。据王富洲先生介绍，在8100米活动时，尽管飘着雪，但风小，气温高，中午可摘下手套工作；然而，在下山时要注意辨认登山路线，否则容易滑坠。如果在珠峰顶部的云很少，没有形成“旗云”，且云慢慢向东南方移动，表明高空有弱的西北气流，珠峰地区受西风带高压脊控制，当日和未来13天内为宜于登顶活动时期。

科学家和登山家在珠峰地区生活与工作，朝夕与珠穆朗玛女神相处，天长日久，人们和女神之间逐渐了解，逐渐相知，逐渐建立了合作的默契。风雪交加的日子固然是女神的劫难日，晴空万里但“旗云”急速飘动之日，也是女神挺身斗恶风的时刻；“旗云”徐徐飘动，或在珠峰顶部的云垂直向上，太阳高挂天空，那是女神在欢迎我们。

“狭管效应”带来大风

“狭管效应”，是流体力学中的常用词汇，是指当流体在运动过



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的加速流动现象。珠峰北坡的“狭管效应”是什么意思呢？

在珠峰北坡的东部，在海拔7400~7600米的地方，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是攀登珠峰最常采用的必经之路。这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每当西风或西北风盛行时，一旦强劲的西风吹入这条狭窄的通道，空气流动速度加快，致使风速加大。一般说来，在偏西北风的条件下，这儿的风速都要比相同高度的其他地方大1~2倍，登山者在这儿攀登时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或被大风阻挡不能前进，或被大风吹走背包，或被寒风冻伤面部、四肢，严重时，大风可将登山者吹倒，坠入谷底深渊……

1980年春，登山家王富洲率领一支日本登山队从北坡攀登珠

峰顶有豆荚状高积云，天气稳定，风速小于7级，登顶的一等好天气。



峰顶有旗云，但旗云上升，风速在15~20米/秒之间，属二等天气。

峰，我率气象科考队在珠峰北坡大本营科学考察。

有一天，王富洲陪同日本登山队队长渡边兵力等来访问我，要我讲讲关于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和预报问题。据王富洲介绍，渡边兵力先生曾率领日本登山队从南坡攀登珠峰，对从南坡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比较了解，但对珠峰北坡的气象条件不了解，希望我讲讲在珠峰北坡攀登的气象条件。当我讲到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主要威胁是大风，特别是海拔7400~7600米地形的“狭管效应”带来异常的大风时，渡边先生不以为然，认为雪崩才是对登山者的主要威胁。渡边兵力先生是日本登山界前辈，当时他已年近花甲，是我的长者，出于尊敬，我未辩解，只说“谨供参考”。

几天后，中日队员组队向7600米营地攀登。从大本营高空测风资料可知，7500米高度为西北风，14米/秒。我告诉渡边先生，

在 7400~7600 米高度处的风速估计可达每秒 20 米左右, 请谨慎, 注意安全! 渡边兵力先生笑了笑, 毫不在意。当中日双方登山队员到达 7400 米时, 遇到了大风, 队员们感到有 7~8 级风(相当于风速每秒 17~22 米), 中方队员顶着大风把登山给养运到了 7600 米营地, 日方队员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这段“狭管效应”区, 被大风阻挡下山了。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 渡边先生带着好几个队员在王富洲陪同下又来找我, 探讨从南北坡攀登珠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问题, 我自然毫无保留地作了详细介绍。谈完后, 比我年长 20 来岁的渡边先生客气地向我鞠躬, 口中不断地用英语说“谢谢”。看来, 渡边老先生相信这个“狭管效应”了。

背风波涛暗藏玄机

人们知道, 在北半球的冬季, 在山脉迎风北坡寒冷而风大, 背风南坡温暖而风小。然而, 人们却不知道, 在珠峰的背风一侧, 却暗藏着奇妙玄机, 有时能助你成功, 有时能令你失败。

来自登山实践的科学问题 1966 年春, 有两组登山队员先后在珠峰北坡 7000~8000 米高度活动。报话机里不时传来登山队员对天气的反映: “大本营! 现在风很大, 至少超过八九级, 无法行动。”过了几个小时, 高山上又传来消息: “现在风突然减小了, 只有三四级, 可以行动。”在 1 天内, 先后传来了四次迥然不同的高山风速报告, 时大时小, 变化很大。

对此, 我和我的同行们都很奇怪: 为什么呢? 查阅有关文献, 我怀疑是否与山地背风波动有关。

1975 年 5 月, 是攀登珠峰的最好时段。一方面为保障登顶任务完成, 二方面为探索登山队员提出的问题, 我向登山队王富洲政委建议, 每天施放 68 个探空气球, 得到了他的支持。为此, 我们气象组每天在线布河谷施放 64 次无线电探空气球, 每隔三四个小时施放一次。与此相同季节, 我们在线布河谷西侧山坡海拔 5700 米

看来, 渡边老先生相信这个“狭管效应”了。

我们千辛万苦在珠峰北坡取得的背风波动观测资料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科学结果。



南侧有农秋云，
风速在15—20
米/秒，属二等
天气。

处连续8天施放“定高平飘”的探空气球，每天施放5次，每次在6000、8000、10000米三个不同高度上施放三个等高平飘气球，用以测量背风波动资料。

可喜的科学成果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千辛万苦在珠峰北坡取得的背风波动观测资料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科学结果。

原来，在珠峰北侧，当高空盛行西南风时，珠峰北坡地区上空7000~10000米高空中正处于背风波动区域，气流上下运动十分剧烈，波峰和波谷的高度差(即振幅)可达到1~2千米。波峰和波谷的时间差(即半周期)约为1~3小时。测得的最大振幅为2.2千米，气流最大下降速度为每小时450米，最大上升速度为每小时320米。

在气流下降区域(即波峰到波谷区)的气压高，并伴有大风，最大风速达32米/秒；在气流上升区域(即波谷至波峰区)的气压低，伴有小风，最小风速仅5米/秒。背风波动是形成珠峰北坡的中小尺度低压和高压的原因。

观测分析结果说明，登山队员在7000~8000米高度报告的风速突变情况确实存在，它是由于在珠峰北坡背风波动带来的结果。登山者在海拔7000米以上攀登珠峰时，若在珠峰上空盛行西南偏西风时，应根据背风波动可能带来高空风速短期剧烈变化的特点来安排登山计划。

1990年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和日本热气球协会合作，在珠峰西北侧施放热气球，执行“飞越珠峰科学探险”活动时，由于日方不听取我的关于“改变热气球施放点，避开希夏邦马峰带来背风

大风、旗云劲吹，风速大于20米/秒，不宜登顶的三等天气。



观测分析结果说明，登山队员在7000~8000米高度报告的风速突变情况确实存在，它是由于在珠峰北坡背风波动带来的结果。



波动威胁”的建议，就曾遭遇背风波谷中的下沉气流袭击，热气球很难从地面升起，最后以热气球坠毁、两人重伤的失败而告终。

热岛效应改变急流

珠峰的加热作用，除了温暖四周空气外，还会影响“南支西风急流中心”出现的高度。所谓“南支西风急流中心”是指位于北半球副热带上空西风风速最大的区域。春季，当“南支西风急流”从珠峰南侧向北侧移动时，其最大风速中心的高度在珠峰上空会下降1000~2000米，即在珠峰南侧，“南支西风急流中心”的平均高度约为海拔12千米，在珠峰上空，其中心的平均高度仅约海拔10000米；西风急流再往北移动时，其中心的平均高度又会升高到海拔11000米左右。可见，在春季，“南支西风急流中心”的平均高度在珠峰上空要比其南北两侧低1000~2000千米。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实际观测研究表明，春季，珠峰地表吸收太阳直接辐射的作用很强，使得其地表气温迅速升高，极大地改变了珠峰南北两侧的气温分布。众所周知，珠峰海拔高度接近9000米，因而使得珠峰南北两侧海拔5000~10000米高度内的气温随纬度的分布改变；珠峰与其北侧的气温差异增大，月平均温差达到每1个纬度44摄氏度，即在海拔5000~10000米高度内，珠峰地区的月平均气温要比其北侧1个纬度地区的气温高出46摄氏度。这是一个非常异常的南北向气温分布。一般说来，在北半球中纬度，南北向的月平均温差仅为每隔1纬度相差0.8度左右。根据“热成风”随高度分布的原理，若南北向气温差异大，则“热成风”风速随高度递增快，而这种南高北低的气温分布所产生的“热成风”为西风，因而，即西风风速随高度递增快，从而表现为最大西风风速出现高度，即西风急流中心高度降低。

科学家们把高山对于四周大气的加热作用，称为“热岛效应”，



即把这些耸立于大气中的高山比喻为海洋中的热岛。

珠峰的这种热岛效应，对于航空、登山和热气球飞行均有很大影响。飞机驾驶员和热气球乘坐者必须知道，当你经过珠峰上空时，你应该认真考虑这种特殊的风速分布，重新调整你的飞行路线。登山者必须了解，从北坡攀登珠峰顶，主要的威胁是大风带来的冻伤和生命危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地面风速朝夕巨变

1966年下半年，根据登山队员的实践经验，我统计分析了多年拉萨、定日和珠峰北侧大本营的地面和高空风资料。结果表明：春季，在青藏高原上，自海拔3600米至5000米，地面风速的日较差(即当地时间18时与06时地面风速之差)变化很大，即随着海拔

珠峰的这种热岛效应，对于航空、登山和热气球飞行均有很大影响。

高度升高，地面风速日较差迅速增大：在3600米处，地面风速日较差月平均仅为1.2米/秒，在海拔4300米为4.6米/秒，在海拔5000米已达5.8米/秒。它意味着海拔高度每升高1000米，地面风速日较差的月平均值增大3.3米/秒。若照此推论，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地面风速日较差可达14.5米/秒。这个推论固然不可确信，但从我国登山队员多次攀登珠峰的实践表明，在珠峰北坡，地面风速日较差随海拔高度迅速递增的现象确实存在。

根据珠峰北坡上述特点，1966年底和1975年1月，我曾两次书面向国家登山队建议：

在登山季节（4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珠峰北坡高山地区从事登山和考察活动时，一定要遵循近地面风速日变化特点，把“早出发，早宿营”的登山战术作为登山规则。尤其在宜于登顶的好天气时段，在8000米以上活动时，更应严格执行“早出发，早宿营”的登山规则，以凌晨4时至下午4时为宜。

中国登山队采纳了我的建议，规定攀登7000米以上高峰必须在早晨4点出发，16点宿营。

“早出发，早宿营”的登山规则给我们气象组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当登山队员在7000米以上攀登时，气象组必须在02时前收到天气图资料，并于04时之前完成天气预报，提出今天登山活动的建议，向登山队领导汇报后，用对讲机传到山上。新的一天的登山活动从04时就开始了。

风冷效应牢记在心

在高海拔地区登山活动，除了适应地面风速日变化随高度迅速增加的规律而必须“早出发，早宿营”以外，登山者还必须了解大风与低温同时出现带来的严重危害。这里要介绍“风冷效应”和“风冷相当温度”（即“体感温度”）。

所谓“风冷效应”是指因为大风而令人们更为寒冷的现象。



“风冷相当温度”又叫“体感温度”，即，在相同气温条件下，风速越大，人们身体感觉的气温越低，这种与气象观测气温不同的人体感觉气温叫“体感温度”。“体感温度”与气象观测温度差别巨大的原因是大风加速人体热量丧失于大气之中。据测定，当气温为摄氏0度时，若风速在2.5米/秒以下，“体感温度”与气温相同；若风速为10米/秒，“体感温度”为摄氏零下12度；风速20米/秒，“体感温度”为摄氏零下18度。若大气温度为摄氏零下15度，风速10米/秒，“体感温度”为摄氏零下30度；等等。

偏东风旗云，
未来1-3天内
有印度低压移
来，带来降雪。
一般不宜登
顶，属二等天
气。

一般说来，当“体感温度”低于摄氏零下30度时，登山者极易冻伤。在海拔7000米以上攀登，登山者常常会遇到摄氏零下15度、风速10米/秒的气象条件，也就是说，登山者常常面临可能冻伤的气象条件，这是登山者必须警惕的。

河水径流日差很大

一般说来，高山地区河水流量的日变化主要决定于冰川融水量

一般说来，当“体感温度”低于摄氏零下30度时，登山者极易冻伤。

的日变化，而冰川融水量的日变化又主要决定于气温的日变化。春夏秋三季，日出后，当阳光照射冰川表面时，冰川逐渐消融，涓涓流水慢慢汇入河谷，增加河水流量。在珠峰绒布河水流量中，67% 左右来源于冰川融水。因此，高山河流的河水流量，正午前都很小，午后至傍晚最大。

登山爱好者无论在珠峰地区或其他高山地区活动时，若必须淌水过河，一定要在正午前通过，否则会被寒冷刺骨的冰川融水冲走，危及生命。

做好登山天气预报

自 1966 年以来，在参加珠峰、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中，由于工作需要，我除了完成科学考察任务外，还先后参加了 1966、1975 和 1980 年的珠峰登山天气预报以及 1983 和 1984 年的南迦巴瓦峰登山天气预报。在登山天气预报实践中不断认识这些山区的特殊天气气候规律，并将这些初步认识再在登山天气预报实践中检验、提高，逐渐成为指导登山的天气气候规则。

初为登山天气预报 1966 年春，应中国登山队的邀请，我成了登山气象组一员。在当年珠峰登山天气预报中，根据登山天气预报组的分工，我主要负责高空风预报，即预报珠峰 7000、8000、9000 米高度上的风向风速。

珠峰位于北纬 28 度、东经 87 度附近。当时我想，要考虑中高纬度西风带东移和南下对珠峰上空风向风速变化的影响，选用的时间剖面图的地区必须位于珠峰西北侧。为此，我在 300 百帕等压面上选用沿东经 75 度和东经 90 度、北纬 40 度和 30 度的风向风速和高度的时间剖面图，制作了 4 个预报工具（后来发现，上述工具只考虑了珠峰西北侧的天气系统对珠峰的影响，并不全面，应该同时考虑珠峰西南侧的天气系统。为此，做了很大改进）。1966 年春，利用上述工具作了三次珠峰地区 7000~9000 米高度的高空风预报，

1~2天的风速变化趋势基本可信,但风速的定量预报不准,也曾带来沉痛的教训。

1966年4月21~22日,上述预报工具中显示,北支西风急流迅速南下,948位势什米等高线从北纬35度南下到北纬25度,一个25米/秒以上的大风中心自西北向东南移动。据此,在4月22日的天气会商中,我预报4月23日风速要加大,但加大多少,大风维持多少时间,我没有把握。讨论中,没有得到组内预报员的支持,我的预报没有列入气象组的预报结论中。4月23日,中国登山队副队长张俊岩同志正率领第二分队从7600米营地向8100米营地运送登山物资,为1967年春正式攀登珠峰准备。当日早晨,张副队长他们突然遇到大风袭击,在没有得到气象组预报的情况下率队下撤,在通过7600~7400米的“狭管效应”大风地段时,有4位队员的登山包被大风吹下山谷中,16位队员有不同程度的冻伤。当我和彭光汉组长一道去看望这些冻伤的队员们时,看着他们当中有人要被截去手指、脚趾,内心既悲痛又惭愧。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们,但他们都默默无言。当我和组长快离开时,一位受伤的老队员说话了:“我只担心明年的登顶任务能不能完成。”短短一句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我们气象预报组水平的担忧!“登山天气预报太重要了,它与登山队员性命攸关啊!”我心里很沉痛,立志要把登山天气预报水平提高!

实践—认识—再实践 从1966年到1984年,我先后多次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从事登山天气预报,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不断提高,先后发表了有关登山天气预报的论文三篇:1.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2.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3.攀登南迦巴瓦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美国登山队和日本登山队在攀登珠峰和南迦巴瓦峰前曾向我讨要这些论文的复印件,作为登山中的天气预告参考书。当时,为了美国登山队便于阅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论文,我把这篇论文的图

要认识喜马拉雅山区的天气变化规律并进一步准确预报它的变化，为登山者服务，确实需要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表说明和文章的大小目录都译成了英文。与此相应，我在1975、1980、1983、1984年在喜马拉雅山区所作的登山天气预告水平也逐渐提高。其中，在1984年春，我一人在南迦巴瓦峰基地营为中国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制作登山天气预报，从雨季开始时段的气候(6个月)预测，春季登山好天气时段的长期(3个月)趋势预测，登顶好天气时段的超中期(7~10天)天气预报到1小时内的临近天气预报，都比较符合天气实况，曾被我国登山界誉为“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

2003年5月11~21日，在“纪念人类登上珠峰50周年”活动中，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登山协会合作，电视直播了“澳的利2003，站在第三极”的攀登珠峰实况，中国登山队于5月21~22日先后两天登顶成功。我应邀作为此次直播活动的嘉宾，每天上午与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女士合作，在《珠峰气象站》节目中，预测未来13天内的攀登珠峰的天气，并适时介绍有关攀登珠峰的天气气候知识。在全国人民和世界登山爱好者面前，再一次验证了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论文中的某些方法和结论。其中，根据历年5月宜于攀登珠峰的好天气时段的变化特点，根据5月不利于珠峰登山的天气系统与云系变化的关系，我在5月13日预测“5月16~18日没有登顶好天气”，我的预测与瑞士等国气象台预报相反。

天气实况证明了5月16~18日的天气不宜登顶，我国和外国登山队于5月15日从7028米营地下撤到6500米营地待机，在5月16~18日，珠峰南北两侧没有人登上珠峰。后来，各国登山队于5月20~24日纷纷从珠峰北坡和南坡登上了珠峰。说真话，无论是我国登山界朋友过去对我的鼓励，还是我在“澳的利2003，站在第三极”实况直播活动中预报的成功，都只能作为鞭策我前进的动力。要认识喜马拉雅山区的天气变化规律并进一步准确预报它的变化，为登山者服务，确实需要

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所谓“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若不进一步认识不断变化的天气气候状态，进一步掌握其变化规律，所谓“诸葛亮”也会变为“臭皮匠”了。



所谓“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第九章 有关珠峰的一些技术问题



长期以来，围绕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多数是以讹传讹，甚至成为了人们的常识。我希望在这里就自己所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更正。

“人类死亡地带”与“生物禁区”

我们常常听说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是“人类死亡地带”，后来又说是“生物禁区”。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还要从头说起。早在1800年前后，欧洲兴起了乘热气球遨游的活动。1804年，法国的盖卢塞和比奥两人，乘热气球曾到达3960米的高度。比奥说：“我感到呼吸困难，喘气、脉搏和呼吸的次数增加，鼻孔和咽喉都感到异常干燥，以致吞咽都困难。”

1808年，意大利的安德欧利和布利欧什两人乘热气球到达9000米(海拔)高度。当他们在7077米时，布利欧什已不自禁地进入轻松的睡眠状态；到达9060米(海拔)高度时，安德欧利说：“我的左手臂已不能活动。”但气球仍在上升，当气压表上的最低读数为216毫米汞柱(相当于海拔9450米的高度)时，恰好气球出了裂口，它像降落伞一样，缓缓地把两人安全地带到了地面，没有受伤。教练格莱施尔说：“由于安德欧利此前曾多次乘热气球升空，他已经能够忍耐低气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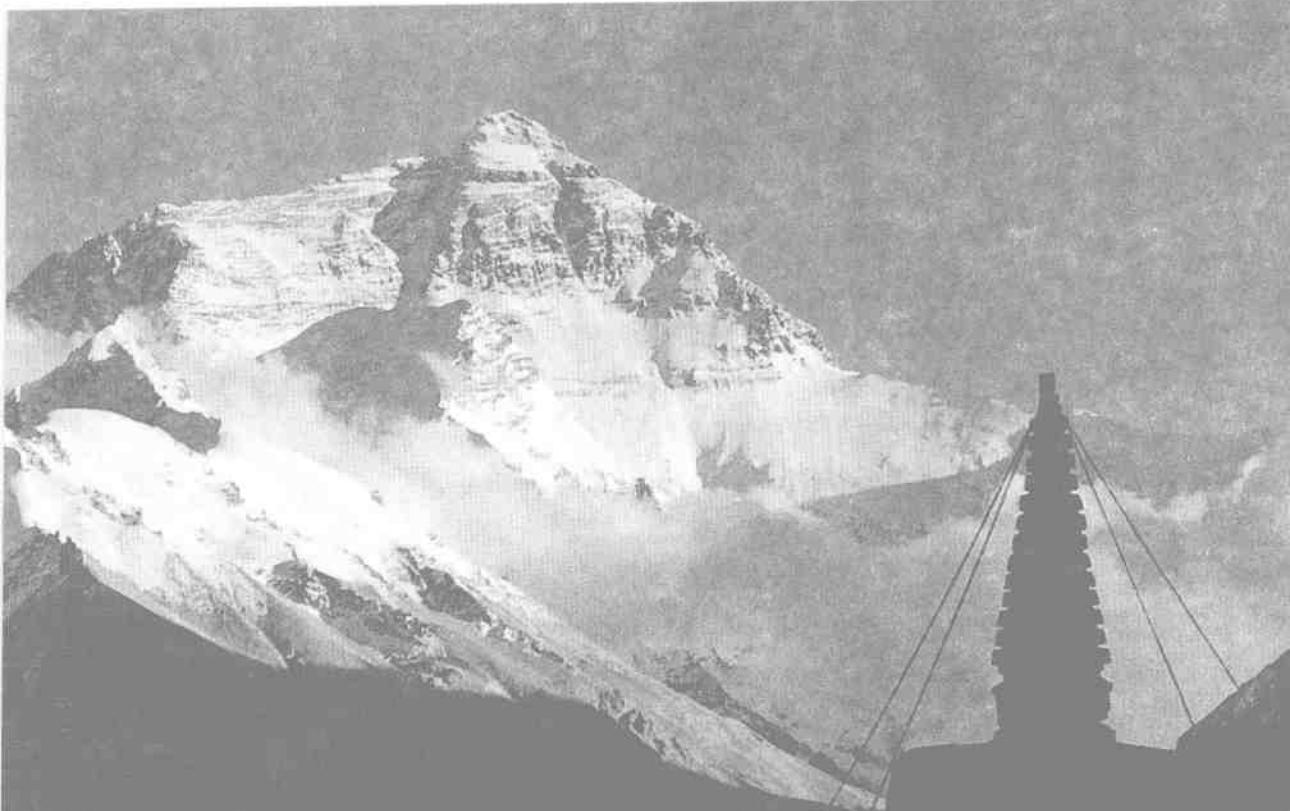
1874年，意大利的斯宾耐利和赛维尔两人乘热气球升空，超过6000米的高度，但最低气压记录已到达7000米。在3600米的高度上，他们在吸入的空气中加入了40%的氧气，感到很舒服，没有什么缺氧的感觉。

第二年，他们二人加上蒂桑迪埃在供氧设备很不完备的情况下



下，就贸然乘热气球升空。他们原计划只在感觉需要氧气时才使用氧气，但在8000米的高度上，斯宾耐利和赛维尔先后死去，只有蒂桑迪埃一人活下来。后来查看他们的记事本，写下的气压记录是7450米，他们那时都感到应该用氧，但都已经抬不起胳膊了。蒂桑迪埃注意到当时手表的时间是下午1:30，他自己也很快失去知觉。过了大约40分钟后，他又清醒过来，原来气球正在下降；当他向外扔下更多的沙袋，气球随之又开始上升，他又昏迷过去，直到下午3:30才又睁开眼睛，察觉到他的两位同伴都早已死去。这样，他就得出：“8000米(海拔)高度是人类死亡地带”的论断。

1922年，英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索马威尔，在到达珠峰东北山脊海拔8230米的高度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越往高处走，体



珠穆朗玛的北壁、东北山脊、西山脊、北壁上的霍思拜茨岩沟(右侧靠近西山脊处)、诺顿岩沟(亦称“大岩沟”，左侧靠近顶峰下方的阴影)。

关于8000米以上是“生物禁区”的说法，也是极其荒谬的。

力就越差，而且随着高度的增加，体力变坏的速度也越快，在6700米以上他感觉到大量的脱水，他说：“这8000米以上的高度不仅仅是‘人类死亡地带’，而且可以说是‘生物禁区’，因为生物在这样的高空中是无法生存的。”

实际情况早已否定了这两种说法。1922年、1924年英国珠峰队的索马威尔本人和诺顿都曾经在供氧装备损坏的情况下，仍在8230米的高山上活动，直到后来下山，他们也还都活着。另外，1960年5月24日下午7:00，当中国队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在登上海拔8690米的珠峰东北山脊上的“第二台阶”之后，在完全没有氧气可用，更没有食物可吃的情况下，借着微弱的月光，坚持夜行军，于25日凌晨4:25登上珠穆朗玛峰并安全返回基地营，他们在长达14小时内，在海拔8700米的高山上没有使用氧气，竟然完成了登顶，并能安全地返回。除了王富洲和屈银华两人的手指和脚趾被冻掉之外，他们都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但都能生还。另外，德国和美国的高山登山家们，他们在前往喜马拉雅山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前，都要在本国做一系列的进山前训练和其他准备，低压舱的耐缺氧训练是在进山前的主要训练课题。美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李奇微博士和德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海茵利希考费尔教授总结的“无氧”攀登理论，就是在无数高山探险家的成功生存经验基础上得出的。1978年5月8日，意大利的梅斯纳和哈贝勒在“无氧”理论的指导下，自始至终未使用氧气，成功登上珠峰并返回基地营。1985年5月1日，中国西藏登山队的仁青平措、边巴和次仁等9位队员也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自始至终未使用氧气，登上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的。因此，现在再重提“海拔8000米的高度是‘人类死亡地带’”，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关于8000米以上是“生物禁区”的说法，也是极其荒谬的。其实我们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和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以及

200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经常看到老鹰和雪鸽（学名是Columba Leuconota）从珠峰和希夏邦马峰飞越去南侧，或飞越来北侧。而喜马拉雅山的黄嘴山鸦（学名Pyrrhocorax Graculus）却总是跟着高山登山队，从一个营地到更多的营地，直到8000米以上的顶峰，为的是寻找一些登山队抛弃的面包残渣或剩饭吃。不但我们自己在攀登这两座高峰时，亲眼所见，许多外国队的登山记事中也都有关于黄嘴山鸦跟着高山登山家们的记载。喜马拉雅山区共有4种乌鸦，除上述的黄嘴山鸦（黄嘴黄腿）外，还有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这种乌鸦只在6000米以下活动，不往高处去；寒鸦（Corvus Monedula），这种鸦全身黑色，只有脖子上有一个白色的环圈，在5000米以下觅食；另有一种大嘴乌鸦（Corvus Macrorhynchos），全身都是乌黑色，个子最大，身长500毫米，仅在4000米左右的低山地觅食，常常在基地营的垃圾堆上找食，稍高一点的地方它们都不去。所以，8000米以上是“生物禁区”的说法，今天看来也是不确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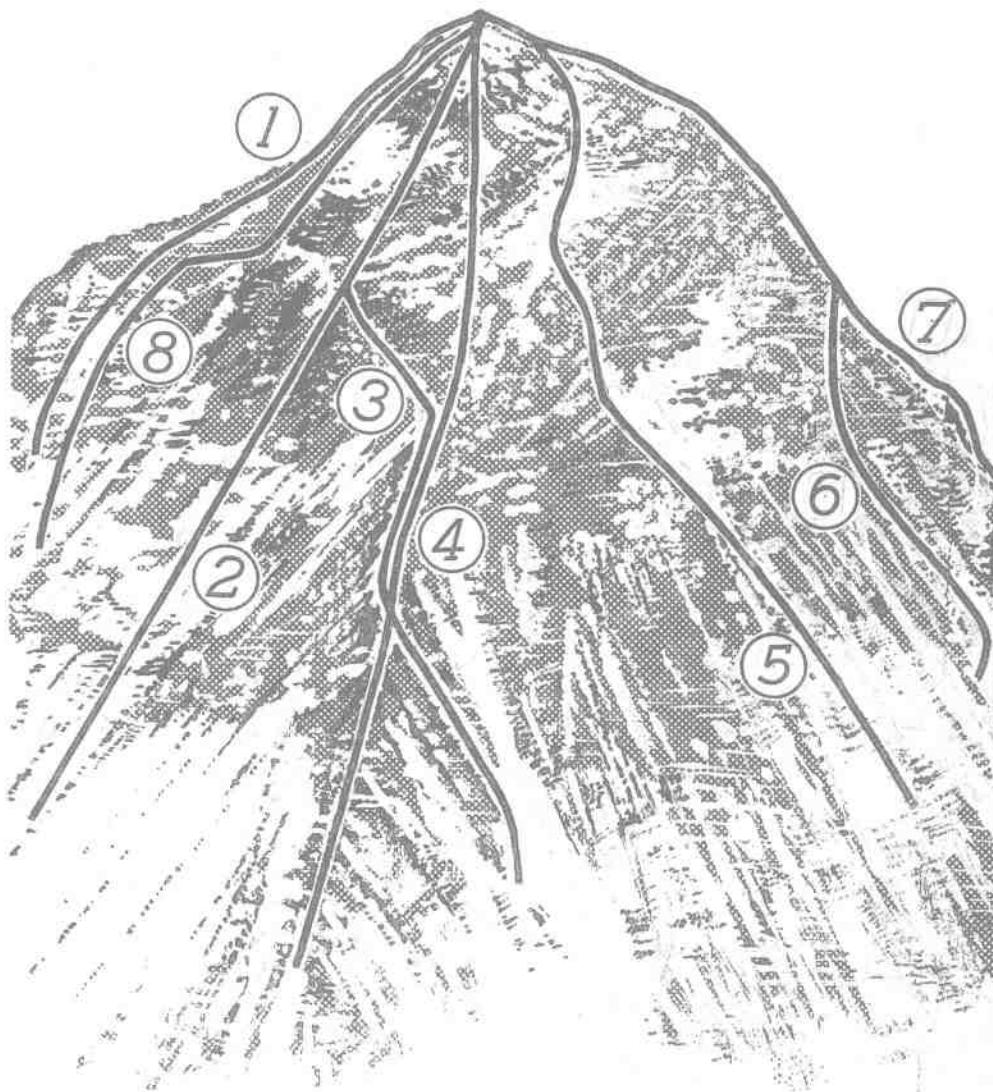
攀登珠峰的“三脊路线”

珠穆朗玛是由三条大山脊和三个坡面（又称三壁）构成的。三条大山脊是东北山脊、东南山脊和西山脊，三壁是北壁、东壁与西南壁。

东北山脊路线，在珠峰北侧，从绒布冰川向上越过冰瀑区登上珠峰与其北峰——章子峰之间的山坳（鞍部，因其位于珠峰北部，通称北坳）。这个山坳就在东北山脊上，是从东北山脊攀登珠峰的起点，沿这条山脊向上，在海拔7400~7650米的地方，是一个大风口，在大风的日子里，这一段路程是非常危险的。从7650米往上，到海拔8100米的山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岩石是深黄色的，这就是英国人在1922年登珠峰时所说的“黄色地带”（Yellow Band）。在这里有一个1~3米的不很陡的岩石台阶，就是人们所说的“第



珠穆朗玛峰 (8848.13)



1986年本书作者手绘珠峰攀登路线素描图。其中1为1960年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的东北传统路线，2为1980年日本队成功的北壁路线，3为1962年美国队霍恩拜因开创的西山脊路线，4为1981年南斯拉夫队开创的路线，5为1975年英国人开创的西南壁路线，6为1980年波兰人开创的东南山脊支山脊(南山脊)路线，7为东南山脊传统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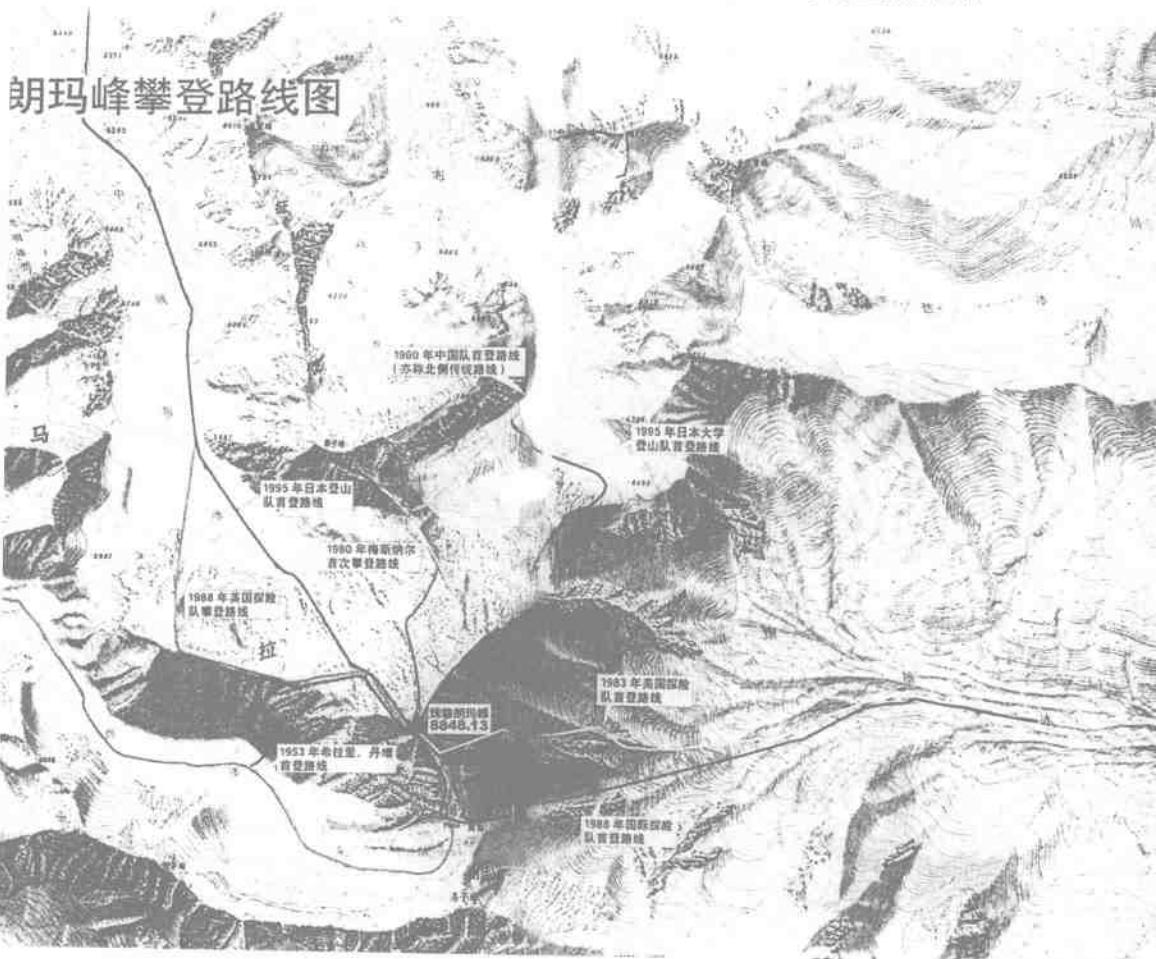
一台阶”(First Step)。再往上到8650米的高度上，又有一个高达6米多的岩石台阶，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台阶”(Second Step)。这个台阶坡度达85度，只有越过它，从东北山脊的路线才能登上顶峰。1960年5月24日晚7:00多，中国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来到这个台阶下，几次试着向上攀登都滑了下来，最后还是采取搭人梯的办法才登上去的。1975年中国队第二次从这条路线登珠峰，事先在北京做好了1.2米长的5节铝合金梯子，连起来成为一个7米多高的金属梯，便很顺利地登上了“第二台阶”，从“第二台阶”往上直到顶峰就没有什么太陡险的地方了。

东南山脊路线，在珠峰南侧，1952年瑞士队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首先开创了这条东南山脊路线。这条路线从珠峰南侧的孔布冰川向上，在冰川源头登上珠峰与其南方的洛子峰之间的山坳——南坳，也是东南山脊的最低点，然后沿东南山脊向顶峰上攀。从孔布冰川的源头(海拔6450米)到南坳之间，正好是洛子峰的南坡，所以要攀登一段洛子峰南坡，这一段路比较陡峭，还有雪崩的危险。登上南坳之后向左就是珠峰的东南山脊，沿东南山脊向上攀登，在东南山脊8600米附近有一段比较陡峭而坚硬的冰雪山脊，长达450米，这一段路程不但开阔，且没有可以抓握的支点，很是危险。再往上去就到达8700米的珠穆朗玛南峰；越过南峰再向上攀，走不远就来到东南山脊上最难走和最危险的路段，人们称它为“希拉里台阶”(The Hillary Step)，也有人称之为“希拉里鼻梁”(The Hillary Budge of the Nose)，以纪念这位首先登上珠峰的勇士。这段路不但光滑、陡险而且很狭窄。两侧都是万丈深渊，需要互相保护，小心翼翼地慢慢向上移动，并且，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在有同伴的保护下通过。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恶名昭彰的希拉里台阶”，有不少人就是在这里滑坠遇难的。过了这一段之后，就登上了顶峰。

东北山脊路线是1921年英国人开创的登顶路线，东南山脊则

是瑞士队开创的。在1952~1964年间，也就是国际上称之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期间，各国登山家们都是沿着这两条路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所以人们称这两条路线为“传统路线”。

西山脊路线，在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和东南山脊之间，有一条从海拔6520米处直达顶峰的南峰的山脊，这就是珠峰的西山脊。西山脊的西北山谷位于中国境内的绒布冰川，而其西南山谷又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孔布冰川，所以西山脊是中尼国界的分水岭。但这条西山脊从珠峰的南峰下来只到海拔6520米处就被一个断崖所折断，



珠穆朗玛峰攀登路线图。

断崖的左右两侧又形成了两条支山脊，一条落在孔布冰川上海拔6250米处，另一条的尽头是海拔6640米的孔布泽峰(Kumbutse)。在这条山脊与孔布泽峰之间有一个海拔6006米的山坳，人们通称为罗拉山口(Lho La Pass)。

西山脊路线的起点有两个，一个是从尼泊尔一侧登珠峰时，从孔布冰川上游、海拔6250米处登上断崖西南的支山脊，从这里登上6250米的西山脊，然后沿西山脊上珠峰南峰，再越过南峰，经“希拉里台阶”登上顶峰；另一个是从中国一侧，先从绒布冰川登上罗拉山口，再沿断崖的西北山脊登上海拔6250米处的西山脊起点，再沿西山脊直上珠峰南峰，经“希拉里台阶”登上顶峰。

1962年5月，美国队的霍恩拜茵首先开创了这条登顶路线。但是在到达西山脊的8350米处时，遇到一个陡峭的断崖(比东北山脊“第二台阶”还陡险)无法越过，发现了在西山脊的左侧，也就是完全处于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上，距西山脊很近的坡面上有一条很大的岩石山沟，可以直通到顶峰附近，他就从西山脊横跨进入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面(由于这个坡面很陡峭，平均坡度达70度，人们又称它为“北壁”)。他们进入北坡的岩沟后，发现沟内可以攀登的支点很多，就顺着岩沟直接上攀，登上南峰和“希拉里台阶”，成功登顶。这条大岩沟后来就被各国登山家称为“霍恩拜茵大岩沟”(Hornbein Couloir)¹³。

实际上，霍恩拜茵和F.威廉开创的是“西山脊转北壁路线”，并不完全是“西山脊路线”。真正从西山脊登上珠峰的，至今还没有，说明它确实是一条新的珠峰攀登路线。

以上三条路线是1963年以前人们开创的最主要的成功路线，也就是珠峰的“三脊路线”。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要从山脊上攀登珠峰呢？从山脊上登珠峰，和从山脊上攀登任何山峰，都是攀登高山所必须采取的战术措施。山脊，顾名思义，就是山峰的脊梁骨，站在山的脊梁背上，第一不会遭到滚石的袭击，第二不会有雪崩的



因此，攀登任何高山，从山脊上向上攀登，是最安全的选择，也是选取登山路线的原则之一。



由英国探险队首先开创的珠峰东北山脊传统登山路线。1921—1938年间，英国队先后7次从这里向珠峰发起冲击，都未能成功。其中尤以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的冲击最为知名。1960年5月25日，中国队的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从这条路线首次成功登顶。

袭击，除了风比较大之外，是上山路中最安全的路线。试想，如果有滚石，它只能向山坡下滚坠，不可能在山脊上滚；雪崩也是一样，大量积雪只能从山脊上向旁边的坡面下滚，不可能直着向山脊上滚动。因此，攀登任何高山，从山脊上向上攀登，是最安全的选择，也是选取登山路线的原则之一。

珠峰三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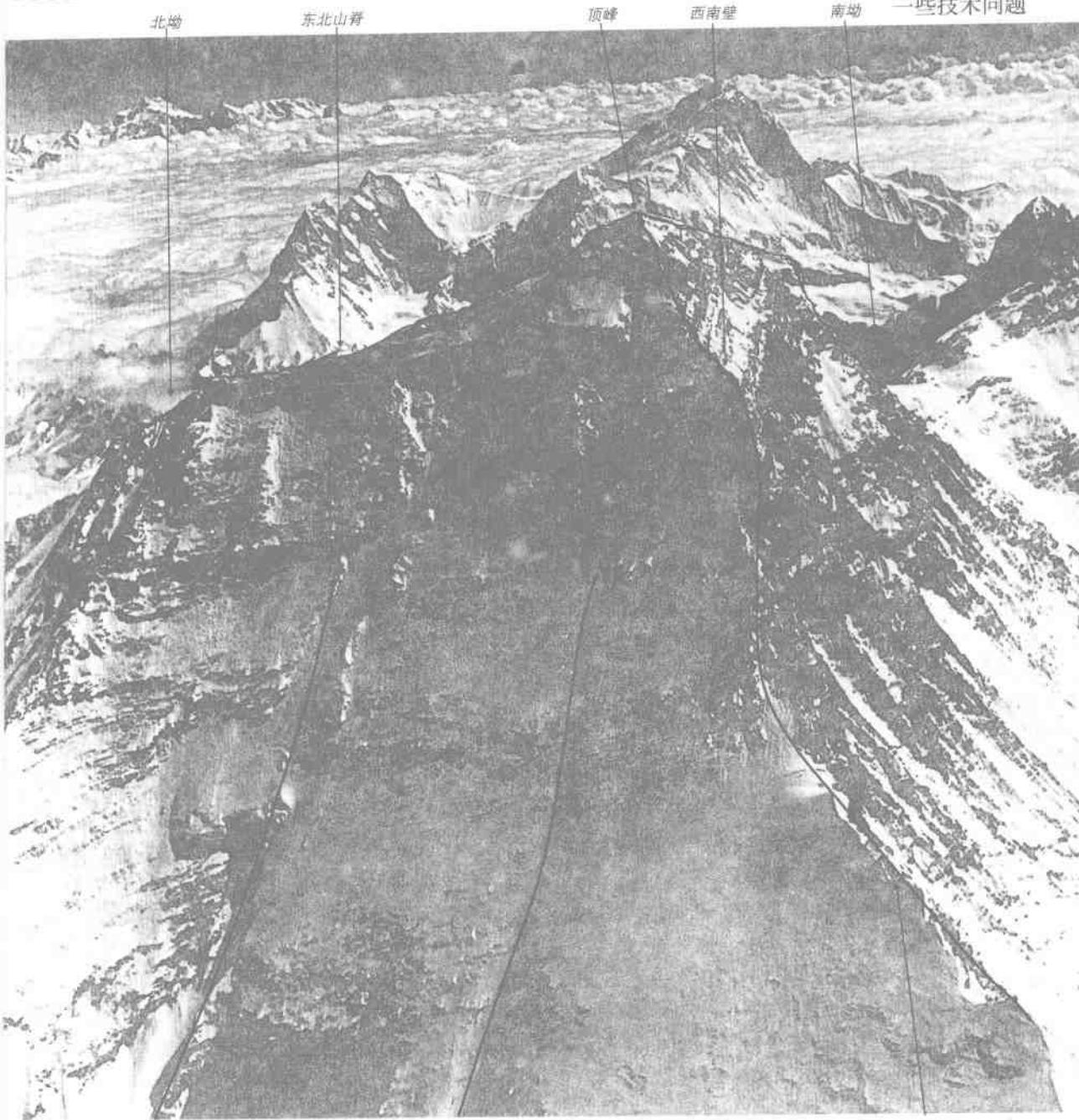
在珠峰的三条大山脊之间，形成了三个坡面，也就是三个壁面。这三个壁面都很陡峭，简直就像墙壁一样，人们称之为壁，英文称之为Face。

三壁是：北壁，西山脊与东北山脊之间的坡面；

东壁，东北山脊与东南山脊之间的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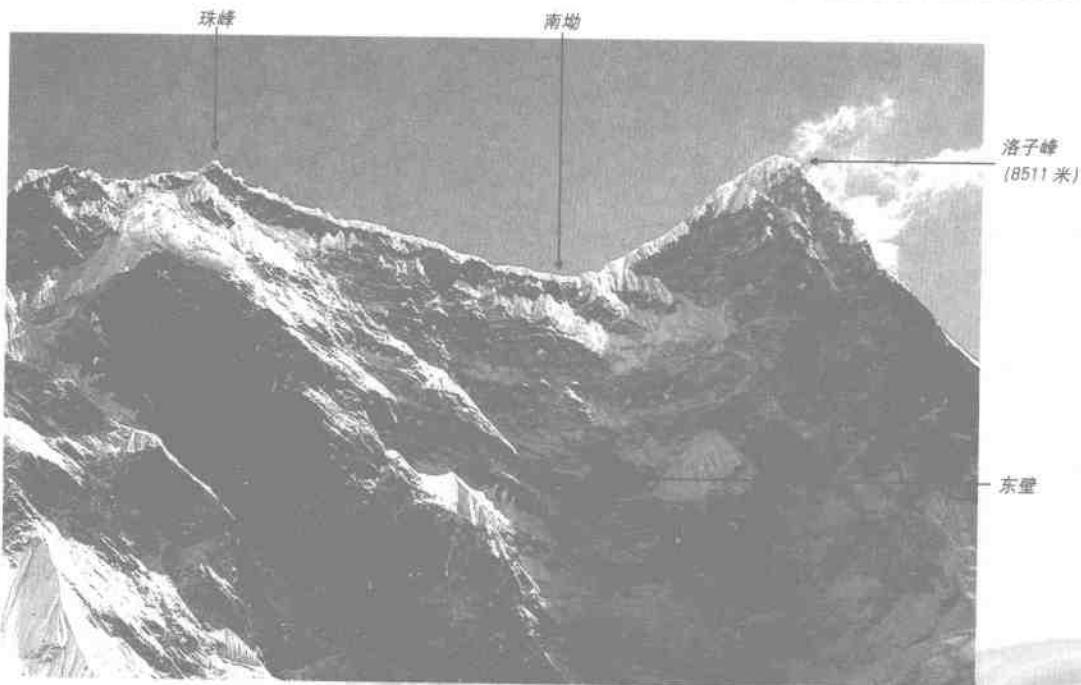
西南壁，西山脊与东南山脊之间的坡面。

◎ 第九章 有关珠峰的一些技术问题



珠峰北壁、东北山脊、西山脊和西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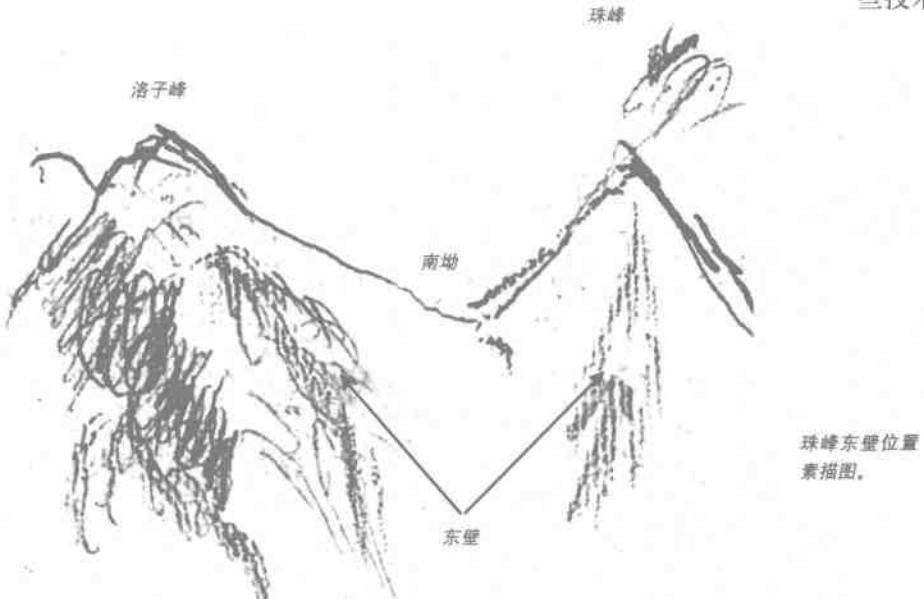
这两条岩沟里都有可以用手抓握和用脚蹬踏的支点，所以许多登山者都取道这两条岩沟攀登珠峰。



珠峰东壁

北壁路线，在北壁上有两条大的岩石沟槽(Couloir，或称岩沟)，靠左边(西边)的一条是1922年英国队的诺顿发现的，被称之为“诺顿岩沟”(Norton Couloir)，靠右边(东边)的一条是1963年美国队的霍恩拜茵发现的，被称之为“霍恩拜茵岩沟”。这两条岩沟里都有可以用手抓握和用脚蹬踏的支点，所以许多登山者都取道这两条岩沟攀登珠峰。但是在这两条岩沟以外的北壁面上，则是非常光滑而陡峭的岩壁，而且经常发生雪崩，特别是岩沟下方海拔6800米以下，全是光滑而陡险的峭壁，至今还没有人敢从这里攀登珠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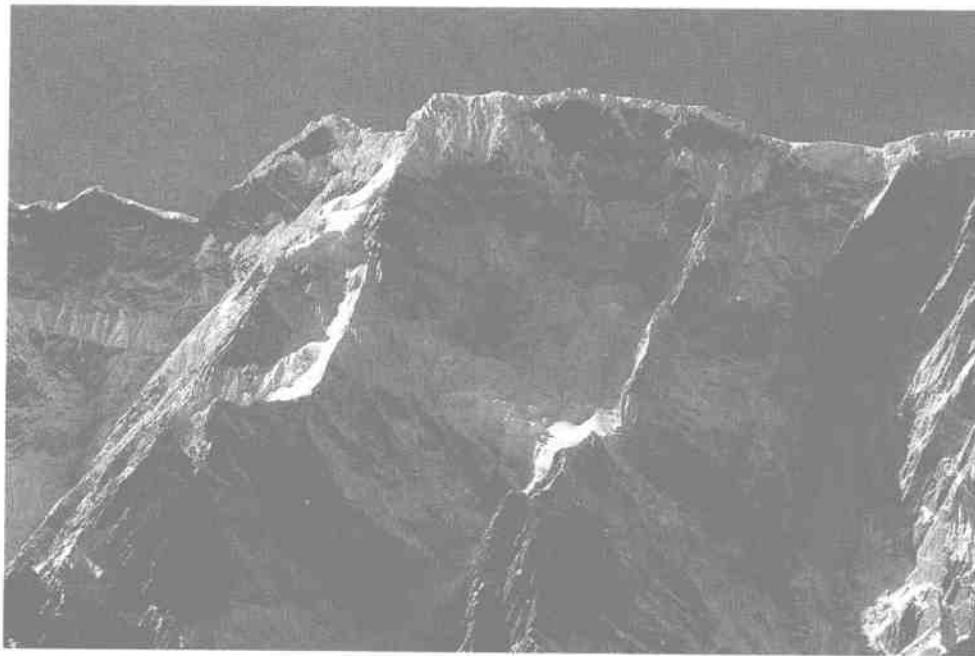
从北壁攀登珠峰，都得与东北山脊或西山脊结合。与东北山脊结合的是，先从绒布冰川登上北坳，沿东北山脊上攀到7800米~8100米之间，或再向上攀登到8500米附近，向右(东)横跨进入“诺顿岩沟”，然后沿着沟底向上直到顶峰附近，再上顶峰；与西山脊结合的是，从孔布冰川上游海拔6500米处向左(西)登上西山脊，沿



珠峰东壁位置
素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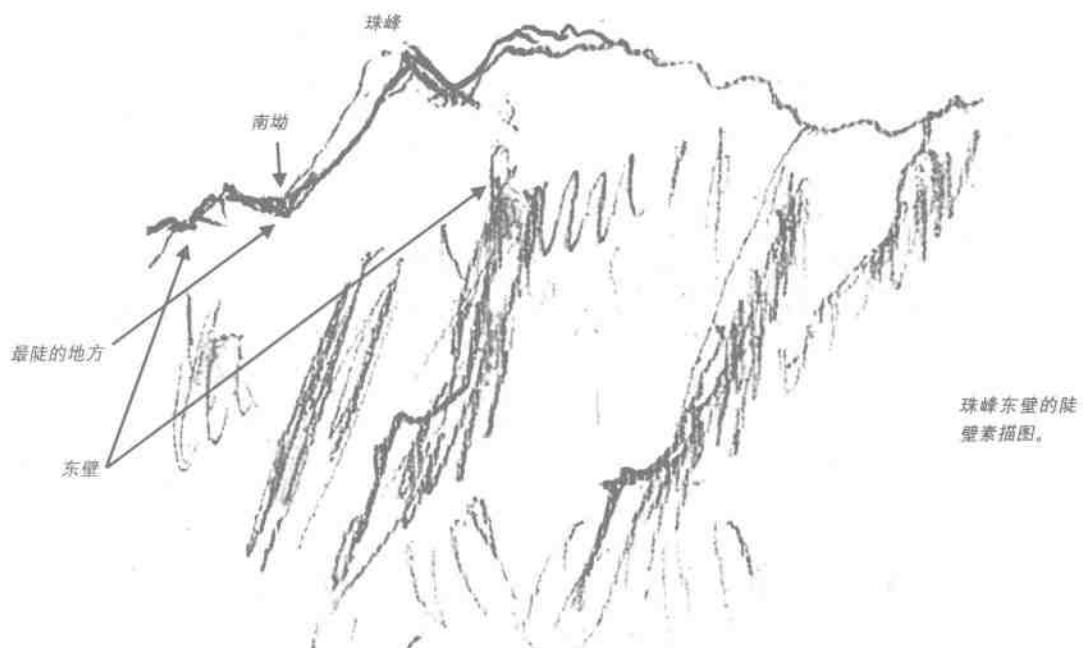
西山脊上攀到8350米处，向左横跨进入“霍恩拜茵岩沟”，然后沿沟底上攀到顶峰，这是1963年美国队开创的路线。1981年意大利人梅斯纳开创了从东北山脊转“诺顿岩沟”路线，并单身一人取得登顶成功，此后的几个队也都采用这两条路线。

西南壁路线，从孔布冰川上海拔6500米处向左(西)登上珠峰的西南坡面，在西南坡面(西南壁)上海拔6600米处建立一个前进基地营(ABC)，然后使用保护绳索和岩石钢锥等器材，从 $65^{\circ} \sim 78^{\circ}$ 的坡面上攀登，在坡面上海拔7000米的高度上有一块凸出于坡面、长达50米的岩石台，远看好像一艘军舰，人们称之为“军舰岩”，可以在上边宿营；再向上到达7200米处又有一块凸出坡面、长达40米的岩石台，看上去像一只蝴蝶落在山坡上，被称为“蝶岩”，这里也可以宿营。从“蝶岩”向上，岩壁就很陡峭了，平均坡度都在 $78^{\circ} \sim 82^{\circ}$ 之间，所以必须使用各种攀岩技术器材，而且，海拔8000米以上攀登陡峭的岩壁，不但需要熟练的攀岩技术，还必须有克服



珠峰东壁的缺氧的措施。背着氧气钢瓶在8000米以上的高空中攀登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端危险的。为此1970年日本队专门制作了加长的供氧气管，但仍然失败了；1975年英国队在使用超轻型的供氧装置后，才勉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

东壁路线，珠峰东北与东南山脊之间的坡面就是其东壁，由于地形特殊，从东壁攀登珠峰只能是从东壁下方的康雄冰川中游直接向西（向前）攀登，通过珠峰与洛子峰之间的南坳，再沿东南山脊直到顶峰。从康雄冰川通向南坳的这一段最难上，也是最危险的，山坡坡度平均 70° ，此外，另一个危险是雪崩频繁，且很难掌握其规律，一天24小时之内随时都有雪崩袭击的可能，有时深夜发现雪崩，而且多是较大的雪崩。雪崩滚下来的直径达2米左右的大雪球不但越过康雄冰川，还经常滚到远离康雄冰川千米之外的登山基地营边缘。这种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大雪球如果压了人，会把人压个半死。但要从东壁登珠峰，也只有这条路线。1981年美国高山俱乐部队首次开创这条路线，



珠峰东壁的陡壁素描图。

并取得登顶成功，但他们也付出了一个人的生命。

至于后来——到2002年12月，攀登珠峰的登顶路线发展到42条之多，都是从这三脊与三壁的6条路线派生出来的，是在这6条基本路线的基础上稍作改动，最后都必须归到这些基本路线上来。例如1979~1980年的波兰登山队，他们是在1979年12月31日在孔布冰川上设基地营后，取道东南山脊的南支山脊，登上南坳，之后沿东南山脊登顶的，并非从孔布冰川的源头登洛子峰的南坡、上南坳，从东南山脊登顶的；1981年的美国队，从珠峰的东壁登山，也是先登上南坳，再沿东南山脊登顶。所不同的，出发点和从南坳下方登上南坳的路线不同而已。因此，三壁三脊路线是最基本的，变化再多也都离不开这6条基本路线。

南北两侧登顶孰难孰易

我们常常听说“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要比从尼泊



“希拉里
台阶”。

尔一侧的东南山脊攀登珠峰难得多！”这种说法早在1960年中国队首次从东北山脊登上珠峰后，直到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么说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准确不？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英国人从1921年起一直到1938年二次世界大战前，先后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进行了7次征战，都未能成功，而中国队在1960年5月25日第一次就从他们7次都失败的北侧登上了珠峰。这条路线当然比1953年5月29日英国队从珠峰南侧登上珠峰的路线难度大得多。

如果仅仅知道从珠峰北侧登上珠峰的人，在196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说这样的话，还多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从尼泊尔一侧的外国队员克服了多少困难和危险，才登上珠峰，那时我们对外国高山探险家的事迹基本没有介绍，大家不了解情况，当然可以说这样了。但是到70年代末以后，各国高山健儿分别从珠峰的南北两侧攀登珠峰的成功次数多了，也有不少人从南侧和北侧两面都登上过珠峰，他们都认为，“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决不比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攀登珠峰更难、更险！”因为北侧路线有北侧路线的难度，特别是从绒布冰川登上北坳的一段路程难度和险度都很大，再就是7400米以上的大风口和1960年时的“第二台阶”，都是最难最险的。而1921~1938年时期的英国队，无论从登山装备和氧气设备或登山技术来说，都很落后。仅以登山时刻离不开的主绳来说，1921~1938年英国人用的是又粗又重的印度黄麻制成的绳子，同样一米长的黄麻主绳，要比1960年中国队从法国买到的尼龙主绳重10倍。英国人当时用的氧气瓶自重是8公斤，容量只有2公升，其抗击力只有60个大气压，不论是高山队员还是夏尔巴人背负，都是很重的负担，能储藏的人工氧又少，单这两项就给登山者带来了很大的负重量。而1960年中国队员所用的尼龙主绳，是从法国和德国买来的当时最先进的，不但重量轻，拉力也比黄麻绳大得多，抗拉力可达1200~1500公斤。至于氧气钢瓶，是



“从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攀登珠峰，决不比从尼泊尔一侧的东南山脊攀登珠峰更难、更险！”



珠峰 7400 米附近。



从法国买来的，自重4公斤，容量为4公升，抗压力为230~250个大气压，这都是二次大战前的英国队无法比的。

1953年的英国队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路线是一年前瑞士人开创出来的。在这条路线上，要经过孔布冰川上的冰瀑区，登上洛子峰南坡面的一段路程，这与经过绒布冰川的冰瀑区登上北坳的难度不相上下，但孔布冰川却要比绒布冰川长得多。过了南坳再向上也有一个大风口，而且南坳就是一个大风口，再往上是“希拉里台阶”，它要比北侧的“第二台阶”更难上一些。

因此，从珠峰南北两侧登顶都是很难的，不能说哪一个就比另一个难得多。特别是1975年中国队在北坡的“第二台阶”上竖立金属梯子，即国际上通称的“中国梯子”之后，北侧的东北山脊路线应该说是稍容易了些。当然，人的素质还是决定一切的，1960年中国队的队员肩负祖国的任务、人民的重托，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顽强奋战，取得了胜利，应该说，这才是中国队成功的主要因素。

珠峰顶上的风力和气温

记得1983年10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宋世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珠穆朗玛峰顶上的最大风力到底有多大。我当时答复他说：“按照1976年12月中旬，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发表的数据是92米/秒，这个数据是目前最可靠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是美国队于当年5月安放在珠峰顶上的遥控测量仪器所发回的数据，此后它就再也没有发回任何信号来，不是仪器被大风吹跑了，便是仪器本身损坏了。我们也只能说92米/秒是最可靠的数据。”

宋世雄为什么打电话来问我这个情况？原来，几天前有位登山家在中央电视台做电视广播讲话时说：“珠穆朗玛峰顶上的大风比十二级还大好几十倍！”他的讲话播出后，不少观众打电话或写信

记得1983年10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宋世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珠穆朗玛峰顶上的最大风力到底有多大。



珠峰東南山脊
8750米處。

询问主持人，“这个比十二级还大好几十倍的大风是什么风？它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这位登山队的队长，不懂得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更不用说气象知识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讲出这样无知可笑的荒唐话来。其实，作为一个高山登山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气象知识，因为高山登山和高山探险，气象是最重要的。我们常说攀登高山成功与否“三分在人，七分在天”，这个天就是天气的变化。

根据国际气象联合会的规定：凡风速每秒32~38米的风就是十二级大风，超过这个速度也算十二级，因为超过38米/秒的风太少了。

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又是怎么样测出这个92米/秒的呢？1976年，美利坚合众国(USA)建国200周年，为了向200周年献礼，美国高山俱乐部组织了一支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以成功攀登世界最高峰来庆贺。这支登山队把最新研制成功的遥控测试风速和气温的仪器安放在珠峰顶峰上，它不但能随时自动收集在顶峰上的风速和气温情况，而且随时能将数据发送回来。1976年12月中旬它们发送回来的珠峰顶峰最大风速是92米/秒，最低气温是-52℃。

这两个数据是目前最可靠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它只是1976年12月中旬的气象情况，而12月中旬也不一定是一年中珠峰顶峰风速最大或者气温最低的绝对时候。不过，在没有更新的数据之前，我们也只能使用这个比较可靠的数据了。

珠峰登顶中的向导与高山协作——夏尔巴、藏人、牦牛

各国从尼泊尔或从中国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都必须雇用当地山区的夏尔巴人当向导和搬运工。所谓向导是指有高山登山经验、山路熟悉、能够在高山上为外国队背负登山物资，并能在合适的地方支设帐篷，还能给外国队员做饭、粗通英语的人。搬运工是居住在山下的夏尔巴村民，他们只是一般的粗壮工，在工头指挥



高山向导和搬运工在海拔6000~8000米的高山上，平均每人负重30~35公斤。

下，为外国队从事长途步行背负运输登山物资的人。他们负责从加德满都背负物资，经过一周或十几天到达登山基地营。上世纪50、60乃至70年代，尼泊尔交通不便，各国都要雇用大批夏尔巴人当搬运工，到70年代后期，尼泊尔政府虽然为各国登山队修筑了公路和小型运输机场，但从汽车站和机场运输物资到登山基地营，还是需要向导和搬运工，特别是从基地营向上直到顶峰，夏尔巴人向导更是非常需要的。尼泊尔政府每年靠外国队登山，并雇用他们的向导和搬运工，赚取不少外汇，是其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到70年代末，我国对外开放山区，即使前来中国境内攀登我国高山的外国队，也常常从尼泊尔雇来高山向导，而不用我国的当地藏族人。尽管他们从尼泊尔雇用夏尔巴人要比雇用我国当地藏族贵得多，但他们宁愿雇用尼泊尔的，因为尼政府专门训练了一大批懂英语，又能吃苦耐劳，熟悉高山生活，能够全面为外国队服务的高山向导。因此，虽然价格高，国外团队仍然愿意雇用他们。

高山向导和搬运工在海拔6000~8000米的高山上，平均每人负重30~35公斤。

中国西藏登山队

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1952年两次为瑞士世界最高峰探险队做高山向导，到达8600米高度。1953年5月29日，他与英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新西兰人埃德蒙特·希拉里两人首次登上珠峰。由于丹增在登山过程中的杰出表现，人们给他起了“喜马拉雅雪虎”的绰号。从此，雪虎成为勇敢、顽强而又机智的高山探险家的美称。

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无异于一群“喜马拉雅雪虎”。

三代雪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员中，藏族队员贡布、米玛、索南多吉、拉巴才



珠峰东南山脊
8800米处。



1970年为日本队服务的牦牛队和夏尔巴搬运工。

仁、多吉普、米玛扎西、云登、多加等都来自喜马拉雅山区，他们从小就与高山打交道，具有耐高原缺氧和高寒的良好体质。

1975年，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峰时，又涌现一批藏族青年高山探险家：桑珠、索南罗布、洛桑德庆、次仁多吉、嘎久、罗则、阿布钦、洛桑坚赞、昌措和两位女登山家潘多、桂桑。他们的登山本领比前辈提高许多，参加过的每一起登山探险活动，都十分成功。

1992年2月，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China Tibet Mountaineering to all 14 Peaks over 8000 meters Expedition Team，简称西藏高山探险队)诞生。到2004年7月27日，12年里他们集体成功登上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13座，五星红旗在这些山峰的顶峰上高高飘扬。同时，对在中国境内登山遇险遇难的外国登山家的救助行动中，他们的勇敢、顽强，多次使外国同行们转危为安。

在中国的多次高山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中，藏族登山家们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了各个高山区，世界各国登山家们纷纷前来西藏和新疆进行高山探险和旅游，西藏由于拥有喜马拉雅山脉而备受青睐。中国与各国的合作登山活动接连不断：1981年中日女子联合攀登希夏邦马峰(8012米)、1986年中日联合攀登章子峰(7543米)、1988年中日尼联合攀登珠峰、1990年中美苏联合攀登珠峰、1992年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7782米)。这些大型高山探险活动，西藏高山探险队都作为国家代表队参加，队员们学习并吸收了各国优秀登山家们的先进战术和技术，配备了国际上科学、优良的登山装备，加上本已具有的身体素质，使他们成为一支高水平的高山探险队。

把五星红旗插遍8000米高峰 在与各国登山家合作过程中，西藏高山探险队队员们了解到，全世界只有意大利的梅斯纳、波兰

“10年内，把五星红旗插遍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高峰峰顶！”

的库库奇克等5位登山家登上所有8000米以上高峰。因此，他们提出的第一项计划就是，“10年内，把五星红旗插遍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高峰峰顶！”

为实现这一目标，西藏体育局和西藏登山协会经过详细研究，制定出周密的攀登计划。队员由13人组成：队长桑珠，副队长旺加，攀登队长次仁多吉，队员：边巴扎西、大齐米、仁那、达琼、洛则、阿克布（兼摄影师），翻译张明兴，医生兼后勤总管洛桑云登，教练成天亮。

西藏高山探险队对14座高峰的登山路线、时间、方法、各种措施以及装备、运输等进行全面研究后，确定先易后难的方针，以取得经验。

2003年为中国
队服务的牦牛
队和藏族搬运
工。

登上第十、第七高峰 1993年3月15日，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首次走出国门，从拉萨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办完登山手续，补



充物资后，22日到达马隆宗卡。9天后，身荷重负的队员们与夏尔巴向导一起，到达海拔4340米的登山基地营。

教练成天亮和队长桑珠决定，队员分成两组，A组由攀登队长次仁多吉带领，队员有边巴扎西、仁那和阿克布，负责侦察路线、架设保护绳索和选择高山营地。B组由副队长旺加带队，队员有加布、大齐米、达琼和洛则，任务是建立各高山营地并运送食品、燃料和各种装备。

4月26日凌晨3点，A组4人从6700米的3号营地向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尔纳顶峰冲击。北京时间18:45，成功登顶。这是他们征服的第一座8000米以上高峰，激动不已的队员们高举五星红旗，高呼“胜利！”阿克布将这一动人景象摄入镜头，让历史牢牢记住了这一刻。

安放好登顶证书后，队员们下山了。他们要为B组作支援，等待B组登顶。不幸的是，当天夜里天气突变，风雪交加，雪崩将2号和3号营地间的安全保护绳全部砸断，B组5人只好放弃登顶。

全部队员回到基地后，立即实现原计划，向邻近的8172米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利峰进发。5月13日，建好基地营，14日早晨举行了国旗升旗仪式。15日开始侦察、修路，仍分两组，但A组的仁那由于从安娜普尔纳峰下山回基地营时突患急性阑尾炎，已送往加德满都医院治疗。虽然他坚持不作切除手术，通过保守治疗控制病情后立即回队，但他回到基地营时，A组已出发，因此他留在了B组，而B组的达琼则调整到A组。

30日，A组4人从7200米的营地出发，向顶峰冲击。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17:30登顶成功。而B组5人也于31日10:45成功登顶！西藏高山探险队首次出击成功！仁那成功了！

一举成功为探险队员们向其他12座高峰挑战增强了信心，实践证明他们的登顶速度和安全措施都是一流的，这在我国的高山登山史上是相当出色的。

快速登顶希夏邦马 1994年4月25日，西藏高山探险队向中国境内喜马拉雅山上的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进发。其实，对于这座山峰，“雪虎”们早已十分熟悉，他们多数人曾在国际合作攀登时登上过。

5月2日，全体队员和所有物资均抵达海拔5800米的前进基地（英文简称ABC，是登山基地BC与1号高山营地间的一个过渡基地，主要为方便运送物资和抢救伤病员）。3日，1号营地(6300米)建成。6日，3号营地(6900米)建成。

7日凌晨2:30，全体队员从3号营地出发，向顶峰冲击。北京时间12:55，旺加、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加布、大齐米、达琼、洛则、阿克布9人集体安全登顶！从离开基地营到成功登顶，仅用6天，称得上是快速登顶。

1994年9月30日11:30，西藏高山探险队集体登上世界第6高峰卓奥友峰(8012米)。

1993、1994年，西藏高山探险队在1年内连续登上3座8000米以上高峰，说明他们的速度、战术、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攀登迦雪布鲁姆I、II峰 1995年，西藏高山探险队的目标是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界山——喀喇昆仑山上的世界第11号高峰迦雪布鲁姆I峰(8068米)和第13号高峰迦雪布鲁姆II峰(8035米)。

6月19日，他们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乘车行驶700公里后到达斯卡尔都，在这里雇用了170名搬运工，步行7天于29日抵迦雪布鲁姆I峰基地营。这里已有先期到达的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波兰、捷克、加拿大、德国和巴基斯坦的探险队。

经过研究后，西藏高山探险队决定先登迦雪布鲁姆II峰，战术上仍采用A、B两组，A组4人由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和阿克布负责侦察、开路、修路和确定高山营位置；B组4人为旺加、加布、仁那和达琼，负责运输及建立营地。大齐米因为身体原因没



有参加，从此即退出探险队。

7月6日开始，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从基地营出发，边侦察边建立1号和2号营地、修筑道路；9日在7200米处建立突击营地。10日4:40，A组4人向顶峰冲击，14:22登顶成功；B组4人11日16:25也登上顶峰。

17日，两组稍事休息后，准备攀登迦雪布鲁姆I峰。20日，在6900米处建成2号基地。但天气突然变坏，暴风雪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停止，路上积雪厚达1米多，雪崩频频发生。桑珠队长决定暂时撤回基地营。24日开始，连降5天大雪，基地营积雪深达1米多。这时，墨西哥和西班牙队被困在两米多深积雪的1号营地，不断向基地营呼救。气象预报说喀喇昆仑雨季已经来临。

8月9日，中国队决定放弃攀登迦雪布鲁姆I峰。

遭遇第二次失利 1996年，计划攀登尼泊尔境内的喜马拉雅山第8高峰玛纳斯鲁峰(8156米)和位于中尼边界线上的第5高峰马卡鲁峰(8481米)。山，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难走。

4月6日，探险队从加德满都乘直升机到达玛纳斯鲁峰下，在4050米处建基地营。13日在4860米处建前进基地，14日在5422米处建成1号营。但从16日开始连降大雪，在1号和2号营地间的5900米处雪崩不断，全体队员只好撤回基地。

30日，A组在6170米处建好2号营。继续上山途中，他们发现墨西哥队的卡洛斯和另一名队员冻饿疲惫至极，生命垂危，倒在下山途中海拔6500米的帐篷里。中国登山家立刻扶起这两位登山者，将他们送回山下，救了他们的命。在场的一位德国登山家目睹此景，称赞说，“中国登山家们这种援救他人的品德，实在令人钦佩，这种乐于救人的行动，早已超越了高山探险的意义……”

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两组8人先后于5月3日14:50和4日12:20登上玛纳斯鲁峰顶峰，5日安全返回基地营，15日回到拉萨。

8月20日，探险队按计划向马卡鲁峰进发。小雨绵绵，使长长的进山路更加难行。11天后，到达基地营。9月初才在天气稍微好转时建好第2号营地。10月中旬，A组到达3号营。但大雪连续不断，上山道路积雪深厚，行动十分危险；队员们几次遭遇雪崩，有的队员竟被雪崩击中，坠落50多米，所幸无人伤亡。医生洛桑云登上山途中迷失方向，失踪7天后为山区藏胞送回。11月2日，他们放弃登顶，返回拉萨。这是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第二次遭遇失利。

中巴联合探险队 根据中国西藏登山协会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高山俱乐部达成的合作登山协议规定：“1997年5~6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中方11人，巴方4人），共同攀登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喜马拉雅山最西端的南格·帕尔巴特峰（8125米，世界第9高峰）。同时，中国和巴基斯坦还组成联合登山队，于1997年4~5月，共同攀登中国境内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方3人，巴方11人）。”

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的11人与巴基斯坦的4人组成联合登山队，于1997年5月7日离开伊斯兰堡到450公里以外的达吉拉斯镇，在这里雇用了145名搬运工运输物资，4天后到达南格·帕尔巴特峰基地营。两国队员15日前已建好1号、2号、3号营地。但30日起，连降7天大雪，无法上山。

6月14日，联合队在7480米处建好4号即突击营地。15日，两国队员分成两组，一组在前一组稍后，清晨5时从4号营地出发，经过9小时奋战，14:15、14:30两组8名队员全部登顶。这座高峰1938年前后因攀登者在此遇难死亡人数最多，被登山界称为“吃人的魔鬼山峰”。

登上顶峰的中国队员有：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加布、洛则、阿克布。巴基斯坦有两名队员。

1998年5月9日13:34，西藏高山探险队次仁多吉、边巴扎西、

阿克布、仁那、达琼、洛则成功登上位于尼泊尔、锡金边界的世界第3高峰干城章嘉峰(8598米)。

到珠峰顶采集圣火 1999年，原计划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8611米，亦名K2峰)。由于全国第六届民族运动会要从珠峰峰顶采集圣火火种，这项任务交给了西藏高山探险队。因此，探险队决定将登乔戈里峰推迟到2000年。

西藏高山探险队原有13人，这次增加了两名女队员桂桑、吉吉和两名采集圣火的监督人员。桑珠队长带着17人，4月20日前往珠峰基地营。基地营仍设在5200米处，前进营地则设在6500米处，1号营地在北坳上方7028米，2号营在7790米，3号营在8300米。这次只设了3个营地，比1960年和1975年中国队从这条路线登顶时少设了3个高山营地，也比其他从中国一侧登顶的各国探险队少设了3个营。因为对西藏高山探险队来说，这里已至少已走过五六次，路线已非常熟悉。

5月17日3:00，8名男队员和桂桑、吉吉离开第3号营地，从8:02~9:00，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加布、洛则、阿克布、拉巴、扎西次仁、桂桑和吉吉10人同时登顶，并成功采集到民运会火种。当天10人安全返回1号营地，身体最好的边巴扎西则直接返回前进基地。为了保证火种采集的成功，他们在珠峰峰顶停留了138分钟!

从1993至2004年的12年里，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的高山健儿们，已成功征服13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珠峰、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道拉吉利峰、马纳斯鲁峰、南格帕尔巴特峰、安娜普尔纳峰、迦雪布鲁姆II峰、希夏邦马峰、布若阿特峰、乔戈里峰，这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西藏高山探险队的“雪虎”们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在

为了保证火种采集的成功，他们
在珠峰峰顶停留了138分钟！

喜马拉雅山的百年登山探险史上，也有不少藏族青年参加过8000米以上的登山活动，但他们只是作为搬运工，为外国登山者们运送物资而已，即或有一两人能够作为高山向导登上一座山峰，也不过是无名小卒。中国西藏高山探险队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生长在一个人人都有自我发展、实现自我抱负的时代；其次，他们的成功还得益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制度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资和最先进、精良的技术设备，保证了他们不仅能集体登顶，还能全部安全返回；第三，他们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成功的战术。

全球14个8000米以上峰群与29座8000米高峰

人们一提起珠穆朗玛峰，就说它是地球上的最高点、世界最高峰，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最高峰，等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全球并非只有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而应该是29座。科学的说，全球共有14个8000米以上高峰群，每一个高峰群中都有几座7000多米或8000米以上的高峰。

在高山探险这个项目中，海拔6500米以上的山峰都通称高峰，人们所说的“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1950年6月3日～1964年5月2日），就指的是这14年间，地球上14座高峰群中的第一个峰群的最高者相继被各国高山健儿攀登，或称征服。其实，在1964年5月2日后，各国登山家们不但多次征服14座8000米以上峰群中的最高者，每座峰群中的7000、8000米以上的高峰都攀登过，并给它们命名或从当地居民那里弄清了它们千百年来的传统名称。

这里将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群逐一简略介绍。

1.珠穆朗玛高峰群，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偏东。珠穆朗玛峰，8848.13米，北纬 $27^{\circ} 59' 17''$ ，东经 $86^{\circ} 55' 31''$ ；珠南峰，8760米；珠东北峰，8393米。

2.乔戈里峰，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中段，8611米，北纬 $35^{\circ} 52' 55''$ ，

东经 $76^{\circ} 30' 51''$ ；乔西峰，8230米；乔南峰，8132米。乔戈里按其高度排列世界第二，“乔戈里”按当地方言意思是“雄伟的高山”。它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名字“K2”，这个K是喀喇昆仑的字头，2是早年英国军事测绘队在测量喀喇昆仑山时给这座高峰编的号。K2目前仍为世界各国通用，它是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的分水岭，属两国共有。二次大战前也曾有过“戈德温·奥斯腾”的名字，是一位英国军事测绘官的名字，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它的，二战后已很少有人用了。我们国内一直用乔戈里峰。1954年7月意大利队首次登上K2。

3. 干城章嘉峰，位于北纬 $27^{\circ} 42' 09''$ ，东经 $88^{\circ} 09' 01''$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与锡金的国界分水岭上，8586米，位列世界第三。“干城章嘉”是当地居民古老的传统名称，意为“五大宝藏之雪山”，周围有3座8000米以上和一座7900米的高峰，分别为：干城中央峰，8482米，位于干城章嘉峰正南方600米处；干城南峰，8476米；干城西峰，8420米，亦名雅兰康峰(Yalung Kang)，位于干城章嘉峰之西1500米处，“雅”是山下一条冰川的名字，“兰”是冰川的源头谷地，“康”是雪山，合起来就是“雅河源头谷地上的雪山”；康巴秦峰，7902米，在干城西峰之西2400米处。以上5座高峰是一个高峰群，即当地居民所说的“五大宝藏之雪山”。干城章嘉峰1955年5月26日为英国队首次登上。

4. 洛子峰群，位于北纬 $27^{\circ} 57' 43''$ ，东经 $86^{\circ} 56' 10''$ ，喜马拉雅山脉东段，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线的分水岭上，8501米，在珠峰南方，直线距离3000米处，过去人们曾称它为南峰，位列世界第四。“洛”藏语是南方的意思，“子”在藏语中有山峰之意，合起来即“珠穆朗玛南峰”。共有3座高峰：洛子夏尔峰，8398米，位于洛子峰之东1000米处，“夏尔”是藏语东边的意思，即洛子东峰；洛子中峰，8426米，位于洛子夏尔峰与洛子峰之间，1956年5月瑞士队在攀登洛子峰时发现的。洛子峰1956年5月为瑞士队首

次登上。这3座高峰都处于中尼边界上，一半在我国，一半在尼泊尔，为两国共有。

5. 马卡鲁峰，位于北纬 $27^{\circ} 58' 23''$ ，东经 $87^{\circ} 05' 44''$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偏东，中尼边界的分水岭上，洛子峰的南方稍偏东处，为中尼两国共有的高峰，海拔8463米，位居世界第五。“马卡鲁”是藏语“黑色或深灰色的神”之意，其东侧的冰川是珠峰东壁下方康雄冰川的河源。马卡鲁南峰，又名马卡鲁Ⅱ峰，8010米；在马卡鲁峰的东北有一座海拔7815米的珠穆伦错(Chomo Lungco)，有人说马卡鲁峰就是我国境内的珠穆伦错，这是不对的，它们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山峰。在马卡鲁峰的西北还有一座海拔7410米的康穷泽峰(Kang Chung Tse)。这4座高峰构成马卡鲁高峰群。1955年5月17日，马卡鲁峰为J.弗朗科(J. Franco)率领的法国队登上。

6. 卓奥友峰，位于北纬 $26^{\circ} 05' 37''$ ，东经 $86^{\circ} 39' 43''$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稍偏东的主山脊上，也是中尼边界的分水岭，属两国共有，海拔8201米，名列世界第六。卓奥友峰周围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我国地图上曾标名“乔乌雅”，其实都是藏语的译音，“卓”为神，“奥友”是光明而美丽，合起来即“光明美丽之神”。卓奥友峰和珠峰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山脊上，1954年10月19日，奥地利H.提契(H.Tichy)率领的奥地利登山队首次登上。

7. 道拉吉利峰，位于北纬 $28^{\circ} 05' 37''$ ，东经 $86^{\circ} 39' 43''$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8172米，位列世界第七，这是一座十分陡峭而且多雪崩的高峰。“道拉”是当地民族语言“白色”的意思，“吉利”是山峰，合起来是“白色的山峰”，将它译为道拉吉利，实际上一点都不吉利，特别危险。1950~1960的10年间，就有16个团队攀登过它，没有一次不死人的，有几次全军覆没，人们曾称它为“吃人的魔鬼峰”。1960年5月13日，瑞士队的6名队员首次登上其顶峰。

8. 马纳斯鲁峰，位于北纬 $28^{\circ} 32' 58''$ ，东经 $84^{\circ} 33' 43''$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海拔8163米，名列世界第八，与第七高峰道拉吉利峰离得很近。“马纳斯鲁”是当地民族语言，“马纳”或“马纳斯”是神灵，“鲁”是土地，合译“土地之神”，附近夏尔巴人称之为“潘干”(Pung Gang)，意思是“围绕着土地的神镯”，两个名称基本一致，都是地区的神灵。1956年5月11日，由今西寿雄率领的日本队首次登上。

9. 南格帕尔巴特峰群，位于北纬 $35^{\circ} 14' 21''$ ，东经 $74^{\circ} 35' 24''$ ，喜马拉雅山脉的最西段，巴基斯坦的东北部，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帕米尔地区。海拔8125米，位列第九。山名为当地居民的传统名称，“南格”(Nanga)是古印度梵语“裸露”的意思，“帕尔巴特”(Parbat)是山峰，这座“裸露的山峰”地处中央亚细亚与印度平原的结合部，中国古代许多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人和商队都在该峰下经过，1953年7月3日，奥地利、德国联合登山队的奥地利队员布尔(H.Buhl)一人首次登上。



10. 安娜普尔纳峰群，位于北纬 $28^{\circ} 35' 45''$ ，东经 $83^{\circ} 07' 30''$ ，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海拔8091米，位列第十。在其周围还有安娜中央峰，8051米；安娜东峰，8010米，安娜普尔纳II峰7977米，安娜普尔纳III峰7555米，安娜普尔纳IV峰7525米，均在安娜普尔纳主峰的东南方。而在其南方同一条主山脊上还有7647、7357米的两座高峰，至今未被人攀登上过，也没有名称。

这7座高峰构成安娜普尔纳高峰群。当地民族语言中，“安娜”为粮食或谷物，“普尔纳”为赐与之神，合意为“赐给丰收之神”。1950年6月3日，法国队首先登上这座高峰后，结合法国人的习惯和该峰的当地民族语言发音，给它合成一个法国女孩的名字“安娜”，结果这座被法国人首次登上的处女峰，就以法国人习惯用的ANNAPURNA的名称向全世界发表了。它是人类高山探险史上第

一座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高峰。在此之前，尽管从18世纪末起，人类就已向包括珠穆朗玛在内的地球上的14个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最高峰展开挑战，但在1950年以前，都失败了。虽然也有人曾经登上过珠峰的海拔8500米的高度，但却没有人登上过任何一个高峰的顶峰，这在登山运动的传统规定来说，就都算失败。安娜普尔纳虽然位居世界最高峰群的第十位，只有8091米，却是人类第一次登上顶峰的8000米以上高峰，又因法国人为它取了一个法国女孩的名字而闻名遐迩。登顶者埃尔佐格(当时他是法国国立登山学校校长和莎莫尼市市长，后来又在戴高乐政府任青年体育部长)和拉什耐尔(F.Ldchenal 1921~1955)两人在病床上(他们在登顶过程中被冻掉了全部手指和脚趾，回国后住院达一年之久)所写的《ANNAPURNA》一书，曾被译成英、德、西班牙、俄、日和意大利等文，先后发行十多万册，多次再版，可见人们对这座首次被人类征服的高峰的重视和兴趣。人们说：“法国人打开了人类向8000米高峰进军的大门！”

11. 迦雪布鲁姆I峰，位于北纬 $35^{\circ} 43' 30''$ ，东经 $76^{\circ} 41' 48''$ ，中国和巴基斯坦所管辖的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线喀喇昆仑山的主分水岭上，属两国共有，8068米，位列世界第十一。在它的周围，主要是其西南和东南方，还有4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它们是7504、7069、7784和7300米的无名高峰，构成了迦雪布鲁姆I峰高峰群。“迦雪布鲁姆”是当地民族的传统叫法，意思是“光辉的高峰”。1892年英国驻印度的军事测绘官康维(W.M.Conway)在此地测绘时，绕过许多山梁，最后在群峰中发现它是其中的最高者，认为它是隐藏在许多山中的高峰，命名为“隐峰”(Hidden Peak)，1958年以前英美和日本的地图上都用“隐峰”来标称。此后，世界各国逐渐通用迦雪布鲁姆I峰。

12. 布若阿特峰群，位于北纬 $35^{\circ} 48' 35''$ ，东经 $76^{\circ} 34' 25''$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界山喀喇昆仑山的中段，距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

峰9000米，是喀喇昆仑山上4座8000米以上高峰之一，8047米，位列世界第十二。“布若阿特”是我国地图上的名称，其实应译为“布若德”，曾有过第K16峰和“法尔秦康格里”(Phalchankangri)之称，但目前通用“布若阿特”。它也是一个高峰群，除主峰外，还有一座海拔8000米的中央峰和7538米的北峰。它是英国军事测绘队1893年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附近发现的一座平顶高峰，英国人没有考察当地民族的传统名称，就给他起了个“平顶的山峰”即Broad Peak，因为它与其他高峰不同的是顶峰宽阔而平坦，之后逐渐在全世界流传开来。1959年6月9日，由M.修姆克(M.Schmuck)率领的奥地利队的4位队员中的代博勒和布勒等首次登上。

13. 迦雪布鲁姆II峰，位于北纬 $35^{\circ} 45' 31''$ ，东经 $76^{\circ} 39' 15''$ ，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线上喀喇昆仑山的主山脊分水岭上，在乔戈里峰东南方19公里处，距迦雪布鲁姆I峰5500米，海拔8035米，位列世界第十三高峰。一般多将迦I、迦II峰说成是一个高峰群。严格说它们是两个高峰群，在迦II峰的西北1000米的同一条主山脊上，还有一座海拔7952米的迦III峰，主峰西北还有一座7925米的迦IV峰，主峰东南同一条主山脊上相隔1200米处还有一座7772米的迦东峰。1956年7月7日11:30，迦II峰由以莫拉威克(F.Moravec)为首的奥地利队的莫拉威克、威廉帕尔特和拉尔奇三人首次登上。

14. 希夏邦马峰(Shisha Bangma)，位于北纬 $28^{\circ} 21' 07''$ ，东经 $85^{\circ} 46' 55''$ 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东段，是惟一一座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8000米以上高峰，海拔8012米，位居世界第十四高峰。它曾有“高僧赞”(Gosainthan)之称，是根据古印度梵文译音而来，意思是“圣者的住所”。“希夏邦马”是我国当地藏族的古老名称，意思是“荒凉的高峰”。除希夏邦马主峰外，它周围还有4座高峰：希夏中央峰，8008米，位于主峰之东南山脊与西山脊的汇合处；摩拉门青峰，7703米，位于主峰之东3000米处；希夏东南峰，7486米，位于主峰东南2600米处，亦有“班巴利”峰之称；希夏

它也是一个高峰群，除主峰外，还有一座海拔8000米的中央峰和7538米的北峰。

这是人类高山探险史上，最后一座被登顶的
8000米以上高峰。

南峰，7119米，位于主峰东南5700米处，有“雅南利”峰之称；希夏西峰，7292米，位于主峰西北7000米处，有“勃隆利”峰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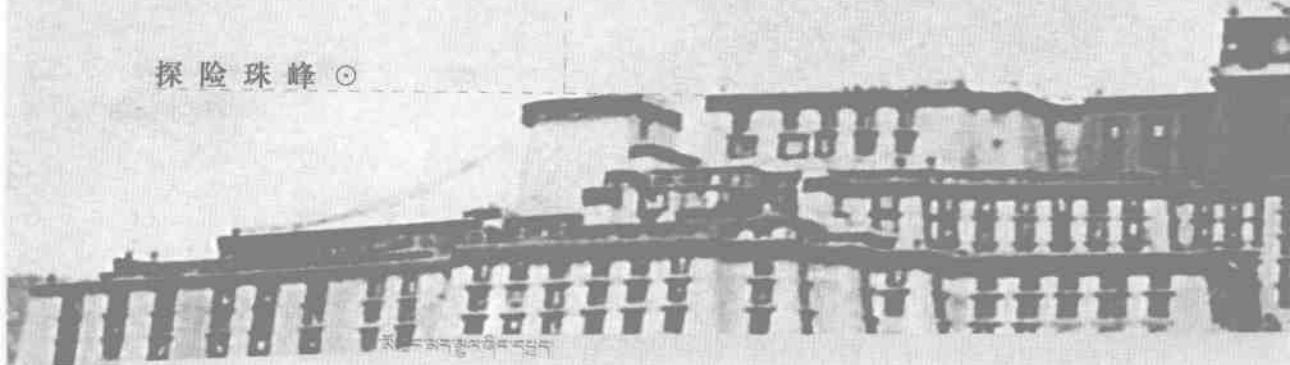
1964年前，世界上仅有两张关于希夏邦马的照片，一张是1947年7月英国空军在9500米的高空拍摄的，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另一张是在20公里以外的地面拍摄的，是1944年从法西斯德国流亡到中国西藏的纳粹分子哈勒所摄，他在1945~1947年间多次到希夏邦马峰附近活动。后来又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拉萨和西藏各地以前，参加了西德的南格帕尔巴特峰登山队，登山后返回德国途中，经卡拉奇时被英国军队以间谍捕获。1950年后，这两幅照片成为全世界最为宝贵的图片，可见人们对能够有机会攀登此峰的强烈愿望，因为那时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13座都已被人先后登上，只剩下这一座处女峰了。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陈三、许竟、张俊岩、成天亮、米玛扎西、多吉、索南多吉、云登和邬宗岳等10人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集体登上此峰。这是人类高山探险史上，最后一座被登顶的8000米



以上高峰。在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峰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各个学科的专家们也在对希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在大气物理、高山地理、地质、地貌、水文、动植物等学科都有丰硕的考察成果。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山下的一个岩石坡上，发现了一条完整的鱼龙化石，登山队和科考队将它从岩石中挖出，带回到北京，经过复原，一条完整的稀有鱼龙化石呈现在人们面前，直到现在，它还是世界的惟一。现在，人们可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中一睹其丰姿。



现在，人们可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中一睹其丰姿。



注 释

1 珠峰与其北边的章子峰(Changtse 7541米)之间的鞍部(山坳),海拔7007米,通称“北坳”(North Col); 珠峰与其南边的洛子峰(Lhotse 8511米)之间的鞍部,通称“南坳”(South Col, 8000米)。北坳南坳都是登顶珠峰时的必经之路。

2 由于地形复杂,从基地营到1号营地之间路线不但长,而且有不少地段危险多,所以要在1号营地与基地营之间再建一个营地,从基地营运来的物资可先放在这里,再从这里向上方转运,这种营地就是前进营地。

3 甘·辛(Gyan Singh),印度上校,1960年印度登山队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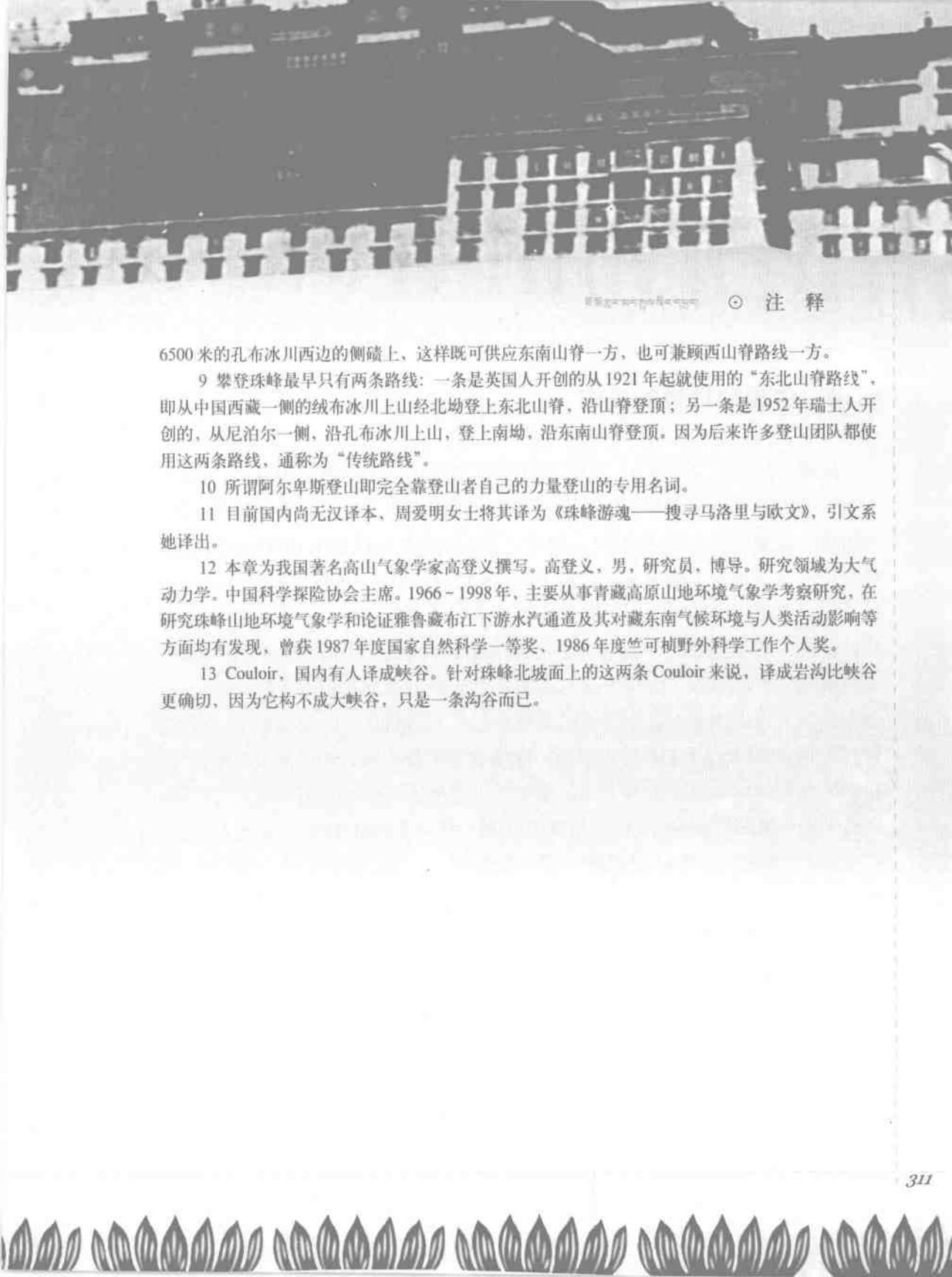
4 突击营地、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一般来说登顶队员离开突击营地后,支援队员应在这儿等候,以便随时接应;同时,若登顶队员登顶成功,返回突击营时,担任支援的队员可继续登顶,而先期返回的队员亦应在此等候第二批登顶者,这时他们则成为支援人员。之后一同下撤。

5 第二台阶,这是从东北山脊(中国一侧)攀登珠峰时的必经之路,位于海拔8700米处,是一道高达6米多的岩石峭壁,能抓握的支点极少,像一个高大的台阶。因为在8100米处还有一个台阶形的岩石峭壁(这个比较容易越过)叫第一台阶。这都是英国登山队1924年登珠峰时起的名字,传留下来,成为今天的专有名称。

6 20世纪60年代,在珠峰顶峰上,自来水笔、圆珠笔等都写不出字来,只能用铅笔。

7 1978年2月,德国的高山生理学专家海茵利希·考费尔(K.M.Heinrich Koffer)教授和美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李奇微(Litchwe)博士,就是根据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人从8700米高度开始,登上峰顶并直到下撤到7400米处的14个小时未用氧气的实践,总结出一个新的理论:“正常人只要经过系统的耐缺氧训练,是完全可以在不使用任何人工供氧的情况下,登上地球上任何一个高点的。”根据这个新的理论,1978年5月8日,意大利高山登山家梅斯纳尔(Messner R.1949-)和哈贝勒(Habeler P.1935-1982)两人在完全不用氧气的情况下,从西山脊登上珠峰。所以说1960年中国登珠峰的成功,在世界高山探险史上所创造的不用氧的成绩,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8 前进基地,Advance Base Camp,在一号营地与基地营之间,由于通道复杂多险,或路线过长时,常常需要在这中间再设立一个“前进基地”,将山上所需要的物资先从基地营运到这里,再从这里向山上往返运输,这种营地既不是基地营,也不是中间营地,就称之为前进营地。我国习惯称之为第二号大本营。美国队这次登珠峰,是从两条路线登顶,他们这个前进营地设在海拔



◎ 注释

6500米的孔布冰川西边的侧碛上，这样既可供应东南山脊一方，也可兼顾西山脊路线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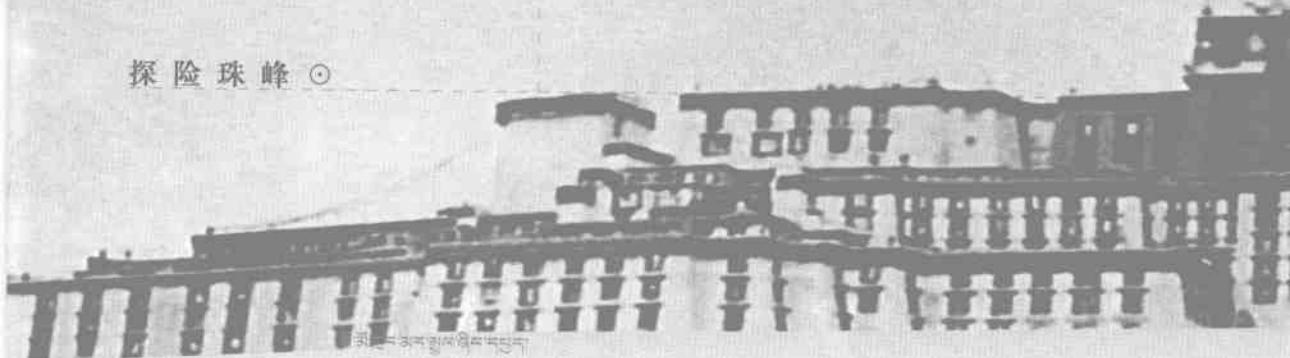
9 攀登珠峰最早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英国人开创的从1921年起就使用的“东北山脊路线”，即从中国西藏一侧的绒布冰川上山经北坳登上东北山脊，沿山脊登顶；另一条是1952年瑞士人开创的，从尼泊尔一侧，沿孔布冰川上山，登上南坳，沿东南山脊登顶。因为后来许多登山团队都使用这两条路线，通称为“传统路线”。

10 所谓阿尔卑斯登山即完全靠登山者自己的力量登山的专用名词。

11 目前国内尚无汉译本，周爱明女士将其译为《珠峰游魂——搜寻马洛里与欧文》，引文系她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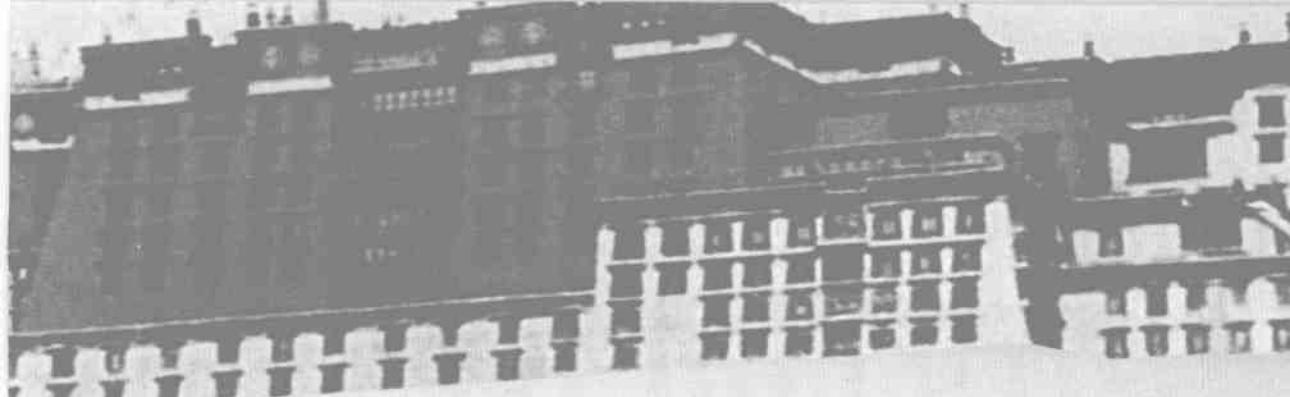
12 本章为我国著名高山气象学家高登义撰写。高登义，男，研究员，博导。研究领域为大气动力学。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1966~1998年，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山地环境气象学考察研究，在研究珠峰山地环境气象学和论证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汽通道及其对藏东南气候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等方面均有发现，曾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度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个人奖。

13 Couloir，国内有人译成峡谷。针对珠峰北坡面上的这两条 Couloir 来说，译成岩沟比峡谷更确切，因为它构不成大峡谷，只是一条沟谷而已。



附录：中国和世界的高山

地球上的高山分布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多高山，有的地区山虽多，但却不高，有的地方也仅仅是丘陵地带。亚洲大陆集中了全世界最高而且最多的大山脉。这里有长达2500公里、拥有众多高峰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有在世界地理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天山、昆仑山、祁连山还有兴都库什山、内外天山、秦岭、巴颜喀拉山、阿尔泰山和中国西南的横断山脉等。其中的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和昆仑山的西段，构成了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天然屏障，但也阻碍了古代中国与邻国和更远的中亚及欧洲的友好交往。在亚洲的各条大山脉上，集中了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高峰，以及世界上仅有的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和峰群。这里有世界最高峰、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Qomolangma)；第二高峰、8611米的乔戈里峰(Chogori)；第三高峰、8598米的干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第四高峰、8511米的洛子峰(Lhotse)；第五高峰、8481米的马卡鲁峰(Makalu)；第六高峰、8201米的卓奥友峰(Cho Oyu)；第七高峰、8172米的道拉吉利峰(Dhaulagiri)；第八高峰、8152米的马纳斯鲁峰(Manaslu)；第九高峰、8125米的南格帕尔巴特峰(Naga Parbat)；第十高峰、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Annapurna)；第十一高峰、8068米的迦雪布鲁姆Ⅰ峰(Gasherbrum I)；第十二高峰、8047米的布若阿特峰(Broad Peak)；第十三高峰、8035米的迦雪布鲁姆Ⅱ峰(Gasherbrum II)；第十四高峰、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Shishabangma or Xisababangma)。除此之外，还有闻名于世的诸如高丽珊卡、门龙泽、章子峰、格重康峰，南迦巴瓦峰、佳拉白垒峰、库拉冈日



◎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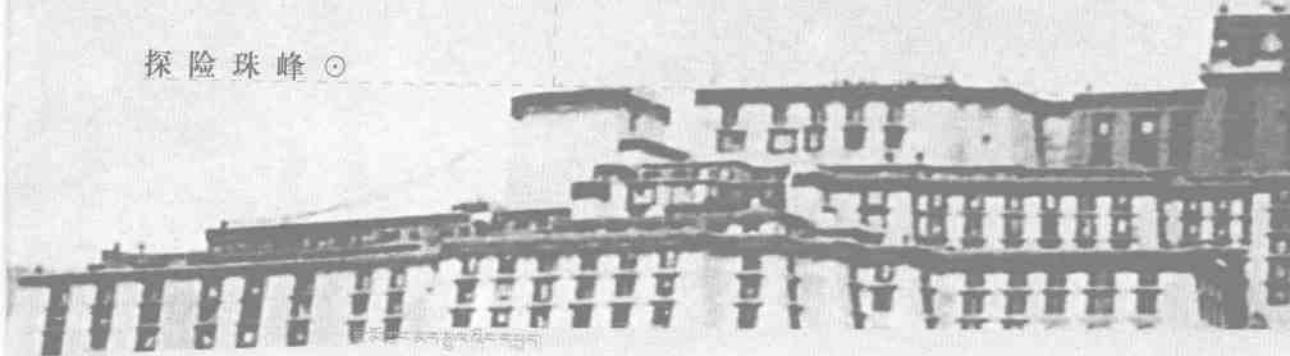
峰、古尔拉曼达特峰、希马楚利峰等7000米的高峰达380座之多。而海拔6000多米和5000多米的高峰就更是多得难以计算了。

除上述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之外，实际上还有15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只因它们均包括在三个8000米高峰的峰群中，人们一般不计算它们。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它们也是独立的高峰。它们是：珠穆朗玛峰群中的珠穆朗玛东北峰(8393米)，珠穆朗玛南峰(8763米)；在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的旁边还有雅兰康峰(Yawing Kang，8505米，也称干城章嘉西峰)，干城章嘉南峰(8491米)；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群中，还有洛子东南峰(8410米)，洛子夏尔峰(Lho Tse-Shar，8383米)。因此，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高峰实际上是29座。这确实是亚洲、也是中国的宝贵资源。亚洲以外的其他各大洲，甚至连一座7000米的高峰都没有。

亚洲大陆的中部，也就是中亚地区，是著名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这里有中国境内最长的、历史最悠久的、贯穿大半个中国内陆的昆仑山和天山。说它历史最悠久，是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欧美各国尚无历史记载时，我国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就有关于昆仑山和天山的记载了。

在帕米尔高原的北部，也就是在中国的国境以外，还有内外埃莱、兴都库什等大山。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具体地说是中国昆仑山的西段，有一个以7719米的公格尔峰为主的高峰群。帕米尔高原最高的山峰全都在中国的西昆仑山上。这里还有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或称公格尔Ⅱ峰)和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在这一带，有22座海拔6000多米的高峰。

紧邻帕米尔高原的西北部是埃莱山区。左边是扎埃莱山(即外埃莱山)，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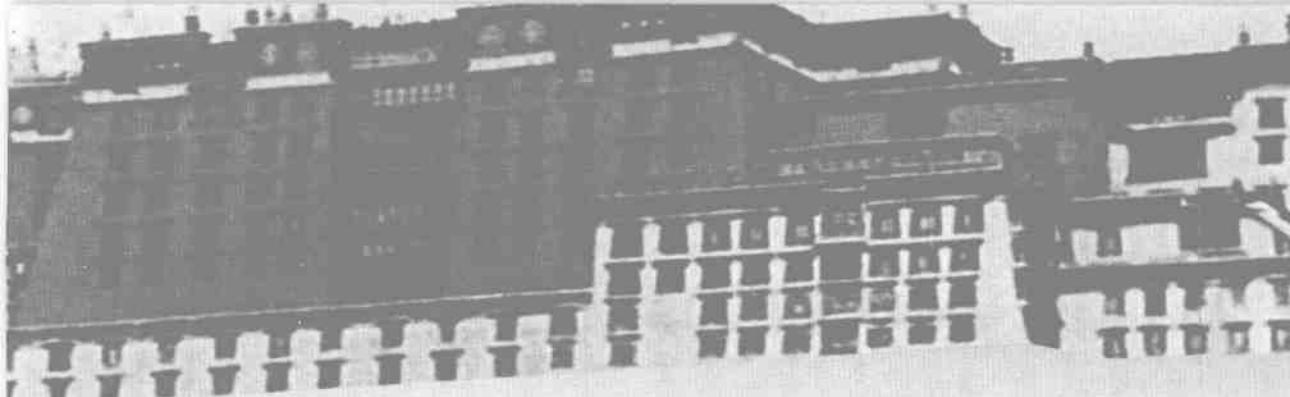


边的是内埃莱山，具体位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靠近我国新疆附近。这里有苏联时期著名的苏联国家最高峰、海拔 7495 米的共产主义峰(Kommunizma)，海拔 7134 米的列宁峰(Lenin)和海拔 7105 米的科尔仁聂夫斯卡娅峰(Korzheneuskaya)。它们是当时苏联境内仅有的三座超过 7000 米的山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包括革命峰(Levolutheya 6987 米)、费凯拉峰(Fekela 6726 米)、加里宁峰(Kalinin 6593 米)、科学峰(Akajemek 6726 米)等 6000 多米的山峰 37 座。

帕米尔高原的东北是天山和祁连山。“祁连”是蒙古语“天”的意思。这两座大山的名称都是“天山”，只不过一座用了汉语，另一座是用蒙古语的译音。天山长 1000 多公里，其东段和中段完全在中国境内，东段一直延伸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附近，在这里形成一个峰群。最高峰博格达峰，海拔 5445 米，在它的周围有 5 座 5000 多米的高峰和 16 座 4000 多米的山峰。天山最高峰是海拔 7435 米的托木尔峰，位于天山西段中国境内。与托木尔峰在同一条主山脊上的还有一座 6995 米的汗腾格里峰。在它们的东方有一座 6627 米的雪莲峰，周围还有 7 座 6000 多米的高峰。祁连山则横跨甘肃和青海两省，山势不高，最高峰祁连山海拔 5547 米，是中国甘肃省的最高峰。

亚洲大陆喜马拉雅山西段与喀喇昆仑和昆仑山三大山交汇的地方，地处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国境附近，有一个细长的高山湖，那就是著名的班公湖。在湖的四周也有一个高峰群，仅 6000 米以上的高峰就有 30 多座，大部分还没有查明它们的名称，这是一片非常珍贵的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的“处女地”。这些高峰中的绝大多数也都在中国境内。

从这里再向东南，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国西藏普兰县境内的狮泉河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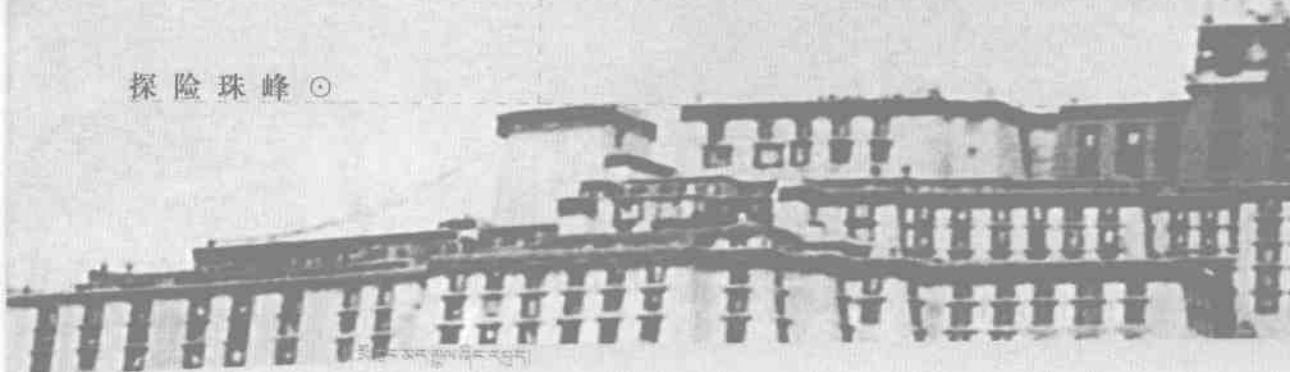


◎ 附录

有一座形状非常特别，远远看去像一个大馒头似的、没有棱角的圆秃秃的雪峰，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佛教圣山——冈仁布钦。虽然它只有海拔6714米，但却闻名遐迩，国际上称它为凯拉斯峰(Kailas)。每年都有许多来自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以及国内西藏各县、青海、四川乃至甘肃的信徒们前来朝圣。按藏传佛教的习俗，只要是神山，就只能朝拜，绝对不许攀登，以免触怒神灵而“降灾”于当地百姓。为了尊重这种宗教习俗，西藏自治区政府决定暂不对外开放，不准人们攀登此峰。这种宗教的习俗在锡金、尼泊尔和印度以及不丹等国也都有之。例如，位于尼泊尔与锡金边境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8598米)，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对外开放，允许外国登山家攀登，但细则规定，只能到达距顶峰10米处，而不准登上最高点，也是怕触犯了神灵。

在亚洲大陆的深部，具体位置是喜马拉雅山的东端，中国的云南省与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汇集的地方，是中国特殊的横断山脉。之所以叫横断山脉，是因为中国内陆所有的山脉走向，都是自西向东，惟有这里的山脉走向是自北向南。这是由于地球造山运动所致，把原来自西向东走向的山脉冲撞而呈南北走向了，所以叫横断山脉。横断山脉跨四川、西藏和云南三个省区。最高峰是位于四川西部大雪山上、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也叫“迷尼雅贡嘎”，这也是被当地藏族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山。在它的周围有20多座6000多米的高峰，是横断山脉中一个大的高峰群。

在贡嘎山峰群东北的日隆附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雪峰群，那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峰群。最高峰是四姑娘山，海拔6250米(亦称幺妹峰)，三姑娘峰5664米，二姑娘峰5454米，大姑娘峰5355米。在它的周围还有至今尚未查明姓氏的16座5000多米的雪峰。



在四川省的西部，也是贡嘎山群的西部理塘附近，有一个以6204米的格聂峰为首的峰群。它也属于横断山脉的一部分。

横断山脉的第二高峰，也是云南省的最高峰，是海拔6740米的卡格博峰（亦称太子峰），这座高峰也是世界闻名的。1902年起，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曾先后来此攀登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5年，先后有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高山探险家们前来攀登，虽付出了极大牺牲，至今还没有人征服过它。中国现行的地图将这座山峰称为“梅里雪山”（6740米）是不对的。这座山峰在云南和西藏边界的分水岭上，山脉全称叫“四蟒大雪山”。四蟒大雪山由两条山脉组成，全长150多公里，北段约50公里，是真正的梅里雪山，其最高峰是5295米的说拉曾师面布峰。它与卡格博峰在同一条主山脊上，一个在南（卡格博），一个在北，相距达28公里，它们中间以说拉山口为界，山口以南是太子雪山，山口以北才是梅里雪山，目前中国地图上的错误应当纠正。

在昆仑山脉的东部还有三座大山，它们是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可可西里山。具体位置是在西藏与青海和新疆的交界地带。巴颜喀拉山是我国长江、黄河及澜沧江和珠江的源头，巴颜喀拉山上没有很高的山峰，最高峰就叫巴颜喀拉，海拔5267米。但阿尼玛卿山就不同了，它的最高峰6282米，名叫玛卿冈日，还有一个名叫积石山。在它的周围还有3座6000米的高峰和10多座5000多米的峰群。玛卿冈日峰，也是国际上很有名的高峰，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位飞行员在青海上空飞行时说：“发现了一座比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还要高许多的高峰。”1947年10月，一位美国实业家米尔·雷诺和现任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的华士本两人

驾驶一架小型飞机专门飞到这里观看这座“比珠穆朗玛还要高”的山峰，于是这座玛卿冈日就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高峰了。那么它是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呢？这个问题到1986年才弄清楚。实际上它的高度只有6282米。在玛卿岗日的周围，也是一个高峰群，6000米以上的高峰有4座，5000多米的山峰达14座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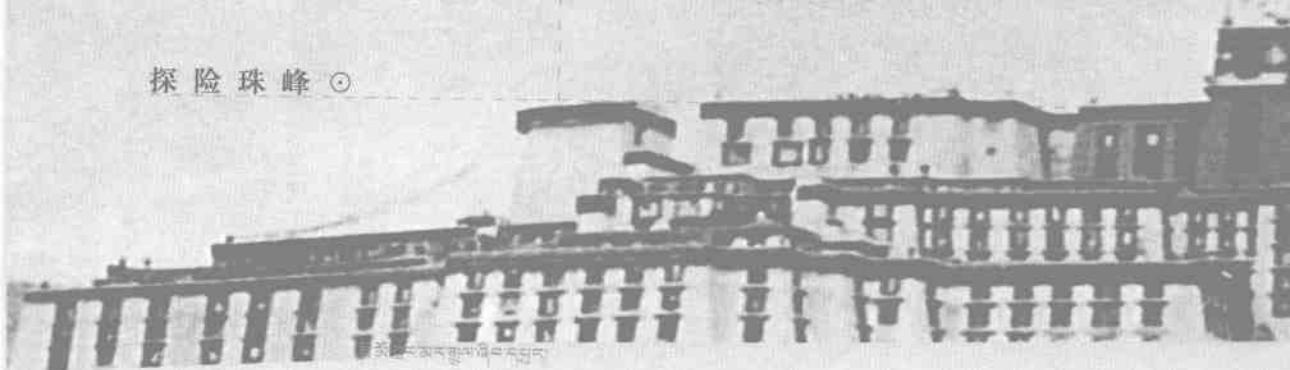
在亚洲，日本号称“登山大国”。日本人从事高山探险活动的人数确实达到八百余万，但是日本却是一个“高山小国”。虽然日本也有不少山，但都是低山，就连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富士山，也只是一座海拔3776米的死火山，只有冬季几个月积雪，全日本甚至连一条小冰川都找不到。

朝鲜半岛上最高的山，是中国与北朝鲜的边境线上的长白山，最高峰白头山，海拔2744米。朝鲜北部的最高峰是海拔2262米的卧碣峰(Whalal Bong)。朝鲜半岛南部的最高峰位于韩国的济州岛上，是海拔1950米的汉拏山(Hanrasan)。

中国台湾岛上最高的山峰是玉山，海拔3997米。还有7座3000米以上的山峰，它们是：大武山(3090米)、秀姑峦山(3833米)、南湖大山(3740米)和合欢山(3416米)、雪山(3884米)、奇莱主山(3559米)、卑南主山(3293米)等。

在亚洲内陆，中国和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有阿尔泰山。最高峰是达板·博格多(Taban Bogdo)，海拔4653米。蒙古国境内阿尔泰山的参巴·格拉布峰(Tsamba Garav)，海拔4208米，是蒙古国的最高峰。

中近东地区，只有伊朗和土耳其境内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伊朗国内最高峰，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厄尔布鲁士山上海拔5604米的德马万德峰(Demavend)，这也是一座死火山。伊朗北部海拔4821米的萨瓦兰山



(Savalan)和南部的海拔 4420 米的黑扎尔山(Hejar)，也都是古老的死火山。

土耳其国家最高峰是海拔5165米的大阿勒山(Ararat)，位于土耳其与伊朗边界附近土耳其的阿勒省境内，也是一座死火山。此外，土耳其还有三座3000多米的山峰。埃及境内西奈半岛的南端有一座海拔 2285 米的慕萨峰(Musa)。埃及国家最高峰为海拔 2637 米的卡泽利纳峰(Katherina)。

以色列国家最高峰是海拔1126米的麦陆峰(Meron)。而约旦境内的最高峰是海拔1331米的哈伦峰(Harun)。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附近的安迪·黎巴嫩山的最高峰是海拔 2814 米的旋伊克峰(Xuikh)。

大洋洲的山脉分布很广泛。从洲际范围来说，印度尼西亚虽然是一个亚洲的主权国，但它又是横跨亚洲和大洋洲的一个洲际国家。这里只介绍属于大洋洲的部分山区。大洋洲的最高峰嘉雅峰(Djaja)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上，海拔 5030 米，是印度尼西亚的最高峰，过去曾称为苏加诺峰(Sukarno)。山峰由石灰岩构成，雪线高度海拔 4500 米。第二高峰是位于新几内亚岛上、与嘉雅峰属于同一条山脉上的匹林姆斯特峰(Pilimsit)，海拔 4795 米。第三高峰是海拔4730米的特里科拉峰(Trikra)，第四高峰是海拔4694米的威尔海勒姆峰(Wilhelm)。大洋洲的第五高峰是位于新西兰岛上的库古峰(Cook)，海拔 3768 米。过去曾认为它是大洋洲最高峰，后来在测算了大洋洲范围内的新几内亚岛的洲属之后，确定嘉雅峰是大洋洲最高峰，这样排列下来，库古峰只能算大洋洲的第五高峰。

阿尔卑斯山(Alps)是欧洲最大的山脉，它南起法国地中海岸边，向东北经意大利、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德国直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附近，全长 1000 多公里，宽达 200 多公里。最高峰是蒙·勃朗(M.Blanc，4807 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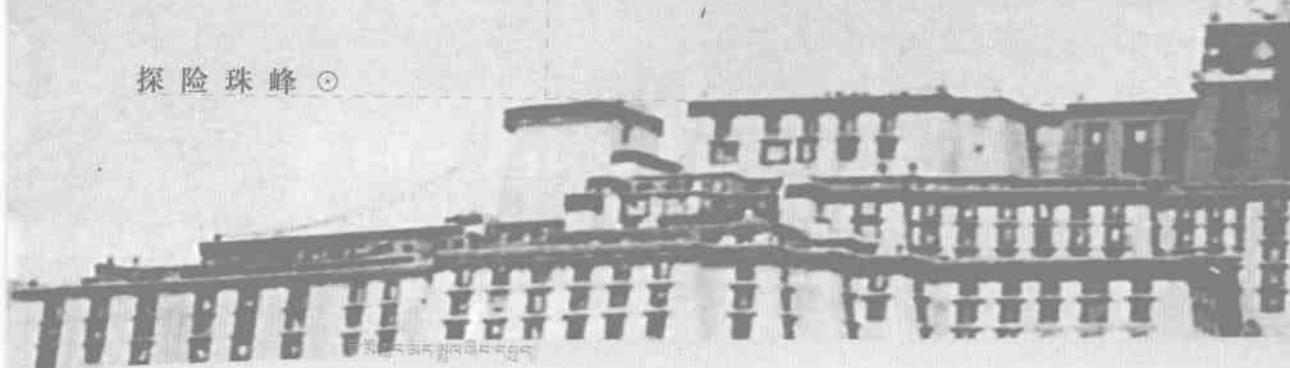
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分水岭阿尔卑斯山上。它是世界现代高山探险的发祥地，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各国登山爱好者们向往的地方。阿尔卑斯山上还有21座海拔4000米的山峰，而闻名全球、检验攀登者技术水平的埃尔峰(Eiger, 3970米)、古兰特·焦拉斯(Grandes Jorasses, 4208米)和马达霍隆峰(Matterhorn, 4478米)等三大险峰，也都在这里。

在欧洲和亚洲的洲际分界线，欧洲一侧的高加索山区，也是欧洲的高山区。在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大高加索地峡上，群峰争艳，这里有全欧洲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Elbrouz, 5633米)，也有与阿尔卑斯山上三大险峰相媲美的乌什巴(Ushba, 4710米)、卡兹别克(Kazbek, 5043米)、科希丹·达乌(Koxutan, Tau, 5145米)、克里切夫斯卡娅(Klyuchevskaya, 4850米)、盖斯多拉(Gestora, 4860米)、狄赫·达乌(Dykh.Tau, 5198米)等险峰。这里还有4000米以上的山峰19座，是欧洲重要的高山探险地区。

欧洲的另一个山区是位于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一侧的最高峰，是海拔3404米的阿聂托(Aneto)峰。在法国一侧的是海拔2785米的堪尼古峰(Canigou)。

环地中海地区没有什么高山。这一地区包括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南斯拉夫、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个地区的最高峰在意大利半岛的南端，是海拔3901米的奥尔托列斯(Ortles)，另外一座是海拔3323米的埃特那峰(Etna)，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是一座不时喷发的活火山。保加利亚境内最高峰是2975米的牟萨拉峰(Musala)。

捷克与斯洛伐克境内的喀尔巴阡山的最高峰是海拔2665米的盖尔拉霍夫卡(Gerlachovka)。



意大利境内的亚平宁山，其最高峰是海拔 2914 米的格尔诺峰(Corno)。

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没有超过海拔 2500 米的山峰。3 座较高的山峰是：阿比斯科(Abisko)，海拔 2117 米，是瑞典的最高峰。格尔德霍比根峰(Goldhopiggen)海拔 2468 米，是挪威第二高峰，其第一高峰是海拔 2470 米的格利特尔庭特峰(Gittertind)。

英国境内(包括爱尔兰)没有高山，英国的最高峰是海拔 1343 米的奔·聂维斯(Ben Nevis)。

北美洲的高山都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和邻近的加拿大西北部的尤科州(Yukon)境内。这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阿拉斯加山，另一座是森特·埃莱阿斯山(Saint Elias)。北美洲最高峰是海拔 6191 米的麦金力(Mckinley)峰，就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境内的阿拉斯加山上。另一座海拔 6050 米的北美第二高峰洛干(Long)峰，在加拿大尤科州境内的森特·埃莱阿斯山上。此外，这里有鲁卡尼阿(5226 米)、弗拉凯尔(5301 米)、弗拉克库班(5038 米)、勃纳(5030 米)和斯迪尔(5488 米)等 5 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山群。还有诸如大学(4581 米)、仓格斯(4345 米)、霍依特尼(4418 米)、埃尔贝特(4398 米)、威尔逊(4342 米)和渥特(4840 米)等 4000 米以上的山峰 25 座。这里是北美洲的一个很好的高山探险区。

在中、南美洲有地球上最长的大山脉——安第斯山(Andes)，从加勒比海的南美洲最北部开始，一直延伸到南美洲大陆最南端的费科岛，是一条全长达 8000 公里的大山脉，形成了一条环太平洋的大屏障。这条大山纵贯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各国。最高峰阿空加瓜(Aconcagua)海拔 6960 米，位于智利与阿根廷的安第斯界山上的阿根廷一侧。第二高峰奥霍斯·迭尔·萨拉多(Ojos del Salado)海拔 6888

米，位于智利与阿根廷的安第斯山边界分水岭上，是一座死火山。第三高峰是海拔6723米的卡奇峰(Cachi)，在阿根廷境内。第四高峰是海拔6660米的卡扎狄罗峰(Cazadero)，位于阿根廷境内。第五高峰是位于玻利维亚境内的瓦斯卡兰峰，海拔6655米(Huascaran)。在这一带的安第斯山上，共有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39座，海拔5000~6000米以上的山峰25座，是南美洲主要的高山探险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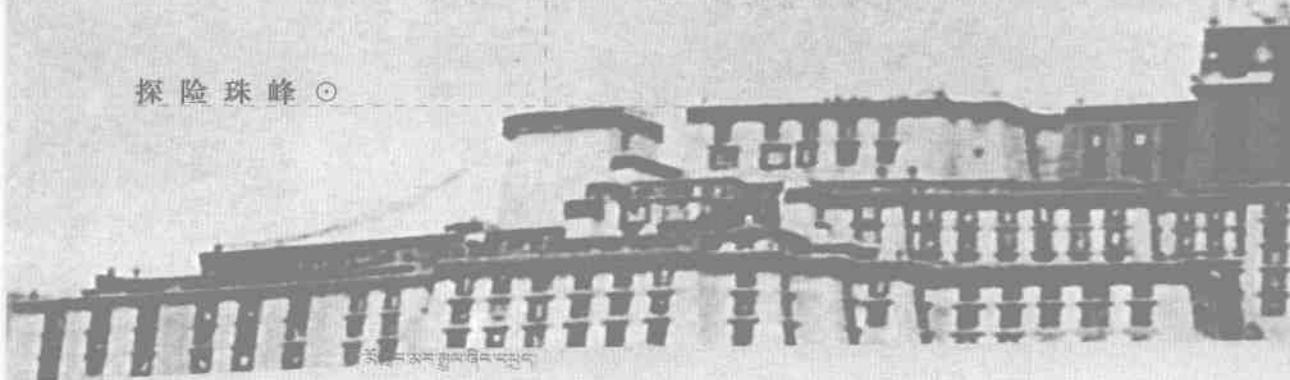
其他地区：太平洋上最高的山脉在美国的夏威夷岛上，最高峰芒那·凯阿(Mauna kea)海拔4202米，是死火山峰。

大西洋的高山位于葡萄牙属的阿佐列斯群岛，最高峰阿尔托(Alto)海拔2351米。

南极大陆的最大山脉是森迪聂尔山，位于埃尔瓦斯高原上，最高峰文森(Vinson)，海拔5140米，是南极大陆最高峰。此外，在南极大陆维多利亚，还有两座海拔4000米的山峰，一座是马克汉姆峰(Markham)，海拔4350米；另一座是利斯特峰(Lister)，海拔4023米。南极的极点海拔2800米，南极还有4座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

北极地区，除了在北极圈内的丹麦领地格陵兰岛上斯次阿兰德山上的弗瑞尔峰(Forel)海拔3362米以外，没有什么高山。因为整个北极是海洋，而不是陆地。

非洲的高山区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境内，最高峰是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峰(Kilimanjaro)，位于坦桑尼亚与靠近肯尼亚边界附近的赤道线上，也是一座死火山。与日本的富士山稍有不同的是，这座死火山是圆锥形(日本的富士山是锅底形)。在它的西面还有三座死火山，即梅鲁火山(4567米)、洛尔马



拉辛山(3648米)和奥尔德阿尼山(3188米)。

乞力马扎罗峰是坦桑尼亚的最高峰，也是非洲最高峰，是地球上最高的死火山。在它的东部不远处还有一座海拔5150米的死火山芒威齐(Mawenzi)，这是非洲第二高峰。在肯尼亚境内的海拔4985米的肯尼亚峰(Kenya)和乌干达境内的斯丹里峰(Stanley 5110米)等，都是非洲的高峰。

北部非洲，在摩洛哥境内的托布卡尔峰(Toubkal 4165米)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希门山上的瑞斯达珊峰(Ras Dashan 4621米)，也是非洲的高峰。

从全世界的山脉和高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是高山和高峰最多的国家，我们还有许多尚未有过人迹的待开发和开放的高山区。它们将为我国和世界的高山探险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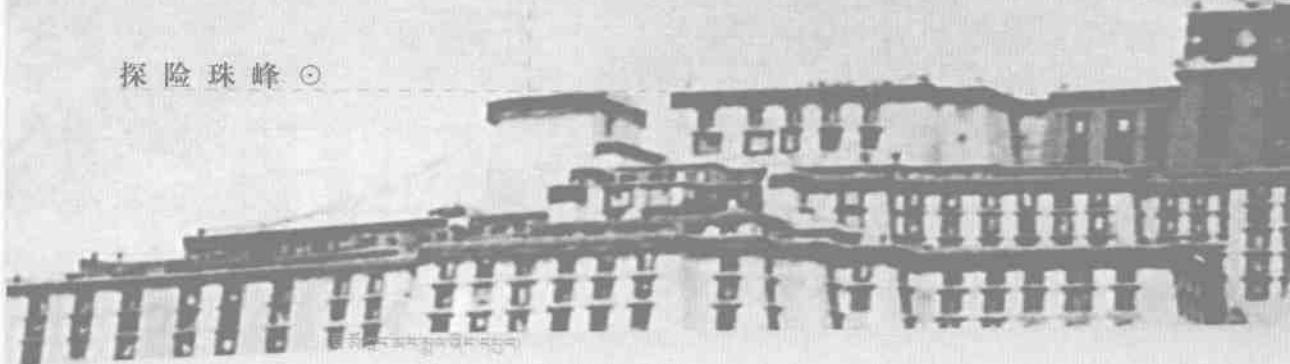
参考书

俄文资料

- 1.《登山运动员手册》，拉达达也夫著，1964，莫斯科
- 2.《登山运动》，马里伊诺夫，1970，莫斯科
- 3.《初级登山运动员手册》，E.A.契尔波夫，1974，莫斯科
- 4.《被征服了的高峰》，拉达达也夫著，1982年，莫斯科

英文资料

- 1.Alpine Journal by the Alpine Club England. 1921,1922,1923,1924,1925, 1926,1938,1952,1953,1960,1963,1964,1966,1974,1981,1992,1996 共 17 册
- 2.The American Alpine Journal 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 1988,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共 18 册
- 3.The True Book about Everest by Eric Shleton 1954, England
- 4.Sacred Mountains of the World by Edwin Bernbaum, 1922, San Francisco
- 5.Medicine for Mountaineering and Other Wildernes Activities by James A. Wilkerson M.D. 1966, Seattle
- 6.Everest the West Ridge by Thomas Hornbein, 1964, Seattle
- 7.Sjvalaya the 8000-metre Peaks of the Himalaya by Louis C. Baume, 1990, Gaston-West Col
- 8.World Mountaineering by Audrey Salkeld, 1998, Mitchell Beazley
- 9.High Asia by Jill Neate, 1999, Seattle
- 10.Into Thin Air by Jon Neate, 1999, Seat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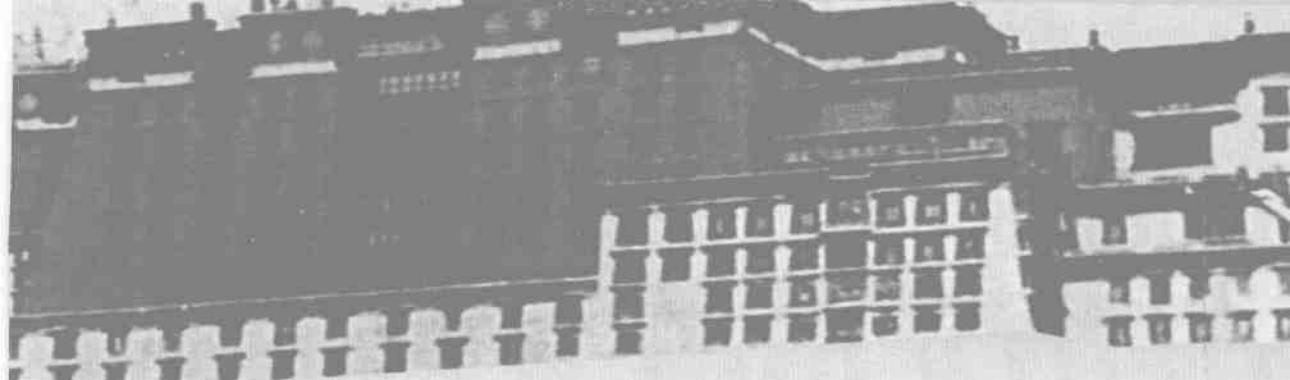
11. Reinhold Messner All 14 Eight-Thousanders 1998, The Crowood Press
12. Climbing Ice by Yvon Chouinard, 1997, Ann Francisco
13. Ghost Everest 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by Larry A. Johnson 1999, Seattle

日文资料

- 1.《1970年日本珠穆朗玛队报告书》，日本山岳会，1971年东京
- 2.《喜马拉雅名峰事典》，1997年东京平凡社
- 3.《世界的名峰》，山田圭一著，1987年东京白水社
- 4.《尼泊尔山间旅游指南》，中野融著，1992年山上溪谷社
- 5.《喜马拉雅的高峰》，深田久弥著，1976年东京白水社
- 6.《珠穆朗玛是从何时开始攀登的》，上村信太郎，1993年东京山上溪谷社
- 7.《岩与雪年鉴》1970, 1971, 1972, 1976, 1980, 1981, 1983, 1989, 1992, 1997年各号共10册
- 8.《珠穆朗玛峰》，1996年日本立正大学珠穆朗玛登山队报告书，1997年东京印刷出版

中文资料

- 1.《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2年科学出版社
- 2.《中国登山运动史》，中国登山协会编，1993年武汉出版社
- 3.《冰山雪岭两千年》，周正著，1983年展望出版社
- 4.《登山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周正著，1980年，人民体育出版社
- 5.《中国西藏》2002年合订本



◎ 参考书

- 6.《西藏登山运动史》，邵生林、成天亮著，2002年10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7.《西藏自治区经济地理》，孙尚志编，1994年新华出版社
- 8.《山野》杂志2003年第2期，中国登山协会编

后记

关于珠穆朗玛峰，国际上有许多文献史料和书籍。在纽约美国高山俱乐部的图书馆里，我见到过1921到1953年期间英国和其他国家出版的大量书籍。这些厚重的图书，系统、全面地记载了各国，特别是英国多次挑战珠峰的经历。在日本山岳会的图书馆里，也有英、美出版的大量原书、史料以及这类书籍的日译本。由于时间的关系，当时我仅能重点阅读其中某些篇章。这些史料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由此我想参考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国青少年和山地科学工作者们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2003年全世界纪念人类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五十周年之际，《中国西藏》杂志社的领导，特别是在藏学博士周爱明女士和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本书珠峰历史部分是周爱明博士撰写的，珠峰的气象一章为高登义教授所作。可以说本书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更大量的文献和史料来源，则是英国的S. Audrey女士、美国的N.Clinch先生、Pete Schoening先生、Tom Horbein先生和日本的渡边义一郎先生、田村达弥先生、坂井南雄治先生等好友所提供。此外，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以及李志新、王勇峰等同志的口述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在这里谨向这些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希望各界人士和读者批评指正。

2003年12月28日